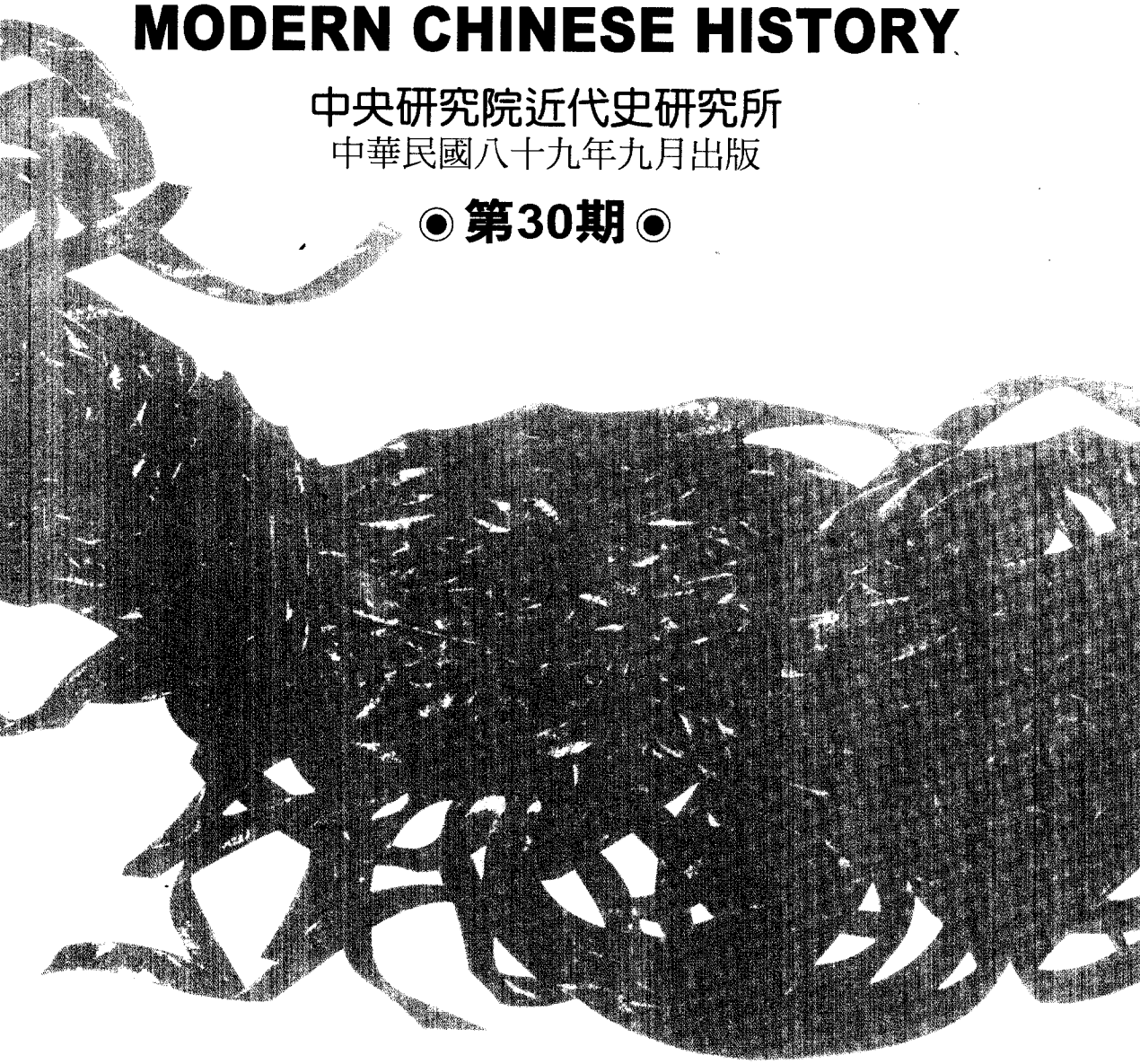
ISSN 1016-0566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NEWSLETTER FO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出版

◉ 第30期 ◉



李恩涵、林明德（由左至右）兩位先生榮退演講會

治學嚴謹、取材贍博的中國近現代社會經濟史專家王樹槐先生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 目錄 第三十期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出版

學術會議
「中國商人、商會及商業網絡」——第三屆中國商業史國際研討會會議報導 ..... 趙祐志 1
「回顧老臺灣、展望新故鄉——臺灣社會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紀要 ..... 洪健榮 11
「疾病的歷史」研討會會議報導暨近代史相關論文簡介 ..... 張哲嘉 16
「檔案管理與運用研討會」會議報導 ..... 莊樹華 22

學術演講
退休感言：暮靄回首來時路 煙波迷茫念師友 ..... 李恩涵 26

學人簡介
王樹槐 ..... 侯坤宏・李宇平・林蘭芳 40
Roland Felber—On the Occasion of his 65th Birthday ..... Ursula Ballin 57

研究概況
中國都市史研究的課題及其尋求的理論架構 ..... 貴志俊彥著・鍾淑敏譯 73
中國大陸最近之會館史研究 ..... 馮筱才 90

史料介紹
《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及其史料價值 ..... 吳蕙芳 109
《營謀小集》與商販經理知識 ..... 王爾敏 118
李國鼎先生照片資料庫網站介紹 ..... 蔡淑瑄 124

檔案與研究
國史館典藏臺灣省教育廳檔案介紹 ..... 歐素瑛 13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行《內閣漢文題本：戶科貨幣類》微捲簡介 ..... 鄭永昌 139
蔣中正總統檔案中之事略稿本介述——以民國19年爲例 ..... 陳進金 151

研究與討論
明清地域社會論的反思——《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新書序言 ..... 岸本美緒著・何淑宜譯 164

274

新書評介 *The Opium Empire: Japanese Imperialism and Drug Trafficking in Asia, 1895-1945*. By John M. Jennings .....謝美娥・陳惠珠 177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 .....鄭會欣 190

關文斌，《文明初曙：近代天津鹽商與社會》.....宋惠中 197

大事紀要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2000.4-2000.9)..... 蕭郁雯等輯 205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總目21~30期..... 213

封面設計：黃憲鐘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　呂芳上

編輯委員　呂芳上　林滿紅　陳慈玉　賴惠敏
朱浤源　李宇平　游鑑明　林美莉
張　寧

執行編輯　游鑑明

助理編輯　藍旭男　蕭郁雯　張珍琳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半年刊　**第30期**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華民國台北市南港區
電話：27824166
郵撥帳號1034172-5

印刷者　文芳印刷事務有限公司

定　價　新台幣 100元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出版

GPN 509538890011
ISSN 1016-0566

學術會議

「中國商人、商會及商業網絡」—第三屆中國商業史國際研討會會議報導*

趙祐志**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爲推動中國商業史的研究，曾於 1996、1998 年舉辦兩屆學術研討會，第一屆主題討論中國自明代以來商業集團崛興的背景及發展因素，第二屆則著重探討商人在歷史轉變期中所扮演的角色、商人的經營及投資行爲、商人與政府的關係、商人的活動網絡、商人的社會階級等。[1]甚爲成功的兩屆研討會，已爲海內外研究中國商業史的學者建立良好的交流管道。

本次會議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又與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合作，舉辦規模更盛大的國際學術討論會，本屆商業史主題爲中國商人、商會和商業網絡，議程三天，總計有六十多位學者參與，宣讀了二十八篇論文，議程參見文末附表，尤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天津、武漢三大商會研究重鎮的學者，都出席了本次會議。

從本次會議的論文中，可以看到國家（state）、社會（society）兩種力量發展的軌跡。

就國家力量的發展言，在晚明商業力量似仍難與政治力量抗衡。卜永

---

* 感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邱澎生先生提供修改意見。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1 兩次會議的相關報導，可參見 *Chinese Business History*,Vol.6, No.2（1996）、《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期 3（1997）、《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 年 3 月），期 27。

堅的論文透過明末「黃山大獄」，吳養春等十四名徽商被魏忠賢「追贓」的過程，估算吳養春的資產和業務，以瞭解兩淮鹽業經營的概況。從卜文中，可以看到商人經營事業，常需尋求政治靠山，但政治力量卻非其所能掌握，一旦形勢丕變，只能任由政治力量宰割。

但至二十世紀初，商業力量顯然已具有相當的自主性。朱英的論文指出本世紀初商人流行「在商言商」一語，此不僅爲商人由四民之末躍居社會主導力量的反映，同時，商人也常藉口「在商言商」，抗拒參與政治。但「在商言商」亦有積極性，商人不僅經常據此抵制官府的束縛和限制，甚至更以此向政府提出參與商政的要求。至 1920 年代以後，商人參政意識更爲強烈，不斷發起各項政治運動，商人由「在商言商」轉變爲「在商言政」、「在商行政」，逐漸突破「在商言商」的戒條。

陳忠平的論文亦有類似看法，其文指出在以往「革命中心史觀」下，長江下游商會被誤述成對革命猶豫、與清朝妥協、背棄臨時政府、投靠袁世凱，是軟弱無力的資產階級。但實際上，長江下游商會掌握地方金融大權，擁有功名，是十分有力的群體，並且能將個人利益與地方公共利益、民族利益結合轉化，在反抗鐵路國有政策上，其自視爲公共利益、愛國主義的代表，利用輿論迫使清廷讓步，因此，並無需參加革命。在辛亥革命中，上海傾向武力支持，蘇州運用影響力和平地宣布獨立，杭州僅重視維持地方安定，顯示各地商會根據不同的地方公共利益，而有不同抉擇，具有相當的自主性。民國後，因革命黨政府強徵行政、軍事費用，乃由支持孫中山轉而投靠袁世凱，此正顯示商會是不受任何政權左右的民間力量。

從陳劉潔貞的論文中，可以看到香港華商在政治抉擇上，亦有類似的自主性。其文指出香港華商透過慈善事業、參加公共事務，提高和維持領導地位，至十九世紀末，殖民政府已無法漠視華商領袖對穩定殖民統治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省港大罷工時更是如此。香港華商對激進主義的支持與否，最後仍取決於商業利益，1911 年香港華商支持共和革命、1913 年又響應二次革命，但 1921-1934 年，整個香港商界卻充滿反共氣氛。這是因爲中共在廣州、潮汕地區活動，而這兩個商業中心與香港商人利益息息相關，中共被認爲是省港大罷工、廣州暴動等一連串動亂的元兇，因此，對中共缺乏好感。甚至當孫中山傾向聯俄容共時，香港華商亦排拒孫中山。香港

殖民政府與華商聯手創造反共氣氛，運用影響力，藉報紙形成反共輿論，並透過操縱勞力市場，形成各階級一致反共的態勢。

民國初年，在廣州地區，商人不僅自主意識強烈，力量甚至不下地方政權。邱捷的論文指出：民初廣州商人面對政權更迭頻繁，社會動亂不斷，匪患兵禍相連，而無論革命黨人或軍閥都不能給商人安定的保障，乃在 1912 年成立粵省商團。其透過行業、街區發展團員，得到商界支援，力量強大，不僅合法擁有武器，而且多次參與保衛社會治安、調解軍事衝突的責任，成爲廣州的另一權力中心，最後甚至與孫中山政府發生衝突。

但至 1930 年代以後，國家力量開始藉經濟不景氣的機會，大肆擴張。城山智子的論文指出 1930 年代上海商界由於美國通過購銀法案，引發白銀外流，造成通貨緊縮、企業倒閉等經濟危機。在此情況下，以總商會爲領導中心的上海商界，不得不尋求國家力量的支援，政治勢力乃得以介入，總商會在 1930 年代以後漸趨衰弱，與此似不無關係。

汕頭亦是如此，黃挺的論文指出汕頭商會在 1930 年以前實力極大，對民國政府、廣東省政府，都保持相當的獨立性。汕頭商會控制著市面的金融流通，甚至 1929 年財政部發佈取締地方錢莊、商號私發紙幣的公告，商會亦未理會。直到 1933-1934 年經濟危機爆發，商會無力平服，政府才得以利用機會，動用公權力，維持社會秩序，逐漸掌握汕頭的金融大權。

連浩鑒的論文，也顯示 1930 年代地方軍閥政權掌控商業力量的企圖。其文指出廣東軍閥陳濟棠在 1933-35 年，推動「三年施政計畫」，對砂糖商人加以收編，陳在農業經濟教授馮銳的指導下，建立六座砂糖提煉廠，利用不景氣的機會，低價購進生產設備，以貸款鼓勵農民種植甘蔗，提高進口砂糖稅，杜絕走私，並以特許制度，建立壟斷機制，軍閥政權控制了一切遊戲規則，商業力量只能伏首稱臣。

再者，中央政府也把握「戰時統制」的機會，伸張力量。鄭會欣的論文，利用財政部、貿委會檔案，刻繪抗戰時期三大國營貿易公司之一：「復興商業公司」的創立及初期活動。[2]該公司係應「中美桐油借款」而成立，

---

[2] 另兩家國營貿易公司爲富華公司、中國茶葉公司，這兩家公司後來分別在 1942、1944 年併入復興商業公司，使復興公司成爲執行戰時中國統制貿易的唯一國營公司，肩負中國對外貿易的重任。

資本全來自政府，公司的董監事、經理人員全由財經官員、銀行家出任，公司購置交通工具、開拓運輸路線，承擔桐油的收購，完成對美借款的償還，爲中國爭取西方援助開創了新模式，但政府也藉此從中壟斷了對外貿易。

二次大戰後，國家力量在大陸地區佔有絕對優勢，劉建中的論文簡述1950-52年廣州人民政府將舊工業會、商會、同業公會統整爲「工商業聯合會」的過程，及50年代廣州工商聯的作用，其過程全由國家力量主導，其功能亦全爲國家服務。

馬敏的論文也指出中共政權建立後，削弱舊商會的經濟、社會功能，將其改造爲政治功能爲主的工商聯組織。但自70年代末期改革開放後，隨著市場經濟的加強，工商聯已不敷時代需求，馬敏建議應將其轉化真正代表企業利益、爲企業服務的民間商會，並將工商聯、貿促會系統的國際商會、進出口行業商會等系統，加以整合，建立新的中國商會聯合會，以提升商會的中介作用。

香港，雖爲商業力量沛然之地，但從何佩然的論文中，可以看到當經濟力量有所未逮時，政府力量亦會伺機伸展。其文指出50年代逃難的中國移民大量遷居香港，以此爲背景，刺激沙田墟市的興起，並因而成立沙田商會，此亦代表地方經濟力量的興起。但在70年代晚期沙田經濟力量轉化時，政府利用發展新市鎮的機會介入，在沙田墟市清拆過程中，沙田商會無力爲商家爭取權益，因而走上沒落。葉景明、伍碩康的論文，討論一九九七年香港歸還中國，對於商工團體的影響，香港的工商團體爲避免政治力量干涉，失去功能，缺乏活力，乃以致力草根化、反官僚主義、緩和反共態度爲對策。

從張素玉的論文中，可以窺見海外華人與當地政權間的關係。其文指出菲律賓華商總會是殖民政府與華人間的中間媒介，華商總會既致力保護華人的利益，也需配合執行殖民政府政策。獨立後，菲國甚晚給予華人公民權，而且所給的公民權亦不完整，不容許華人在政治上扮演積極角色。再者，華人欠缺共同基礎的政治組織，因此，華人利益仍有賴商聯總會（簡稱「商總」）爭取。商總以贊助政治的方式，進入菲國的政治文化中，親近歷任菲國總統，藉此增加影響力。但相反地，菲國總統也透過商總控制

華人的經濟行爲，並實現個人的政治目標，而且這種方式有利於菲國政府的多元控制，可能更甚於增進華商的利益。

再就商業力量的發抒而論，商業力量不論個體或群體，都常能透過建構網絡增強力量。在個體方面，浜下武志的演講，認爲中國商人創出「合股」形式，將血緣、地緣、業緣各種網絡，以合股的方式加以統合，增強實力。至近代後，中國商人更突破合股，引進新形式的企業組織。朱蔭貴論文討論 1882-1887 年中國第一批股份制企業，中國商人突破以往獨資和合股的狹隘，通過發行股票，公開招商集股成立股份制企業，使籌集資金的網絡更爲擴大，而且，這種新形式企業的資本總額，竟可達清政府全年歲入的 1/7-1/8，重要性可見一斑。

在劉義章有關榮昌泰瓷莊的研究中，雖看到該商號將過多資金投於購置房地產，種下商號失敗之因，印證傳統商業資金習慣投資房地產，致無法進一步累積的說法。但投資土地並非絕對不利商業活動，在林玉茹的論文中，可以看到臺灣竹塹郊商的機敏，其將獲利投資於土地，不僅藉此保值，也透過租佃土地，收取實物地租，並以商品形式售出，直接控制生產、運銷環節。再者，竹塹郊商更藉土地投資、修築埤圳，與其他商人、地主、佃戶、村民建立社經網絡，有利於控制商品出口、資金融通、進行開拓事業，故能在與艋舺、鹿港、大陸商人的激烈競爭中取得優勢。

在群體商業力量的表現方面，上田貴子的論文，考察東北地區 207 個商會，3,977 名商會幹部，其中，當地籍 1,867 名，河北籍 860 人、山東籍 744 人，指出河北幫、山東幫在東北地區擴張的事實。但兩幫分布地區頗有差異，平原地區河北籍較佔優勢，邊界地區則山東籍較佔優勢，奉天地區由奉天籍、河北籍、山東籍三分天下，大連、哈爾濱兩地則以山東籍較佔優勢。

東北爲新拓之地，地緣性的商人群體較有發揮餘地，但在經濟較發達地區，同鄉組織對商業活動的影響，似有式微的趨勢。馮筱才的論文，對寧波商人做個案研究，指出同鄉組織在較早時期，與商業關係較密切，至民國後，同鄉組織多爲慈善機構，不應過份誇大其商業性，寧波商人依賴家族、個人關係的網絡更深。同鄉組織在商業活動有影響，但根本關鍵仍在利潤。同鄉雖常合力創辦企業，但仔細考察他們除有同鄉關係外，又常

有血緣關係，而且血緣關係可能更重要。再者，寧波商人在員工招募時，雖喜用同鄉，但需要專業技術時，也可招募非同鄉；資金的放貸亦同，有利可圖時，非同鄉亦可借貸。劉義章的論文也有類似的看法，榮昌泰瓷莊是集同鄉資金所創立，但在劉家發生危機時，即便是同鄉也可爲利益不惜落井下石，後來幸賴有血緣關係親友的支持，才渡過難關。這兩個研究顯示：地緣組織在民國以後雖然確實已趨式微，但是否可視爲傳統商業組織轉變的證據，則仍有待更多研究支持。

在海外華商群體網絡的建構方面，劉宏的論文指出：華人共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對華人建立跨國商業網絡、企業，具有很大的影響力，近代華商即善用這種背景，建立跨國性的商業網絡。

近代商會網絡的建立，更是商業力量發抒的明證。胡光明的演講指出：二十世紀初，中國建構了全國商會聯合會——各省商會聯合會——各通商大埠、省城商務總會——各府廳州縣集鎮商務分會——小城鎮商務分所的商會網絡，是中國歷史上民間新生社會勢力第一次合法地打破各省區的分散隔離，結成嚴密有序的網絡系統。這個網絡系統對於制度的創新、金融商務風潮的平息、反帝愛國運動的領導、新技術的引進、商務調查的實施等皆有貢獻，同時，也顯示資本家階級力量的成長。

不僅全國建立嚴密的商會網絡，地方商人亦根據不同實力，整建出多元網絡。徐鼎新的論文指出：上海的一流巨商建立總商會，二流商人也創出滬南商會，中小企業商人則建辦各路商界聯合會，形成三大商會分庭抗禮之局，此亦爲上海商會特有的多元網絡。

上海一流巨商創立的總商會，以行業團體爲紐帶，故能使該會「聯絡眾商」的意圖較順利貫徹，但黃漢民的論文中，我們看到中小商人的力量勃興更快。其文指出「上海機製國貨工廠聯合會」在組織行爲上吸納中小企業、秉持平等民主原則，會務活動上確立務實、服務原則，故其成立後即生氣勃勃。反觀上海總商會在組織行爲上，排拒新興中小企業、重商輕工，領導階層又多爲紳商、買辦，與軍閥官僚、外資勢力掛勾，在許多問題上，態度常與一般工商業者背道而馳，總商會行爲、職能的偏離，終於導致 1930 年代的沒落。

在宋美雲的論文中，可以看到商會網絡也向國外伸展。該文論述二十

世紀初天津商會與國外商會、商人交往的方式，及對天津地方經濟發展的作用。天津商會透過組團互訪、考察、座談，參加國際貿易展覽，書信、電報、電話傳遞，市場、商情調查，報刊溝通等，與外國商會、商人建立聯繫網絡，對於天津進出口貿易、外資引進、國際合作、加速工業化、傳播新觀念等皆有貢獻。

商業力量的發抒，也表現在有形的市場體系建立、商業技術革新及無形的商業精神提升等方面。就市場體系的建立言，張利民的論文指出：遼寧地區開埠後，因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近代工業的勃興，鐵路、海運等交通運輸的變革，農產商品率的提高，不僅與世界市場接軌，亦促進商品流通市場體系的建立。這個市場體系以大連、營口、瀋陽、安東爲中心市場，錦州、新民、遼陽、海城、鐵嶺、法庫門、昌圖、開原等爲中級市場，另有成百上千的初級市場。

就商業技術革新及商業精神的提升言，葉文心的演講，指出商業史研究不僅要看商業發展過程中的「經濟結構」調整與轉變，也要重視「商學知識」的結構轉變。晚清以降中國與歐美日的商業交往，不僅是兩種商業組織的交互影響，更是兩種不同「商業文化、商業知識」的相互接觸。上海商界在商業知識結構上的轉變，對促進商業力量的發抒作用極大。

徐鼎新的論文亦指出：上海總商會建立後，即鼓吹商業道德、服務精神；引進泰勒科學管理、設立檢查所、檢驗局實施品質管制；協助政府研訂商業法令，將商業納入法制的軌道；推廣商學商智、試辦商業學堂、實業學校，創辦商業期刊、商業圖書館、商品陳列所；舉辦國貨展覽、參加萬國博覽會等，大幅增強了商業力量。

再者，馬長林的論文，利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金城銀行檔案，考察1930年代上海銀行界的風險意識。指出此時上海銀行界已提出、並能貫徹放款、抵押品分散風險的觀念，銀行也知聘請經濟學家指導信用調查，其信用調查不僅項目周密、隨時變動，並建立業界報告員制度，最後上海銀行界甚至成立「中國徵信所」，專門提供各類調查，該所的報告書發行量、參加會員皆直線增加。此文顯示上海商人商業智識的漸趨增長，亦可爲商業力量發抒的有力佐證。

本次商業史會議對國家力量、商業力量的討論，可謂充分而具體，但

對介於國家、社會之間的「公共領域」則討論較少，葉漢明的論文試圖從此角度論述山東濰縣商會的發展。其文指出：濰縣自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青島開埠、膠濟鐵路通車、該縣開埠後，其經濟即迅速成長，商人力量亦因而崛興，反映在濰縣商會，其領袖由士紳轉變爲紳商，再變爲商人。同時，商會成立後即在城市治安、慈善事業等「公共領域」扮演重要角色。但在南京國民政府、日軍佔領時期，國民黨勢力、親日力量一度滲入商會領導層，商會受到政治力量的影響。另方面，商會領袖則利用這個場域，憑藉其在國家與社會間的中介角色，在中央與地方左右逢源、謀取私利，此現象成爲「公共領域」向「市民社會」過渡的一種障礙。

陳忠平的論文在公共領域方面的討論亦多，其文指出：長江下游商會的組織、活動，已突破官方的直接控制，也超越私人活動，確實符合公共領域的範疇。但值得注意的是，商人利用商會進行公共活動時，並未放棄自身利益。透過商會，商人精英將在地方上的個人支配，轉化爲集體支配，將個人的利益與地方公利、民族利益結合起來，正是這種公、私利益的考量，促使長江下游商會在鐵路國有風潮上採取非暴力的抗爭，充份運用公共輿論對清廷施壓。其次，商會的組織原則的規定，使其並非普通商人而是商人精英的組織，其能取得商人利益、甚至地方公利代表的地位，實賴其在社區的影響力、對社區資源的壟斷，以及對社區公共利益有效的控制與保護，在鐵路國有風潮、國會請願運動中，商會不僅代表了社區公共利益，也鞏固了對地方事務的支配權力，並力圖將權力擴展至國家事務範疇。

綜括本次會議，學者善用當地珍稀的檔案資料，研究區域遍及上海、天津、廣東、東北、山東、臺灣、香港、菲律賓、印尼等地，研究時點從晚明、盛清、晚清、民國到當代都有，有試圖爲舊問題下結論者，亦有提出新穎視角、資料者，現場討論熱烈而融洽，確實是一次成功而圓滿的會議。

第三屆中國商業史國際研討會議議程

主題	主講人	論文題目
中國商人、商會及商業網絡	Wen-hsin Yeh（葉文心，加州大學）	Business, vocations, and the Shanghai merchant circle（商業、職業及上海商界）

	Takeshi Hamashita（浜下武志,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在中國民間社會經濟的「股」和它的歷史作用
	胡光明（天津社會科學院）	論商會網絡體系的構建與近代中國資本家階級的成長
上海商會與上海商界	徐鼎新（上海社會科學院）	近代上海商會的多元網絡結構與功能定位
	黃漢民（上海社會科學院）	上海「機聯會」的組織行爲與會務活動——兼談上海商會的行爲偏離
	馬長林（上海市檔案館）	民國時期上海銀行界的風險意識
商人團體、商人政治與國家政權（一）	劉宏（國立新加坡大學）	Beyond business: the cultural poetics and social politics of Sino-Southeast Asian transnational networks
	Therwsa C. Carino（張素玉,香港愛德基金會）	Chinese merchant organization,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patronage: the case of the Philippines
	Olivia Ip（葉景明,香港城市大學）、伍碩康（香港大學）	Across the 1977 'Divide': a look at contemporary trade union centers in Hong Kong, their changing structure, industrial roles and functions in society
商人團體、商人政治與國家政權（二）	陳忠平（加拿大麥基爾大學）	長江下游商會與辛亥革命關係新探
	陳劉潔貞（香港大學）	Business and radicalism: Chinese merchants and communism in Hong Kong,1921-1936
	Alfred Ho-yuke Lin（連浩鋆,香港大學）	Warlords and merchants: Guandong's sugar industry and sugar merchants under Chen Jitang's "Three-year administrative plan", 1933-1935
前近代以來中國商	Billy Kee-long So（蘇基朗）	Transaction cost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in maritime trade: a case in premodern China

業信用與交易成本	Tomoko Shiroyama（城山智子，日本北海道大學）	The limit of credit: the crisis of Shanghai business community during the world depression
中國近代商會與地方政治和社會	朱英(華中師範大學)	「在商言商」與近代中國商人的政治參與
	邱捷（中山大學）	民初廣東的商人團體與社會動亂——以粵省商團爲例
	葉漢明（香港中文大學）	商會與民國時期的地方領袖——山東濰縣的例子
商會的網絡與地方經濟發展	宋美雲（天津社會科學院）	二十世紀初天津商會對外交往與城市經濟的發展
	黃挺（汕頭大學）	1933 至 1934 年金融危機中的汕頭市商會
	Taka Ueda（上田貴子,大阪國語大學）	就工商人資本的籍貫來看中國的東北地區
商人與商業網絡	卜永堅（香港城市大學）	天啓黃山大獄中的徽州鹽商
	林玉茹（臺北中央研究院）	商業、土地與網絡——清代臺灣竹塹郊商的土地經營策略
	馮筱才（浙江大學）	寧波商人與他們的同鄉組織,1911-1949
商人、商品流通與市場	張利民（天津社科院）	遼寧近代商品流通市場體系的初成
	劉義章(香港中文大學)	客家商人與興寧榮昌泰瓷莊
近代中國企業研究	朱蔭貴（中國社會科學院）	近代中國的第一批股份制企業
	鄭會欣(香港中文大學）	復興商業公司的成立與初期經營活動
香港商會研究	李培德（香港大學）	香港華商會研究的回顧與計劃
	何佩然（香港中文大學）	地方經濟力量的興起與衰落——香港新界沙田商會的個案研究
現代中國商會的演變和發展	馬敏（華中師範大學）	從商會到工商聯——中國商會的現代變遷
	劉建中（廣州市工商業聯合會）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廣州工商社團組織

「回顧老臺灣、展望新故鄉——臺灣社會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紀要

洪健榮*

在新史料的問世、新視野的開拓以及本土意識高漲的推波助瀾下，臺灣社會文化研究成爲目前蓬勃發展的學術課題。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主辦，中華民國臺灣史蹟研究中心協辦的「回顧老臺灣、展望新故鄉——臺灣社會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於民國 89 年 5 月 5、6 日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綜合大樓五樓國際會議廳舉行。與會人士包括國內各大專院校教授和研究生、各研究機構學者、各地文史工作團體負責人以及臺北、高雄兩市暨全省各縣市公立中小學教師代表等二百餘人，共襄盛舉，進行多重領域的對話。在兩天總計 8 場的研討會中，由國內學者專家宣讀論文計 21 篇，分別以臺灣史各時期之社會結構與社會生活的演變，以及學術、藝術和庶民文化的發展爲主題，共同切磋，從事學術成果的交流。

5 日上午，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長簡茂發先生、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楊正寬先生依序致開幕詞之後，緊接著第一場論文發表由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曹永和院士主持，國立花蓮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系副教授康培德宣讀〈荷蘭時代村落頭人制的設立與西拉雅社會權力結構的轉變〉，主要以臺南平原的平埔族群西拉雅（Siraya）社會爲研究客體，論述荷據時期村落頭人制的實施緣起、行政職掌和其相對於原村落層級制暨兩性社會地位的權力轉移，經由權力結構的重新調整，塑造出跨村落政治菁英分子的集體經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溫振華在〈清代武頂灣社社史〉一文中，根據田野實察、方志文獻、調查報告、老字據尤其是新近發掘的三重市李乾龍家藏地契，考證平埔族武頂灣社的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社域範圍大約分佈於今三重、新莊、五股、泰山、板橋一帶，以及該社與擺接、龜崙、霄裡社之間的公有地域，另解說其在漢人拓墾、官方屯制與宗教文化的影響下所產生的社會經濟變遷。

第二場論文發表會，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鄭瑞明教授擔任主持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講師施志汶宣讀〈臺灣史研究的史料運用問題——以清代「渡臺禁令」爲例〉，檢討自連橫《臺灣通史》、伊能嘉矩《臺灣文化志》以降各種涉及渡臺禁令說法的論著，比對《六部處分則例》、《大清會典》等官書的相關記載，顯示禁令存在的真實性和合理性，其實缺乏有效史料的支持。高雄科學技術學院共同科講師張妙娟〈從《臺灣府城教會報》看晚清臺灣長老教會的白話字教育〉一文，分析 1885 至 1895 年間《臺灣府城教會報》的各期報導中對於學習白話字的鼓吹、作爲白話字教育的輔助及其與白話字書籍出版的關係，闡述當時臺灣長老教會推行白話字教育以傳播基督教福音的成效。

相對於上午以荷據、清領爲時代背景的專題研究，5 日下午的兩場論文發表會主題則環繞於日治、戰後之社會文化的探討。第三場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陳郁秀院長主持的發表會中，國立臺北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系助理教授何義麟〈日治時代臺灣廣播事業發展過程初探〉一文，論述從 1928 年臺北放送局的設置、收音機的普及到廣播事業的推廣過程，包括收音機在教育方面的運用、在戰爭動員時期的功能以及全島廣播網對臺灣社會的影響。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蔡淵絜〈從傳統布袋戲到金光布袋戲——由「範式轉換」看百年來臺灣布袋戲的變遷過程〉中，援引美國科學史家孔恩（Thomas S. Kuhn）的典範論（pradigm）作爲參照架構，關注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外在環境與內在因素如藝術體驗、感知方式、演出配置、表演方式、主題內容、表現對象的交互影響，審視近現代臺灣布袋戲類型的起落消長與演變趨勢。國立藝術學院校長邱坤良在〈飄浪舞臺——臺灣職業新劇團變遷〉一文裡，透過演員訪談與劇本整理的田野調查資料，勾勒出戰後數十個職業本土話劇團的組織、營運、劇本、演員及演出內容等之發展，探索新劇團的興衰與臺灣政治氣氛、大眾文化之間互動的歷史脈絡。

第四場論文發表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任劉翠溶院士主

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吳政憲在〈近代臺灣「彗星牌」燈油銷售通路（1860-1910）〉中，考察清末到日治前期暢銷於臺灣的美國「彗星牌」（Comet）燈油之貿易經營、市場競爭、價格波動、行銷對象，以及全島銷售網路的南北區域差異，論說其與當時民眾日常生活的緊密關聯。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呂紹理〈從《臺灣人士鑑》看日治時期社會領導階層的休閒傾向〉一文，以 1937 年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資料爲分析場域，敘述臺灣各地社會領導階層在日治政府休閒教育的影響下，傾向於閱讀、音樂、園藝、旅行與體育活動等數種具有西化、都市化色彩的休閒生活項目，並點出其隨機排除日式武術活動所隱含的文化認同情形。私立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蔡錦堂的〈日本治臺時期所謂「同化主義」的再檢討——以「內地延長主義」爲中心〉，一方面強調 1919 年後總督府所標榜的「內地延長主義」應界定在日本內地法制與法規的施政延伸，有別於一般所認知的偏重在文化、精神上的「同化主義」；另一方面根據 1918 年 4 月日本帝國議會所頒布的「共通法」，推論內地延長主義以「內地法的延長」爲主軸的緣故。

6 日上午的第五場論文發表，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李國祁主持，私立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歷史與人文教學組教授鄭梓的〈戰後臺灣的第一場「產業盛會」（1948）——首屆「臺灣省博覽會」歷史影像之解讀〉，根據戰後首屆臺灣省博覽會（1948.10.25-12.05）主辦當局所出版的會議手冊，配合當時的新聞報導與紀錄影片的展示，解析這場慶祝臺灣光復三週年的產業盛會所蘊涵的集權高壓象徵與穩定社會意念，重顯戰後初期動盪歲月的歷史圖像。國立中山大學共同科教授葉振輝的〈日治末期高雄市的齋教信仰——寶華堂的歷史見證〉，作者整理 1928 年設立、1997 年拆毀的高雄市寶華堂現存的文物史料，分別從教義內涵、教階層級、空間設施與信眾來源等方面，呈現原屬金幢派齋教信仰的寶華堂在日治末期的歷史風貌與社會功能。中國技術學院副教授卓克華的〈寺廟興建與地方變遷——以淡水龍山寺爲例〉，綜述清咸豐 8 年（1858）淡水龍山寺的創設，同光時期的重修，到日治及戰後歷次的整建過程與人事浮沉，透視當中族群勢力的消長、政治情勢的波動及其與地方變遷的互動關係。

在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賴澤涵院長主持的第六場論文發表會中，私立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陳君愷〈超越種族的藩籬之外——日治時期臺、日人關係的另一個面向〉一文，憑藉相當數量的回憶錄資料，描述日治時期臺籍菁英對於在臺日人與日本本土日人之超越民族對立的實際觀感，突顯出臺、日人親善相處的經驗如何轉化爲反殖民體制運動的心理動因，以及當時游移於想像與實質之間的「臺灣意識」所反映的認同問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鄭政誠的〈日治初期臺灣舊慣調查事業的規劃與開展（1896-1907）〉，利用總督府公文類纂與調查報告，探討日治政府進行舊慣調查的背景因素、相應的行政措施與實際的調查項目。私立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歷史與人文教學組講師莊義芳的〈殖民統治與產業大展（1935）——以日據「始政四十周年臺灣博覽會」爲中心的呈現〉，透過 1935 年池上清德編刊《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寫真帳》爲主的圖表影像，依序從展出前的籌劃、展出實況、展出效果和影響等層面，概略呈現當年爲期五十天（10.10-11.28）之博覽會的歷史情景。

下午第七場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王仲孚院長主持的論文發表會，焦點放在臺灣教育文化史的研討。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薛化元以〈戰後臺灣教育制度中國家權力問題的歷史探討〉爲題，陳述戰後臺灣威權專制時期的黨化教育、軍國民教育體制及其落實在教科書統編與私人興學限制的發展歷程，論證國家權力的強制主導對於教育法制演進的規範作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兼任講師許佩賢在〈臺灣近代學校的誕生——日治初期國語傳習所之研究〉中，首先著眼於 1896 年起臺灣各地國語傳習所的設置、成立之際擇尋校舍與學生就學的情形，敘說日治初期臺灣近代學校形態的濫觴；其次環繞在科目設計、課程規劃、教材選取等教學活動與各項定期舉行的典禮儀式，闡述國語傳習所實質開展的知識傳遞、文化陶冶及國家統治等學校教育的功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教授賴美鈴在〈光復初期臺灣國民學校之音樂教育——以教科書的分析爲中心〉一文中，透過民國四十五年經教育部審訂的兩套國民學校音樂教科書的比較，剖析呂泉生、李永剛兩位編輯由於學養背景的不同，影響到教科書之編纂方式、內容項目與教育理念的差異；同時，針對當時音樂教材配合國府反共政策、忽略音樂教育本質的實施概況，加以論述。

第八場論文發表會，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黃富三

教授主持，私立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張素玢宣讀〈憤怒的葡萄——二林葡農抗爭事件〉，從彰化二林地區的農業環境、釀酒葡萄栽培的時空背景及其生產的擴充與危機、葡農與菸酒公賣局的利害衝突，呈現民國 76 至 85 年間該鎮葡農要求公賣局收購超產的釀酒葡萄，所引發抗爭行動的前因後果及在戰後臺灣農民運動史上的特殊地位。美國康乃爾大學東亞系李玉珍博士主講〈出家入世——戰後臺灣佛教女性僧侶生涯之變遷〉，以 1996 年 9 月埔里中臺禪寺的集體剃度風波爲開場，進而考察父權家庭倫理與女性宗教經驗之間的價值衝突，並且就尼眾落髮與否所體現的政治、宗教與性別象徵以及社會活動力，深入分析戰後臺灣比丘尼身分的提昇與寺院生活形態的轉變，如何與眾多高學歷的年輕女性出家濟世的行爲產生互動。

研討會最後的綜合座談，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王啓宗、系主任吳文星暨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楊正寬、副主任委員林金田共同主持。4 位主持人一致表示這兩天來的熱烈討論與集思廣益，已充分達成回顧老臺灣、展望新故鄉的會議目標。吳文星教授綜評 21 篇論文的內容特色與研究取向時指出，本次研討會有三分之二的論文集中在近現代的探討，充分反映近幾年來臺灣史研究的趨勢。各研究課題觸及原住民關係、教育發展、社會經濟、國家政策、族群互動、宗教信仰、風俗習慣以及音樂、戲劇、藝文、社運等範疇，大體上具備相當程度的周延性。尤其對於新史料的發掘和運用，考證嚴謹，論述縝密，在研究方向上深具開創性、啓發性與參考價值，幾乎是各篇論文共同的特徵。吳教授同時推崇每位評論人皆能提出精闢獨到、一針見血的補充和建議。

現狀是歷史演變的結果，史學研究往往聯繫著時勢滄桑。面對千禧年世代交替的氣氛與政權轉移的局面，各論文發表人深入考察臺灣開發過程中社會文化的演進軌跡和變遷風貌之餘，也多半對於當前臺灣的政治環境、經貿措施、教育改革、藝文提倡、人民權益、族群問題、區域均衡與兩岸關係，表達出他們「述往以爲來者師」的現實關懷，鞭辟入裡且發人深省。而各場次主持人、評論人以及與會發言人士無不期盼能透過這次會議的溝通與反思，充實臺灣史教育的內涵，探索臺灣史研究的未來趨勢，掌握世紀末轉型的時代脈動，以彰顯承先啓後、繼往開來的學術契機，共同爲二十一世紀臺灣社會文化的發展方向，提示開闊性及多元化的思考空間。

「疾病的歷史」研討會會議報導暨近代史相關論文簡介

張哲嘉*

千百年來無論東西方，醫學史一向是醫生所獨擅的領域，主要的內容與目的爲醫學進步之讚歌，同時也扮演確認行業正統譜系的角色。一直到二十世紀下半葉，才開始有有識之士反省這個現象，並且逐漸了解歷史人文學者也能對醫學史有獨立且無可取代的貢獻。[1] 近年來醫學史的研究更蔚爲風氣，其中中國醫學史的研究也頗受西方漢學學者的注目。國內除了早期的陳勝崑醫師、史學界的拓荒者如熊秉真、梁其姿等學者外，研究這個領域的主要團隊首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醫療生命史研究室」。這個研究室自 1992 年由當時的所長杜正勝院士倡議成立後，數年來的研究成果已經受到海內外學者的肯定與重視。其中尤其是自 1997 年起在召集人林富士爲首的研究室成員共同努力協辦的一連串研討會活動，引起了越來越多各界人士的注意與興趣，已使該研究室成爲國際研究中國乃至東亞醫學史的學者無法忽視的一股力量。[2]而今(2000)年 6 月 16 日至 18 日舉行的「疾病的歷史」研討會，固可說是「醫療生命史研究室」數年來工作的一個小結，從某種意義上來看，更可視爲該研究室進入另一個階段的正式起點。

這次研討會之所以取疾病作爲主題，正如主持人林富士所指出的「和疾病史有關的史料不僅稀少，在解讀上也困難重重。因此，長期以來，疾

---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1 Charles E. Rosenberg, *Explaining Epidemics and Oth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4.

2 醫療生命史研究室在 1997 年舉辦過一次爲期三天的「中國歷史上的醫療與社會」大型國際研討會。隨後在 1998 年舉辦「中國十九世紀醫學」及「潔淨的歷史」；以及 1999 年的「養生、醫療、與宗教」及「健與美的歷史」等中小型研討會。

病史研究自然處於歷史研究的邊陲地帶，一片荒寂。即使是在醫學史的著作中，疾病的歷史也只是可有可無的附庸。」說明了疾病史在研究醫學史的研究中是一塊重要卻尚少開發的區域，醫史學者自應急起直追。而美國學者麥克尼爾（William McNeill）所著 *Plagues and Peoples* (中譯本書名《瘟疫與人》)的成功更提示了疾病長久以來雖未受史家青睞，實際上對人類歷史發展的方向卻始終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在國內外的中國醫學史研究已經成熟到一定程度，轉而開始探索疾病史的諸問題，乃水到渠成，勢之然也。

這個研討會的與會人士包括來自海峽兩岸、日、韓、歐、美等各地的學者，領域跨及史學、醫學、藥學以及文學，共計 30 篇論文。經主辦單位精心安排分成 10 個場次，包括「疾病觀念與醫療技術」、「疾病與文化」、「身心與疾病」、「性與疾病」、「生活方式與疾病」、「疾病與政治論述」、「文獻材料與疾病史研究」以及三個專論流行病的場次，探討的領域相當廣泛多元。然豐富的題材只是此研討會諸多特點之一端而已。以下爰就「疾病的歷史」研討會值得學界注意的幾項成就做分析報導，配合該會中與近代中國史相關的論文爲例加以說明。

首先必須要提出的特點是探討的範圍不再限於中國。誠然在幾年前「健與美的歷史」研討會已經有鈴木則子專論日本德川時期美容方式的先例，然而這次不再是孤例，而是有多篇論文專論外國醫學史，形成此次研討會的一項特色。[3]其中包括了美國、歐洲、日本、乃至整個東亞等區域的疾病史，充分發揮他山之石攻錯的效果。如美國賓州州立大學(Penn State University)醫學史教授腓力．威爾遜(Philip K. Wilson)討論二十世紀美國的優生學運動。現在英國衛康醫學史研究所從事博士後研究，即將到中研院史語所任職的李尚仁則從十九世紀英國癲瘋病的種種論述，探討種族、性別與疾病之間的糾葛。日本名古屋大學院國際言語文化研究科教授福田真人的文章，談的是有關日本文獻中結核病作爲一種「美麗的疾病」有關形象的問題。而同樣來自日本的順天堂大學醫史學部教授酒井靜有關日本虎

---

3 該篇論文經修改後已於近期在國內發表。見鈴木則子，〈鏡中美女——從江戶時代的化妝書看美容意識的變遷〉，《新史學》，11：2（2000 年 6 月），頁 41-73。

列拉流行的論文，所討論的其實不只是日本開始認識虎列拉的流行性以及防治的方法，其視野更超越一個特定區域，述及範圍包括虎列拉從初起到全世界的幾次流行，終究進入日本的途徑。這些論文在在彰顯出研究疾病史時不限於一隅的重要。當然，作爲一種專史，外國疾病史的研究的參考性乃至於連帶性比較明顯。其他各領域的史學相關研討會是否可以借鏡這次的做法，邀約專作相關外國史的學者與會，值得觀察。

這次獲邀與會的幾位美國學者，均在中或新生代已嶄露頭角，其作品可隱約看出美國學界未來發展之幾個方向。其中北卡羅萊那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教堂山(Chapel Hill)分校教授瑪珠娣(Judith Farquhar)乃是一位人類學家，曾在廣州中醫學院一面學習經過毛澤東改造後的現代中醫學，一面就醫療過程作實地的田野調查。其研究結果寫成 *Knowing Practice* 一書，得到學界極高評價。另外來自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助理教授韓嵩（Marta Hanson）與內華達大學助理教授夏互輝(Hugh Shapiro)都是剛畢業不久的中國醫療史家。韓嵩專治明清時代疾病與地域之間的關係，夏互輝的主要研究興趣則爲清末民初西醫在中國的傳播。在這次研討會瑪珠娣的論文所探討的是中國大陸自八〇年代改革開放後各種情色書刊暢銷流行的現象，她論述了這一時期各種性學研究的熱潮，乃毛時代對性的潔癖與壓抑的反動結果。此篇是瑪珠娣即將出版的《後社會主義時代中國的食與色》(*Food and Sex in Post Socialist China)* 的一章，以本篇論文的精彩來看，這本即將誕生的著作是值得期待的。韓嵩則是接續其博士論文有關江南區域特性與溫病學派的興起的討論，透過醫學來分析二十世紀以前中國人對人群歧異(human variation)的理解架構。相對於近代西方建立在演化論上種族(race)概念，在近代的傳統中國，人群歧異是被放在空間(spatial)的軸線上，是一個地域區隔的概念。每一個特定的地方有其特有的地氣，而此地氣所孕育的環境形塑了當地人群特有的體質，也從而需要特別專屬的醫療方式給與恰當診治。夏互輝的文章的主題是神經衰弱。他指出「神經衰弱」雖然是一個自西方醫學觀念傳入後才產生的疾病概念，但是中國人並不把西方那一套照單全收，由於在症狀（耳鳴、失眠、倦怠）、相關的解剖位置（腦、腎、脊骨）等引起混淆的巧合，從 1930 年代上海醫院的醫生開始，中國人把神經衰弱跟性功能障礙在概念

上結合起來，從而更豐富了固有腦腎科疾病的內涵，這個例子具體舉證了一種疾病觀念內容的變化。夏互輝更進一步指出在歐洲、美國、日本等地，神經衰弱也配合了當地原有對自我身體認知的基本方式，發展出各地不同的內涵。因此夏互輝在結論中特別強調了比較研究在擴大視野上的利益。

與會諸論文在研究方法上也是豐富而多元，有學者承繼最傳統的漢學考據家法研究這個時代的新課題；也有專家採用最嶄新的數理統計技術商榷歷有年所的舊成說。在順天堂大學醫學部醫史學研究室研究的郭秀梅秉承考據傳統，以辨正詞語的方式，對江戶時代中國和日本考證派醫學者疾病認識觀進行分析，並列舉處於同時代，不同社會背景中的醫學者，對於某種疾病的病名、病因、病機的認識以及治療手段而加以說明。這顯現出日本醫學界在善於吸收外來知識的同時，既使之順應自己國情，亦試圖改變創新。可謂以舊方法做出新結論。而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的研究助理劉士永則是以統計數理方法，檢測與解釋日本領臺時期「流行病學轉型」出現的原因。根據他的分析，臺灣在 1920 年代發生的流行病學轉型乃醫藥、經濟、以及社會穩定共同作用的結果。而日本政府在醫療衛生方面的努力固有相當貢獻，惟隨著環境衛生的逐漸改善，從 1920 年後期起即開始進入效用遞減的階段而面臨瓶頸。進而他說明日本政府所宣稱、以及許多人所相信的日治時期衛生政策所帶來美好成效，有一定程度是誇大的宣傳。可謂爲舊說提出新的反省。這兩篇文章在方法上皆能在前人的成就上別出新意，具體展現了醫療史新一代研究者來自多方的背景，以及在學術上推陳出新的潛力。

研討會中引起最多聽眾興趣與場外迴響者，或當屬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廖炳惠、以及史語所副研究員盧建榮從當代文學切入疾病的兩篇文章。這兩篇除了因探索疾病研究的處女地而讓人耳目一新外，也因內容與聽眾日常生活之貼近而受到關注。其中廖炳惠的文章，是以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微醺彩妝》等近作，「針對幾個殖民接觸中所引發的不適，尤其是水土不服之後的憂鬱（melancholia）與失能症（acedia），探討文化的傳染病問題」。並以臺灣近年來風靡一時的紅酒熱爲背景，凸顯臺灣社會種種如拜物等病態式的放縱，以及大眾在沈醉於杯中物後的「迷惘、鬱卒、及失感」。盧建榮的文章所探討的則是膾炙人口的武俠小說。他指出

武俠小說一個主要特徵，是其中饒富「中國性」的文化符號。而若以外省作家所共同打造的偉大的「中國性」——創造奇跡的中醫學——作爲武俠書寫的正宗的話，這就提供了對照本省籍作家武俠書寫一個有用的標竿。相對而言，他認爲本省籍作家的敘述大多扭曲或背離了中醫學，意外造成了中國文化破壞的效果。兩篇文章除了在會場上引起熱烈討論外，場次結束後仍餘波蕩漾。有一位聽眾在意猶未盡之餘，當天晚上在網路上抒發對武俠小說一文的感想，並要求中研院的網友幫忙代轉給盧先生致意，算是研討會場外的一點花絮。

除了發掘新題材之外，與會學者在前人研究之上也有承繼與深化。據史語所助研究員李建民指出，如北京中醫藥大學醫史文獻教研室副教授梁永宣以及同校中醫診斷教研室教授兼主任梁嶸的作品，就承繼了上一輩的中國疾病史家如余巖、范行準所開的路數，以現代科學分類範疇來界定古代的疾病分類。[4]前者討論的內容是 16-17 世紀末時期，中國醫學認識梅毒病的概況。文章按時間順序介紹了梅毒的命名，又將其病因分爲濕熱及濕熱加傳染觀兩種；作者歸納了各位醫家對梅毒症狀的認識，並與現代醫學的分期相對應；對於梅毒的治療，總結爲分證、分法、分時、分病四部分，並將醫家的常用方藥進行了簡要敘述。本文對當今學者將梅毒更好地「辨證論治」無疑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梁嶸則深入探討了舌診法的歷史以及發展中所出現的一些問題。文中創獲的新說包括舌診法是金元時期以劉完素爲代表的寒涼學派醫家創立的關於外感溫熱病的診斷方法；在舌診成立後，舌不再如經典所言只是心臟系統下的一個環節，而是成爲反映整個人體的氣・血・陰・陽以及津液狀況的窗口。而透過探討爲何中醫舌診圖越來越簡單化、形式化的原因，作者也意圖詢問這和中醫學崇尚所謂「醫者，意也」最高境界的特徵有無關聯。席間對兩位文中所包括的不久前從日本所蒐集到資料十分感興趣。尤其是梁嶸所展示的彩色舌診圖係首次發表，讓不少與會者大呼過癮。

另外，有一些學者開發新的史料並在研討會中推介給對疾病史有興趣的人士，這方面的訊息也值得有志學者注意。如史語所研究員劉錚雲介紹

---

[4] 李建民，〈「疾病的歷史」研討會印象記 〉，《中研院科學史通訊》，期 20（2000 年），頁 21。

了他多年來投入心力整理的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的網上資料庫。這次他以乾隆朝的相關資料爲範圍，說明刑事檔案中所見有關內、外科疾病和治療方法、以及癩瘋與天花等疾病對清代社會所造成的影響。中國醫藥學院的張賢哲教授與蔡貴花女士則藉由介紹龜在中醫藥的地位，展示張賢哲苦心孤詣獨力建立的電子文獻資料庫功能強大的檢索及蒐集資料等能力。學者對內閣大庫中的醫藥相關記錄相當感興趣。認爲這些記錄所呈現的醫藥實踐的面貌與正統醫書中若干不同的地方，可能反映出部份民間或區域性獨特的醫療方式。此外，清華大學博士班蔣竹山就利用晚明士人祁彪佳的《祁忠敏公日記》談病醫關係，也揭開了許多醫書上所不載的醫、病間互動的細節。雖然僅憑一本日記的內容，並不容易推展至很大的結論，但與會人士仍相當肯定蔣竹山爲醫病關係這個重要的領域所作的貢獻。也期待日後有更多學者能夠分工合作，逐漸把類似的史料內容一一整理出來，爲傳統一般社會的醫病關係拼湊出較完整的圖像。總之，兩個電子資料庫以及日記史料的整理不但將爲研究醫學、疾病相關課題的學者在找尋資料的方式帶來衝擊，而且由於這些來源的史料與過去學者主要所使用者不盡相同，可能會因此發展出新的課題與研究方向。儘管有在場學者反應說研討會論文應該要有所「論」，然而從學者的迴響及開始反思研究未來可能發展的方向等跡象看來，藉著專家學者難得齊聚一堂的機會，公開展示這些革命性的研究工具一舉，允稱是這次大會值得一書的貢獻之一。

在研討會最後綜合討論的時候，日本醫學史界的祭酒酒井靜教授做了一項特別的正式宣佈。酒井表示這三天來她爲與會學者的熱情與活力深深感動。她希望能延續此次會議的討論氣氛，同時也鼓舞才剛剛踏上醫學史之路的年輕學者。除了她早已著手籌劃重建「谷口基金會」的傳統，預計於 2001 年在日本成立「東亞醫學史學會」外，她也希望在 2002 年召開一個類似於「疾病的歷史」的研討會，邀所有與會學者重聚研討醫學史的重要課題。在演說的結尾，將屆退休的酒井教授感性地表示，她現在最大的心願，就是將餘生奉獻給這個新的學術社群，並見到它成長茁壯。研討會即在酒井動人的告白與聽眾的掌聲中落幕。而史語所醫療生命史研究室舉辦這次研討會，無論是學術討論或與學者聯繫等目的，均可謂十分成功。該研究室也可望將在即將成立的「東亞醫學史學會」諸活動中扮演活躍的角

色。其日後在中國乃至東亞醫學史研究的地位與貢獻的潛力，值得學界繼續密切注意。

「檔案管理與運用研討會」會議報導

莊樹華*

民國 88 年 11 月 30 日立法院通過國家檔案法，預定兩年內設立國家檔案局。檔案法的通過將使原先保存、管理國家檔案的各機關單位受到相當程度的衝擊，進一步影響學術研究的發展。所以未來國家檔案法施行細則如何制定？國家檔案局如何成立與運作？既有的檔案典藏單位如何整合？這些重大課題均與檔案界、學術界息息相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 89 年 7 月 13 日邀請政府主管機關、檔案典藏機構、圖書資訊學界及檔案使用者等相關人員，假中研院歐美研究所，舉辦「檔案管理與運用研討會」。

此次會議分檔案法與檔案管理、檔案保存、檔案教育、檔案數位化四個主題，大會並安排一場綜合討論，針對目前國內檔案機構面對檔案法公佈後的因應進行討論。以下就各場次主題介紹如下：

第一場由呂芳上先生主持，主題包括檔案管理組織體系及檔案的保存，計有四篇文章。首先由國家檔案局籌備處主任陳士伯先生報告「檔案管理組織體系之建置」，該文主要探討我國檔案管理組織體系之規劃，從檔案法規定行政院應設檔案中央主管機關之法源談起，復就檔案管理之三大病症、國家檔案管理基本概念、檔案中央主管機關使命與發展策略、國家檔案局籌備處組織職掌及人事佈局、檔案中央主管機關之隸屬、職掌規劃等議題，提出目前檔案管理組織體系之初步建置構想。第二篇由國家檔案局林秋燕組長報告「檔案法立法重點與未來業務展望」，是以檔案法研訂經過及立法重點爲楔子，敘述我國檔案管理法制方向，期以建置落實的檔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編審

案管理制度，推展現代化檔案儲存與原件典藏技術，建立便捷靈活的檔案資訊系統及塑造便利多元的檔案開放應用環境，爲我國檔案管理業務開創嶄新氣象。

第三篇由故宮博物院科技室岩素芬科長談「檔案害蟲的防治」，介紹紙質類常見的害蟲，包括蟑螂、書蝨、衣魚、煙甲蟲及白蟻等，並探討檔案害蟲防治的五大要項：避免、阻絕、偵測、回應、恢復，並介紹了低溫法、低氧法及鈷 60γ 射線照射等殺蟲滅菌的方法。最後由臺南藝術學院蔡斐文教授發表「檔案保護管理及保存維護方法之探討」。該文首先談到檔案保護管理，包括保護政策、環境政策、複製政策、安全政策、存放政策、使用政策、修復政策。其次根據檔案的材質分爲紙質類、攝影類、聲音影像類、電子檔案類，介紹不同媒材的構成及其劣化的原因，並提出不同媒材保存環境的溫濕度控制規範，及存放維護方法及注意事項。

針對第一場的議題，與會者所關注的問題包括：國家檔案局設定爲三級機關，將來在運作上是否會有困難；而檔案法所強調的檔案集中管理的可行性也是大家所關切的。此外國家檔案局籌備處目前籌劃的兩個主題館「總統檔案館」及「二二八檔案館」，檔案徵集的可行性也受到質疑，而且以事件爲主題的檔案館，檔案的徵集是否會破壞檔案的全宗性？針對以上問題，國家檔案局籌備處主任陳士伯先生表示未來將努力與各單位溝通協調，而集中管理是原則，現在檔案局籌備處也在研議檔案託管的可行性。至於主題館亦交由專家學者研議中。

第二場由臺史所籌備處主任劉翠溶院士主持，主題爲檔案教育。先由政大圖資所薛理桂教授主講「我國大學設立檔案系所與檔案專業訓練之探討」，該文主要就臺灣地區檔案法通過後，日後亟需專業的檔案管理人員，探討檔案教育在國內發展之現況。其次，就西班牙、英國、美國與加拿大四國及大陸地區有關檔案教育發展之現況進行文獻探討，以了解國外對於檔案教育實施之情形。最後提出符合臺灣地區檔案教育的學制與課程，並建議由國家檔案局負責檔案的專業訓練。第二篇論文由東吳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張中訓教授報告「史料學、文獻學及檔案管理人才之培育——以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史料學與文獻學』碩士班爲例」，主要是介紹東吳大學歷史研究所設立之「史料學與文獻學」碩士班的課程規劃。檔案教育在臺灣方興未艾，政大圖書資訊研究所是臺灣第一個培養檔案專業人才的碩士

班，然而其畢業生竟然沒有人從事檔案工作。其原因一來與這些學生的原先學科背景有關，畢業後又回本行，另一方面檔案機構的徵聘仍需經由國家高普考，這也突顯國內檔案人才培訓與實際運用的落差。

第三場由中研院資訊所研究員謝清俊教授主持，主題環繞在檔案的數位化，第一篇報告由國家圖書館閱覽組組長陳昭珍教授主講「XML, Metadata 與檔案資料數位化」。在數位化計畫中，Metadata 扮演重要的角色，該文主要在說明設計 Metadata 時所涉及之問題；介紹專爲檔案資料而設計的 Metadata—EAD 之語意、結構及語法；並說明爲何要用 XML，並比較 XML 與 HTML、SGML 的差異；最後說明以目前所發展的 XML/Metadata 通用系統——Metalogy 來建立 EAD 資料庫之作法。第二篇論文是由中研院資訊所何建明、黃世昆、莊庭瑞、李德財共同撰寫，由黃世昆報告的「檔案數位化資訊環境之探討」。所謂檔案數位化環境，指的是一個由一般使用者、進階使用者、研究者、內容提供者、數位化工作人員、資訊技術人員等以人爲中心的資訊提供與應用環境。該文擬探討在這個環境當中的相關技術問題，並初步從使用者的使用、搜尋、與組織知識等需求當中，探討如何擴充檔案數位化的基本需求，除了建立內容管理程序所需要的各式輔助工具，並且試圖建立從後端製作到前端呈現的整合一貫性自動化作業程序，協助提高數位化的工作效率，進而保證資料的一致性。與會者對於檔案數位化所關心的問題，包括如何防止駭客入侵檔案系統、數位化檔案規格的穩定性以及檔案如何製定 Metadata。主持人謝清俊教授對於未來科技是充滿信心，但他也強調科技的演進中，「人」仍是佔最重要的角色。

最後一場的綜合討論由近史所檔案館主任許雪姬教授主持，國家檔案局籌備處主任陳士伯先生、國史館副館長朱重聖先生、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任委員楊正寬先生擔任引言人。首先朱副館長提出他對未來檔案局的期待，楊主委因文獻會面臨改編之際，只能欲言又止表達其個人對同仁工作權及工作尊嚴的維護。當然，文獻會是否適合改隸國史館引發了與會者熱烈的討論，最後朱副館長提出了三大保證：第一，保障文獻會同仁的在地工作權；第二，文獻會原有的委託案或計劃照常運行；第三，全國性工作由臺北負責，地方性工作由地方單位負責。討論的另一個焦點是國家檔案局的組織與管理。陳主任在引言時提出國家檔案局是檔案的管理者，而非

應用者，是以使用者爲導向，建立檔案資源的管理，使讀者能有效運用。至於定位問題，檔案局原擬定爲行政院的二級機關，後遇政府再造，種種原因，裁示爲行政院的三級機關。檔案局會設法在策略上、組織上作些彌補。

未來檔案局是採集中管理或分散管理，與會者也有不同意見。檔案局的規劃是在北部成立一綜合性國家檔案館，中、南、東部各設分館。東華大學張力教授、政大薛理桂教授均支持建立全國性的綜合檔案館，薛教授主張臺灣省文獻會可改制爲國家檔案館二館。陳儀深教授支持文獻會改隸國史館，對檔案局的建議是，分散管理、委託制度，依法分類列管，統一查核。文獻會傅光森組長認爲檔案集中管理風險太高。近史所陳三井先生認爲，以目前國家檔案局的層級，只能做到不溯既往，維持現狀，接收各單位檔案集中管理是不切實際。

最後，近史所張淑雅教授與歐美所趙綺娜教授對檔案局如何評鑑檔案，十分憂心，認爲歷史學家的觀點與檔案管理者的角度是不一樣的，而檔案一旦銷燬，無從補救。目前檔案局籌備處的編制，史學背景的人員偏低，其未來方向是令人擔憂的。

整場綜合討論發言踴躍，氣氛熱烈，由於時間關係，很多議題只能點到爲止，無法立即建立共識。會後與會者均肯定此次檔案會議的意義，希望日後能多舉辦類似的會議，讓不同學門的人對檔案的議題能有多元性的思考空間。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三十三期

論　文　323 頁　平裝 250 元

游鑑明：日治時期臺灣學校女子體育的發展

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

張秋雯：趙爾豐與鄉城之役（1905-1906）

馮筱才：江浙商人與 1924 年的「齊盧之戰」

葉其忠：1923 年「科玄論戰」前張君勱對歐戰四個看法之嬗變及其批評

書　評

Lin-Min Liou: *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by Joan Judge

學術演講

退休感言：暮靄回首來時路 煙波迷茫念師友

李恩涵*

時光荏苒，驀然回首，我竟然是已屆七十「古稀」與所謂「隨心所欲不踰矩」之年了；而自大學畢業(民國 43 年，1954)至今，也整整 46 年之久了。雖然事實上我早已是多病纏身之人，但因我平時總是服膺當代旅美小品文作家劉墉所說的：「不回頭，不回頭，不是我不想回頭啊，只是一回頭，我們就再也往前踏不出半步了」。所以，這些年我總是老牛破車，勉力向前，爲完成我自己多年來要寫出的一些東西而匍匐前進。我非常感謝本所所長呂芳上教授與主持本所討論會的黃自進教授的厚愛，給予我這樣一次回首前塵、感念數十年來教我、助我的老師、長輩、妻兒、朋友與學生們對我所給予的各種形式的提攜、鼓勵與支助，其中我要首先特別感謝的，就是本所前所長張玉法教授在我長期離所出國講學的十七年多之後，惠允我於 1990 年重新返所服務，使我能有機會爲我們共同的學術目標而奮鬥(當然我早自 1956 年 2 月起，就已是本所最早期的「老同仁」之一了)。我也要感謝大學同班同學師大文學院前院長李國祁教授與國立政大外交系前主任趙國材教授於 1981-1982 年與 1989-1990 年分別邀聘我回臺擔任師大與政大的「客座教授」，使我對於國內的歷史學術界不至生疏。回顧過去從我攻讀大學至今整整五十年期間，老友國祁兄常常對我說：「恩涵兄是一員福將」；我仔細想想我這些年成長、受教、以至出而任事、作研究教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書的平淡生活歷程：從我 15 歲離開了自己的原鄉、19 歲隨堂兄恩渥從遙遠的山東來到亞熱帶炎熱的臺灣，毫無憑藉地竟然能幸運地考取了大學，又能在大學畢業之後來本所任職，結婚、生子，並能幸運地考取了或申請到了全額留學美國的獎學金，分兩個梯次，完成了我一向嚮往的獲取最高學位（哲學博士，Ph.D.）的素志；國祁兄所給我的「福將」之名，也確是一種不毀之譽吧。

一

我是 1930 年出生於僻處山東東南濱海的古老小城諸城的一個小康之家。六歲時入讀本縣城南門裡著名的觀海書院小學(觀海書院好像早自元、明時代就有了，代有仁人傑士啓蒙孕育於此)。諸城地方雖小，但因宋、元、明、清與民國時代，在政治與文化方面頗出了幾個全國性的人物，如趙明誠(宋宰相之子，李清照之夫，金石名家)、張擇端(繪清明上河圖長卷的大畫家)、劉統勳(乾隆時之軍機大臣)、劉墉(劉羅鍋，統勳之子，乾隆時協辦大學士，書法名家)、竇光鼐(嘉慶帝之太傅、四庫全書副總纂)、王心葵(北派古琴大師，曾任北京大學古樂導師)、王樂平(二十年代國民黨領袖)、王統照(五四後名作家)、康生(中共領袖)、臧克家(名詩人)等等，故諸城雖然僻處山東東南一隅，但教育風氣則特別開明、開放，常與北京、上海所盛行的最具前瞻性的風氣，有著直接的聯繫。這固然與城內每一巷道內都有大地主的巨型邸第有關，也與諸城城內設有省立第十三中學、縣立鄉村師範、觀海書院小學與府前小學等優良學府內常有飽學與開風氣之先的臥虎藏龍之士有關。所以，家兄恩淳、堂兄恩渥既從小就想作外出求學之計，我雖小小年紀，也以去濟南、青島攻讀爲理想。觀海書院小學的老師臧丙兮先生(爲家兄的老師，我尚無緣從學於他)爲本城擁有數十頃(每頃 100 畝)大地主的嫡子，博學多才，爲多產的文學家、音樂家和思想家；所撰觀小校歌的曲與詞，慷慨激昂，音調鏘鏘，頗有法國馬賽曲與戰時義勇軍進行曲的意味，至今我都能大致唱誦不忘(自然我是從家兄處學來的)。

可惜我在觀海書院小學只讀了一年半，1938 年春，侵略中國的日本軍就從附近的青島西攻，一舉占領了諸城，而殘暴的日軍不只在占領初期，

即強將我們的省立第十三中學的校址，作爲其駐軍的司令部，也完全破壞了我們的縣立鄉村師範與全縣社教中心的民眾教育館(圖書館)，校舍相當像樣子的觀海書院小學及府前小學，自然也全遭破壞，房屋設備一掃而空；使我的小學教育霍然中輟。這是當年日本有計劃地破壞中國有形的文化建設，想將中國一舉打回「石器時代」的一項例證。

日軍占領下的諸城，因爲日軍常常隨便殺人，我們男女老少都跑到城內唯一的一處天主教堂避難(爲德國神父主持)，教堂附近的家家戶戶都將其大街小巷的大門壅塞起來，而將自己庭院內的牆壁打通，以與天主教堂連通成爲一個大社區，不走大門，而走破牆而成的各家的小門，在各街巷的外壁上，則寫上兩公尺見方的大字：「大德國天主教堂」字樣(當時德國與日本有著半同盟的親密關係，日本軍最怕德國人)。所以，大家，特別是婦女，得以免除遭受日軍的蹂躪。但日子一久，我們這些孩子都失學一年之久了，教會當局乃在「大難民院」內開辦了一家私立育德小學，校舍雖然是急就章，相當簡陋，但教室內總有桌子、黑板等必需物品，另也闢有運動場如籃球場、雙槓、單槓等；惟教師陣營則非常之好：很多位老師都是任教於青島、濟南著名中學的老師，因避難而返回了諸城原籍；而且，老師們感受到國難當前，都非常認真教學，又極注重於體育、音樂、藝術等科目與課外活動(雖然校區不大)，令我至今仍極懷念他們的那番熱情。尤其是李紀文老師和李紀武老師(兄弟)，甚至在國文上課之餘，爲我們小學二、三年級補習加讀《古文觀止》和《唐詩三百首》等書，在我幼小的心靈中，等於是一種「啓蒙」(我從未讀過私塾)，不只加強了我對中國文學的知識，也使我的眼界開擴了不少。至今兩位李老師諄諄善誘的音容笑貌，仍然常深印在我腦海之中。在育德小學讀書二年，也使我浸潤於天主教的信仰之中，「天主經」、「聖母經」、「信經」等經文，至今仍琅琅上口，一字不忘。同時，在日僞對教育的控制下，我校也有「日語」的必讀課，但老師都是馬馬虎虎的教，學生也是馬馬虎虎的學，除了學會了 51 個平假名、片假名字母之外，進步有限。

1940 年夏，我隨祖父與父親、叔父轉往濟南居住，轉學進入了峨雅坊小學(在濟南東門甕城內，校舍位於護城河兩岸，中有木橋相通)。該校規模龐大(相對於育德小學而言)，環境優美，設備完善，老師眾多；但對我而言，

對於這次轉學卻感到異常惶恐，因爲我在諸城所學的國文、數學等課的程度，雖然似乎較濟南同年學生的程度爲高，但在日語方面，我在諸城所學的較之濟南同班同學的日語程度，相差很大。幸虧我在我的遠親王讀鼇先生的親切鼓勵與教導下，每週他都爲我補習日語數次，從課文到發音、文法等，非常有恆而認真的教我，使我在一學期之內就趕上了濟南同班同學的日語程度了； 而且在全班同學中有兩個學期我都在各科目平均總分中考了第一名，受到「王老爺爺」(他比我高三輩)撫頭獎勵：「李恩涵是個好孩子」(王讀鼇先生是山東官費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在山東政界頗有地位，爲山東國民黨領袖范予遂的岳父。當時他因在諸城鄉下無法安居，只好避難去濟南住，在山東僞政府中擔任了一個糊口的芝麻小官。其實他是常被壓迫出任僞政府的高官的，但他總避之惟恐不遠，只允作個小官而不作大官)。

在濟南另一項影響我一生的事，是我在王讀鼇先生的兒子處(名字已忘記了，他是一位醫生，在濟南東門甕城內開設一家太平醫院)，發現了他的一處文學藏書，其中包括有巴金、冰心、張愛玲、蘇青(日僞時代的黃色小說作家)，甚至魯迅、郭沫若等人的散文、小說等等，還有當時北京、上海每月出版的文學雜誌等，有兩、三個書架之多。我雖然只是一個小學四、五年級的學生，對於這些文學作品實在看不大懂，尤其像《吶喊》、《徬徨》等評論性的文字。但我仍然很有興趣的常常去看，有時甚至借書回家，慢慢讀。對於郭沫若的新詩集《繁星》，我最喜讀：冰心的《寄小讀者》，也增加了我對新世界的新奇感。巴金的《家》、《春》、《秋》、《春天裡的秋天》等等，我也全部讀過了。太平醫院的藏書中，還有幾冊世界地圖集，也是我最喜歡的課外讀物。地圖上塗藍色的法蘭西、我的印象一直很好，常心嚮往之。對於塗粉紅色的英吉利，則不太喜歡，只是它塗著粉紅色的屬地遍佈全球，爲全球第一大國。對於美國則無甚特殊印象。

1942 年，我又隨家庭自濟南轉回諸城，轉入縣立模範小學與私立鴻瑞獻小學就讀，一年後小學畢業。總計我小學六年，竟讀了五處學校，也是奇聞。當時諸城教育界人士數年來推動恢復中學的擬議，已經成熟，在僞縣政府的支持下，由張步月校長(他在戰前即任教青島某中學教師並擔任校長多年，戰時返回諸城家鄉，任模範小學校長，爲年高德劭的教育家)和臧荀慈教導主任(爲北京某大學畢業的當地國民黨要人，也是諸城教育界名人)

的領導下，成立了縣立諸城中學，於 1943 年夏天招考第一屆初中一年級學生。我適逢其會，幸運地在 120 名錄取新生中名列第十一名。由於戰爭使正常的教育系統(特別在鄉下)停頓已久，我讀初中一年級時才是 13 歲的小孩(我只耽誤讀書一年)，但同班同學中，竟有不少 20 多歲、已結婚生子的同學，大我三、四歲的同學更是相當不少。由於我縣原省立十三中學的宏大校舍仍爲日軍占爲司令部，我們諸中的校舍只能利用西城原和尙廟改建的數棟殿宇及新建的數間大教室。不過，整個校區的配置還算寬敞；既有不錯的籃球場和集會場，也有一棟學生宿舍(供鄉下來的學生住)。校牆之外，則有廣大的菜園，全年綠油油；另在一面校牆之外，則爲城牆，寬約兩公尺，是閒來眺望城外農村景色的好地方，也是溫習功課或男女同學談情說愛、悠閒思考的好所在。

諸城中學的特色，尤在於它教師陣營的堅強：張步月校長長著一個公羊鬍子，人極和善，不太管事，待學生如子姪，呵護慈愛，如浴春風。全校日常事務全由臧荀慈主任總持一切。臧主任出身於擁有數十頃田地的大地主，又爲國民黨的地下領袖之一，一派洵洵儒者的樣子，說話溫和，而鼻孔中一直發出「孔」、「孔」的出氣聲，他的專業科目好像是物理、化學。他治校的基本方針，是開明與開放的；在基本的校規之下，他絕不將學生管的死死的。因此，課餘我們常去教師辦公室向他與其他老師執經問難，他絕不拒人於千里之外。教國文的李道庸老師，爲北京大學(或北京師大)畢業，戰前原任教於青島扶輪中學。他上課時出口成章，爲有著名士派頭而不拘小節的良師。在李老師的教誨下，我受益最多，可說打下了我此後國文的基礎，因爲在此後的高中與大學階段，我因著力於學習數學與英文，而頗忽略了國文一課，我的國文程度可說已無大進步了。數學老師也是非常好(但我已忘記了他的大名)，爲我的算學與代數打了下扎實的基礎。教英文的是一位鄭老師(名字忘記了)，發音雖不太好，但教課認真，我曾很努力地讀英文一年；但第二學年(1944.9-1945.8)日本顧問(日本人爲控制本校，在學校設有專職「顧問」，此人長的矮矮，能說中文，人人對他如避瘟疫，躲避之惟恐不遠)通知學校：猋、猋(英、美)爲大東亞共榮圈各國的死敵，不准各級學校學生再學英文了。我們的英文課便這樣霍然而止。教日語的是羅君強老師(與汪僞政權中的大漢奸羅君強同名)。他實際是國民黨

的地下人員，好像是南方人(江蘇)，教學非常認真，但他並不強制每位學生一定要將日文學好。我因爲有在濟南曾經苦讀日文兩年的底子，應付他的課，真是輕鬆而愉快之至。

二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中國終於跟在美、蘇之後也戰勝了強敵，並一躍而成爲全世界的四強之一。但緊接著勝利之後，國共內戰很快便全面展開，山東尤其爲雙方精銳大戰的焦點區之一；而在勝利後的一個月之內，諸城也淪陷於共軍之手。過了幾天，我們回到諸城中學看看，大門旁竟然改掛著「濱海學院」與「山東大學分校」的兩個大牌子，小小初中竟然一躍成爲大學的校區了，令我們感到困惑、驚愕之至。稍後，學校並派人通知我們復學上課。事情顯然有些不妙，我們何敢輕易去上課？因此，父親與叔父便很快決定送堂兄與我轉去青島就讀：我所轉讀的學校就是青島市中初中部，只讀了一年即順利初中畢業了。1946 年夏，我繼續投考高中。我雖然很幸運地考取了本校高中部與山東省立青島臨時中學(這是一所流亡學校)，但因後者管吃管住，我乃選擇後者就讀。那時我已 16 歲。

省立青島臨中位於黃台路，原爲日本青島女中的校舍，規模相當大，我們省中所占的房舍只是原女中的一處宿舍大樓及其附近空間，只占有原女中校區的 1/6 左右而已。校區綠樹環繞，而成行的櫻花樹植遍各處，另有面積頗大的蓄水池一處與籃球場等運動設備，環境整潔優美。這棟教學大樓(即原爲宿舍之大樓)的二、三樓分間爲各班級的教室，四樓則爲大家的宿舍，各生魚貫席地而臥，也算非常滿意而理想了。膳食方面，省中免費供應全校師生白麵饅頭(麵粉爲美國以聯合國名義救濟中國難民及重建者)，在當時吃白饅頭可真算是享受。副食方面，雖然沒有魚肉及湯羹佐餐，但鹹菜頭實不缺。後來也吃過雜糧窩窩頭(黃金塔)，但仍屬難得；因爲當時山東各地戰火漫延，中共在各處實行階級鬥爭，加以災荒頻仍，在逃難流亡的日子，有學校可讀可住，三餐無虞，已是心滿意足了。

省中最大的特色，是特注重學生的學業，而師資優良，較之青島市中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我是高五級(即應爲高中第五屆畢業生)，授業各老師都

非常出色，尤其我著重的數學(算學、代數、幾何)、英、理、化各科。數學老師吳錫濤先生，北大畢業，身材壯碩而矮，頭大而呈扁狀，教學非常嚴格認真，而學識優良。他也兼教物理，教的也非常好，有風趣而使人終生不忘；故同學背後給他起一個外號「豬頭」(絕無侮辱之意)。又因爲他平常的「口頭語」好說某某人爲「小人物」，所以，我們也叫他「小人物」(其實他是我們敬愛的對象，此綽號也絕無輕視之意)。英文老師張居在先生爲北洋工學院畢業，爲人端莊嚴正，一板一眼，教學認真，一絲不苟。他教英文著重課文的熟讀，常叫我們熟讀課文十遍、十五遍，但不必背誦，自然會對英文結構運用自如。英文文法除簡單的一些規則學生應予牢記之外，其他英文中瑣細的平常很少用到的一些文法，他根本不教，而叫學生直接去寫英文小文章。他叫學生「常查字典」也是最重要的學好英文的要項。張老師特注重正確的「標點符號」：每句第一字的第一個字母，應該大寫；每句最後一字之後應加「句點」(period)，如有錯誤，全卷即予 0 分。總之，經過他四個學期的教導，我們無不養成了正確寫英文字句的良好習慣；在英文的學習上，進步甚速。張居在老師也鼓勵我們多讀英文的課外讀物(多查字典)，我因此養成了常去青島廣西路市立圖書館借閱 Time Magazine 的習慣，受益無窮。可惜當我們讀高三上學期時，英文課改由校長王秋圃先生授課。他雖然是北師大英文系畢業，但一講英文便大畫其 diagram(文法圖表)，反而使我們忘記了欣賞課文中優美英文的本體了，令人煩厭；所以，這學期內，我們的英文程度不進反退了。化學老師張世鐃先生，爲煙臺著名釀葡萄酒業的張裕公司的嫡裔老闆，上海復旦大學畢業，教課清晰而引人入勝，富於啓發性。雖然我校一點化學設備也沒有，但我們不知不覺都能將那些複雜的化學元素的分子結構式，記的清楚。我也對化學發生了濃厚興趣。

其他教我們國文的王亦若老師，教地理的劉象天老師、教歷史的王馥遠老師等，也是教的好而認真的優秀老師。音樂老師孫桐友先生爲西北大學音樂系畢業，會寫曲，也會自撰歌詞。他自寫歌詞並予以譜曲的「原子彈歌」，我至今仍能琅琅上口：「頂好！頂好！我是個原子彈！年紀小，志氣高，我的力量團結的最堅牢。……我要打倒一切的強盜，決不是以暴易暴。勝利已經得到了，頂好！頂好！」孫老師還教我們唱〈聯合國歌〉，

我也至今一字不忘：「太陽與星辰羅列天空，大地踴起雄壯歌聲；全世界的人民都高唱，慶祝新世界的誕生！聯合國萬眾一心，打倒敵人，讓自由幸福的新世界奮勇前進，讓自由幸福的新世界奮勇前進」！

三

民國 38 年(1949)3 月 2 日，父親突然告訴我，要我隨堂兄恩渥前往臺灣，他與叔父則仍留青島。3 月 5 日，渥哥服務的聯勤被服廠的員工與設備全部搬運上負責運輸的海張輪(一萬噸左右)，當日凌晨即自青島大港某號碼頭啓程南行，三日後，我們即抵達基隆。全廠的設備與員工眷屬又改搭火車逕抵高雄小港，我也成爲該廠工人的一員了(我初在縫紉二部做搬運工，一週後則調升爲司帳員，其後並被調至高雄市郊苓雅寮設立縫紉加工分站，率員工三人，負責衣料加工及收發等工作，對上級所交辦的任務，都能順利完成)。在全中國糜爛式大變動的關鍵年代中，我算是很幸運地未吃到什麼苦頭。因爲我在高雄小港被服廠有著一個小小據點(司帳員也算是個小主管)，而且做工人可以隨到、隨吃、隨住，解決了最基本的生活問題，所以，許多青島省中的老同學都來我處小住幾日，如同班的楊家駒(後任國軍飛彈營上校營長)、于洪達(後任職警局外事室，現在美國 Florida 州 Miami 經商、高六級的隋邦銳(後任樹林中學校長)等。過一段日子之後，他們再分往他處自求發展。

1950 年 7 月，我從高雄來臺北考大學。我本應投考臺大土木工程系的，因爲做建築工程師一直是我的志願，也是我在就讀高中時平均著重數、英、理、化等科的目的所在。我其實真正是一塊學理工的料子，頭腦單純而記憶力和分析力都還可以；但因我實際差一學期並未讀完高三，物理並未讀完，而在高雄小港被服廠的工作忙碌，無暇將物理一科自修複習；所以，報名時乃以臺大歷史系與師範學院史地系爲志願，而在考試時對於所考的數、國、英、歷史各科，也感到得心應手。考試後發榜，我同時幸運地考取了臺大歷史系與師範學院史地系。由於臺大新蓋的宿舍遲未完工，而我於 1950 年 9 月來臺北後擠住在老同學的小屋內，所以，我很快就決定去和平東路師範學院報到，並參加了該院的新生訓練了，並未去臺大歷史系就

讀(我攻讀大學工學院的志願，最後只能由我的兩個兒子爲我完成：大兒柏恆與二兒柏毅均爲電機系畢業，一在加州大學(UC Berkeley)，一在普度大學(Purdue University, Indiana)，因爲他倆的數學程度都不錯)。

當時師院(畢業時改爲師大)的規模很小，只有學生 800 人左右，史地系與其他各系的師資都很優秀整齊，而且師生間的熟悉度高，住在宿舍內不同系別的同學，也彼此很快相熟。在大學一年級的通識教育科目中，教「英文」的吳奚真教授、教「國文」的程發軔教授(爲鄂派傳統歷史地理學的傳人，著作繁富)、陳致平教授(名作家瓊瑤之父)、教「哲學概論」的田培林教授(留德博士)、教「教育心理學」的林仲達教授(所授內容甚精粹而確有研究心得者)、教「教育概論」的余書麟教授等等，都是非常好的老師，使我在史地本科之外，對其他學科也頗有茅塞頓開之感。在史地系的課程中(我自始即著重於歷史方面，只讀地理方面的必修課，不讀選修課)，李樹桐教授的大一「中國通史」，扎扎實實地介紹我們閱讀錢穆、繆鳳林、張蔭麟、呂思勉等人的著作，並要大家閱讀《史記》、《漢書》、《資治通鑑》等大部頭書。朱雲影教授的「史學通論」則全面性初步介紹了一些基本的史學方法與中國、西洋的史學史。他教的雖然有些枯燥，但卻材料豐富、全面，對於近代諸史學名家梁啓超、張蔭麟、何炳松等的著作，都有詳細介紹。沙學浚系主任的「史地綜論」，則分析歷代胡人「南下牧馬」的歷程，並教我們查閱歷代正史中的「地理志」。

進入專史的範圍之後，郭廷以教授的「中國近代史」(必修)、「中國現代史」(選修)、「明清史」(選修)，都是我最感興趣的科目，因爲我經歷過中國翻天覆地的苦難歲月之後，實在很想從最近的歷史中探索出其中的一些原由來；加之郭師著作多(在臺灣研究近代史的學者當時無出其右者，臺大吳相湘教授的《晚清宮廷紀實》當時尚未出版)，大名如雷灌耳。郭師上課，態度嚴峻，對學生不假辭色，講課聲音自小而大，內容則一氣呵成，無任何「迴想」的空間。所以，大家只是猛記筆記，而全班筆記之組織最好而文字佳順者，則首推李國祁、李恩涵、鄧汝言三人，課後常成爲同學們爭相借抄的對象。郭師介紹的基本參考書，有李劍農、蔣廷黻、陳恭祿、H. B. Morse、H. N. MacNair 諸書(但他絕不介紹學生讀蕭一山《清代通史》兩大冊之書〔當時第三冊尚未出版〕，事後多年，我想真有道理，因蕭書

龐雜，史實羅列而毫無頭緒，對初學者只有「嚇阻」而無「鼓勵」之效的)。當時我可能是全班唯一的一位部分讀過 H. B. Morse 之書的人(全臺灣當時只有臺大圖書館藏有此書，我則託人轉借而得)，頗多獲益。

師院四年，對我走上研讀歷史之途最有助益的另一位老師是王德昭教授。他教我們「西洋近世史」與「史學方法」。前者他自文藝復興開始講起，非常全面、具體而深入(他譯有《歐洲文藝復興概論》一書)，使人對 Florence, Flanders 爲之神往。他也指定 Hayes and Moon 的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爲參考書，我也確實將該書一頁一頁的讀下去，至少讀了 1/2！王師所講的「史學方法」，雖無姚從吾先生在臺大所講「史學方法論」之例舉分明(姚先生此課我也去臺大旁聽過)，但他將梁啓超、陸懋德、何炳松(譯)等著作，扼要地詳爲介紹，也曾談到史語所傅斯年的「旨趣」，是非常充實的一個課。而且，王師待人和氣，滿面春風，還請我去他家吃過飯，很使我受寵若驚(畢業後，王師一直對我關照、愛護和鼓勵，他實是我的恩師之一)。藍文徵教授教我們「隋唐史」，教我們去查閱《舊唐書》和《新唐書》等，使我對大唐史事，爲之心嚮往之。吳俊才教授兼任的「印度史」的內容，我雖不甚感興趣，但吳師年青倜儻，對印度史事非常嫻熟，而娓娓道來，使人對印度文化的博大精深，頗有體會。這與我在十九年之後(1973)毅然南下南洋任教新加坡大學十七年之久的一段淵源，實際也很有關係，因爲新加坡實有 15%的印度裔人口呢！

1954 年 6 月，師大畢業，於服役預備軍官(第三期)一年之後，次年 8 月，我被派去省立桃園中學任教(教初一至高三的歷史課，共有四個不同的教學單元)，但我毫不以爲苦，每課皆有頗爲詳細的「教學大綱」，而且還在教學之餘，翻譯了相當多的希臘史的資料(當時我初譯的陶恩培 Arnold Toynbee 的〈希臘歷史思想緒言〉一文，後來竟爲王任光、黃俊傑編輯的《古代希臘史研究論集》（臺北：成文出版社，民國 67 年），採入印出，頗出我的意外)。1955 年 10 月，郭量宇師輾轉通知我，要我馬上來中研院近史所作助理員，但因桃園中學的課程適在學期的中途，我請求稍稍延期三個月，再來南港報到。這便是 1956 年 2 月我轉來本所服務的一些背景(我是與李念萱兄同時入所服務的)。

四

至於我來近史所擔任助理員之後歷經升級爲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的過程以及其間兩度(1962-1964，1967-1968-1971)赴美國留學，及此後於 1973 年前往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的種種來龍去脈，我的學生李仕德博士與周琇環協修合寫的〈簡介〉一文(見本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 29 期，民國 89 年 3 月，頁 32-46)，已有簡括的敘述，此處即不再贅言了。綜括而言，我除奉郭師之命，與王壟兄合編過《礦務檔》(八大冊，5094 頁，民國 45 年，1956 年)、與王爾敏兄、呂實強兄合編了《中法越南交涉檔》(七大冊，4649 頁，民國 51 年，1962)、《教務教案檔》第一輯(三冊，1709 頁，民國 63 年，1974)、第二輯(三冊，1805 頁，民國 63 年，1974)之外，在個人的研究旨趣方面，則主要是著力於中西外交史的範疇：最早我在 50 年代時的主要考慮是想藉多讀外文資料，以達到去美國留學的目的；但這也與五、六十年代西方學者對於近代中國的研究著重於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的趨向，不謀而合。其後我在美攻讀與此後之研究、教學所涉及的範疇，尚有內戰後的美國外交史、日本近代史與東南亞華人史等，而在過去 46 年之中，我所撰寫的論著，則計有中、英文專著九冊、譯書一冊、彙編(合編)資料書四種、中、英文學術性論文 84 篇、書評 6 篇、譯作等 14 篇等。綜括而言，我研究論題的第一著重所在，係環繞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研究，計出版專書《晚清的收回礦權運動》(1963 年，371 頁)、*China's Quest for Railway Autonomy, 1904-1911*(1977，316 頁)、《北伐前後的「革命外交」(1925-1931)》(1993，356 頁)等書籍三冊及論文 20 餘篇。此外，我對某些中國近代的外交家如曾紀澤、唐紹儀、王正廷、伍朝樞、陳友仁與政治家左宗棠等也曾做過深入的研究，著有《曾紀澤的外交》(1966，398 頁)、〈唐紹儀與清季外交〉(1973，73 頁)、〈伍朝樞的外交事業〉(1993，22 頁)，《左宗棠事功研究》(計包括論文八篇，正刊印中)等書籍二冊、論文 20 餘篇。我感到特別欣慰的是，我對「革命外交」（即 1925-1931 年間的撤廢不平等條約運動）的研究（我爲此曾兩次前往倫敦的英國公共檔案局 Public Record Office, Kew Garden，查閱 F. O. 405/228/371 等資料），「重新發現」了南京（武漢）國府在收回租界（漢、潯、廈、鎮江）與收回關

稅自主權之後，實際曾於 1931 年 6 月 5 日與英國簽訂了一項全面廢除在華治外法權的「草約」（draft treaty），中國付出的代價，爲上海英人之權保留十年，天津保留五年（此事甚至爲南京國府的官方外交報告所遺漏了，因而即使在深入研究此段外交史的學者之間，也不知道了。實爲遺憾）。該「草約」雖因同年 8 月英保守黨在大選中勝利上臺，而遇到一些困難，但相信當無礙於它之最後轉變爲中英之間的正式條約的；惟真正迫使該「草約」胎死腹中的是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突然發動的九一八事變。

從 1986 年夏季之後，我實際在集中全力於研究中日戰爭期間日本在中國與東南亞華人社區的暴行罪行的問題。我研究入手的方法則希望在「多文字、多檔案」(multi-language, multi-archive)的資料基礎上，分就中、日、英文中有關此一論題的公、私原始資料與第二手資料，予以仔細的爬梳比較，並就這些頗有爭議性的論題，分別做出盡量客觀的公正的非情緒性的研究論著。我幾乎每年暑假都去加州大學(Berkeley, Santa Barbara, Irvine, Los Angels)或斯坦福大學 Hoover Institution 查閱資料，幾乎每週都風塵僕僕於奔走各圖書館之間，終日孜孜不倦地鑽研於巨型資料書與舊書報典藏室內，踉蹌獨行，而義無反顧；其間之甘苦與所經歷的悲憤、喜悅、痛苦與解脫的心理過程，是不足爲外人道的。在這方面，我總計在過去十四年的歲月中，計已出版了學術性論文 11 篇（包括南京大屠殺者 3 篇、1942 星洲檢證屠殺 1 篇、「三光作戰」者 3 篇、日本戰時販毒者 4 篇），半學術性論文 3 篇，彙集爲《日本軍戰爭暴行之研究》(1994，429 頁)及《戰時日本販毒與「三光作戰」研究》(1999，563 頁)兩本書行世。我在這方面的研究，已引起國際學術界廣泛的注意，1998 年 4 月加州大學(Berkeley)東亞研究所召開 Conference on the Nanking Incident，邀請我與其他日、美專家十餘人各提論文參會，大會則提供我們往返旅費、食、宿、零用金以及優渥的宴會款待；會後的論文(英文)則由 Princeton University Nanking 1937 Conference 印行刊佈中。我所寫作的中日戰爭時期日本販毒活動的中文論文，也由我自己改寫爲英文 "Japan's Involvement in Drugtrafficking in the Occupied North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於 2000 年 3 月 3 日至 5 日在美國舊金山召開的第六屆中日關係史國際研討會上宣讀，希望它很快也可以正式刊佈行世。

五

如果就我在本所 44 年半的長期研究中（中間我雖離開本所去國外講學 17 年多，但實際我仍與本所在精神上與實際上密切相聯），有什麼小小的心得，以向各位同仁與各位貴賓朋友提出來，共相切磋，我願提出下列五點：

(1) 我認爲我們在研究近代中國史事時，必須在資料上做到多種文字、多種檔案的來源（因爲在 1945 年前，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式的弱國，列強在中國的外交情報與一般特務調查性的情報資料，非常多，雖其中成見錯謬之處甚多，但這些資料所涉及政、經、社會、文化等方面甚廣，值得我們予以批判性的參考利用）。

(2) 大部頭的有關研究論題的資料必須「系統閱讀」——所謂「系統閱讀」就是對有關係的時期內，自始至終的查閱之（即使與本題無直接關係，也應查閱，而不是選擇性的部份閱讀）。這樣對於本論題的本身，固然可有系統的了解，對於與本論題不直接相關的某些問題，也可有相當的了解，可免見樹不見林之弊。

(3) 原始資料與第二手論著（包括記述、回憶等）應交叉閱讀。然後再就這兩方面的資料擴大其範圍而搜羅閱讀之——擴大再擴大；要知道運用各種類型的「書目」(bibliography)。原始資料的擴大運用，固極重要，但爲避免「迷失於叢林之中」，我們對於新的第二手論著的閱讀、探索，也絕對不應偏廢，以達資料完備（exhaustiveness）的目的。

(4) 史實的比較與解釋：同類史實在不同地區與不同時代有其類似性，也有其歧異性。如我在研究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在華的暴行罪行時，總是對納粹德國戰時在蘇俄、波蘭、甚至法國的某些暴行，予以了解（如 Omer Bartov's *Hitler's Army* 及他的其他論著及 T. Schulte, *The German Army and Nazis Policies in Occupied Russia* 等等的著作，我都曾仔細閱讀）。史實的解釋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如西方學者自由主義式對不同社會發展的解釋（Max Weber 等），馬克思派學者對東方社會的解釋，都有其系統的、哲學的深厚背景的。即使像 John. K. Fairbank 中型性質「合治論」的解釋，也極不易。但我因個人的才力和學力較差，訓練又不足，但我至少在本論題的直接範圍之內，作了些小規模的解釋，也算做完了這個論題的完整研究。

(5) 全世界「現代化」(modernization)的理論研究與中國現代化的特殊

經驗與其歷程，仍然是我們研究近代、現代中國者的一項饒有興味而重要的課題。我個人在六十年代對於 W. W. Rostov, Edward A. Shils, Cyril E. Black, S. N. Eisenstadt, Marius Jansen, Robert Bellah 等的著作，雖曾下過一些研讀功夫，但因專題研究忙碌，我只寫出來一篇中日近代化比較的文章（《思與言》，1967），因此退休之後仍希望能將我對此一問題的全盤了解全面的有系統的寫出來，才對。我認爲梁啓超先生之 1.器物模仿，2.政、經、制度的模仿，3.思想、文化的模仿的「三段論法」，殊嫌籠統，因爲一個廣土眾民的中國自 1840's 年代即爲不平等條約所緊扼其頸項，無自由作爲的意志了。一個廣土眾民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實無法直接學習先進的英、法、美（雖也是廣土眾民，但資源「無限」）等國的經驗，甚至也無法完全學習德國、日本（人口較少，地區較集中）。因此，中國只能學習蘇俄（1.政權集中；2.先建立工業化中的重工業系統），孫中山、蔣中正、毛澤東等，好像在現代化問題上所採取的策略，基本上莫不如此。至於未來富強與「民主」的協調問題；「民主」的內涵與實踐的問題（是否「民主」的主要內涵，爲「金錢替代權力」、三權分立、代議制的多黨政治、直接選舉等等），也是我們研究政治民主化的一些主要分析項目。總之，從理論到實際，我們研究中國近代史事的人希望也可以對於現代化問題貢其了解的一得，因爲我們對於歷史發展的實際全盤過程，較之社會學者、政治學者或心理學者，實更爲熟習之故。

展望未來，對於我們的國家、社會、歷史學術界與本所的前途，我看到的，都是一片光明—長江後浪推前浪，後起的精英份子與年紀較輕的同仁，他們都在作爲歷史研究者的條件與大環境的配合上，較之我們這一輩在外敵侵境、內戰亂離、鋒鏑刀斧、傷殘餘生長大的一些人，好得多了(他們也應該是好的多了吧！)。不過，我個人深信美國西點軍校軍歌中的話：「老兵不死，他們只是逐漸凋謝」——在歲月的餘暉中，我總希望在凋謝過程中仍然能繼續放射出一些生命的光芒吧！我總希望對於自己的國家、社會、文化在有生之年，仍能貢獻我微薄的力量，推動它不斷的進步、發展才對。

*2000 年 4 月 25 日脫稿於臺北板橋翠巒書齋

（同年 7 月 27 日在近史所「退休茶會」上發言）

學人簡介

王樹槐

侯坤宏・李宇平・林蘭芳*

一、生平簡歷

王樹槐先生，民國 18 年 12 月生，湖南邵陽人，幼入岩口鋪小學、松坡中學；抗日戰起，流亡貴州，入安順國立黔江中學。勝利還鄉，考入湖南省立六中。民國 38 年春來臺，轉入高雄中學。39 年考入臺灣大學物理系，次年因健康關係，轉入歷史系。43 年 7 月畢業，44 年 8 月至 45 年 1 月間，任臺東女中教員。45 年 7 月，轉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助理員；49 年 8 月，升助理研究員；民國 50 年 2 月至 52 年 1 月間，赴美國夏威夷大學攻讀，並獲得碩士學位。55 年 8 月，升副研究員，62 年 8 月，升研究員；迄 88 年 1 月，由近史所退休，前後計 42 年又 6 個月。先生與近史所的關係，可謂至深。有關先生的爲人，與他有過接觸的人，無不深佩他的溫文儒雅，及與世無爭的做人處事態度。首先，我們也可以透過近代史創所人郭廷以先生來瞭解先生。

先生在近史所 42 年又 6 個月的時光中，絕大部分的時間致力於研究，其中暫時、正式代理所務計有兩年（58 年 7 月至 60 年 7 月）時間，因爲該段時間內，近史所首任所長郭廷以先生赴美夏威夷等大學做訪問研究。根據《郭廷以先生書信選》內收郭先生致先生函 36 件，由信函內容，可看出郭廷以先生對先生之倚重與信任。郭廷以先生出國期間，委請先生代理所務，曾於 59 年 2 月 8 日、2 月 21 日、3 月 14 日、3 月 27 日四度來函促

* 侯坤宏，國史館協修；李宇平，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副研究員；林蘭芳，政大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勸擔任副所長一職。2 月 8 日的函件提到：「去歲（58 年）曾擬一折衷辦法，主及早設置副所長，負實際之責，……人選方面，以吾兄最稱適當。……誠以吾兄沖淡穩練，中正明達，治學有成，物望素孚。廷固知兄無意於此，但爲本所前途計，務懇勉爲其難，犧牲一時，好在任期有定，並非長此相強」。3 月 27 日第四次函中，又再三敦勸先生接任：「兄謙沖爲懷，高風可欽。廷之再三敦勸，實爲本所前途計。明知兄未必慨諾，然不得不爾。」「先置副所長，負實際之責」，「環顧各方情況，舍兄外，實無第二人，因之不得不強兄跳火坑，共維此局。千言萬語，總望兄能勉強見諾，共維本所於不墮。」先生始終未同意，並多次向錢思亮院長請辭代理所務，因先生志在研究。

先生著作等身，已發表之作品中，含專書 4 冊：《外人與戊戌變法》、《咸同雲南回民事變》、《庚子賠款》、《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江蘇省，1860—1916》，及論文 68 篇。其中《咸同雲南回民事變》一書出版於民國 57 年，爲先生早年之作品，相較於先生探討外力對中國之衝擊，本書討論重點爲清末葉的內政問題。關於咸同年間雲南回民事變，先生與當時各家說法不同，以爲宗教信仰不同不是滇亂發生的重要原因，唯以生活習慣不同，漢回兩族間的隔閡，才是彼此結怨敵對的主因。漢回之間初因細節而齟齬，至演成兩族間之爭，復以官吏處置失宜，漢滿結爲一體，遂至回民仇而抗官，造成大亂。亂後雲南，殘破不堪，戶口凋零過半，漢回均有感悟，亂久思治，全滇始趨安定。所以滇亂的根本原因是政治、社會、經濟等多方面原因造成。本書雖是先生較爲獨立的一個範疇，卻是先生最滿意的作品之一。除《咸同雲南回民事變》此一專著之外，歸納先生之學術成就，大抵可歸納如下 4 個領域：（1）清末改革運動史研究，（2）區域史研究，（3）財經史研究，（4）電業研究。

二、清末改革運動史研究——西學與新政

先生早年致力於中西文化傳播與融合的研究。他以爲中國近代化涉及問題甚多，而以吸收西學最爲重要。欲使西學普遍化，必須使西學中國化。西學中國化的意義則是使用中國的語言文字表達近代的科學知識。先生早年因此究心中國的翻譯問題。先生認爲中國翻譯西書此一西學中國化的事

業，並不成功。失敗的原因可以總括爲譯名是否統一與譯名是否恰當兩問題，未能得到適當的處理。所以，先生說：「中國近代化過程的延誤，固然影響譯名的統一，而譯名之未能及早統一，對中國近代化的進度，也不無阻礙。」

吸收西學的方式極多，除了翻譯西書之外，西人來華傳授亦爲方式之一。先生曾撰文討論來華傳教士在中國介紹西學方面的貢獻。他首先指出，「廣學會」在清末致力發行報刊雜誌、出版書籍，以介紹西方文化、敦勸中國仿效爲重點，宣傳基督教義爲附帶目的，開拓了中國人的知識領域，並增進了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的了解與景仰。其後，又撰文說明清末民初「基督教教育會」在倡導中國新式教育，推行羅馬拼音及語體文方面的貢獻。然而先生同時也發現，來華傳教士文化傳播的工作只能限於西方文化的介紹，文化融合會通的功能則非所能及。「廣學會」以淺易的普通常識介紹西方科學知識，或以西方文物制度介紹西方的價值觀念，均不免抱著西方文化中心主義，誇大基督教義與物質的神奇，終致使刊物銷路銳減，學會趨於式微。而「基督教教育會」於道咸的拓荒初期，介紹西方教育與傳播西方文化，設立新式學校並鼓吹教育改革，轉型至民國初年演變爲專門商討宗教教育問題及拓展教會學校本身校務的機構，也使基督教教育會淪爲中國教育制度的附屬品。這兩個例子都說明了中西文化由接觸、融合到發展的過程中，文化發展的方向及外來文化與本國國情的配合，必須由本國文化自身尋求解決之道。

由吸收西學走向社會改造，戊戌變法是具體而微的例子。先生曾著《外人與戊戌變法》一書，強調戊戌變法是東西列強加緊侵略和歐西思想大量輸入之後激起的一個運動。前此諸多學者以爲清廷的腐敗與戊戌變法的孕育、發展直接相關。先生分從西人在華鼓吹變法的文字、言辭，康梁等維新派對外聯盟的意見，以及政變發生後列強的態度等三方面，說明忽略了變法運動的國際背景，不能明白變法運動何以如此迅速而激烈。

來華西人之所以鼓吹變法，原因甚多，但總以不背其本國利益爲目的。同時，西人鼓吹變法，不僅獲得維新分子的好感，更影響維新分子對外的態度。維新派的聯盟政策，可以說與西人鼓吹變法有極度密切的關係。當維新分子對鼓吹變法的人有了親近的傾向，部分西人不僅更熱衷鼓吹，且

希望保存此派人物的勢力，以爲他日外交上爭取奧援預爲鋪路，此又與政變後列強公然起而干預，以致慈禧遷怒外人，導致日後庚子拳亂的發生極有關係。

三、區域史研究

在有關區域史研究成果上，先生主要表現在兩方面，其一是《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江蘇省，1860—1916》乙書，另一是有關江蘇省等 10 餘篇論文。就前者言，因該書爲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自咸豐 10 年至民國 5 年）的集體研究計劃的一部分，而專以江蘇一省爲研究範圍。

據先生多年研究所得，清末民初江蘇省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現代化之特色如下：

（一）政治現代化：清末民初四大政治運動（變法、立憲、革命、倒袁），江蘇人士重立憲，輕革命，此與江蘇民情風俗中之重文輕武、持盈保泰有關；初擁袁，後亦反袁帝制自爲，此爲蘇人理性使然。蘇人崇尚理性，故能走在現代化前端。江蘇政治現代化，可由兩方面觀察，一爲政治參與，一爲行政革新。前者是民間向政府爭取的政權，後者是政府自身的革新。兩相比較，對政權的爭取，不但熱烈，且成績斐然，專制政治終被推翻；而行政革新常依主官而定，成敗遲速，操之在官，非民所能爲力，成就不大。

（二）經濟現代化：清末民初的經濟發展，政治力量不但未能盡到領導的責任，甚至連最起碼的保護責任也未作到。經濟發展，政府與民間原應相互配合，在政府方面應該作的，如統一貨幣、設立現代化的金融機構、改良稅制、興辦學校、訓練人才、改良農業、投資重工業、建設交通、輔助民營企業、擴展海外貿易，然而清末民初的政府，所做不多，貨幣絲毫未統一，新的金融機構設立不多，且不健全，稅制未改良，且有任意加捐者。興辦學校，爲數亦極有限。交通建設及礦業開採，多爲外人資本，受制於外人，成爲外商謀利的工具。農業改良，雖略爲盡力，但只是提倡種棉植桑，改良品種，對整個農村經濟制度，毫未涉及。對工業、交通的發展，唯以軍事眼光，首先設立兵工業、架設電線，算是開風氣之先。至於設招商局、立織布局，實施官督商辦，名爲輔導工業，實則成爲少數宦紳

利潤的泉源。民間對官吏，一向缺乏信心，使官督商辦之事業，無法籌集資金。而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海關國際化，政府也無力改正。國內工商業，不但不能受到政府特殊的照顧，反而受到官吏的剝削，厘金稅制之苛商擾民，即爲一例，益使民間企業難與外商競爭。

總之，中國經濟現代化，政治力量未能加以領導，而經濟本身力量又薄弱，自無力領導政治。政治與經濟脫節，是爲經濟發展遲緩的主要原因。

（三）社會現代化：江蘇社會，在清末民初期間的變遷，其特點如下：就人口方面而言，太平天國之亂後人口銳減，減緩人口的壓力，對經濟發展自有助益。由於輕工業的興起，人口集中於大城市，雖然若干城市人口較太平天國亂前尙少，但城市人口所佔比例則逐漸增高，江蘇已走向城市化。城市的建設，亦因新技術的引進，漸漸走向現代化。江蘇省士、農、工、商中，以士、商兩階層爲社會中堅份子，因其接受新知識、新思潮既早又快，加上在社會上的經濟地位，成爲社會中的領導份子。紳商爲自身權利的謀取，國家民族意識的增強，因而領導各種運動，如立憲、革命、收回路權、抵制美貨、女權、天足、禁煙及剪辮等運動。清末民初期時，因爲物價上漲，工人生活困難，爲了要求增加工資，罷工風氣日開，罷工事件層出，工人自我意識的增高，遠較農民爲快。佃農雖然亦有受地主壓迫而反抗者，但就整體農民而言，因其對外接觸不多，保守性重，多在遇有天災不得溫飽時，才會造成社會不安，而安份守己餓死者尤爲不少。

在結論中，先生特就文化發展之區域性及現代化的相關性與整體性，加以論述，先生認爲：（1）江蘇省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各府州縣並不相同，大致而言，長江南北不同，淮河南北相差亦大，其間有著明顯的地域性，即如民情風俗，南北亦有顯著不同。由地區發展看，經濟是促成社會文化發展的主流，江南地區因得地力之厚，自古即成爲文化中心，歷久不衰。文化發展，從長遠的比較看，社會文化因素至爲重要，但文化發展的背後，地理環境的因素極爲重要，蘇屬地區即爲一例。（2）現代化的相關性與整體性：現代化的推進，必須政治、經濟、社會三方面密切配合，始能迅速發展，且不致造成文化失調。三者的關係是：社會爲主體，政治爲主力，經濟爲主流，三者須配合而行。

四、財政與金融

先生對近代中國財政史著力很深，曾撰相關論文十多篇。他以爲：「財政爲行政之母，財政不健全，則行政無從發揮其功能。」他並指出「財政的基本原則，在求社會的最大利益，一個良好的財政制度，通常意指通過財政措施的適當運用，以獲得最大社會利益績效的制度。」然而觀諸民國初年的財政，由於外力之侵壓，內戰之頻仍，賦稅之不公平，加以財政紊亂，收支不當，可謂絲毫未達此一目標，終於導致所謂國家建設直如畫餅，且無益於民生。財政制度的不健全，顯然爲近代中國經濟落後的重要原因之一。

先生指出，自民初至民國 14 年，北京政府確曾擬訂財政政策，整理預算，改良稅制，免厘加稅，劃分中央地方兩稅，減省浮濫開支，清理內外債款，改進財政機構，整頓金融，統一國幣。此一致力於制度調整的改革措施，陳義雖高，然因執行不力，效果遠不如預期。所謂的財政改革，不過設法增加稅收，或大量借取外債，以應付日益增多的開支，或用以彌補累計的赤字而已。籌款因此成爲財務行政的最大目的。中央如此，地方亦然。

先生以爲清末民初財政未上軌道，其基本原因，除財政制度不健全外，外債與賠款負擔過重亦爲根本原因。他認爲近代中國外債償還占政府收支比例甚大。庚子前，每年償付債款本息，約占政府收入的百分之 26 以上。庚子後，占百分之 42 以上。民國時期則難以估計。儘管庚子賠款是中國最大的一次戰爭賠償，然而就整個庚款實付而言，實不及甲午戰後償日賠款負擔之重。因爲中國付出庚款總數的百分之 58.11，若以賠款本金計算，只有 261,495,000 庫平兩。比之甲午戰後償日 231,500,000 庫平兩，多付 33,737,063 兩。但償日款借債有折扣，爲此則應借入 252,598,629 海關兩，已與庚子賠款相差無幾。可以想見賠款影響中國財政之鉅以及中國近代爲戰爭賠償所付代價之慘重。

誠如前述，庚子賠款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戰爭賠償。先生漚心瀝血撰寫《庚子賠款》一書的目的不僅在陳述庚款的沉重負擔，尤在綜觀庚款前後經緯，比較各國的動機，分析其利害得失，並

闡明其對中國各方面的影響。各國退還庚款用於中國教育及實業兩方面之費用，與列強私自挪爲己用之比例相當，顯示列強退還賠款，並非出於誠意。

庚子賠款，除大賠款 450,000,000 海關兩外，另有地方賠款，約爲兩千萬兩。先生也曾撰文討論此事。所謂庚子地方賠款乃由領事、教士、教民與地方官紳調查所議定，目的在賠償地方傳教事業在拳亂期間所受暴民之傷害。先生發現，儘管庚子拳亂的影響，不在地方賠款，且地方賠款數目不多，僅及大借款的 27 分之 1。然而最令先生慨嘆的莫過此一事件所反映國際公理的偏執。因爲中國人在外國暴亂中死難者可以不賠，而西人在華爲暴民所殺，不僅要賠，而且節外生枝，還索取其它利權。

金融制度與國家財政經濟具有極密切的關係。除撰書著文討論財政狀況本身的演變外，先生亦曾撰文討論近代中國貨幣、銀行的發展與經濟社會、甚至財政經濟的關係。先生以爲，迄至民國 17 年北伐統一之前，中國無論新式銀行或錢莊、票號，其於國內工商業發展之貢獻，均極有限。另就貨幣而言，貨幣之現代化必須尋求貨幣單位的統一。然而民國初年，對此問題所做的改革與所收的效果極爲有限，以致此種紊亂的貨幣制度無法發揮現代國家貨幣的功能，終而妨礙國家財政經濟的發展。

財政改革首要之務在政權統一，政局穩定。先生以爲北伐統一後，中央地方皆銳意改革財政，無論財政改革的確立，財務行政的改革，預算的編製，稅制的革新，公債的整理，貨幣的統一各方面，皆勵精圖治，推陳出新，終於建立了較爲健全之財政制度。

先生對近代中國經濟史涉獵研究的範圍極廣，除財政、金融之外，對近代中國交通事業的發展也甚爲關注，曾撰多篇文章討論水運、鐵路、交通等方面的問題。他發現近代中國交通的發展，爲西人所引起，亦爲西人所競爭。發展較爲順利的是郵政與電信，受挫較多的則是輪船與火車。這是因爲郵政以管理技術爲主，有了總稅務局司的設計與開辦，推行較易。電訊與郵政所費資金不多，技術簡單，人才培植容易，中國因此有能力與外人競爭。且電訊與郵政，同爲全國性企業，不若鐵路與輪船，可以局部或單獨操作。陸路電訊能保持自主並得以發展，原因在此；客郵難以在中國擴大，原因也在此。

五、電業部分

電氣事業乃是萌生於西洋歐美之新科技，此一舶來品之引入中國，實是中國現代化的項目之一。就中國現代化之主題而言，先生多篇文章皆曾論及，集大成者爲先生所著《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江蘇省，1860-1916》一書，多方論析現代化的各個層面，繼之即以建設委員會爲核心，探討現代化的動力之一——電氣事業的問題。在 1991 年至 1999 年退休前的近十年之間，先生除向國科會提出〈建設委員會與中國電氣事業的發展，（1928-1937）〉之專題研究外，共發表 20 篇文章，其中 17 篇爲與電氣相關之論文，這些文章可視爲先生擬著《中國建設委員會與電氣事業》一書之基礎。除上述 17 篇文章外，先生另撰有〈電機及電瓷製造廠〉之未刊稿，論著豐富，足見其治學之勤，亦知電業研究爲先生晚年用心最深之研究範疇。

先生發表與電氣相關之論文多爲個案研究，屬企業史之研究範疇，分開來看是一篇篇個別企業的探討，綜合觀之，乃可揉合成宏觀的中國電氣事業歷程，故知先生是以企業個案之「樹」見中國電氣事業之「林」。

17 篇論文所討論的時間，多集中在清末至抗戰前（1882-1937）。在討論的內容方面，相較於林美莉所撰〈外資電業之研究，1882-1937〉（臺大歷史所碩士論文，1990 年），先生所論重點，皆屬華商或中國政府官營之電廠，呈現中國人學習電氣西技的努力、困頓，以及成功和失敗。這 17 篇文章中，除〈中國早期的電氣事業，1882-1928—動力現代化之一〉和〈建設委員會對電氣事業的規劃〉二文屬通論性質外，其餘 15 篇都是個案研究。

先生所研究的 15 個官、民營的個案，多半分就內部經營和外部關係來探討。雖是分別不同的電廠，其內部經營方面，所探討者不外：組織、人事、資金、設備、經營情況、財務概況等內部運作情形；外在部分則是闡明政治、經濟、社會對各個電氣事業的影響。就外在環境影響部分，先生探討的兩個個案正可顯示正反情況：上海華翔電氣公司之所以成功，緣於其「營業區域內人口密度大，工業發達，故知電氣事業之成功，與其內部經營是否得法有關，但與其所在地地區社會環境之關係尤爲密切」；而「鎮江大照電氣公司之未能發展，亦與鎮江市之經濟漸漸衰落有關」。

先生對電氣事業之研究，實以建設委員會爲軸心往外輻射。在中國電氣事業的發展歷程上，1928 年成立的建設委員會是個里程碑，該會之成立，彰顯了國民政府推動現代化建設的企圖。雖然國民政府有心推動現代化建設，但建設委員會所從事的電氣規劃皆未實施，原因是：計畫過於龐大、經費困難、市場需求有限、人才尙待加強培植、其他急待建設之事尙多，故國民政府對電氣事業並不熱衷。換言之，整體社會環境尙不能配合。

根據〈中國早期的電氣事業，1882-1928—動力現代化之一〉一文所指，建設委員會成立之前，中國早期電氣現代化所表現之特色有五：一、外資企業所佔比例大過中國自辦之企業；二、外資使中國電廠難以匹敵；三、中國電氣事業之發展具地區性，與社會發展相互依賴，互助互補；四、資金、人才常感不足，無法與外廠競爭，距製造電機和電器還有一段遙遠距離；五、電氣事業爲公用事業，涉及業者、消費者和政府，三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皆有欠妥當。

建設委員會成立後，同樣面臨上述人才缺乏、技術經驗兩不足、經費困難的窘況，但在政府角色扮演上，則因國民政府實行國父實業計畫之要求，發揮了不同於以往的功能。

「資金」和「人才」，正是先生文章中三復斯言，一再強調的關鍵因素。例如在〈首都電廠的成長，1928-1937〉一文中，先生論及「經營實業，以人才與經費兩者最爲重要。兩者之中，又以經費較爲重要，因爲有了經費尙不難找到適當人才；若無經費，不僅人才難得，即使有人才，亦難發揮其影響力。」實業建設如此，電氣事業何嘗不然。所以，「中國早期電氣事業所顯示者是缺乏資金與人才，而兩者之中又以資金較爲重要；解決之道，則在政府應大量投資於此類公用事業，並使之管理經營合理化」。可見先生標舉政府在促進投資及輔導管理角色上之重要性。但因資金不足，「促進投資」勢所難行，接管電廠卻成爲「輔導管理」的方式之一。

被接管的民營電廠計有：江蘇武進戚墅堰電廠、九江映廬電燈公司、南昌開明電燈公司、廣州電力公司。接管之型態有由：建設委員會接管，以及由地方政府如江西省政府和廣東省政府接管者。先生在行文中提及政府強行接管之影響：「早期強迫接收震華電氣公司（接收後改成戚墅堰電廠），雖然經營很成功，但原有股東始終不服，在企業界造成很大的衝擊」；

對於南昌開明電燈公司之接管，先生認爲「南昌行營，爲所欲爲，似毋需強行接管」；對於廣州電力公司的接管，先生認爲，此一電力公司的命運，與中央對兩廣關係有關。由這些個案，我們可看到 1930 年代落實民生主義的一些爭議，也可藉由個別電廠接收的案例，觀察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關係。

在〈上海閘北水電廠商辦的爭執，1920-1924〉一文中，先生提出，清末民初，新興產業的發展含有兩項趨勢：一爲產業經濟的民族化，即收回利權運動，此爲外向的要求；一爲產業經濟的合理化，要求產品的提升與價格的公道，此爲內向的要求，水電事業即爲其一。關於後者，民眾抗爭的原因或爲電價過高，或爲服務不良，或爲官營之不合理。總之，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人民除了民族意識高漲之外，權利意識也隨之高漲，不過其中亦雜有地域、鄉土意識，溧陽人反對無錫人祝大椿在溧陽所設的振亨電燈公司，即爲一例。

先生認爲，爲應付現代化，蛻變是必然的趨勢，而先嗅到時代脈動改變者，往往爲預聞西方新知識的買辦和有識見的紳商。如振亨電燈公司的祝大椿、鎮江大照電氣公司的郭禮徵、上海浦東電氣的童世亨等皆是創辦電廠之代表人物。

葉坦在〈吳承明教授的經濟史研究〉中論及「有些經濟部門的發展規律尚待探索，或如資源、技術、生態環境等史的研究尚多屬新構」[1]，電力實屬資源的一環，電氣建設又屬新科技技術的範疇，先生對電氣事業史之研究，除可以個別的企業史來看待，並可作中國致力於現代化的註腳之外，在經濟史新領域研究上，亦具有先驅性意義。

六、結語

綜觀先生一生的研究歷程，其孜孜矻矻以窮根溯源者，莫不在近代中國經濟發展的特徵，以及中國經濟相對於西方何以發展落後的相關論題。由先生對西方經濟學者對中國經濟發展落後原因的檢討與批駁，可以明白先生所持經濟史觀，及其治史的方法論基礎。首先，持馬克斯史觀的學者認爲，一方面是中國封建地主勢力的韌性不易改變；一方面是帝國資本主

[1]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 2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 年 9 月），頁 65。

義的侵入，造成了中國半殖民半封建的社會。先生認爲此種公式化的解釋過分簡化了歷史的發展。歷史上雖有矛盾存在，有利益衝突，也有階級鬥爭，但這絕不是歷史發展的全部。其次，持新馬爾薩斯模式解釋的學者認爲清中葉傳統技術用盡，生產難以增加，然而人口壓力日增，因之落入高水平均衡陷阱，欲打破此種陷阱，唯有從改良技術著手。[2]先生認爲此種說法有其創新意義，但係從巨視觀點，由數理推演而來，忽略了人類文化因素的多元性與多變性。另有學者採取歷史文化角度的研究法。先生認爲，歷史文化本身富有多樣性與多變性，欲求了解真相，非從歷史文化本身研究不可。理論模式常有以一概全的缺點，然而影響人類行爲與歷史發展的因素很多，不易理出單一而普遍的公理，所以惡性循環說（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 Theory）[3]、帝國主義說（依賴理論）（Imperialism）[4]均不過只是執其一詞，不能全爲學者接受。也就是說，先生認爲學者應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從中國近代經濟發展中各種因素以及各種因素之間相互激盪的過程，追根究柢，始能發掘歷史的真相。換句話說，先生強調多元綜合性的研究，中外合一的研究。

先生不僅勤於治學，著作等身，且治學嚴謹，取材贍博，立論客觀，見解精闢，因而在新史實與新解釋的建立上，屢有出人意表的發現。蕭公權稱先生「述論詳明精到」，劉廣京稱先生撰文「結實精到」。先生一生獲獎無數，所著《庚子賠款》一書得六十三學年教育部學術獎，《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江蘇省》獲中國歷史學會金簡獎，亦曾兩次榮獲國科會傑

---

2 此說由 Mark Elvin 提出，其本質仍係從資源、人口、技術三者間之關係建立的，與馬爾薩斯的說法相近，Ramon H. Myers 稱之爲新馬爾薩斯說（Neo-Malthusian Model）。見王樹槐，〈近代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中英文部分〉，《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年 6 月），頁 496。

3 Ragnar Nurkse，1964 年的經典之作 *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Countries* 曾就此一論點詳爲發揮，大意乃指，愈落後地區，愈沒有儲蓄能力，經濟發展愈是落後。見王樹槐，前引文，頁 501。

4 帝國主義說，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有兩種解釋。一爲有助說，一爲有害說。前者認爲西方對中國的貿易接觸，經由資本、技術的灌輸，刺激了中國現代化。後者認爲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有害於落後地區經濟的發展。見王樹槐，前引文，頁 501。

出獎，多次優等獎，可謂實至名歸。

先生近來有關電業的研究，質量並重，原可以整理成三本專書。一爲有關建設委員會與中國電業發展的研究，一爲有關中國近代電業發展史的研究，一爲有關上海電業的研究。因爲屆齡退休，加以生性淡泊名利，先生有意封筆，不再過問學術界的事。我們誠懇的希望先生再接再厲，將上述電業的研究整理出書，以嘉惠學術界。

王樹槐先生著作目錄

專　書

《外人與戊戌變法》，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12)，民國 54 年，304 頁。

《咸同雲南回民事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23)，民國 57 年，407 頁。

《庚子賠款》，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31)，民國 63 年，612 頁。

《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江蘇省，1860-191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48)，民國 73 年，677 頁。

論　文

〈衛三畏與中華叢刊〉，《現代學苑》，卷 1 期 7（民國 53 年 10 月），頁 17-25。

〈研究歷史應否運用道德裁判〉，《思與言》，卷 4 期 5（民國 56 年），頁 2-4。

〈中國近代的外債〉，《思與言》，卷 5 期 6（民國 57 年 3 月），頁 33-38。

〈拳亂時期聯軍的搶劫行爲〉，《思與言》，卷 7 期 3（民國 58 年 9 月），頁 160-169。

〈清末翻譯名詞的統一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民國 58 年），頁 47-82。

〈基督教教育會及其出版事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民 60 年），頁 365-396。

〈庚子地方賠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3（上）（民國 61 年），頁 25-57。

〈清季的廣學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4（上）（民國 62 年），頁 193-227。

〈清季江蘇省的教案〉，《食貨月刊》，卷 5 期 8（民國 64 年 11 月），頁 357-368。

〈清末江蘇地方自治風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6（民國 66 年），頁 313-327。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Communications, 1860-1916: A Regional Comparison," in Chi-ming Hou & Tzong-shian Yu ed.,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Taipei :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1978, pp.335-352。

〈江蘇民性與政治革新運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民國 67 年），頁 51-93。

〈清末民初江蘇省諮議局與省議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6（民國 67 年 5 月），頁 313-333。

〈康有爲〉，《中國歷代思想家》（卷 4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67 年，頁 5411-5511。

〈清末民初江蘇省的人口發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7（民國 68 年 6 月），頁 327-361。

〈清末民初江蘇省的城市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8（民國 68 年），頁 65-97。

〈北伐成功後江蘇省的財政革新，1927-1937〉，《中華學報》，卷 6 期 1（民國 68 年），頁 1-40。

〈江蘇省的煙毒與禁煙運動〉，《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十週年紀念論文集》，臺北，民國 68 年，頁 159-189。

〈鴉片毒害——光緒二十三年問卷調查分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9（民國 69 年），頁 183-200。

〈清末民初江蘇省的災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0（民國 70 年），頁 141-186。

〈清末鐵路人才問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9（民國 70 年 6 月），頁 141-168。

〈清末民初江蘇省的新式教育〉，《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民國 70 年 10 月，頁 1571-1597。

〈清末民初江蘇省的財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1（民國 71 年 7 月），頁 83-100。

"Effects of Railroad Transportation in China, 1912-192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2（民國 72 年 6 月），頁 301-364。

〈不平等條約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史》冊 1，民國 72 年 12 月，頁 63-86。

〈財政與金融〉，《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史》，冊 1，民國 72 年 12 月，頁 120-150。

〈交通事業〉，《中華民國經濟發展史》，冊 1，民國 72 年 12 月，頁 151-186。

〈國會問題與南北和會〉，《中華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3 年 4 月，頁 335-361。

〈康有爲改革貨幣的思想〉，《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3 年 4 月，頁 611-643。

〈棉業統制委員會的工作成效〉，《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3 年 12 月，頁 713-762。

〈江蘇淮南鹽墾公司的墾殖事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4（民國 74 年 6 月），頁 191-266。

〈抗戰時期雲南的蠶桑業〉，《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4 年 12 月，頁 565-618。

〈江蘇鐵路風潮——一個社會運動的實例〉，《勞貞一先生八秩榮慶論文集》，民國 75 年 1 月，頁 355-370。

〈國人對興建鐵路的爭議，1859-188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5（上）（民國 75 年 6 月），頁 299-318。

〈江蘇省的土地陳報〉，《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5 年 12 月，頁 519-557。

〈蔣中正先生與導淮事業——導淮路線的爭議〉，《蔣中正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冊 3，民國 75 年 12 月，頁 190-216。

〈陳果夫與導淮入海工程〉，《中國近六十年來(1926-1986)之憂患與建設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香港：珠海書院，民國 75 年 12 月）；《珠海學報》，期 16（1988 年 10 月），頁 669-703。

〈梁嘉彬〉，《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 3（民國 76 年 3 月），頁 61-75。

〈浙江長興煤礦的發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6（民國 76 年 6 月），頁 321-366。

〈財政狀況〉，《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二篇，《民初時期》，臺北，民國 76 年 3 月，頁 1085-1170。

〈貨幣與銀行〉，《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二篇，《民初時期》，臺北，民國 76 年 3 月，頁 1171-1248。

〈交通事業〉，《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二篇，《民初時期》，臺北，民國 76 年 3 月，頁 1249-1310。

〈張人傑與淮南煤礦，1928-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17（下）（民國 77 年 12 月），頁 211-259。

〈財政改革〉，《中華民國建國史》第三篇，《統一與建設》，臺北，民國 78 年 1 月，頁 1144-1204。

〈王船山的重農思想〉，《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8 年 4 月，頁 493-531。

〈全國水利局對外資導淮的籌議〉，《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清與近代史組（下冊），民國 78 年 6 月，頁 969-996。

〈近代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78 年 6 月，頁 469-512。

〈江蘇省的田價，1912-1937〉，《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史研討會論文集》，民國 78 年 12 月，頁 161-221。

〈中國早期的電氣事業，1882-1928：動力現代化之一〉，《中國現代化論文集》，民國 80 年 3 月，頁 443-475。

〈首都電廠的成長，1928-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0（民國 80 年 6 月），頁 293-334。

〈振亨電燈公司發展史〉，《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民國 80 年 8 月，頁 94-133。

〈江蘇武進戚墅堰電廠的經營，1928-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1（民國 81 年 6 月），頁 1-51。

〈葉恭綽的文化活動〉，《近代中國歷史人物學術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2 年 6 月，頁 699-737。

〈設立滬西電力公司的談判，1932-193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2（上）（民國 82 年 6 月），頁 1-38。

〈上海閘北水電公司的電氣事業，1910-1937〉，《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二屆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民國 82 年 9 月，頁 395-438。

〈康有爲對女性及婚姻的態度〉，《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民國 83 年 6 月），頁 27-49。

〈上海浦東電氣公司的發展，1919-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3（下）（民國 83 年 6 月），頁 91-132。

〈上海翔華電氣公司，1923-1937〉，《郭廷以先生九秩誕辰紀念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4 年 3 月，頁 157-182。

〈建設委員會對中國電氣事業的規劃〉，《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集》，冊 3，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 84 年 3 月，頁 196-230。

〈江蘇省第一家民營電氣事業——鎮江大照公司，1914-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4（民國 84 年 6 月），頁 517-571。

〈上海閘北水電廠商辦的爭執，1920-192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5（民國 85 年 6 月），頁 167-209。

〈抗戰前後的西京電廠，1934-1949〉，《國史館館刊》，復刊期 20（民國 85 年 6 月），頁 177-216。

〈寶慶光明電燈公司早期的發展〉，《邵陽文史》，輯 24（1996 年 10 月），頁 275-292。

〈九江映廬電燈公司：自營與政府的整理，1917-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7（民國 86 年 6 月），頁 137-184。

〈蔡鍔與雲南財政〉，郭漢民、嚴農編，《蔡鍔新論》，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 年 9 月，頁 381-392。

〈國民政府接管民營電廠的政策與實踐——以南昌開明電燈公司爲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8（民國 86 年 12 月），頁 177-222。

〈上海華商電氣公司的發展〉，《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集》，冊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7 年 5 月，頁 581-604。

〈政府接管前後的廣州電力公司，1909-193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31（民國 88 年 6 月），頁 89-132。

其他

〈康有爲〉，《中華民國名人傳》（冊 2），民國 73 年 11 月，頁 309-328。

〈陳果夫〉，《中華民國名人傳》（冊 2），民國 73 年 11 月，頁 455-474。

〈詹天佑〉，《中華民國名人傳》（冊 2），民國 73 年 11 月，頁 549-562。

〈陳光甫〉，《中華民國名人傳》（冊 2），民國 73 年 11 月，頁 439-462。

〈尹仲容〉，《中華民國名人傳》（冊 5），民國 75 年 6 月，頁 13-40。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稿約

(1)本通訊蒐集近代中國史研究之各項資料，俾供研究參考，園地公開，歡迎各界惠賜未出版之稿件，中、英文不拘。

(2)本通訊爲半年刊，每年三、九月各出刊一期，一、七月底截稿。

(3)來稿除特約者外，以不超過五千字爲宜，請以 Word 文書處理軟體打字後，併同 3.5 吋磁碟片送交本所通訊編輯委員會。

(4)來稿請署真實姓名、服務機關及職稱、詳細地址和聯絡電話。

(5)本通訊編輯委員會對於來稿文字有酌改之權。

(6)採用之稿件，致贈作者當期通訊五份。

(7)來稿請寄臺北市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收。

Roland Felber

–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5th Birthday

Ursula Ballin*

On 20 September, 2000, Roland Felber, Professor of Sinology at Humboldt University in Berlin, turns 65. Known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as Fei Lu 費路, he is no stranger to Taiwan and to this Institute, having visited here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conduct research in 1990 and 1994. We join his wife, Professor Christina Felber, their children and friends, as well as colleagues all over the world, to wish him "many happy returns"!

Roland Felber was born in Chemnitz, Saxony, on 20 September, 1935.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the German partition into two states, Chemnitz, founded in the 12th century, became a district capital of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GDR; "East Germany") and was renamed Karl-Marx-Stadt (1953-1990). Young Roland attended grammar school (high school) at Zwickau, another ancient Saxon city, where he graduated with the German maturity diploma *Abitur* in May 1954. He was then interested in various subjects, among them mathematics, philosophy, and history; but the 19-year old undergraduate had not yet tied himself down to any definite course of studies. When the GDR authorities included his name in a list of outstanding students recommended for a full graduate course in Chinese Studies at *Beida* (Beij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學), he was not merely ready to accept but thrilled to see such a distant part of the world, as most young people would be. Besides, from what he had gleaned at grammar school he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already admired China's ancient culture and philosophy as well as her revolutionary struggles in modern times, including reforms and rebellions in the late Qing, the *Xinhai* 辛亥 Revolution, the May-Fourth and Communist movements. As may be seen from the attached list of his publications, Felber would remain interested in these topics throughout his career and dedicate much of his research and classroom work to them, turning into one of Europe's foremost scholars in the field.

But first things first – of course he had to begin with learning the language. In September 1954 he entered *Beida* and took up his studies in modern and classical Chinese at the *Waiguo liuxuesheng Hanyu zhuanxiuban* 外國留學生漢語專修班. After two years of intensive training, he was ready to choose his special field of interest and enrolled at the Historical Institute of *Beida*, reading Chinese and World History, both ancient, pre-modern, and modern. Among his many teachers were Jian Bozan (then Dean of the faculty), Zhang Zhenglan, the archaeologist Su Bai, et al.

In May 1962, Felber gained his M.A. from the above-mentioned Institute, submitting a thesis on "The Reforms of Shang Yang 商鞅" under supervision by Prof Qi Sihe 齊思和.

The years of Felber's sojourn in Beijing saw the outbreak and increasing gravity of an ideological rift between the PRC and the Soviet Union. European "Eastern Bloc" countries such as the GDR were tied, *nolens volens*, to the Soviet "line". Our small group of *Beida* students from East Germany found themselves quite isolated. However, they were not sent home but permitted to complete their degrees, and went on studying "privately", as it were. During more than a year, Felber would sit every day, just by himself, with Qi Sihe or other professors. Needless to say, such "intensive teaching" turned out a profitable blessing in disguise. Eva Müller, one of Felber's fellow students specializing on Chinese literature, made virtue out of necessity by contacting many writers of the May Fourth period who were still alive in China.

In comparison, Sinology in the West German state, the Federal Republic

(FRG), remained within the pre-war European tradition of classical philological studies. Less subject to Cold War restrictions than Chinese Studies in the post-war USA, this was mainly due to the fact that Sinology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was still taught as a "classical" subject, along with Sanskrit, Ancient Greek or Latin. Only in the wake of the "Students' Movement" of the late 1960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would enter university courses – not infrequently against the resistance of professors who, although versed in ancient Chinese texts, had never been to China and were often unable to speak colloquial Chinese. Only in the last 30 years or so, West German Sinology gradually came out of that ivory tower, offering modern language instruction, cours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literature, political thought, etc., whil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ere encouraged to spend a year in China or Taiwan. Still, I am unaware of any West German colleagues who obtained a degree from a Chinese university, and only of the rare exception who did so in Taiwan.

Upon his return to Europe, Felber enrolled as a postgraduate at Leipzig University (founded in 1409) at its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where he stayed until 1969. Apart from pursuing his postgraduate studies, he was employed as an Assistant, thus able to gain first experience in teaching pre-modern and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n 1966, he was awarded his PhD (*Promotion A*) with highest honors (*summa cum laude*), based on a dissertation on "Goods exchange in Ancient China (*Chunqiu* 春秋 period)", supervised by Profs. Ratchnevsky and Welskopf. Continuing as an Academic Assistant at Leipzig, he was promoted *Dozent* (lecturer, or assistant professor) of Chinese History in September 1968.

In October 1970, Felber went to Moscow under a bilateral academic exchange program to study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al Thought at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Soviet Academy of Sciences, remaining there for two years. The language posed no obstacle since Russian was then taught as obligatory first foreign language in GDR schools. (At grammar

school, Felber had also studied English as his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Returning from the Soviet Union in October 1972, Felber was appointed Associate Professor at Berlin's Humboldt University (founded in 1809/10, then known as Berlin University, later as Kaiser-Wilhelm-University) and became Head of Department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at the university's East Asian Institute. In 1976, he passed his *Promotion B* (GDR equivalent to the conventional German *Habilitation*, a prerequisite to a full professorship) with a dissertation on "Studi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 The reception of traditional utopian concept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supervised by Profs. Gehrsing and Günther. This secured his employment as full professor at Humboldt University in 1977, a post he held for the following 13 years. In 1990/91, he served as Deputy Dean of the Philosophical Faculty.

These were fruitful years, both for Professor Felber's own chair (Chinese History) and all of Humboldt University's "Philosophical Faculty, Branch Faculty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Institute of Sinology", or "Department East Asia I" as it was known for short. Along with Felber, other eminent scholars worked there who were, like him, known beyond the borders of the GDR, e.g. Professor Eva Müller (Chinese Literature) whom I already mentioned as one of Felber's fellow students in Beijing, or Dr Scheibner, a female lecturer of Chinese Economy. (It should be noted here that the ratio of female lecturers and professors in East Germany was marked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FRG.) "East Asia I" offered broad and complex teaching and research facilities ranging from classical and modern language instruction and the training of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to courses in classical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cient and modern history, cultural history, economy, society, political ideas of contemporary China, etc.

Professor Felber's teaching and research activities cover a wide range of topics, among them Chines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Sino-German relations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Soviets,

the *Comintern*, and China in general;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including perceptions of Western ideas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and Sino-Western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a;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From 1975 to 1980, Professor Felber was a member of the founding committee and board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established in Paris in 1975. In March/April 1976, he visited Chinese Studies centers in the US, including Cambridge /Mass., Ann Arbor, Chicago, Urbana,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Pursuing research on th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ituation in China, he paid two long visits to the PRC in 1976 and 1978. From August to October 1983 he was a visiting scholar at Ritsu- Meikan University, Kyoto. He spent over a year, from March 1988 to June 1989, as visiting scholar at his *alma mater*,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t *Beida*, where he was appointed permanent foreign research fellow at that university's Center for Social Studies in March 1989. In April/May 1989, he was a visiting scholar at Keio University in Tokyo.

Ever since 1967, Professor Felber attended numerou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nd workshops, including the World Congress of Asian and North African Studies (Paris, Tokyo, Hong Kong);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Toronto, Los Angeles); the World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Moscow);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Paris, Bochum, Tübingen, Cambridge/UK, Zurich, Weimar, Prague, St Ortisei, Leiden); the Japanese Association of Orientalists (Tokyo, Kyoto); and conferences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 in modern China (e.g. in Bellagio/Italy, Tianjin, Beijing, Nanjing, Nanhai). He has also lectured and taught courses on Chinese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at Zurich, Saarbrücken, Hamburg, Budapest, Prague, Jinan, Beijing, Nanjing, Berkeley, Tokyo, and Kyoto.

Following the German unification of 1989/90, which in many respects was in fact a take-over of the GDR by the FRG, former GDR academic

institutions were either made redundant (e.g. the East German Academies of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or subject to drastic retrenchments such as mass discharges of university staff. The "Commission for structuring and appointment" charged (by FRG authorities) with the dismantling of East German university departments was composed exclusively of West Germans – mostly civil servants, but even some professors. As for GDR Chinese studies in general and "East Asia I" of Humboldt University in particular, the result was devastating. While in 1990, the institute had still boasted a staff of 21, it was reduced to a mere 11 by 1993, rending it unable to secure the continuation of its extensive program. Dismissals particularly affected females. By early 1994, only three of its previous academic staff were employed, two of them on "temporary" contracts, among them Profs. Felber and Müller. After attempts at expelling them had failed because of massive protests and partly successful legal action, the "Commission", in its haste to supplant them by West German colleagues, re-named the institute and advertised new applications for its academic positions. Thus, those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scholars had to "apply" for their own chairs. Needless to add that the few posts that remained all went to FRG candidates. Felber's chair was given to a specialist in ancient Buddhist studies, with the result that his work of a lifetime to set up a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Studies (based, it must be noted, not on Communist models but on American "area studies") crumbled away. Space does not permit me to go into details of the administrative hair-splitting that ensued. Felber was able to continue his teaching and research at Humboldt University as "professor of the former law" (i.e. that of the defunct GDR), meaning that he was now merely an employee entitled, after retirement, to a mere fraction of the pension he might have expected as Emeritus.

Apparently unperturbed, Professor Felber went on with his work. He visited *Beida* and the Nanjing Archives from September to November 1992 for research on Sino-German relations; became a member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in 1993; accepted an appointment as visiting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of Nanjing University in September 1993 (until August 1995) during which period he was a visiting scholar at Berkeley in early 1994, came to Taiwan in the Spring of 1994 to conduct research at this Institute, and went to *Beida* for the same purpose in December 1994. He attende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in Taiwan (1990, 1994), Geneva (1991), and at Free University of (former West-) Berlin (on Sino-German relations, 1989, 1993, 1995), as well as workshops on contemporary politics of the PRC in Brussels, Saarbrücken, Aarhus, Moscow, Warsaw, Prague, Budapest, and Sofia. He also became, or continues to be, engaged in major research projects, viz., I. "Systemic changes in China –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PRC and the ROC during the 1980s" (with Professor J. Domes, Saarbrücken), sponsored by the German Research Association; II. "Documentary history of Sino-German relations, 1897 – 1993", 8 vols., coordinated by Prof. M. Leutner of Free University, sponsored by the German Volkswagen Foundation and the Taiwan Chiang Ching-Kuo Foundation; being responsible editor/author of vols. 7, "Germans in China", and 8, "Chinese images of Germany"; and III.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USSR, the *Comintern*, and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1920-37 – documents and studies", 5 vols., edited by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Free University, Berlin; being one of the German co-editors.

However, the liquidation of his work at Humboldt University did weigh down on Roland Felber, no matter how bravely he tried to keep a stiff upper lip. It literally broke his heart. He suffered serious cardiac disorder and had to undergo open-heart surgery a number of times in the past few years. Even as I write, he is hospitalized again. We therefore combine our congratulations on his birthday with our wishes for his speedy recovery.

Select bibliography of Professor Roland Felber's publications

(Not included are book reviews and conference papers. For brevity's sake, I list only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Prof. Felber's publications, indicating the original language in brackets.)

1. Monographs

The social character of Shang Yang's reforms. (Chinese) Beijing 1961. Thesis.100 p.

Ed., with F.Gruner, *Li Da-zhao, Struggling for a socialist China. Excerpts from talks and writings of the co-founder of the CCP.* (German) Berlin 1969. 180 p.

The development of exchange relations in Ancient China, late 8th to early 5th B.C. (German) Berlin 1973. 300 p.

Tradition and today's China – Studies in society and ide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a and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social utopian idea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imes. (German) Berlin 1976. 467 p.

Ed., with B.Kaufmann, *The PRC 1949-79. An annotated chronology.* (German) Berlin 1980. 364 p.

Ed., *China's policy in Asia 1949-1979.* 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German) Berlin 1980.

With H.Rostek, *The "Huns' War" – Imperialist intervention in China by Kaiser William II, 1900/1901.* (German) Berlin 1987. 43 p.

Ed., with D.Weidemann, *Asia. A short handbook.* (German) Berlin 1987. 342 p.

Ed., *History of Sino-German relations, 1900-1949.* (German) Berlin 1988.

Ed., with W.Adolphi, *The PRC 1979-89. An annotated chronology.* (German) Berlin 1990. 221 p.

Ed., with Kuo Heng-yü, M.L.Titarenko, M.Leutner, K.M.Anderson, V.I.Glugin, and A.M.Grigor'ev, *RCP(B), Comintern, and the national-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 Documents.* Vol.1: *1920-1925.* (Russian/German) Moscow 1994. 769 p.; Paderborn et al. 1996. 875 p.

Ed. id. (without Kuo Heng-yü) with K.V.Sevelev, Vol.2: *1926-1927.* (Russian/German) Moscow 1996. 1011 p.; Münster 1998.

Ed. id., with J.Krüger, Vol.3: *1927-1931*, pt.1 and 2. (Russian) Moscow 1999.

(German edition forthcoming.)

2. Articles

"On the meaning of the terms *shang* and *ku*. Reflections on the character of exchange in Ancient China" (German) in *Mitt.d.Inst.f.Orientforschg.* 10:2/3 (1964),pp.419-434.

"Shang Yang's reforms and 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China" (German) in *Neue Beiträge z.Gesch.d.Alten Welt* (Berlin) I (1964), pp.111-121.

"The 'well-field' utopia" (German) in *Wiss.Zeitschr.d.Karl-Marx-Univ.Leipzig (Gesellsch.u.sprachw.Reihe)* 14:3 (1965), pp.351-359.

"New facilities and criteria for dating the Zuo-zhuan" (German) in *Archív Orientálný* (Prague) 43 (1966), pp.80-91.

"Recent Soviet works on the history of traditional China" (German) in *Zeitschr.f. Geschichtswiss.* 15:5 (1967), pp.875-882.

"The exchange of gifts as a preliminary step for the exchange in kind in Ancient China (Zuozhuan period)" (German) in *Jahrbuch f.Wirtsch.geschichte* (Berlin) II (1968), pp.259-273.

"Town and market in Ancient China" (German) in *Mitt.d.Inst.f.Orientforschg.* 14:1 (1968), pp.85-99.

"Notes on the educational program of the group around Mao Tse-tung" (German) in *Forum* 11 (1969), pp.9-11.

"On research into the system of the earliest class society in China" (German) in *Ethnograph.-archäolog.Zeitschr.* 10 (1969), pp.467-478.

"Social changes in the late Chou era" (German) in *Orientalist.Lit.zeitg.* 65:3/4 (1970), pp.118-126.

"'Asiatic' or feudal mode of production in China" (German) in *Zeitschr.f. Geschichtswiss.* 19:1 (1971), pp.65-91.

"Termin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term for 'justice' in Ancient China" (Russian) in *Obsčestvo i gosudarstvo v Kitae* (Moscow) I (1972), pp.75-82.

"Li Da-zhao's perception of Ancient China's traditions" (Russian) in *Kitaj* (Moscow) 1973, pp.229-240.

"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ongoing ideological debates in the PRC" (German) in *Aktuelle China-Information*, special issue II (1973), pp.27-38.

"Some remarks 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re-interpretations of 'da-tong'" (Russian) in *Obsčestvo i gosudarstvo v Kitae* 3 (1973), pp.376-390.

"The 10th Party Congress of the CCP and the ideological campaign against Lin Biao" (German) in *asien,afrika,lat.am.* 2:2 (1974), pp.231-239. (Czech) in *Politika maoismu* (Prague) 2:13 (1974), pp.9-24.

"Dealing with bourgeois perceptions of the nature of Maoism" (German) in *Das politisch-ideologische Wesen des Maoismus.* Berlin 1974, pp.224-238. (Polish) in *Krytika teorii i praktyki maoizmu.* Warsaw 1974, pp.65-83.

"Sinological research in the GDR – a review of publications" (Russian) in *Narody Azii i Afriki* (Moscow) 4 (1974), pp.202-209.

"Maoist ideolog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an intensified anti-socialist course" (German) in *Einheit* 10 (1975), pp.1170-1179.

"Bourgeois publications on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the PRC and of Maoism" (German) in *Zeitsch.f.Geschichtswiss.* 9 (1976), pp.1031-1040.

"Interpreting China's contemporary history" (German) in G.Lozek, ed., *Unbewältigte Vergangenheit. Kritik d.bürgerl.Geschichtsschreibung i.d.BRD.* Berlin 1977, pp.422-436.

"Some tendencies in evaluating recent Chinese history in the PRC" (German) in *Aktuelle China-Information* 3 (1977), pp.57-68; (Russian) in *Problemy Kitaja* 1 (1978), pp.206-214.

"The Datong concept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imes" (Russian) in *Kitaj* 1977, pp.93-102.

"The ideal of 'Great Unity and Equality' (Datong) as seen by Chinese revolutionary democrats before the October Revolution" (German) in *Asienwiss.Beiträge* 1978, pp.25-34.

"On the current debate concerning the evaluati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German) in *asien,afrika,lat.am.* 5 (1978), pp.824-832.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aoist views on Confucianism. On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the campaign to criticize Lin Biao and Confucius in China" (German) in *Zeitschr.f. Geschichtswiss.* 6 (1978), pp.686-699.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reflection' on contemporary China" (German) in *G.W.Astavjew zum 70.Geburtstag*, Festschrift ed. by th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rlin) 1978, pp.26-40.

"Traditional and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s of 'propriety' in China" (German) in *asien,afrika,lat.am.* 1 (1978), pp.52-58.

"The ideological struggle of 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 early 1920s in defense of the doctrines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against bourgeois and petty-bourgeois falsifications" (German) in *Die Grosse Sozialistische Oktoberrevolution und der revolutionäre Weltprozess.* Conference Proceedings. Berlin 1978, pp.113-138.

"The nightmare of a reactionary tradition: Sino-centrism and Chinese great-power chauvinism, past and present" (German) in *Deutsche Aussenpolitik* 6 (1979), pp.84-97.

"Historiography in the service of great-power chauvinism. On some current trends of historical abuse in the PRC" (German) in *Beiträge z.Gesch.d.Arbeiterbewegung* 4 (1979), pp.568-572.

"The problem of an 'historical' reflection on contemporary China in non-Marxist historiography" (German) in *Zeitsch.f.Geschichtswiss.* 11 (1979), pp.1033-1041.

"Modern re-interpretations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al utopia of 'Great Unity and Equality' (Datong)" (German) in *Abhdlgn.u.Berichte d.Staatl.Museums f.Völkerk. Dresden* vol.37. Berlin 1979, pp.79-89.

With W.Lulei and D.Weidemann,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Asia" (German) in *Zeitschr.f.Geschichtswiss.* Special issue on historiography in the GDR 1970-80. Berlin 1980, pp.502-514.

"Return to historical truth or a new chapter of spurious history of the CCP?" (German) in *Aktuelle China-Information* 2 (1981), pp.16-23.

"Problems of Chinese history under discussion" (German) in *asien,afrika,lat.am.*

3 (1981), pp.545-554.

"Evaluations of Kang Youwei's Datong utopia in European Sinology" (German) in *asien,afrika,lat.am.* 4 (1981), pp.797-804.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of social-science oriented research on China's development in the post-Mao era" (German) in *China i.d.80er Jahren.* Berlin 1981, pp.1-26; also in *Aktuelle China-Information* 4 (1981), pp.1-24.

"Commemorating the 70. anniversary of the Xinhai Revolution in China" (German) in *Neues Deutschland* 10.10.1981.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at the 6th ses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CP" (German) in *Aktuelle China-Information* 3 (1982), pp.18-38.

"The Chinese factor in the debate on war and peace" (German) in *Wissenschaft dem Frieden verpflichtet. Berichte* 17 (1982), pp.67-73.

"On the adoption of the term 'democracy' into Chinese" (German) in *Soziale Gruppen- und Typenbegriffe* 5 (1982), pp.46-53.

"The bourgeois democratic Xinhai Revolution in China 1911-1913" (German) in M.Kossok, ed., *Revolutionen der Neuzeit 1500-1917.* Vaduz 1982, pp.531-556.

"Character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Xinhai Revolution in China" (German) in *Zeitschr.f.Geschichtswiss.* 3 (1983), pp.233-242.

"Japanese Sinologists on China's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German) in *Aktuelle China-Information* 3 (1984), pp.48-60.

"Reminiscing Jian Bozan" (German) in *Weltbühne* 16 (1984).

"On the revival of the debate on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German) in *Ethnogr.-archäolog.Zeitschr.* 26:2 (1985), pp.241-258.

"China in the feudal age, 3rd – 15th c." (German) in *Allg.Geschichte d.Mittelalters* (Berlin) 1985, pp.143-156.

"Some problems in the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PRC in the mid-1980s" (German) in *Aktuelle China-Information* 5 (1986), pp.50-68.

With M.Njammasch, "Peculiar and common featur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feudalism in India, China, and Japan. Attempts a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German) in *Jahrbuch f.d.Gesch.d.Feudalismus* 10 (1986), pp.9-27.

"On the evaluation of Sun Yatsen in German Sinology before 1945 and on results of research on Sun Yatsen in the GDR, 1949-1984" (Chinese) in *Huigu yu zhanwang*. Beijing 1986, pp.679-698.

"Sun Yatsen and the 'Great Harmony'" (German) in *Weltbühne* 45 (1986).

"Qin Shihuang's po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German) in exhibition catalogue *Tonfiguren von Kriegern und Pferden der Qin-Dynastie Chinas*. Berlin 1987, pp.24-29.

"The revival of debates about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English) in *Coll.Papers of the XXIXth Congress of Chinese Studies*. Tübingen 1988, pp.51-59.

"Sun Yatsen and Germany. I: On Germany's position in Sun's socio-political thought" (German) in *Wiss.Zeitschr.d.Humboldt-Univ.z.Berlin. Reihe Gesellsch.wiss.* Special issue on Sino-German relations 1900-1949, 37:2 (1988), pp.121-135.

"Sun Yatsen and Germany. II: On Germany's role in Sun's political plans after World War I" (German) in ibid., pp.136-147.

With R.Hübner, "Chinese democrat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Berlin 1900-1924" (German) in ibid., pp.148-156.

With R.Hübner, "Chinese democrat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Berlin 1925-1933" (German) in ibid., pp.157-172.

With H.Rostek, "Honorary doctorate of Berlin's Humboldt University for Zhou Enlai" (German) in ibid., pp.194-197.

"The October Revolu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 organizations in Europe in the early 1920s" (German) in *Beiträge z.Gesch.d.Arbeiterbewegung* 5 (1988), pp.592-605.

"Kang Youwei's doctrine of peace 'datong' – a theory of utopian communism or the idealization of a liberal reformer?" (Russian) in L.P.Delyusin, ed.,

Obščestvenno- političeskaya mysl' v Kitae (konec XIX načalo XX v.). Moscow 1988, pp.39-62.

"Reforms in the USSR and in China. A comparative reflection" (Chinese) in *Zhengzhi yanjiu* 3 (1988).

"Beida at 90" (German) in *Weltbühne* 25 (1988).

"On the character of Kang Youwei's Datong Society" (Chinese) in *Shanghai Shifan daxue xuebao* 1 (1989), pp.144-149.

Epilogue (German) in Pu Yi, *Ich war Kaiser von China*. Berlin 1989, pp.511-516.

"The Hundred-Days Reform" (German) in *Weltbühne* 2 (1989).

"Sun Yatsen and Germany" (Chinese) in *Sun Zhongshan he tade shidai*. Beijing 1989, pp.471-499.

"Recent studies in the GDR on German military advisers to Guomindang China" (English) in *Transactions of the Intl.Conf.of Orientalists in Japan* XXXIV. Tokyo 1989, pp.195-196.

"Nationalism and social perspective in China" (German) in M.Robbe, ed., *Wege zur Unabhängigkeit*. Berlin 1989, pp.195-206.

"Cai Yuanpei's studies at Leipzig" (Chinese) in *Lun Cai Yuanpei*. Beijing 1989, pp.460-465.

"The awakening of People's China – Struggle for peace and social progress" (German) in H.Bock, M.Thoms, eds., *Krieg oder Frieden im Wandel der Geschichte. Von 1500 bis zur Gegenwart*. Berlin 1989, pp.524-533.

"In default of dismay. Tiananmen in Peking and unwept tears in Berlin" (German) in *Sonntag* 48 (1989), p.10.

"Chinese history: From the 10th c. to the end of the Empire in 1911" (German) in H.Bräutigam, A.Eggebrecht, eds., *Schätze Chinas in Museen der DDR*. Mainz 1990, pp.34-56.

"Signals from Tiananmen" (German) in *Weltbühne* 19 (1990), pp.583-584.

"The political crisis in the PRC and 'real' socialism" (German) in *Initial* 6 (1990), pp.625-635; also in *Zeitgeschichte* (Vienna) 3-4 (1990-91), pp.90-97.

"On Sun Yatsen's perception of Germany" (German) in Kuo H.-y., M.Leutner, eds., *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 v.19.Jhd.bis zur Gegenwart*. Berliner China-Studien 19. Munich 1991, pp.83-96.

"Repercussions of the 1989 Tiananmen Incident on the 'peaceful revolution' in East Germany" (English) in B.-j.Lin, ed., *The decline of Communism. Causes, process, and prospects*. Taipei 1991, pp.75-82.

"Chinese normalization" (German) in *Weltbühne* 24 (1991), pp.711-713.

"Is Man capable of Ethics? Philosophers of Ancient China on human nature" (German) in *Initial* 2 (1992), pp.37-47.

"Kang Youwei in Saxony" (German) in H.Bräutigam, U.Lau, eds., *Studien zur Kulturgeschichte Chinas*. Dresden 1992, pp.39-44.

"On the democracy problematiqu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German) in *Comparativ* 2 (1992), pp.30-46.

"German diplomatic sourc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English) in H.Schiffrin, E.Shinkichi, eds., *The Chinese Republican Revolution*. Tokyo 1994. (German) in *asien,afrika,lat.am.* 21 (1993), pp.15-31.

"Which road will China take?" (German) in *Initial* 3 (1993), pp.97-104.

"On Mao's 100th birthday. Difficulties in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an historical personage" (German) in *Neues Deutschland* 24.12.1993, p.21.

"Democratization in 20th –century China" (English) in B.-j.Lin, ed., *Asia and Europe. Comparison of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s*. Taipei 1993, pp.266-281.

"Kang Youwei's image of Germany from the Hundred-Days' Reform of 1898 to the Xinhai Revolution of 1911" (German) in Kuo H.-y-, M.Leutner, eds., *Deutschland und China*. Berliner China-Studien 21. Munich 1994, pp.161-190.

"Victors and Victims in German Sinology" (German) in *Newsletter Frauen und China* 6 (1994), pp.1-4.

"Authoritarianism versus premature Liberalism. Controversies on China's political prospects amo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German) in *asien,afrika,lat.am.* 22 (1994), pp.367-385.

"China an the claim for Democracy" (English) in M.L.Näth,ed., *Communist*

China in retrospect. Frankfurt a.M. et al.1995, pp.97-127.

"Between conformity and resistance. On the fate of some East-Asian scholars during the Nazi era" (German) in *Berliner China-Hefte* 10 (1996, pp.80-86.

"Solving the Taiwan Question in three minutes?" (German) in *Freitag* 16.2.1996.

"Zhu Zhixin on Germany" (Chinese) in *Minguo yanjiu* (Nanjing) 3 (1996), pp.104-119.

"Chinese images of German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German) in M.Leutner, ed., *Studien z.d.deutsch-chines.Beziehungen: Politik, Wirtschaft, Kultur.* Berliner China-Studien 31. Münster 1996, pp.139-162.

"The most natural thing in the world: Yeltsin's second visit to China" (German) in *Freitag* 26.4.1996.

"With Confucius into the 21st century" (German) in *Freitag* 20.12.1996.

"The use of analogy by Kang Youwei in his writings on European history" (English) in *Oriens Extremus* 40:1 (1997), pp.64-77.

"Sun Yatsen's relations with Soviet Russia and his attitude towards Germany in the early 1920s, as seen from recently published archival documents" (Chinese) in *Sun Wen yu huaqiao. Lunwenji.* Kobe 1997, pp.57-69.

"Defamation and denouncement in Ancient China. Historical and terminological reflections" (German) in *Berliner China-Hefte* 13 (1997), pp.71-78.

"Reports by Chinese on the conditions in Berlin after World War I" (German) in R.D.Findeisen, R.H.Gassmann, eds., *Autumn Floods. Essays in honor of Márian Gálik.* Berlin et al.1998, pp.589-599.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hina in the GDR" (German) in *Berliner China-Hefte* 14 (1998), p.34-45; also in H.Martin, C.Hammer, eds., *Chinawissenschaften. Deutschsprachige Entwicklungen: Geschichte, Personen, Perspektiven.* Mitt.d.Inst.f.Asienkunde 303. Hamburg 1999, pp.266-281.

"Early German perceptions of China's Hundred-Days' Reform of 1898" (German) in *Zeitschr.d.Dt.Morgenländ.Gesellsch.* 2 (1999).

"Chinese perceptions of Germany in the May-Fourth era" (German) in *Berliner China-Hefte* 16 (1999).

研究概況

中國都市史研究的課題及其尋求的理論架構

貴志俊彥*著・鍾淑敏**譯

前言

（一）現代亞洲巨大都市的出現

從產業革命蓬勃發起到二十世紀中葉爲止，我們總以爲都市是歐美先進國家的贈品，是工業革命必然的產物。結果不是受到如 M. Weber 所認爲的「只有透過歐洲的自治都市，才能掌握理解都市（的發展與原理）」之限制，就是被「只有從像美國都市經驗中所見到的工業化脈絡中，才能理解都市化」的看法所束縛，從而欠缺從客觀與自律的角度來理解或掌握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等地都市特性的觀點。

然而，眾所周知的，現在世界上人口規模最大的前二十位的大都市，幾乎是由亞洲與中南美洲等的大都市圈所獨佔，歐洲與美國大多數的大都市圈反而都落在二十名以後。從第二次大戰後到 1980 年代期間，在開發中國家出現的巨大都市，特別是急速成長的「首要都市」（primate city）已經趕過先進國家的大都市，膨脹成爲人口規模巨大的都市。

這些巨大都市的特徵，有一點可以指出的是，在連鎖的人口移動下所形成的中心都市裡，都市下層人口在惡劣的居住環境中生活的同時，也支

* 島根縣立大學綜合政策學部講師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

撐著都市經濟的一角。首先對這種與過去大都市印象不同的巨大都市提出說明的代表性解釋模型，是一種甚至是被稱爲「貧民窟都市論」的「過剩都市化模型」（over-urbanization model）。

甚且，1990 年代以後，在開發中國家——特別是在亞洲——的過剩都市化都市裡，可以看到人口、就業、居住等方面的巨大變化，有好幾個都市更已迎向新的發展階段。這個時期快速的經濟發展，特別是以首要都市爲基盤之故，強化了都市的經濟基礎。其結果，誠如大都會及包含其支配領域的大都會區（metropolitan region）或者是大都市圈（metropolitan area）一般，新的都市型態及擁有獨特機能的都市圈區便成立了。爲了分析這些新出現的亞洲巨大都市（Asia mega city），T. G. McGee 等提出了「擴大大都市圈」（extended metropolitan region）與「巨大都市化地域」（mega-urban region）等模式來加以說明，小長谷一之則是從就業構造的變化來提倡「新中間層都市」的模式。[1]

在這樣的都市化的新潮流中，可以預見 21 世紀時人類將有八成的人口會居住於開發中國家，而超過半數的人會是都市居民。同時，可以想見這種都市化的出現會給環境帶來極大的影響。近年，處理都市化及環境問題的研究成果，有武內和彥、林良嗣編的《岩波講座　地球環境學 8　地球環境と巨大都市》（岩波書店，1998 年）等不勝枚舉。[2]

對於這種都市化的現狀，特別是輕視其形成過程的日本亞洲研究學者，藉著 1980 年代以來對亞洲巨大都市的比較研究，從開發中國家的都市化與風土性的關係，亦即是從與自然環境條件及歷史條件的關連來分析這種都市化，或者是從居住條件、居住環境與自然環境的關係來加以分析，已深切的感受到都市化的研究有必要因應都市的成長階段，就環境、土地

---

1 T. G. McGee and I. M. Robison eds., *The Mega-Urban Regions of Southeast Asia* , Vancouver, UBC Press,1995. 宮本謙介、小長谷一之編，《アジアの大都市 2：ジャカルタ》（日本評論社，1999 年），章 3。

2 1999 年 10 月，以早稻田大學理工學部爲據點的「亞洲巨大都市環境問題研究會」成立（參見 http://www.ojima.arch.waseda.ac.jp/~asia的「巨大化するアジア都市の地球環境への影響に關するモニタリングとモデリング」）。

利用、都市計劃等方面的政策內容來加以考察。

現在，對這種都市化的比較研究方法已經在幾個層次上有所進展。例如，1989 年 4 月聯合國人口基金（UNFPA）與神戶市共同設立的「神戶亞洲都市資訊中心」（AUICK），刊行了《Asian People and Cities》（1989 年 6 月創刊），並且進行相關資料庫的收集及推動研究計劃等。（URL 是 http://www.exd.city.kobe.jp/kic.auick/index-e.html）。此外，大阪市立大學經濟研究所也對亞洲「新工業化」的動向進行了調查，並且將巨大都市的實證性研究集結成《世界の大都市（全七卷）》（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1989）出版，此事也促成了 1998 年後值得注目的系列書籍《アジアの大都市（全五卷）》（日本評論社）的刊行。

（二）中國都市史研究的誘因（Motivation）

在考慮至今的都市化過程時，沿海沿江的都市在 19 世紀後半以來受到的西力衝擊的影響，以及在近代技術下所呈現出來的變化是不能不加以重視的。以香港、上海、天津、臺北等爲首的都市化道路，透過了通商口岸、租界、外國人居住地等，爲其他各地所模仿。甚且，19 世紀末的洋務運動、20 世紀初的新政、憲政的實施等，也使得現代主義者所稱的都市化計劃在中國落地生根。

此一過程使得警察、軍隊、學校、政黨、議會、醫院、工場，或是企業、洋式建築、基礎設備、公園等，或者博物館、圖書館、展覽會、法院、運動會、技術研修所等的都市機構在中國的都市固定下來，並使得由城牆所環繞的傳統都市結構與機能產生了激烈的變化。在這種變化的過程中，產生了都市精英、勞動者、以及都市的下層人們。到了 20 世紀，新聞、收音機、電影等媒體所帶來的都市文化（urban culture）也在中國出現，其結果使得戀愛、性、道德、美、以及衛生概念等「眼睛看不到」的「人的意識之下的變化」（urban consciousness）也隨之顯現出來。然而這種變化並不是由於歷史必然性的內在性所產生出來的，反而是全然由外部所帶來的異質性的存在；因之，其結果並非將與地域性相結合的固有制度、價值觀與倫理觀等一掃而去，無寧說是與這些固有的因素共存，並進而產生新的變化。再又加上幾次的災害、戰爭、革命、社會運動與流行等的變化，使

得都市社會走上了一種更爲複雜的過程。

在日本，對有關中國的這種都市化的研究，與對日本或歐美都市的研究相較，成果還不能說很多。但自 1980 年代以來，在中國都市史研究的領域中，研究環境也有明顯的改變。由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使得上海等大都市有復權的可能，面對著無止盡的都市化發展之現況，中國都市（史）研究者呼籲人們暫緩腳步，不要一味的追求「海市蜃樓」，而應該重新認識都市發展中的實質問題。研究者也不再拘泥於意識形態、烏托邦般的論理，而是真正面對眼前所呈現的社會現況。換言之，中國都市史研究的文化環境並不是以現時的美國作爲知識上、理論上的核心（intelligent core），在面對目前中國大陸所產生的都市化問題時，所重視的反而是與其他多種類型都市比較的觀點，或者將問題放在都市史發展的脈絡下加以驗證。此外，如果從研究契機來說，則應注意以下四點：

1. 1970 年代初期，藉著美國都市研究的重量級雜誌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及 *Urban History* 的發行，亞洲都市也開始受到關心，之後並有 G. W. Skinner 編著的二書（1974，1977 年）的刊行。如果說除此處提及的 Skinner 的理論外，再加上 1980 年代刊行的 William. T. Rowe 有關漢口都市社會的研究（1984，1989 年）等，使得日本的中國都市史研究終得以開花，也並不爲過。近年，中國都市史協會(Chinese Urban History Association) 透過網路發行的雜誌 *Wall and Market*（E-Mail 地址爲 chengshi@pop.uky.edu）、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編的《城市史研究》及 1993 年伊利諾州大學所設立的 H-Urban（http://www2.h-net.msu.edu/~urban）等，則發揮了先導的作用。
2. 隨著 1990 年代臺灣「民主化」及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檔案館開放的意義也十分重大。利用檔案而公開發表的研究論文，不只已產生連中國史研究的形態都面臨變革的變化，甚至在日本，不同世代間所持的不同問題意識、研究對象、方法論、史料等也都浮顯出來。而都市史研究可以說是在這種變化的研究趨勢中自然產生的。
3. 隨著美國的地域研究、法國的年鑑派社會史與 Peter Brudue 新社會學等理論的穩固建立，使日本一些一向從馬克思主義史觀與新民主主義

論角度從事中國史研究的學者擴大了其研究對象，並讓他們分析的方法論更趨於多樣化。再者，隨著今日人類學、經濟地理學、現象學、記號學、民俗學、文學、美學等多面性的關心都投注到都市上，以及研究分析理論架構的多樣化發展，都市的多樣性及多層次性特質也明白顯現出來。而這種來自多範疇的思想性或理論性的影響已不能再加以忽視。

4. 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進行，外國人也有可能在中國的都市或鄉村進行實地調查。由於此一發展，使得理工學系的研究者得以中國爲對象進行真正的調查與研究。而隨著都市研究的專家們參與了中國研究，再次讓研究者認識到闡明未被過去埋沒而延續至今的都市化過程之重要性。

如此，在日本的中國史研究領域上，研究學者等自行組織的研究團體全力進行了各種的研究，而且也公開發表了各自的研究成果。[3]然而，時代或地域仍然有限，不得不說都各自留下了許多課題。因此，比較都市論這種研究方法依然極爲重要。

在日本最早倡導比較都市論重要性的是 1971 年成立的比較都市史研究會（代表：鵜川馨）。該研究會除了定期刊行雜誌《比較都市史研究》（1982 年創刊）外，也出版了《都市と共同体——比較都市史研究會創立 20 周年記念論文集（全 2 卷）》（名著出版，1991 年）、《比較都市史の旅——時間・空間・生活——》（原書房，1993 年）等。在此想對這種持續長達 30 年的研究活動表示敬意。

---

[3] 例如 1.唐代史研究會，《中國都市の歷史的研究》（刀水書房，1988 年）、《中國の都市と農村》（汲古書院，1992 年）。2.宋代史研究會，《宋代史研究會研究報告》第一～第五集（汲古書院）。3.日本上海史研究會：古廄忠夫、高橋孝助編，《上海史》（東方書店，1995 年）、日本上海史研究會編，《上海人物史》（東方書店，1997 年）。4.天津地域史研究會：貴志俊彥、劉海岩、張利民編，《天津史文獻目錄》（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化センター，1998 年）別輯 23、天津地域史研究會編，《天津史—— 再生する都市のトポロジー ——》（東方書店，1999 年）等。

一、民間秩序與都市行政
(Civil Control and Urban Administration)

〈都市行政與自治〉：謀求維持都市秩序的權力機構，不止是軍隊、警察、行政機關等而已，民間的職業團體、同鄉、同族團體以及非合法團體也都發揮其機能。在日本，對於這些社會團體的研究比較有進展。此乃由於都市的特質不只是由行政、司法體系所決定，而是包括這些各種團體的成員以及這些成員的活動方式與內容所決定的。

不過，儘管民國時期的地方政府制訂了許多個別的法律、細則、條項，然而甚至連這些條文與項目的內容、制訂的時日、制訂的過程以及其營運的相關手續與機關等基本的問題，實際上也都無法充分釐清。在日本，近年由於地方層級的《政府公報》的微捲已經能夠取得，對於這些地方政府的行政運作體系及司法制度的內容等也終於得以理解。這些看來雖然不過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情，其實也正好是盲點所在，使得我們有必要以社會科學的解析方法，來闡明過去的概說類書中所無法明確處理的多樣性的情況。只是，如以下所見般，研究動向還未朝向此方面。

〈慈善〉：慈善事業是近年被全力討論的一個課題。繼曾我部靜雄、今堀誠二、周藤吉之、酒井忠夫等前輩的研究之後，星斌夫在他的著作《中國社會福祉政策史の研究》（國書刊行會，1985 年）、《中國の社會福祉の歷史》（山川出版社，1988 年）中，清楚的釐清了自唐代到清代之間常平倉、義倉與社倉等的機能與變遷。此外，夫馬進除了解明清代的善堂、育嬰堂等的實態外，更運用廣泛搜集的資料，完成了以分析明代到近代的善會與善堂的歷史大作《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同朋舍出版，1997 年）。該書的出版，在對中國都市的自律性或者中國「公」的活動之理解上，實爲一項貴重的研究成果。

〈自治〉：在日本，對於中國自治之實證性研究，始於仁井田陞與今堀誠二對行會的研究。近年，隨著廣島中國近代史研究會的研究成果出現，已使省、縣層級的地方自治制度得以逐漸獲得釐清。[4]最近，值得注目的是

---

[4] 橫山英編，《中國の近代化と地方政治》（勁草書房，1985 年）、橫山英、曾田三郎編，《中國

由高橋孝助與古廄忠夫所編的《上海史》（東方書店，1995 年），其中對上海的都市行政、自治等有細緻的分析。雖然以都市史研究而言並沒有整體性，但是卻可以獲知上海型的由下而上的自治之變貌過程。只是，地方自治的研究偏重於清末民初的江浙地區則是研究上的一個問題。有關北京政府時期、國民政府時期、日本佔領時期、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的自治制度，也有相當多的史料，若加以援用的話，或可透過近代地方自治制度的研究，來闡明都市權力與自治的關係。

〈消防〉：有關消防的研究，已有曾我部靜雄、今堀誠二與梅原郁等人的先驅性研究業績，近年則有堀地明以明末福建省的火災與防火行政爲例的研究，強調居民的社會性結合十分微弱。然而斯波義信則持相反的見解。吉澤誠一郎的〈火會と天津教案（1870 年）〉（《歷史學研究》698，1997 年）大概可以算在斯波論一派，另一方面小濱正子的《近代上海の公共性と國家》（研文出版，2000 年）則將消防視爲兼具官與民之中間機能的公性質活動。根據這些論點，可知像消防這種公共活動實爲一種性質相當複雜的活動，並不能以二選一的方式將其簡單地定爲官或民，或者是「公」或「私」。

〈非正式社會部門（Informal Sector）〉：在都市秩序的形成中，幫會所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視。酒井忠夫可以說是這個領域的先驅研究者，在《中國民衆と秘密結社》（吉川弘文館，1992 年）、《中國幫會史の研究 青幫篇》（國書刊行會，1997 年）、《中國幫會史の研究 紅幫篇》（國書刊行會，1998 年）中，是以民國時代的調查成果爲基礎，再加上運用清代等的文獻史料，具體檢證了紅幫與青幫等在地區經濟及地方政治等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對於這些秘密結社以外的其他一般都市下層人民的情況之研究仍然很少。

以上這些研究成果，都是有關都市內部社會性結合的情況及地域社會的自律性等問題的重要課題。不過，不能不慎重的是將沿江、沿海極有限的事例當作都市化的普遍性現象來下結論，而且只提及片斷的公共機能本身是不是有問題，也有再思考的餘地。這是由於如同過去的實證研究所清

の近代化と政治的統合》（溪水社，1992 年）。

楚的顯示般，都市公共機能的性質並不能片面地將之歸納爲非「公」即「私」，而負擔此公共機能的也絕非社會團體而已。

〈都市計劃與支配理念〉：都市計劃是有關爲政者如何支配都市並建立秩序的一種極其即物性的模型。在這裡，圍繞在爲政者四周的世界觀，亦即文化性的世界被如實地投影在計劃中，期望的都市機能也在計劃中被顯現出來。

在近代，都市計劃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特性。通過都市計劃的檢討，來考察爲政者所期待的都市像，無疑必然比追逐純然宗教般幻影的抽象理念更具意義。近年在這個領域上的最大成果是越澤明一連串的研究。越澤對戰爭時期日本在東北地方所規畫的都市計劃，連立案過程都加以澈底的追究分析。其中，《植民地滿州の都市計劃》（アジア經濟研究所，1978年）、《滿州國の首都計劃》（日本經濟評論社，1988年）、《哈爾濱の都市計劃（1898-1945）》（總和社，1989年）是其研究所完成的成果，此外，也對關於北京、上海、撫順、長春、大連、臺北等的都市計劃作過不少整理。越澤的這一連串的研究，透過了歷史學者忽略的都市計劃的研究，從近代日本都市計劃所走過的腳步中，將其中的政治支配意圖明白的呈現出來。

然而，儘管有關民國時期的都市計劃，在各地檔案館中已有「行政院」、「行政委員會」、「建設廳」、「工程局」、「工務局」、「地政局」等的關連檔案，且有關現代的計劃也可以在各地的城建檔案館中閱覽必要的文書、設計圖等，不過，對關內都市計劃之研究很難說有值得稱道的成果，即使是越澤的作品也難免如此。

只是，現代亞洲的都市計劃早已經不是以先進國家的都市計劃經驗爲模型，其特徵反而可以從以同時代共通課題爲同次元考量的情形來看出。在考察這種動向問題上，日本都市計劃學會的《アジアの都市計劃》（九州大學出版會，1999年）是值得注目的業績。

二、構造、系統與網絡
（Structure, System and Network）

這三個分析用語，在今天已有用得陳腐的感覺。這是由於定義這些概

念的內容過於廣泛，各種事項都可以任意地來過度適用所致。儘管如此，當要釐清地域實情便不得不用這些概念之時，顯示了地域研究本身所具有的理論性問題。

〈地域內網絡與交易網絡〉：斯波義信所提議的將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相融合一事爲嶄新的構想。特別是斯波義信刻意大力推介 G. W. Skinner 有關大地域論、農村市場圈、都市間的階層結構的理論，其功績不可勝計。並且，他也發表了許多對都市史研究動向的考察之作。[5]斯波義信在《宋代江南經濟史の研究》（汲古書院，1988 年）中，提議「爲從整體的關連角度來測定地域發展的指標，應將人口密度、聚落分佈、作物分佈、都市化水準、技術要素（交通、水利、農法、手工業）及社會移動性等作爲焦點，並盡可能使指標相互正關連而逼近具體的實態」，儘管他這種從長期角度作數量分析的方法非常新穎，惟及至目前都未被有效的繼承，實在令人遺憾。

另一方面，浜下武志則認爲應該要超越斯波義信所要釐清的地域內經濟圈的架構，主張應特別致力於通過海港都市的經濟活動所產生的地域間網絡，以及與外國交易的網絡等的構造性理解，並由「海」這個關鍵概念來探索超越國家的地域間的聯繫。浜下武志的研究成果整理在《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汲古書院，1989 年）、《近代中國の國際的契機》（東京大學出版會，1990 年）、《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岩波書店，1997 年）三部著作中。不過，不可否認的是有關以「海」爲舞臺的複雜性地域圖像的研究才剛剛開始而已。

因此，爲了結合斯波的地域內經濟圈分析及浜下的交易網絡論並建構

---

5 斯波義信關於中國都市史研究的考察如下：〈中國、中近世の都市と農村〉《共同論集 近世都市の比較史的研究》1（大阪大學文學部，1982 年）、〈中國都市史研究から〉《講座日本の封建都市》（文 1 總合出版，1982 年），卷 1，總說、橋本萬太郎編，《民族の世界史 5 漢民族と中國社會》（山川出版社，1983 年），章 3、4、〈中國における資本主義の展開と都市化〉（社會經濟史學會編，《社會經濟史學の課題と展望——社會經濟史學會創立五〇周年記念》，有斐閣，1984 年）、〈宋代の都市にみる中國の都市の特性〉《歷史學研究》（1990 年），號 614。

新理論，似乎有必要去分析掌握作爲海陸交叉接合點的都市或者都市圈的構造、機能與聯繫。在這裡很富暗示性的是地理學上所示的「孤立網絡的複雜構造（complex fabric of solidarity networks）」的概念。那是因爲要解開與地域內經濟圈交錯的廣泛地域圖像（macro region）的一把鑰匙，可以說是在於那個複雜而相互纏繞的交易網，而不在於通商口岸間的定點式連繫。

〈溝通連絡〉：在中國史研究中，通信媒介、大衆傳播與交通方面的研究被忽略，是造成理解都市社會、都市機能與都市間連繫等有所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1992 年 3 月日本開始有了媒體史研究會，1994 年起刊行半年刊的《メディア史研究》，對相關議題進行各種歷史性的研究（http://www.ia.inf.shizuoka.ac.jp/ikawa.media.index.html）。甚且，由於近年來各地檔案館的開放，相關研究的可能性已遠較先前預想的寬廣。

例如，即便是提起戰時日本的國策會社，遼寧省檔案館就保存有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相關的檔案 13,690 卷（全宗號 JD1），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也存有華北電信電話株式會社與華北交通株式會社等相關檔案超過 3 千卷（全宗號 2028、2028（4）、2023（5））。筆者也曾經引用其中部份史料而有些許成果發表。[6]關於鐵道方面，高橋泰隆的《日本植民地鐵道史論——臺灣、朝鮮、滿洲、華北、華中鐵道の經營史的研究——》（日本經濟評論社，1995 年）有相當充實的研究成果，但是有關道路、航路與航空等的研究則仍幾乎全無。另一方面，儘管國民政府時期的「交通部」、「鐵道部」或各省的「公路局」、「航業局」、「電信局」、「郵政局」之類的檔案散佈於大陸的檔案館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 01-09～10、01-13、外務部檔案 02-02～03、02-06、外交部檔案 03-02、03-05～06 等等）與國史館等處，日本方面仍缺乏相關的研究。

---

6 貴志俊彥〈大戰下の電氣通信ネットワークと華北電信電話株式會社〉《アジアにおける地域と地域間交流の史的研究》（文部省科學研究報告書基盤 B2(2)、2000 年），〈天津租界電話問題をめぐる地域と國家間利害〉（曾田三郎編，《近代中國と日本——提攜と敵對の半世紀》，お茶の水書房，預定於 2001 年上半年刊行）。

有關廣播媒體方面的檔案，大陸、臺灣、日本與美國等地有大量典藏的事實已漸爲人所知。筆者所屬的廣播媒體研究團體，也使用下述的檔案，準備開始建構「日中電波戰爭論」。例如，大陸第二歷史檔案館所藏的龐大的國民黨廣播關係檔案（全宗號 20、368、718），北京市檔案館（J70、J109）、青島市檔案館（全宗號臨時 61（5））、上海市檔案館（全宗號 Q175）等所藏的地方廣播電臺的檔案。又，吉林省檔案館也藏有滿州國時期所留下來超過二千支的廣播業務用錄音盤。臺北有關國民黨及各省廣播公司的檔案收藏於國史館與黨史會（宣傳部 436、496、F-9/5.2、F-10/5.3 等），日本的 NHK 放送博物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F.2.3.2.2、F.2.3.2.4、F.2.3.2.9）與國立公文書館（1-2A-039-06 的各種情報資料）中則藏有日本、中國、美國相關的廣播檔案與記錄。而美國的國家檔案局（NARA）則收藏有詳細的監聽記錄（208.4.2 Records of the Bureau of Overseas Intelligence）、(208.6.2 Records of the Program Bureau)。

此外，有關印刷媒體的研究更不需多說，各地都留有龐大的史料，目前有許多的地方新聞及「小雜誌」（minicomi）都也拍成微捲，並陸續提供外界閱覽。

〈衛生〉：飯島涉藉由衛生行政的研究而釐清地域秩序形成的狀態與原理的系列研究相當值得注目。飯島在〈近代東アジアにおけるペストの流行について〉（《史潮》新 29 號，1991 年）及〈コレラ流行と防疫システム——香港、上海、横濱 1919 年——〉（《横濱と上海》，横濱開港資料館，1995 年）等研究，將浜下武志的交易網絡論發揮到公共衛生的領域上。兩篇論文對霍亂與鼠疫等傳染病藉著交易網絡而被帶到東亞，以及透過上海的蘇北人與東北的山東苦力等各地區下層勞動者而蔓延開來之事加以論證。飯島更進一步於 1997 年發表了〈近代中國における公衆衛生と檢疫〉（《歷史學研究》704）。在日本，除了飯島之外沒有其他以中國衛生問題爲對象的研究者，說來實在有些寂寞。因爲在各地的檔案館中必定有許多關於「衛生」或「醫院」的檔案，預期衛生方面的研究可能性是無可限量的。

〈租界或外國人社區〉：在考察東西的衝突、融合與共生的問題上，都市的租界或是外國人社區的研究便很重要。在租界內，被稱爲寓公的原

滿洲貴族、隱退的軍閥、官僚、政治家、經濟人及各國的間諜與特務在此活動，而且是以類似時代啓動者的身份暗自活躍。此外，外國人也有許多居住於租界之外，而形成獨特的社區。有租界存在的都市既是侵略與秘密活動的場所，同時也是電車、電燈、郵便、電信、建築等技術，或體育、電影、新聞、西式飲食等文化的接受窗口。都市史研究使得這些因近代化而興起的都市裝置以及支撐這些裝置的機關與人員成爲歷史的注目焦點，而這些在過去則是被研究所忽略掉的因素。

在日本，自植田捷夫系列的相關研究以來，[7]真正租界研究的成果還沒有出現。而且對於租界本身的關心相當有限，主要的關注焦點都集中於包括租界在內的在外日本人活動之上。1990 年組成的「在外經濟團體史研究會」的最新成果是波形昭一所編的《近代アジアの日本人經濟團體》（同文館，1997 年）。該書是以日本帝國主義影響下的臺灣、朝鮮、南洋委任統治地區、滿洲、中國本土、香港及東南亞的廣大地域爲對象，對經濟團體、行政團體、社會親睦團體等的組織構成、活動內容加以釐清，是本具有大抱負的作品。

只是，從日本的居留民或商工會議所等爲對象的日本經濟史研究者的成果來看，由於這些研究只限定在日本人活動所及的地區，而未對各租界與當地的關係或與其他租界進行比較研究，這些研究能否算入租界研究的領域是不無疑問的。從這點來說，深感有必要先分析研究一國的專管租界與多國共同租界內的行政機關與營運機關，並且須要用心發掘相關史料。目前，光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 01-18、外務部檔案 02-11、外交部檔案 03-16）、上海市檔案館（全宗號 U1.U38）所藏的檔案，就足夠產生具有充實內容的研究成果。

此外，即使不限定在租界，當全球化的是非價值問題被重新思考的今日，含括在都市內的外國社區團體的研究也有其必要。希望像 1997 年在里昂召開的「Foreign Communities in East Asia (XIXth-XXth centuries)」般的研討會能有機會被承續。在都市內部，不論在租界內外，都有許多的社區

---

[7] 植田捷夫《支那租界論》（巖松堂書店，1939 年）、《支那に於ける租界の研究》（巖松堂書店，1941 年）、《支那に於ける外國租界還付、治外法權撤廢》（龍文書局，1944 年）。

團體存在，並分擔著各種的都市機能。[8]

三、生活空間——近代建築、民居、園林
（Life Space—Modern Building, Private House and Garden）

都市是自然的、行政的、社會的、文化的、經濟的多層次空間所構成的場所，必須從市區與郊區的機能分割以及社會團體分居的空間性差異來加以理解。在考察都市空間的諸多面相時，Yi-Fu Tung 的 *Space and Place*, Univ. of Minnesota,1997 等從現象學角度所從事的地理學研究成果極具刺激性。1980 年代，受到年鑑學派的影響，試圖對這些都市空間的日常生活面相加以整體掌握的嘗試，主要是在宋代史研究的領域開始展開。利用記錄文學、繪畫、地圖等企圖對都市構造及都市內部生活模樣加以描繪的嘗試，正不斷產生意想之外的成果。之所以這麼說，是因過去利用官書很難描繪的都市內部構造與都市栩栩如生的形態得以再現之故。特別是被視爲宋代都市史研究的伊原弘的《中國開封の生活と歲時》（山川出版社，1991 年）與《中國人の都市と空間》（原書房，1993 年）等系列研究，可以說對應有豐富的照片、影片與地圖等非文書資料的近現代都市史研究，課以嚴肅的研究課題。

在近代中國都市史研究中，有將都市限定在政治與經濟領域論述的傾向，尚未導入社會史的方法論，也尚未試圖展開克服其方法論所面臨的問題。然而，當 1980 年代「改革開放」的成果一開始顯現出來時，對這些歷史學者所抱的課題，年輕的研究者從建築史學、地理學、社會學的立場出發，率先藉著田野工作而逐漸加以解決，而且逐漸釐清了容易被當作現代主義投射的都市新面相。例如，陳立行在《中國の都市空間と社會的ネットワーク》（國際書院，1994 年）一書中，對「改革開放」期的空間秩序與社會網絡的變化過程的描述，以及石原潤與孫尙儉編的《中國鄭州市住民の生活空間》（名古屋大學出版會，1996 年）對都市及農村住民的生活

---

[8] 貴志俊彥〈近代天津の都市コミュニティとナショナリズム〉（西村成雄編，《現代中國の構造變動　卷 3　ナショナリズム——歷史からの接近——》，東京大學出版會，2000 年）。

空間的實際調查，都是值得注目的研究。

〈伊東忠太研究〉：對日本建築史學的創始者伊東忠太與關野貞的關心又再度高漲了。將 architecture 翻譯成「建築」的人就是伊東忠太。兩人都是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並於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攜手對亞洲各地的建築進行調查，對亞洲建築史的創設盡了相當大的心力。伊東忠太的業績有重刊本的《清國伊東忠太見聞野帖（全 2 卷）》（柏書房，1990 年）與《伊東忠太著作集（全 8 卷）》（原書房，1982-83 年）。關野貞的《韓國の建築と藝術》（韓國の建築と藝術刊行會，1988 年）也重新刊行。1980 年代以後，隨著以往被等閒視之的亞洲建築再度吸引了關心注目，伊東忠太等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再度受到評價的趨勢也就其來有自了。

〈民居調查〉：中國施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日本的研究者與中國的研究團體共同進行了都市空間、建築、住宅與園林等的相關調查，而且已日漸獲得成果。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有淺川滋男的《住まいの民族建築學》（建築資料研究社，1994 年）、茂木計一郎的《中國居民の空間を探る》（建築資料研究社，1991 年）。

1990 年代，由中日雙方共同進行的都市與建築調查成果大量出現。[9]其中尤其以佛羅倫斯與東京爲主要實地調查對象的陣內秀信等法政大學中國建築都市研究會的活動最受人注目。陣內等參與了蘇州及江南地方水鄉市鎮的調查，相關的成果集結於陣內秀信編的《中國の水鄉都市——蘇州と周邊の水の文化》（鹿島出版會，1993 年）。也參與該調查的木津雅代則將有關中國庭園的空間構造形成的相關研究集結成《中國の庭園——山水の錬金術》（東京堂出版，1994 年）。其後，陣內秀信等於 1993 年到 95 年間，與清華大學共同展開北京都市空間的調查，並刊行了由陣內秀信等人編的《北京——都市空間を讀む》（鹿島出版會，1998 年）。儘管這些成果還沒能解決都市變遷的歷史分析課題，但是將都市北京的空間構造加

9 例如大西國太郎《中國　西安市における都市景觀の形成及び誘導に關する日中共同研究》（トヨタ財團助成研究報告書，1991 年）、鈴木充《中國　蘇州市の住宅地形成の研究》（住宅總合研究財團研究報告書 No.8816，1992 年）、土田充義《湖南省民家の共同研究中間報告書》（鹿兒島大學工學部建築學科建築史研究室，1997 年）等。

以立體的掌握之嘗試卻獲得了相當的成功。

〈近代建築調查〉：與以上以民居爲中心的調查不同，東京大學工學部生產技術研究所的相關研究人員則嘗試用測量與照相的方法，記錄大都市的近代建築資料，其契機始於 1985 年時爲紀念村松貞次郎退休而舉辦的「東亞近代建築」國際研討會（詳細情況參見村松伸、西澤泰彥編的《東アジアの近代建築》，村松貞次郎先生退官記念會，1985 年）。該研討會相關的藤原惠洋、村松伸與西澤泰彥等人所提有關都市建築的比較史考察之必要性，之後在加藤祐三所編的《アジアの都市と建築》（鹿島出版會，1986 年）也再度被提起。經過這樣的準備階段後，中日合同的全面性都市調查終於在 1987 至 1991 年間獲得實現。中國方面的「中國近代建築史研究會」（代表爲汪坦）與日本方面的「日本近代アジア建築史研究會」（代表爲藤森照信）分別爲雙方的聯絡窗口。他們的研究成果，集結成《中國近代建築總覽》（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92-1993 年）出版，包括北京、天津、青島、煙臺、濟南、哈爾濱、營口、南京、重慶、廬山、昆明與廣州等 12 冊，保存了龐大的建築群的記錄。其後再加上上海等地的調查而集大成的是藤森照信與汪坦監修的《全調查東アジア近代の都市と建築》（筑摩書房，1996 年）。該書是根據在中國、臺灣、香港、澳門與韓國等地的完整實地調查成果而成的重要著作。

此外，一些參與調查的年輕研究者則依據各自不同的問題意識而發表了個別的研究成果。例如藤原惠洋的《上海——疾走する近代都市》（講談社現代新書，1988 年）、西澤泰彥的《海を渡った日本人建築家》（彰國社，1996 年）、《圖說「滿洲」都市物語——哈爾濱・大連・瀋陽・長春》（河出書房新社，1996 年）與《圖說大連物語》（河出書房新社，1999 年）等的公開刊行。其中尤以村松伸的活動最受注目。村松著有《上海・都市と建築——1842-1949 年》（PARCO 出版局，1991 年）、《圖說上海——モダン都市の 150 年》（河出書房新社，1998 年）、《圖說北京——三〇〇〇年の悠久都市--》（河出書房新社，1999 年）及《アジア建築研究：トランスアーキテクチャー／トランスアーバニズム》（INAX 出版，1999 年）等，村松在廣泛考查過去到現在的亞洲建築的同時，不只努力嘗試去再現都市構造、都市文化與都市居民的意識，同時也有像《超級アジア・

モダン——同時代としてのアジア建築》等著作一般，從國際合作的觀點來審視亞洲建築的現況。

他們對建築樣式的解釋給人許多暗示，他們所提出的方法論也極具意義，亦即所要描述的不只是建築物，也應及於圍繞在建築家、技師與施工業者等周遭的人物與事業體的描寫。不過，應該留意的是他們的研究基本上是延續近代建築或近代都市政策等現代主義而展開的，對於今天已經很明顯知道是錯誤或者是可能沒有發展空間的問題之處理常嫌不足。在後現代時代到來的今天，單是藉著近代建築就想來整體性地掌握理解一個都市，不可否認的此種作法本身就有其局限性。因爲，亞洲的建築群本來就不是如伊東忠太以前所犯的錯誤認識般，只是作爲與西洋的「近代」相對化時的一種存在。

關於這點，《布野修司建築論集（全 3 卷）》（彰國社，1997-98 年）中含有建築史研究者自省性觀點的暗示。布野除了主持京都大學工學部建築學科的「アジア都市建築研究會」外，還兼任建築同人雜誌《群居》的總編輯。作爲建築史家的布野的全球式觀點，可能是源於以東南亞這個混合多樣性要素的地域爲考察都市及建築的舞臺所致也說不定。

目前，若要了解亞洲都市與建築的多樣性之一般情況，可以參看日本建築學會建築歷史意匠（即設計）委員會建築史小委員會的網頁（http://www.waseda.ac.jp/projects/Asian Arch/Asia-J.html）。

結語——迎向今後都市史研究的方向性

如上所述，中國都市的研究已經不再是歷史學者獨佔的領域了。此乃由於都市本是多面複合的「生態」，在本質上即具有須跨學科研究的性格所致。亞洲巨大城市的比較研究已說明了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與理工系科學等科際整合的必要性，而亞洲建築史研究也顯示了日本與當地之間國際性學術網絡的必要。日本的中國都市史研究，可能也已到了不陷入傳統漢學式研究（chinoiserie）的窠臼，而是必須以檔案調查與田野工作爲原則，來致力於泛亞洲巨大都市（Pan-Asia mega city）論的構築時期了吧。

在此可以當作典範的是戰後開始的科際整合大計劃「以比較方法對伊斯蘭都市性的綜合研究」（1988-1991 年），以及後續的「現代伊斯蘭世界

的動態性研究——爲理解伊斯蘭世界的資訊體系之建構及資訊的累積——」（1997-2001 年）（網頁爲http://www.1.u-tokyo.ac.jp/IAS/Japanese/index-j.html）。參考這些鄰近領域的成績時，可知在檢討從前近代、近代到現代的都市化過程時，儘管其重點是置於現代都市的變貌過程，惟過去 150 年來都市化的過程如何與現代相接合的相關理論性架構仍是必要的。

在此，首先要確認的是亞洲都市間比較研究的重要性，而且從地域內來看不只要注意沿江沿海地區的都市，對於內陸或少數民族居住的都市空間的個案研究也有累積的必要。剛出版的 J. W. Esherick 之 *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00-1950* (Univ.of Hawaii Press, 2000)所顯示的研究方向性，正是在於對上海以外都市特徵的詳細研究。但是，若考慮到過去美國在地域研究方面的成果，在作個案研究的探求時，爲求避免陷入完全埋沒在一個都市的弊害，應該致力於對中央權力或國家全體之關係的探討，或者是專注於引導出能與其他地區比較的都市特性上。另外，都市間的網絡雖然可以一言以蔽之，但是連結其間的聯繫點的情況卻是複雜的，不僅是交易關係，還應透過非文書式資料，透過藝能、節慶、宗教以及都市文化中所不可或缺的娛樂、玩樂及各種媒體等，甚至是透過犯罪等來加以考察。並且，將都市社會內部複雜的統治構造以及庶民的生活模式等也加上地域性特色，特別是明清時期或是民國時期的都市行政情況、都市計劃法以及各種團體的研究也都有推進的必要。

在日本，國立大學的獨立行政法人化計劃業已決定，各大學的歷史學講座的規模也隨之日漸縮小。中國史的研究也必須處理當今亞洲所面臨的各種問題，而一個重視理解這種歷史過程及各面相的中國史研究時代也已經到來了。

附記：本文爲 1999 年度至 2002 年度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費補助〈編號爲基盤（d）〉「中國黃渤海地域的都市化及媒體形式多樣化的研究（1870-1954）」之部份成果。

本刊「研究概況」欄，歡迎讀者撰文介紹各學術機構有關中國近現代史之研究情況，以及對各個研究領域進行回顧與檢討。

中國大陸最近之會館史研究

馮筱才*

一、前言

會館史是近世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重要領域。[1]從研究的進展來看，最早關注這個問題的可能是在中國海關任職的外國人。[2]後來不少日本學者及中國學者均投入研究，成果斐然。1950 年代初，由於政治力的衝擊，會館、公所及同鄉會一類組織在中國大陸被視爲「封建」而遭到禁止。但同時，因「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討論的開展，會館成爲當時學界研究的主要對象之一。不過，當時多數學者關注的重心在於證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存在，以及用行會的禁錮來解釋資本主義發展受阻的原因，因而其研究的成績不可高估。

1980 年代初，大陸學界爭鳴風氣又起，關於會館、公所是否具有行會性質重新引起討論，而會館與公所二者的關係也漸爲人們所明瞭。近年來，由於一些新理論的引進，如「國家——社會」框架、「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理論，會館、公所及同鄉會等帶有濃厚民間色彩的「自願團體」，成爲許多學者欲「小試牛刀」的對象。爭論仍在繼續，但新的觀點亦正在湧現。而隨著大陸社會的漸變，「同鄉會」與同業公會性質的「民間行業

---

* 浙江大學政治學系講師、浙江大學歷史學系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1 本文所指會館史以會館、公所爲主，旁涉後續的同鄉會及同業公會等團體。

2 參見何炳棣，《中國會館史之研究》（臺北：學生書局，1965 年版），頁 37-40；D. J. Macgowan 在溫州海關任職時，則有一篇較詳細的調查發表，即 "Chinese Gilds or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Trades Unions", *Journal of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1,No.3(1886)，中文譯文見彭澤益主編，《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1 月）。

商會（協會）」之類組織又在一些地方浮現，甚至引起有關方面的注意。[3] 所以，會館史的研究，在有意無意間，含有現實關懷的因子在其中。本文將就大陸學界由 1993 年至今的會館史研究作一簡要介紹。[4]

二、研究成果及其觀點

（一）研究成果

1.專書

王日根之《鄉土之鏈：明清會館與社會變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年 5 月，以下簡稱《鄉土之鏈》）是近年關於會館史研究的重要著述。該書由作者的博士論文修改而成，旨在從社會變遷與社會整合的角度對明清會館興盛的歷史過程、社會背景、內部運作、社會功能與文化內涵，作一全面的考察與分析。[5]以會館爲題的著述還有周昭京著《潮州會館史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 10 月），在該書中，作者就蘇州、上海、北京及境外各地潮州籍會館作了全面的介紹；湯錦程著《北京的會館》（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1994 年 4 月），該書從會館的由來講到其各種文化事業，包羅甚廣。但出版後，受到另一位學者嚴厲的批評，被認爲是「粗製濫造」之作；[6]上書出版不久，胡春煥、白鶴群合著的《北京的會館》（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4 年 5 月）立即問世，該書主要是

---

3 李軍，〈大學校園「同鄉會熱」的負面影響〉，《當代青年研究》，期 6（1996 年）；李甬、王孔瑞，〈溫州商會有點面子〉，《南方周末》，版 28（2000 年 4 月 21 日）。

4 1993 年前大陸學者對會館史的研究，可參考王日根，〈國內外中國會館史研究述評〉，《文史哲》，期 3（1994 年）。

5 該書出版後有多篇書評，主要者有劉永華，〈評《鄉土之鏈，明清會館與社會變遷》〉，《歷史研究》，期 3（1997 年）；陳學文，〈一部立意深有創見的會館史著作，《鄉土之鏈，明清會館與社會變遷》〉，《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期 1（1997 年）。

6 華道強，〈一部粗製濫造的「著作」---評湯錦程的《北京的會館》〉，《中國社會經濟史》，期 4（1995 年），頁 88－94。

作者就北京各區的會館所做的調查記錄，共分北京會館之綜述、會館在各區縣的分布、各省在京會館、工商會館等幾個部分。高洪興著《會館街——外碼頭人從這裡興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 年 6 月），屬《上海潭》的一種，簡略介紹了上海各地會館的歷史。

以會館爲題的建築史著作有河南省古代建築保護研究所與社旗縣文化局共同編著的《社旗山陝會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 10 月）一書。社旗原稱赊旗，爲清代北方名鎮，該縣山陝會館規模宏大，保存較好，1988 年被定爲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社旗山陝會館》一書收入研究論文和雕刻銘文及石刻碑記的拓文等有關文字資料約 25 萬字，又各種圖版 430 幅。文學史著作有彭曉丰、舒建華《「S 會館」與五四新文學的起源》（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年 11 月），該書是以魯迅在北京紹興會館的創作活動爲主線，介紹「新文學運動」前後魯迅及其他浙籍作家創作中的地域影響與獨特風格。

其他不以會館爲名，但其中有部分章節涉及會館問題者則更多。諸多涉及明清社會經濟史的作品中，亦無不提及會館的問題。如蔣兆成著《明清杭嘉湖社會經濟史研究》（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 年 3 月），頁 426 至 437 即舉浙江杭嘉湖地區會館公所的活動爲例，分析中國行會的特點；范金民在其新作《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中，以專章討論了全國各地商人商幫在江南的活動，並附有詳細的會館公所的調查表格。曹樹基《中國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 7 月）第六卷清、民國時期中，亦有「移民氏族與移民會館」一節。楊國楨、鄭甫弘與孫謙的合著《明清中國沿海社會與海外移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年 5 月）亦討論了海外移民以會館爲主的地緣組織的形成與發展。

新近出版的商會、商幫研究著作，對會館均有所涉及。如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年 1 月）、[7]朱英《轉型時期的社會與國家——以近代中國商會爲主體的透視》（武漢：

[7] 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年 1 月），頁 243－250。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年 9 月）、[8]張正明《晉商興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 年 12 月）[9]等等。各地出版的通史及志書中亦有不少的介紹，如新近出版的《上海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9 月）、[10]《蘇州市志》（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 年）[11]等。

2.博、碩士論文

浙江大學研究生陶水木的博士論文題爲《浙江商幫與上海經濟近代化研究》，主要「論述浙江商幫經營工商業的經驗教訓」，[12]其中第四章專門討論上海的浙籍同鄉組織與同業組織。同年又有華東師範大學研究生李堅的博士論文《上海的寧波人研究》，亦以一章的篇幅談旅滬寧波人的同鄉組織。張國雄的博士論文《明清時期兩湖移民研究》，其中亦有涉及會館者。[13]

上海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研究生曹竣、方福祥、趙蘭亮、黃壽東分別就上海的寧波籍、湖州籍、山東籍、紹興籍等地域團體撰成碩士論文。[14]主要討論這些同鄉團體的成立背景、組織結構、所辦事業功能等等。

以上僅筆者所知者，其他各研究機構之研究生學位論文中雖涉及會館史，但未知者可能亦有不少，但限於資訊不暢，無法及時探知。

3.單篇論文

大陸學者所發表與會館史相關論文，自 1994 年至今共計約 50 餘篇。內容上主要包括綜述、會館的形成與分布、會館性質及功能、會館的公益

---

8 朱英，《轉型時期的社會與國家——以近代中國商會爲主體的透視》，頁 23－35。

9 張正明，《晉商興衰史》，頁 97－106。

10 周武、吳桂龍，《上海通史》，卷 5，頁 327－336。

11 陳暉主編，《蘇州市志》，冊 3。

12 陶水木，《浙江商幫與上海經濟近代化研究》，浙江大學博士論文，1999 年 5 月，「提要」。

13 張國雄，《明清時期兩湖移民研究》，博士論文摘要，《文獻》，期 1（1994 年）。該論文經陝西教育出版社（西安）1995 年出版。

14 分別是，曹竣的《上海的四明公所與寧波旅滬同鄉會研究》，1996 年碩士論文；方福祥的《上海湖州商幫研究》，1996 年碩士論文；趙蘭亮的《近代上海的山東移民與山東同鄉團體》，1999 年碩士論文；黃壽東的《近代上海的紹興同鄉團體研究》，1999 年碩士論文。

善舉、會館、公所與商會的聯繫與區別，會館與社區地方事務、會館建築及其藝術等。討論的會館類型包括工商性會館、移民性會館、客屬會館以及行業公所、同鄉會等。主題涉及經濟史、社會史、文學史、建築史等。

除期刊論文外，相關學術會議上亦時見會館史論文發表。如 1999 年 8 月 16－19 日，「檔案與北京史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有劉正剛發表〈近代以來北京地區會館的衰落〉，習五一發表〈近代北京工商行會與傳統宗教〉。[15]

(二) 觀點介紹

以下介紹從社會史與經濟史的角度所進行的主要研究及其觀點。

1.形成與分布

王日根歸納地域性會館形成和發展的基礎爲三點：土著排斥、「鄉井」價值實現的舞臺、社會管理的需要。他認爲會館的地域分布特點是：沿海沿河地區分布多，內陸腹地分布少；東部分布多，西部少；會館建築與商幫發展相輔相成。[16]范金民指出，江南行業性會館公所的不斷增多，實力的不斷壯大，是江南商品經濟日益發展的標誌，它們既是此種發展的產物，又促進了其進一步的發展。曹樹基討論了移民會館的形成，他認爲，當移民遷徙在外，需要一個公共場所進行活動時，會館也就出現了。但其本質實爲公共福利事業，而非經營組織。[17]

2.性質與功能

這是大陸學者討論得最多的主題，具體的問題又可細分如下：

（1）性質

①有無行會性

會館公所有無行會性，學界一直爭訟不休。近幾年仍可見相反的觀點在發表。肯定者如吳慧強調，會館、公所的行會性質不容貶低，其行會性主要體現在行規之上。[18]蔣兆成亦認爲會館、公所對產品的生產和銷售、產

---

[15] 馮佐哲，〈檔案與北京史國際學術討論會在京舉行〉，《中國史研究動態》，期 12（1999 年）。

[16] 王日根，〈地域性會館與會館的地域差異〉，《中國歷史地理論叢》，期 1（1996 年）。

[17] 曹樹基，前引書，頁 315。

[18] 吳慧，〈會館、公所、行會，清代商人組織演變述要〉，《中國經濟史研究》，期 3（1999 年），

品的規格標準、市場價格、原料分配、學徒人數、年限等等都有具體的規定。所以它們的行會組織性質及其經濟職能是非常清楚的。[19]彭澤益在〈中國工商業行會史研究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強調中國的行會在清代已相當成熟，它們本質上是享有獨占特權的團體，依恃官府的保護進行活動，以致成爲封建統治城市的工具。他所稱的行會實際包括了商人創建的會館、公所以及其他以「堂」、「廟」等命名者。[20]持類似觀點還有朱英、黃漢民等人。[21]

范金民把江南的會館公所分成地域性與行業性兩種，認爲既不能把地域性會館公所說成是對內限制發展，對外排斥競爭的封建行會組織；亦不能以非主流的個別行業公所的負面行爲來概括理解江南所有的行業公所的活動。[22]謝俊美在〈清代上海會館公所述略〉一文中指出，中國的行會組織較多地存在於手工工場、手工作坊內部。會館公所同行會組織有聯繫，行會在相當程序上利用了會館公所，加強了對工人的控制，但它卻不是行會這一類組織。[23]馬敏把會館與公所分開討論，認爲絕大多數明清蘇州會館只是以地域性商幫爲基礎的同鄉會性質的組織，而非嚴格意義的行會；而公所的職能卻基本類似西方早期的行會。[24]

②地域性與封建性

不少學者主張會館公所這些組織發展到清末，其地域性逐漸消融，而共同的「階級利益」則居於重要地位。如李吉奎以上海廣東商人爲例，認爲至 1900 年前後，廣幫滬商絕大部分人已落地生根，會館雖仍有聯絡鄉誼、

頁 111。

19 蔣兆成，前引書，頁 432。

20 《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1 月）。

21 朱英，前引書，頁 23－33；黃漢民，〈近代上海行業管理組織在企業發展與城市社會進步中的作用〉，張仲禮主編，《中國近代城市企業．社會．空間》（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 年 1 月），頁 174－175。

22 范金民，〈清代江南會館公所的功能性質〉。

23 《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期 2（2000 年）。

24 馬敏，《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頁 177、247。

處理糾紛的作用，但同鄉關係相對淡化。1904 年上海總商會成立後，商人逐漸已用統一的口徑發言。此時「共同的階級利益才是他們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它比日見淡薄的鄉情有現實得多。」[25]王衛平則以清代乾隆中前期爲界，提出在此以前，蘇州的會館基本上是一種同鄉團體，而在此後，隨著商業機能的突出，其地域性逐漸減弱，轉變爲工商行會組織。[26]

范金民則不同意此種觀點，他通過對清代杭州、蘇州及上海三地徽州商幫慈善設施的研究，認爲徽商乃至所有商幫直至清末仍保留了濃厚的地域觀念和商幫特色。[27]而馬敏、丁長清等人則將地域性作爲劃分會館、公所與商會的標尺之一。[28]

與地域性相連的是所謂「封建性」。[29]如王日根認爲當會館成爲流動人員中的一種有效的社會組織而爲政府支持時,大批官僚便會介入會館，從而保證了會館的「封建性」。[30]謝俊美亦承認清代的會館公所有一定程度的封建落後性。他以鴉片戰爭爲界線，此前的會館公所屬於封建商業社會的民間團體，領導權掌握在少數仕宦紳商手裡；但在清末，其區域性色彩漸漸減退，按行業按系統聯合的趨勢日益增強，大多演變成資本主義性質的工商業團體，領導權掌握在民族資產階級的上層手中。[31]上述彭澤益、朱英的

---

[25] 李吉奎，前引文。

[26] 王衛平，〈清代蘇州的慈善事業〉，《中國史研究》，期 3（1997 年），頁 154。

[27] 范金民，〈清代徽州商幫的慈善設施－以江南爲中心〉，《中國史研究》，期 4（1999 年）。

[28] 馬敏，前引書，頁 250；丁長清，〈試析商人會館、公所與商會的聯繫與區別〉，《近代史研究》，期 3（1996 年）。

[29] 所謂「封建性」或者「封建落後性」的提法主要出現於以下作者的論著中，但他們對該用法似乎並無嚴格規定。大致上，他們把會館公所的地域排他性以及與官方的聯繫等等均視爲其表現。相關的用詞如下面提到的「封建國家」之類。「封建」一詞的使用，在此處基本上是以政權性質而作的某種劃分。即把所謂「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國家」指爲「封建國家」，而與之相連的官僚系統、意識型態等便沾上「封建」色彩。

[30] 王日根，〈明清會館與社會整合〉，《社會學研究》，期 4（1994 年），頁 109；又《鄉土之鏈》，頁 261。

[31] 謝俊美，前引文。

論著中亦強調了會館公所作爲「封建國家」工具的特點。

③傳統性與現代性

「現代化」是研究會館史的大陸學者常用的一個理論。其中以虞和平爲代表，他提出，會館這種傳統的城市同鄉組織保持幾百年不變，直到清末民初，隨著城市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移民數量的增加和移民素質的改變，才開始發生變化，現代性的同鄉會逐漸發展起來，並影響了傳統同鄉會館和公所的組織性質向著現代組織的方向轉化。[32]持此論者爲數甚眾，如曹竣、方福祥認爲雖然同鄉會仍以傳統地緣爲紐帶，但無論內容和形式都不同於同鄉會館、公所。[33]宋鑽友則以上海廣肇公所爲研究個案，他發現在民國以後，這個傳統商人組織的職能有了很大的轉變。通過改革，它從職能和組織上完成了從傳統向近代的轉移，從而適應了新的歷史條件。馬敏、張忠民等人均認爲會館、公所是傳統的商人組織，有許多消極的特點。[34]

（2）功能

研究者們多把會館、公所的功能概括成「答神庥、睦鄉誼」，或者「祀神、合樂、義舉、公約」。而縱觀近幾年的研究，談及功能者多注意以下三方面：

①社會整合

王日根從三個層面探討了明清會館的社會整合功能：會館內部整合、移民社會整合、中外文化整合。認爲它們在保持社會秩序及文化融合等方面發揮了其積極的作用。[35]宋鑽友在〈民國時期上海同鄉組織與移民社會關係初探〉一文中亦稱「同鄉組織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盲目移民給城市帶來的壓力，改變了移民群體的無序狀態」；[36]曹竣等人指出上海的同鄉

---

[32] 虞和平，〈清末以後城市同鄉組織形態的現代化－以寧波旅滬同鄉組織爲中心〉，《中國經濟史研究》，期 3（1998 年），頁 71。

[33] 曹竣、方福祥，〈近現代上海盧灣區同鄉移民團體的考察〉，《史林》，期 3（1995 年），頁 98。

[34] 馬敏，前引書，頁 250；張忠民，〈清代上海會館及其在上海地方事務中的作用〉，《史林》，期 2（1999 年），頁 23。

[35] 王日根，《鄉土之鏈》，頁 216－247。

[36] 宋鑽友，〈民國時期上海同鄉組織與移民社會關係初探〉，《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期 3

會館、公所與同鄉會雖然存在某些差異，但對近代上海移民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均有貢獻。[37]

②地方事務的參與

會館一類的組織在地方事務中起到什麼樣的作用？亦即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它們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張忠民認爲，會館內部事務的職能和作用，也可以視之爲地方事務的一種特殊類型或存在形態。他並且指出，在清末地方自治運動開展時，上海地方事實上出現了兩個並行不悖的行政中心：一個是以傳統皇權爲背景，正式的政府機構；一個則是以民間工商勢力和會館公所爲背景的市民化的自治中心。[38]而在河南佘店鎮，有人認爲地方的政治經濟實以商人會館爲中心，甚至構成了一座「獨立的客商塢堡」。[39]

另一方面，一些會館、同鄉會在民國初年的社會環境中，似乎又對家鄉的各項興革事務施加其影響。如王日根注意到 1925 年前後，北京的福建會館「幾乎成爲地方與中央的中轉站」。[40]

③慈善公益

許多研究者都以大量篇幅介紹會館公所及同鄉會的慈善公益事業。如宮寶利利用30家蘇州公所的碑刻史料考察了清代後期該地區公所的善舉活動。[41]范金民則專門探討清代旅蘇徽州商人的慈善設施。[42]王衛平對清代江南地區慈善事業的研究中亦提及會館公所的活動。[43]

對同鄉會的研究，慈善公益事業則是描述的重點。[44]研究者均認爲同鄉

（1996 年），頁 166。

[37] 曹竣、方福祥，前引文，頁 99。

[38] 張忠民，前引文。

[39] 〈緒論〉，《社旗山陝會館》，頁 2。

[40] 王日根，《鄉土之鏈》，頁 60。

[41] 宮寶利，〈清代蘇州地區公所的善舉活動〉，《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期 1（1998 年）。

[42] 范金民，〈清代徽州商幫的慈善設施－以江南爲中心〉，《中國史研究》，期 4（1999 年）。

[43] 王衛平，〈清代蘇州的慈善事業〉，《中國史研究》，期 4（1999 年）。

[44] 如虞和平，前引文；李堅，《上海的寧波人研究》，頁 156、166－169；曹竣，《上海的四明公所與寧波旅滬同鄉會研究》；趙蘭亮，《近代上海的山東移民與山東同鄉團體》；黃壽東，《近

會給予了旅居異地的人們許多幫助，尤其在非常時期，其所發揮的救助作用更爲顯著。同時，對其家鄉的公益善舉，同鄉團體亦能貢獻良多。

3.移民與會館

藍勇在〈清代西南移民會館名實與職能研究〉一文中分籍考察了清代西南地區移民會館的名稱，以及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的職能。移民會館的建立使移民的鄉土觀念得以較長期地保留下來，減緩了移民和土著以及各籍移民間的同化。[45]在另一篇論文中，他詳細統計了清代四川會館的分布，並試圖通過此種資料來驗證移民人口的比例。結果他發現，四川分籍會館的比例與分籍移民得分的比例一致。[46]任銀睦亦曾用清末民初青島的同鄉組織的分布，作爲分析青島開埠後移民流入的籍貫結構的一個旁證。[47]而曹樹基通過他對清代四川東部和西部的移民的研究，認爲會館的多少與移民的多少並不存在什麼必然的關係，「由於我們無法區別城市會館和農村會館，以及我們無法確定會館所代表的各類分籍人口的前提下，根據會館的數量是無法估計移民人口的數量的」。[48]

宋鑽友、李堅等人撰文探討了同鄉團體在上海移民社會中的作用。宋在其論文中指出：民國時期上海的同鄉組織承擔了大量的社會責任，「一個個具有高度自治精神，團結互助的移民社會或移民社區」得以形成，促進了上海的社會穩定與城市經濟發展。[49]

代上海的紹興同鄉團體研究》；汪仁澤，〈虞洽卿與上海寧波旅滬同鄉會〉，金普森主編，《虞洽卿研究》（寧波出版社，1997 年 6 月），頁 62－76；顧炳權〈試論浦東同鄉會的浦東開發工作〉，《上海研究論叢》（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3 年 8 月），輯 9，頁 120－128；郭緒印，〈上海客屬同鄉團體支援淞滬抗戰〉，《上海修志嚮導》，期 3（1995 年）；曹竣，〈上海寧波幫的抗日救國活動〉，《抗日戰爭研究》，期 1（1997 年）。

[45] 《中國史研究》，期 4（1996 年）。

[46] 藍勇，〈清代四川土著和移民分布的地理特徵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期 2（1995 年）。

[47] 任銀睦，〈清末民初移民與城市社會現代化——青島社會現代化個案研究〉，《民國檔案》，期 4（1997 年）。

[48] 曹樹基，前引書，頁 110－111。

[49] 宋鑽友，〈民國時期上海同鄉組織與移民社會初探〉，《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期 3（1996

海外移民的地緣組織的研究亦引起學者的注意，孫謙在《明清中國沿海社會與海外移民》一書撰「沿海社會組織與海外移民」一章。他認爲維繫海外移民地緣關係的紐帶最早是具有多種功能的寺廟組織，清季才開始建立同鄉會館。此種會館被他定義爲「以中國原籍爲地域基礎的自願團體」。[50]丘峰認爲東南亞的客屬會館文化經歷了「華僑時代」和「華人時代」兩個不同的時期，這兩個時期的會館有著質的變化。後者的特徵表現爲：「忠」的觀念明顯轉變；產業的轉變與發展；會館的文化教育日趨發展；尋根問祖的活動逐步擴展；世界性的客屬組織迅猛增加。[51]

4.會館與宗教文化

商人的會館建築有時是和祀神的廟宇連爲一體，甚至合二爲一的，商業力量會有助於民間信仰的傳播。如依陳尙勝的論文，清代天后宮的廣泛分布和媽祖文化的傳播，主要是通過商幫會館的途徑和商業力量來推動的；而會館的宗教祭祀可能帶有很強的社會功能。[52]在王日根的筆下，明清會館神靈成爲一種有效的整合紐帶，處於當時的社會變遷之中，它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優良的文化品德」，並維持了社會的穩定。[53]

5.會館、公所與商會之比較

有人認爲從研究商業史的立場看，會館與公所之間有深刻的區別。它們是商人組織的兩個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也可以說是兩種不同類型的商人組織。從清前期大量會館的興起，到清後期大量公所的興起，反映著商

年）。

50 楊國楨、鄭甫弘、孫謙著，《明清中國沿海社會與海外移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123。

51 丘峰，前引文，頁166。

52 蔣維錟，〈清代商幫會館與天后宮〉，《海交史研究》，期1（1995年）；王日根，〈論明清會館的神靈文化〉，《社會科學輯刊》，期4（1994年）；宮寶利，〈清代會館、公所祭神內容考〉，《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期3（1998年）；陳尙勝，〈清代的天后宮與會館〉，《清史研究》，期3（1997年）。

53 〈明清基層社會管理組織系統論綱〉，《清史研究》，期2（1997年），頁19。

人組織的演進。[54]

范金民避開就會館、公所的名稱而作的一些性質判斷，他提出應從地域或行業的角度，將會館和公所分爲地域性和行業性兩大類。而會館一類，即使有時既表現爲地域性又表現爲行業性，但地域性仍占絕對比例。總體而言，會館主要是地域性的社會團體，而公所主要是行業性社會團體。而且大多數的會館形成於太平天國以前，而大多數的公所形成於太平天國之後。[55]

丁長清亦從命名、組織者的職業、是否訂立行規等角度出發，討論會館與公所的區別。他認爲，會館基本以地區命名，公所則多以行業，或以含行業的字義命名；會館主要是商人組織，而公所則有不少是手工業者組成；商人會館與公所相比很少訂立行規。但其論述的根據主要從《上海碑刻資料選輯》一冊書中得來，所以其結論的適用性值得推敲。[56]其他類似的討論如謝俊美〈清代上海會館公所述略〉。[57]會館、公所與商會的異同爲許多學者所關心。朱英的筆下，會館公所是屬於行會組織，封建依賴性很強；而商會則是具有獨立性格的現代社團。[58]丁長清將地緣性、行幫性等作爲劃分會館、公所與商會的兩個重要依據。[59]王日根則不同意將兩者放在對立的位置。他指出會館與商會在許多方面有著共同的追求，商會在處理一些「非經濟」問題時並沒有會館公所這類組織靈活，而祭神等活動亦不能作爲判斷其落後的依據。[60]

---

[54] 吳慧，前揭文，頁 119。

[55] 范金民，〈清代江南會館公所的功能性質〉，頁 46。

[56] 丁長清，前引文。

[57] 謝文主要依據的亦是《上海碑刻資料選輯》一書。文中作者指出，「一般說來，會館主要按地區組織，……公所的組織形式，地區和行業並重。」文載《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期 2（2000 年）。

[58] 朱英，前引書，頁 23－33。

[59] 丁長清，前引文。

[60] 王日根，〈近代工商性會館的作用及其與商會的關係〉，《廈門大學學報》（社科版），期 4（1997 年）。

另外亦有論文涉及商人或官宦與同鄉會館興建的關係，會館興落的原因等。[61]恕不一一介紹。

三、資料的整理出版

近年中，大陸各家出版社出版有各類檔案匯編、資料集等甚多，其中與會館史有關者亦不在少數。以下 4 種是筆者認爲最重要者：

（一）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清代工商行業碑文集粹

這兩種書共三冊，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彭澤益編輯。[62]《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一書分上下兩冊，共 8 篇：前 2 篇是從中外文書刊及地方志中選錄的有關工商會館公所的記述。如把瑪高溫(D. J. Macgowan)1886 年發表的 "Chinese Gilds or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Trades Unions"一文及發表於 1883 年的 "Chinese Guild and their Rules"譯成了中文；第 3 篇是「各省工商行業條規選輯」，這些行業條規主要來源於 1911 年版的《湖南商事習慣報告書》、重慶《巴縣檔案》、東亞同文會所編《中國經濟全書》、《北京工商基爾特資料集》等。下冊中，第 4 篇有關「會館公所」的記載主要從《海關十年報告》與《布萊元克商會訪華團報告》中輯錄出；第 5 篇是晚清報紙中有關手工業行會的新聞摘編；第 6 篇爲上海工商業會館公所徵信錄選輯；第 7 篇資料除兩則來自清室檔案外，其他均摘自各種文牘、筆記與文集等；第 8 篇中，編者輯錄了一些清末民初商會與工商業同業公會的法規。書前有彭氏所撰導論——〈中國工商業行會史研究的幾個問題〉，表達了作者相關的主要觀點。書後附有「中國工

---

[61] 杜春和，〈李鴻章與安徽會館〉，《安徽史學》，期 1（1995 年）；陶水木，〈紹興商人與紹興旅滬同鄉會〉，《紹興文理學院學報》（社科版），期 1（1999 年）；馬斌、陳曉明，〈明清蘇州會館的興起，明清蘇州會館研究之一〉，《學海》，期 3（1997 年）；張明富，〈試論明清商人會館出現的原因〉，《東北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期 1（1997 年）；劉正剛，〈近代以來北京地區會館的衰落〉，「檔案與北京史國際學術討論會」，1999 年 8 月 16－19 日。

[62] 前書由中華書局 1995 年 1 月出版，後書由中州古籍出版社（鄭州）1997 年 6 月出版。

商業行會簡表」。

《清代工商行業碑文集粹》一書是上書的補編。匯編了有清一代北京、上海、蘇州、杭州四地的工商會館、公所碑記業規共 181 篇。全書所收碑記按地區分排，次又按行業分類。對研究清代城市手工業及商業發展史頗有參考價值。

（二）北京會館史料[63]

該書是近年大陸所出版的唯一一冊會館檔案匯編，史料價值極高。其材料主要爲北京市檔案館館藏相關會館檔案。全書分爲會館法令、會館管理、會館財產、會館調查、工作報告、會館碑記、會館楹聯等七個部分。會館法令部分輯錄了自 1915 年至 1956 年各屆北京市（北平市）政府當局管理會館的規則、辦法及通知等，反映了國家對會館的控制努力；會館管理則選錄了自 1770 年至 1951 年全國 21 個省份在北京的會館及以後成立的同鄉會所制訂的規條、章程及爲登記致官方的呈文，這部分內容爲該書主體之一，占去全書近半篇幅。從中可清楚看出會館的自我規範與政府試圖規範的各種行爲；會館財產部分主要選錄了 1950 年後各省會館上報的地產及其他財產的清冊；會館調查部分輯錄了各省會館的調查登記表與申請書，註明不同時期各會館的名稱、地址、負責人及職員、歷史沿革、組織情形、經濟來源等各項數據資料；工作報告部分輯錄了 1950 年代各省會館財產管理委員會之成立及整理工作的報告；其他會館碑記、楹聯兩部分主要形成年代爲清季民初。

該書前置有王國華撰寫的前言一章，討論北京會館的起源發展、機構人員與財產、歷屆市政當局對會館的管理以及會館對北京文化的影響等。

（三）蘇州社會史碑刻史料集

蘇州大學出版社新近亦有《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出版。[64]該書由王國平、唐力行等人編輯，收錄了有關蘇州地區（含吳縣、吳江、常熟、昆山、太倉及張家港等地）社會史的相關碑刻共 500 件。時間上起明初、下迄 1949 年。全書按社會學的體系排列：一、社會角色與社會群體。收錄

---

[63] 北京市檔案館編，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 年 12 月。

[64] 王國平、唐力行主編，《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江蘇：蘇州大學出版社，1998 年 8 月）。

婦女兒童、農民、商賈、塾師、郎中、糧長、富戶、士宦、鄉紳、將官及其他階層人等之墓誌銘、碑記等 173 件，又血緣群體個案碑記 16 件、地緣群體個案碑刻碑記 5 件；二、社會生活與社會合作。收錄宗族生活與互濟類、行業生活與互濟、公共生活與公益事業及其他各類碑記共 96 件；三、社會信仰與社會心態。分別收錄有關道教、佛教、回教、基督教及各種民間神祇廟宇碑記共 55 件，又先賢祀廟、宗祠、家祠等碑記 39 件，行業神靈 18 件，勸人行善及其他 9 件；四、社會問題與社會管理。收錄政府力圖解決社會問題規範行爲之碑記 13 件、賦役管理、商業管理、宗族管理、寺觀管理、環境市政管理及其他各類碑記 86 件。

以上 500 件碑記中，與會館公所等有關者甚多。爲研究江南社會經濟史者不可或缺的資料書。書後還附錄了此前出版的《江蘇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中有關蘇州部分與《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一書的目錄。不過，據稱該書由於出書時間匆忙，文字錯漏不少，使用時需要注意。

（四）檔案史料類刊物所刊載者

大陸各重要檔案館均有檔案史料公布與研究之期刊出版。近年來，此類期刊上時常揭載與會館史相關的檔案。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歷史檔案》便先後公布〈清末北京外城巡警右廳會館調查表〉，[65]〈江蘇吳江市盛澤鎮碑拓檔案中會館史料選刊〉等。[66]北京檔案館所辦《北京檔案史料》，亦先後公布一些北京行業性會館的史料。[67]上海檔案館主辦的《檔案與史學》則登載了關於上海四明公所的檔案。[68]相關史料在其他省份的類似刊物中偶然亦可看見。[69]

---

65 《歷史檔案》，期 2（1995 年），頁 59-65。

66 《歷史檔案》，期 2（1996 年），頁 20－24。

67 如〈清代北京顏料行會館碑刻〉，《北京檔案史料》，期 1（1994 年）；劉蘇，〈清代北京糖餅行靛行會館碑刻〉，《北京檔案史料》，期 3（1994 年）；王星整理，〈民國二十一年油酒醋醬公會重修臨襄會館碑〉，《北京檔案史料》，期 3（1995 年）。

68 〈上海四明公所檔案選〉，《檔案與史學》，期 6（1996 年）；〈第一次四明公所血案檔案史料選〉，《檔案與史學》，期 1（1997 年）。

69 如佚名，〈民國各省旅黔同鄉會〉，《貴州檔案史料》，期 1（1996 年）；〈抗戰期間浙江旅渝

除此之外，像大陸各地出版的文史資料中亦可見對會館組織的介紹文章。[70]但需要研究者費心去翻揀。其他如一些地方檔案館出版的行業檔案中亦會有大量的行業性會館公所的資料，值得注意。如蘇州市檔案館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中便收錄了該館保存的大量蘇州各絲綢行業性會館、公所檔案。[71]

四、研究中的缺漏

近年來，大陸的會館史研究漸有升溫的跡象，參與研究的學者似乎亦在增加。新的成果不斷出現，其中明清史部分的研究成績尤佳。但是研究中的缺漏仍有不少，許多方面尚有待進一步的規範與提高。

（一）概念的規範

會館的各種類型已爲不少學者所公認，但研究者在討論時，往往從某一特定類型或某一時段、地區的特別情形出發，以致雖然都在談「會館」，但其實概念的內容卻迥異。如王日根把會館定義爲「明清時期易[異]籍同鄉人士在客地設立的一種社會組織」，[72]顯然忽視了民國以後各地眾多會館、公所的存在。而一些研究者把會館公所、同鄉會等組織歸爲「同鄉移民團體」或「同鄉組織」，似乎同業性質的會館、公所又被遺漏。不少論者把工商性、移民性的會館與試館、以會館、公所爲名的善堂等等不加區分地加以討論，可能亦會犯「以偏概全」的毛病。因此如何規範會館史所涉及到的諸多概念，爲研究者構建一個對話的平臺，是一個急需進行的工作。

（二）研究視野

同鄉會的一次歡迎報告會〉，《檔案史料與研究》（重慶市檔案館主辦），期 2（1993 年）。

[70] 如東山，〈乍浦會館摭憶〉，陳偉侗主編，《嘉禾春秋》（嘉興市歷史學會、嘉興市地方志編纂室、嘉興市圖書館編印，1998 年 12 月），頁 114－119。

[71] 蘇州市檔案館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上、下）（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5 年 4 月），版 1。

[72] 王日根，《鄉土之鍵》，頁 29。

在已有的研究中，蘇州、北京、上海等地爲學者們所矚目。研究時段則以明清爲主，民初爲輔。研究者鮮有延至 1927 年以後者。其實亦有學者注意到，進入民國以後，會館、公所向兩個方向轉化，地緣性爲主者改組成同鄉會，而業緣性爲主者則改組成同業公會。[73]但此種轉化如何實現？政府在其中起到何種作用？轉化前後不同制度的效率有何區別？這些問題至今仍未見學者的研究。而多數論著似乎均持一種樂觀的「單線進化論」，認爲從「傳統」的會館、公所到「現代」的同鄉會、同業公會、商會，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亦反映了社會的進步。

從會館公所本身來看，由於論者往往喜歡以蘇州、上海等地爲例，而未及其他，因而普遍強調其經濟功能及與工商業的聯繫。而許多的會館公所主要還是慈善公益組織，所以從全國範圍來看，它們與後起的同鄉會之間的關係應比與商會關係更爲密切。尤其是對民國以後的會館、公所與同鄉會，缺乏紮實的研究成果。

（三）研究方法

個案研究太少。由於中國地域遼闊，各地情形不盡相同。因此如要得出一些共性，則必須先將個案的研究工作做好。但已有的關於會館史的研究中，仍以通論性質爲多。這其中既有史料搜求的困難，亦是一種取巧的做法。但個案的生疏，使得研究者的歸納概括往往流於空泛。

預設前提的現象仍常見。研究明清時期的會館史者則仍較易受到「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論」的影響，或者帶有很濃的「行會論」的色彩；而研究民初以後的同鄉會者則多未能擺脫「資產階級階級論」的影響，較易使用階級觀點來分析會館公所的成員或領導，[74]並據此判斷其組織性質。甚至試圖通過此類研究揭示「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面貌」。[75]

近來研究者更易陷入「傳統——現代」的兩元框架之中。喜歡把前面

---

[73] 徐鼎新，〈舊上海工商會館、公所、同業公會的歷史考察〉，《上海研究論叢》（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0 年），輯 5；張忠民，前引文。

[74] 曹竣，〈上海寧波幫的抗日救國活動〉，頁 127；趙蘭亮、于澎，前引文，頁 102。

[75] 宋鑽友、葉斌，〈一部研究同鄉團體的佳作——讀顧德曼教授的《籍貫、民族與城市》〉，《史林》，期 2（2000 年），頁 103。

的團體稱之爲「傳統」，而將新起的團體稱爲「現代」，並據此輕率地判斷其進步與落後。而忽視這些社會團體之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更爲複雜的各種影響因素。如政府的干涉，便幾乎被研究者們遺忘。最近一些學者將注意力轉向會館公所的「民間團體」性質，甚至套用「公共領域」的理論。但卻忽視了中國本土的具體情境與西方世界的迥異。[76]

（四）資料利用

資料利用上，討論明清會館者主要依靠已出版的幾種碑刻集與方志，而較少有再深入發掘檔案及其他各種史料以充實研究基礎者。有時即使有新的史料出版，也不見論者利用。如《北京會館史料》一書出版 3 年，仍很少引起治會館史者的注意。史料的偏狹，限制了研究的視野。論者往往僅從一時一地出發，而作出片面的判斷。故爭論有時只是基於各自掌握的片面史料，而未有普遍的意義。論者往往根據自己論點的需要，而選擇一二處的會館、公所的碑文或記載作爲佐證。但各個會館、公所、同鄉會的情形均有不同之處，而且時人所撰碑文或序辭亦有寄託某種理想，或蘊含一定的「事後規範」的企圖，並不一定真的代表會館、公所所從事的實務。研究者更重要的是從組織的實際活動入手，來分析其性質或功能。這就要求研究者去做深入的史料發掘工作。而研究民初同鄉會者雖然較多地依靠同鄉會檔案，但往往又未能兼及其他，如報刊史料、政府文書等「同鄉會」自身以外的史料。

另外，大陸不少研究者的工作缺乏學術研究的承繼性，論者往往不去總結前人的研究基礎，以致做了許多的重複工作，甚至出現明顯的錯漏。會館史的研究如從瑪高溫 1883 年的論文算起，至今已有 110 餘年的歷史，研究

---

[76] 如趙蘭亮即認爲上海山東會館與山東同鄉會所從事的一些「社會公共領域的活動」，尤其是它們在「五四運動和一·二八、八·一三抗戰中的突出表現」，促進了「上海市民社會的形成」。氏著，《近代上海的山東移民與山東同鄉團體》，頁 29－30；黃壽東亦在其論文中指出，「紹興同鄉團體作爲一個同鄉互助互濟的團體，具有中介性，溝通了同鄉與社會、政府間的聯繫。而紹興同鄉團體的議會制組織狀況和「自治性」的機制，對上海近代市民意識、市民社會的形成有一定的意義」。氏著，《近代上海的紹興同鄉團體研究》，頁 27。

者若不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建立在前人已有的學術基礎之上，其質量與價值令人懷疑，許多的研究其實仍未超過 1960 年代何炳棣等人的研究水平。

五、結論

「自願團體」（voluntary association）在中國社會中素來缺乏。但主要源自民間的會館、公所以及同鄉會等卻是最接近此類「自願團體」的組織。它們亦是一定的社會經濟環境下民眾自發的「制度創新」，藉以解決一些他們所面臨的現實問題。所以通過會館史的研究，我們可以窺見一定的時空背景下，特定人群的生存狀態以及其周遭社會經濟環境的實況，其研究意義不言自明。

大陸最近 7 年的會館史研究，是在社會經濟變遷與文化變遷迅速推進中進行的。從已有的研究來看，無疑比此前有了許多進步。討論的問題比前人更加廣泛，如會館公所在社會整合以及地方政治權力架構中的積極作用、同鄉組織的現代化等等均是以前不能談或者不會談的主題。而且，大陸學界漸現的寬容、理性的學術態度亦可由此一研究領域得以看見。多元的觀點能共存一堂，相歧的意見能平和地交流。此種理想的研究氛圍自然爲我們所期望已久。不過，如上所述，大陸學者在此領域的研究，仍存在種種的缺陷，如何在已有學術積累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研究質量是大陸會館史研究者亟應思考的問題。

最後，值得強調的是史料的整理和發掘工作。近幾年會館史相關史料的編纂出版也取得一些成績，但與目前大陸各地檔案館、圖書館所保存的相關資料總數比較，卻不能令人滿意。在筆者走訪過的各家檔案館與圖書館中，發現會館史的資料爲數甚巨，卻長年累月地無人問津。如各會館、公所及同鄉會等團體所編印的大量徵信錄、會員錄、大事記及會史志書，當時的各種報刊上也登載了大量的會館、公所、同鄉會的活動消息與公告。這些浩繁的資料均需要花費巨大精力去整理，有計劃地編輯有關的索引，目錄或提要。此時跨地域的合作非常有必要。唯有如此，學者們在研究中也許不會再有「巧婦難爲無米之炊」之感慨。

史料介紹

《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及其史料價值

吳蕙芳*

日用類書是將日常生活所需常識以分門別類方式加以刊載，提供人們隨時利用的一種書籍，性質如同今日之家庭生活手冊，或俗稱之家庭生活小百科。此種書籍最早產生於南宋，主要是爲文人雅士生活便用，元代亦有刊行，然至明代後期已發展出普及於四民大眾均可利用的民間日用類書，清代持續之，至民國以後的今日，仍不斷地刊行流通。

民間日用類書係爲四民大眾日常生活利用之書，使用者超越階級，不限地域，且其內容因時代需求不同而有變化，可反映社會變遷，實研究民間社會生活或庶民文化絕佳之材料，亦可補充以往主要經由話本、戲曲、小說、寶卷等文學作品，或善書、經卷、陰騭文、功過格等宗教材料，以了解民間生活風貌及庶民文化特色之不足，故學界對於此種史料實應賦予更多之關注。

唯此種珍貴之民間史料，因其過於通俗及大眾化之性質，各版書籍每每在使用過後，或內容不合時代需要時則遭人們毀棄，難以留存，更遑論進一步地作研究。然即使如此，仍有部分民間日用類書得以在不經意的情況，或有心人士的努力下保存至今；其中，日本學者仁井田陞的貢獻是值得稱道的。

仁井田陞早在 30 年代以前即已注意到這類史料的重要性，並在中國各地廣爲蒐集。其辛苦努力蒐集來的民間日用類書資料，除了幫助他本人在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法制史的研究上有更多的收穫外；[1]後來並將蒐集到的各版民間日用類書均捐獻給東京大學的東洋文化研究所，加惠於其他的研究者，以後日本學界因利用民間日用類書資料而產生之重要成果，多爲仁井田氏觀念啓發或資料貢獻下之影響。唯仁井田氏當年的蒐集民間日用類書資料，雖不限於明版或清版，而因二次大戰東京轟炸的戰火波及，清版被燒燬，致今日保留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中的收藏僅爲明版，此亦影響到日本學者之研究多以明代爲主，少論及清代。

除了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因仁井田陞早年的蒐集而有的民間日用類書資料外，在日本的其它公私立圖書館，不論是大學或研究單位，乃至一般的市立圖書館等地均藏有明清時期不同版本的民間日用類書。如東京的國會圖書館、內閣文庫、都立中央圖書館、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早稻田大學中央圖書館、東洋文庫、尊經閣文庫，京都的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大谷大學、陽明文庫，大阪的大阪大學、關西大學，乃至其它各地的蓬左文庫、東北大學、神戶大學、鹿兒島大學、長崎大學、岡山大學、米澤市立圖書館、沖繩縣八重山博物館、新潟縣立圖書館等。此外，中國大陸的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中華書局圖書館、首都圖書館；香港的沙田圖書館；韓國的高麗大學、成均館大學；美國的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學燕京學舍；以及臺灣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等等，亦均藏有不少明版及清版的民間日用類書；故就數量而言，現存的明清時期各版民間日用類書不可謂少。然這些珍貴資料多深藏於圖書館內，除若干已有複製品的版本可提供部分影印外，其餘大多數版本僅限於館內閱讀，以紙筆抄錄利用之，實大礙於研究工作之進行；無怪乎今日學界有關民間日用類書的運用研究，主要仍以藏有最多數量此類資料的日本學者爲主。而如今日本學界能將藏於國內的民間日用類書資料出版發行，對各地研究者而言，可謂貢獻大矣。

---

1 仁井田陞，〈元明時代の村の規約と小作證書など（一）—日用百科全書の類二十種の中から—〉，《中國法制史研究（奴隸農奴法家族村落法）》，冊 3（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出版會，1962 年 3 月 20 日），頁 746。

東京汲古書院出版的《中國日用類書集成》資料集，是由當年師承仁井田陞，並於 50 年代即利用民間日用類書資料於教育史研究中的酒井忠夫教授監修，[2]而由關西大學的坂出祥伸教授及大東文化大學的小川陽一教授合編；其中，坂出祥伸關懷的重心是民間日用類書中的醫學內容，[3]而小川陽一則將民間日用類書與小說作比對研究。[4]由於日本學界並未將此類資料區隔成多爲士人階級使用或普遍爲四民大眾利用兩種，而均習慣以「日用類書」、「日用百科全書」、「日用百科辭書」等名稱之，尤其是「日用類書」一詞的稱呼最爲普遍，[5]因此本資料集即以《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名之。

資料集中選取了六種明代版本的民間日用類書共十四卷，茲將其版本種類及相關事項分述如下：

1. 第一、二卷的《五車拔錦》，係萬曆 25 年（1597）序刊本，福建建陽鄭雲齋寶善堂出版，全書共 33 卷 10 冊，現藏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仁井田文庫。（已於 1999 年 9 月全部發行）此版本在美國國會圖書館中亦藏有一套，[6]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也有源自日本上述收藏地的複製品一套 5 冊。《五車拔錦》多被學者視爲現存最早的明代版本的民間日用類書，然事實上，在此書之前，至少還有二個不同版本的民間日用類書，一是萬曆 13 年（1585）龍陽子輯的《萬用正宗》，

---

2 參見：酒井忠夫，〈元明時代の日用類書とその教育史的意義〉，《日本の教育史學》，號 1（1958 年），頁 67-94；〈明代の日用類書と庶民教育〉，見林友春編，《近世中國教育史研究》（東京：國土社，昭和 33 年 3 月），頁 25-154。

3 參見：坂出祥伸，〈關於明代日用類書中的醫學門〉，「醫療與中國社會」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民國 86 年 6 月 26-28 日），9 頁。

4 參見：小川陽一，《日用類書による明清小說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1995 年 10 月 10 日）。

5 如仁井田陞、寺田隆信稱之爲日用百科全書，水野正明稱之爲日用百科全書或日用百科辭書，酒井忠夫、小川陽一、坂出祥伸稱之爲日用類書；工具書中的解釋則採日用類書一詞，見野口鐵郎、坂出祥伸、福井文雅等編，《道教事典》（東京：平河出版社，1996 年 10 月 20 日，），頁 478。

6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臺北：明文書局，民國 72 年 12 月），頁 383-384；王重民輯錄，《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目錄》（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 61 年 6 月），頁 745-746。

[7]另一則是萬曆 24 年（1596）的《萬書萃寶》；其中，《萬用正宗》未能得見，而《萬書萃寶》在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洋文庫及早稻田大學中央圖書館中均藏有相同年份的版本，然皆屬殘卷，若將三者整合視之，仍缺十餘卷的內容。因此，《五車拔錦》僅能算是現存明代民間日用類書完整版本中較早的一部。

2. 第三、四、五卷的《三臺萬用正宗》，係萬曆 27 年（1599）刊本，福建建陽余象斗雙峰堂出版，全書共 43 卷 10 冊，現藏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仁井田文庫。（已於 2000 年 3 月全部發行）此版本在日本名古屋的蓬左文庫亦藏有一套 8 冊。[8]《三臺萬用正宗》多被學者視爲現存版本中卷數最多的民間日用類書，然事實上，《萬書萃寶》亦含有 43 卷內容，唯部分內容已亡佚。
3. 第六、七卷的《萬書淵海》，係萬曆 38 年（1610）刊本，福建建陽楊欽齋清白堂出版，全書共 37 卷 6 冊，現藏於東京尊經閣文庫。（預定於 2000 年 7 月全部發行）此版本在日本京都大谷大學亦藏有一套，爲 40 卷 10 冊本。
4. 第八、九卷的《萬寶全書》，係萬曆 42 年（1614）序刊本，福建建陽樹德堂出版，全書共 34 卷 8 冊，現藏於宮內廳書陵部。（預定於 2000 年 11 月全部發行）此版本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亦有源自日本上述收藏地的複製品一套 3 冊。
5. 第十、十一卷的《萬用正宗不求人》，係萬曆 35 年（1607）刊本，福建建陽余文台出版，全書共 35 卷 12 冊，現藏於京都陽明文庫。（預定於 2001 年 3 月全部發行）此版本又名《萬用正宗分類學府全編》，在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內閣文庫、尊經閣文庫、[9]成簣堂文

---

[7] 彰考館文庫編，《彰考館圖書目錄》（東京：八潮書店，昭和 52 年 11 月 30 日，增補影印）。

[8] 名古屋市蓬左文庫編，《名古屋市蓬左文庫漢籍分類目錄》（名古屋：名古屋教育委員會，昭和 50 年 3 月 31 日），頁 98。

[9] 尊經閣文庫編，《尊經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東京：尊經閣文庫，昭和 9 年 3 月 25 日），頁 730。

庫、[10]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東北大學均各藏有一套；[11]又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有源自內閣文庫的複製品一套 3 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有源自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的複製品一套 6 冊。

6. 第十二、十三、十四卷的《萬寶全書》，係萬曆 40 年（1612）刊本，福建建陽劉雙松安正堂出版，全書共 38 卷 10 冊，現藏於京都建仁寺兩足院。（預定於 2001 年 9 月全部發行）此版本在日本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神戶大學、[12]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舍亦各藏有一套。[13]

由上述六種明代不同版本的民間日用類書在各地的收藏情況，可知此種書籍在當時發行量之大及其普遍程度；且同一家書坊出版的同一年版本，爲滿足市場需求，亦不限於刊行一次，故同一版本的民間日用類書往往有不同卷數或冊數的出現。

再就其內容而言，此六種明代不同版本的民間日用類書內容可謂包羅萬象，茲將各版類目分列如下：

名稱	《五車拔錦》	《三臺萬用正宗》	《萬用正宗不求人》	《萬書淵海》	《萬寶全書》	《萬寶全書》
版本 / 類目 / 範圍	萬曆 25 年序刊本 33 卷 10 冊	萬曆 27 年刊本 43 卷 10 冊	萬曆 35 年刊本 35 卷 12 冊	萬曆 38 年刊本 37 卷 6 冊	萬曆 40 年刊本 38 卷 10 冊	萬曆 42 年序刊本 34 卷 8 冊

[10] 川瀨一馬編，《（お茶の水圖書館藏）新修成簣堂文庫善本書目》（東京：（財）石川文化事業財團お茶の水圖書館，1992 年 10 月 31 日），頁 1102。

[11] 東北大學附屬圖書館編，《東北大學所藏和漢書古典分類目錄（漢籍）》（仙臺市：東北大學附屬圖書館，昭和 50 年 3 月），頁 321。

[12] 神戶大學附屬圖書館編，《神戶大學附屬圖書館漢籍分類目錄》（神戶：神戶大學附屬圖書館，昭和 50 年 3 月），頁 224。

[13] 莊芳榮編，《中國類書總目初稿》（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 72 年 10 月），頁 67；裘開明，〈四庫失收明代類書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2：1（1969 年 9 月），頁 57。

生活環境	1 天文	1 天文 3 時令	1 天文 4 時令	1 天文	1 天文	1 天文 5 時令
	2 地輿 3 人紀 4 諸夷	2 地輿 4 人紀 5 諸夷	2 地輿 3 人紀 13 諸夷	2 地輿 3 人紀 5 諸夷	2 地輿 3 人紀 4 諸夷	2 地輿 3 人紀 4 諸夷
	5 職官 6 律法	7 官品 8 律法	10 官爵 12 律法	4 官品 6 律法	5 官品 6 律法	6 官品
社會生活	8 啓劄 24 體式	17 民用	5 體式	9 民用 17 狀式 8 啓劄	17 體式 14 啓劄	9 民用 16 詞狀
	7 文翰	15 文翰 39 僧道	6 書啓	7 雲箋	13 文翰	8 柬札
	9 婚娶 10 喪祭	16 四禮	7 婚娶 8 喪祭	10 冠婚 11 喪祭	15 伉儷 16 喪祭	7 四禮
		6 師儒 42 閑中記		23 訓童 24 勸諭	28 訓童 31 勸諭	
精神生活	11 琴學 13 書法 14 畫譜 23 詩對 29 侑觴	9 音樂 11 書法 12 畫譜 19 侑觴 43 笑譚	16 書法 17 畫譜 34 詩聯 26 酒令 24 笑談 35 雜覽	13 琴學 15 書法 16 畫譜 30 詩對 28 酒令 27 笑談 37 雜覽	9 琴學 11 書法 12 畫譜 18 詩對 32 侑觴 33 笑談 38 雜覽	 34 筆法 11 書畫 25 翎毛 22 謎令 21 笑談 23 雜覽
	15 八譜	10 五譜 13 蹴踘 20 博戲	15 八譜	12 八譜	8 八譜	12 八譜

	12 棋譜			14 棋譜	10 棋譜	
	31 玄教	40 玄教	30 戲術	35 僊術	35 玄教	18 戲術
	30 風月	18 子弟	23 風月	36 風月	34 風月	10 風月
物質生活		35 地理				20 塋葬
	16 塋宅	34 營宅	31 塋宅		23 塋宅	30 陽宅
	17 剋擇	38 剋擇	19 剋擇		19 涓吉	26 剋擇
		32 數課	22 上課		36 卜員	
	20 卜筮	31 卜筮	11 卜員	21 易卦	20 卜筮	27 筮譜
		33 夢珍	32 斷易	33 夢課		14 夢員
	21 星命	29 星命	25 星命	18 星命	21 星命	29 星命
	22 相法	30 相法	21 相法	19 相法	22 相法	15 相法
	25 算法	22 算法	14 算法	29 算法	29 算法	17 算法
		21 商旅				
	28 農桑	38 農桑	9 農桑	25 農桑	30 農桑	28 耕佈
		37 牧養				24 馬經
	18 醫學	26 醫學	33 醫學	20 醫學	26 醫學	13 醫林
	32 祛病	41 法病	27 法病	34 法病	37 法病	
	19 保嬰	27 護幼	18 種子	22 保嬰	27 全嬰	32 種子
		28 胎產		31 婦人		31 祈嗣
	26 武備	14 武備	20 武備	32 武備	7 武備	19 武備
	27 養生	25 養生	28 養生	26 衛生	25 養生	
	33 修真	23 修真	29 修真		24 修真	33 修真
		24 金丹				

由上述類目表可知，民間日用類書的內容實涵蓋民間生活的四大領域，即生活環境、社會生活、精神生活及物質生活。

生活環境包括屬於時間觀念的天文門、時令門，史地常識的人紀門、地輿門、諸夷門，及對官府了解的官品（職官、官爵）門、律法門。

社會生活包括屬於家庭教育的訓童（師儒）門、四禮（婚娶、冠婚、伉儷、喪祭）門，社會教育的勸諭（閑中記）門，與人平時交往的文翰（柬札、書啓、雲箋）門、僧道門，以及涉及法律責任的體式（啓劄、民用、狀式、詞狀）門。

精神生活包括怡情養性與娛樂活動兩部分；前者有屬於寫字的書法（筆法）門，畫圖的畫譜門、翎毛門，音樂的琴學（音樂）門，文字游戲的詩對（詩聯）門、侑觴（酒令）門、謎令門、笑談（笑謔）門、雜覽門等；後者有屬於棋藝的棋譜門，骰戲與牌術的八譜（五譜）門、博戲門，技法的蹴踘門、戲術（玄教、僊術）門，嫖妓的風月（子弟）門。

物質生活包括謀生技藝、玄理術數及養生保健與醫療衛生三部分；其中，謀生技藝有屬於農業活動的農桑（耕佈）門、牧養門，屬於計算能力與商業活動的算法（筭法）門、商旅門；玄理術數有屬於看風水的塋宅（營宅、塋葬、地理）門，擇吉避凶的剋擇（涓吉）門，占卜用的卜筮（卜員）門、課數（上課）門、易卦（斷易）門、筮譜門、夢珍（夢課、夢員）門，算命的星命門，看相的相法門；養生保健與醫療衛生有屬於事前預防用的養生（衛生）門、武備門、修真門、金丹門，還有屬於事後治療用的醫學（醫林）門、保嬰（全嬰、種子、護幼）門、祈嗣門、婦人（胎產）門、法病（祛病）門。

由於民間日用類書幾乎涵蓋人們日常生活中之各個層面，故此種史料可利用作研究之課題亦頗爲廣泛。以目前所見之成果而言，日本學者中除了前述仁井田陞用之於法制史、酒井忠夫用之於教育史、坂出祥伸用之於醫學及小川陽一用之於文學領域外，尚有寺田隆信、斯波義信、森田明、水野正明用之於商業史探究，[14]山根幸夫、谷井俊仁用之於地理交通的了

---

[14] 寺田隆信，〈明清時代の商業書について〉，《集刊東洋學》，期 20（昭和 44 年 10 月 20 日），頁 111-126；〈商業書にみる商人と商業〉，《山西商人の研究：明代における商人および商業資本》（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內東洋史研究會，1972 年 11 月 30 日），頁 197-324。斯波義信，〈「新刻客商一覽醒迷天下水陸路程」について〉，《東洋學論集》（京都：朋友書店，昭和 54 年 12 月 1 日），頁 903-918。森田明，〈『商賈便覽』について—— 清代の商品流通に關する覺書〉，《福岡大學研究所報》，期 16（1972 年），頁 1-28。水野正明，〈「新安原板士商類

解，[15]本田精一用之於童蒙教育及數學領域的發展；[16]中文著作中，則有大陸學者韓大成、楊正泰、陳學文及臺灣的羅麗馨用之於商業、地理交通方面的研究，[17]而王爾敏則是最早將之用於社會生活史及社會文化史的研究。[18]事實上，民間日用類書的研究除了上述已經開發出的教育、商業、地理交通、醫學、文學、數學領域外，尚可朝天文曆法、民俗、養生、玄理術數、人際交往以及各式娛樂等方向發展；相信在經由對民間日用類書資料廣泛而深入的了解與利用後，民間生活的各式風貌及庶民文化的特色，亦可因之而有另一番新的呈現與剖析。

要」について〉，《東方學》，輯 60（1980 年 7 月），頁 96-117。

15 山根幸夫，〈明代の路程書について〉，《明代史研究》，號 22（1994 年 4 月），頁 9-24。谷井俊仁，〈路程書の時代〉，見小野和子編，《明末清初の社會と文化》（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6 年 3 月 31 日），頁 415-455。

16 本田精一，〈宋元明時代における兒童算術教育〉，《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號 22（1994 年 1 月），頁 37-72；〈『三臺萬用正宗』算法門と商業算術〉，《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號 23（1995 年 1 月），頁 87-125。

17 韓大成，〈明代徽商在交通與商業史上的重要貢獻〉，《史學月刊》，期 4（1988 年 7 月），頁 35-43；〈明代交通運輸散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期 2（1998 年），頁 93-103。楊正泰，〈現存最早的商旅交通指南〉，《歷史地理》，輯 2（1982 年 11 月），頁 158；〈略論明清時期商編路程圖記〉，《歷史地理》，輯 5（1987 年 5 月），頁 273-277；〈明代國內交通路線初探〉，《歷史地理》，輯 7（1990 年 6 月），頁 96-108。陳學文，《明清時期商業書及商人書之研究》（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3 月）。羅麗馨，〈十六、十七世紀的商業書〉，《中興大學歷史學報》，期 7（民國 86 年 6 月），頁 27-40。

18 王爾敏，《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5 年 3 月）；《明清社會文化生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 7 月）。

《營謀小集》與商販經理知識

王爾敏*

三十年來我已多次介紹一些名不見典冊的小冊子給學界，並引入於拙文研討。使我們治學可以把眼光放大到市井稗販身上。

現在要談的《營謀小集》是中外任何大圖書館所不收的一種極單薄之書。在西方叫做 Pamphlet，也是隨手可丟棄的小冊子，談不上是書。無論中外，像這樣的小冊子，真可謂是不登大雅之堂，難入著作之林。而今我來介紹，是把它當作一種珍籍，卻還是最常見的珍籍。雖然是常見，卻不會被人瞥然一顧。

《營謀小集》是一種常見的商販小冊子，但是我們近年所見到一種很重要的商業書，是陳學文所著《明清時期商業書及商人書之研究》，可謂十分詳備，但卻未曾收入這個小書。可見連同類的書目資料收集者也漏掉它的存在，因是我以爲有必要介紹。

《營謀小集》不知其作者，而其書是年年發行。每年俱由香港數家出版《通勝》時附印其新印之《通勝》中。香港書坊間，有著名的聚寶樓及永經堂二家，年年刊行不輟。其「包羅萬有」版本內容最富。此書是廣東以及港澳民間廣泛通行的一本家家必備之參考書，主要是翻閱皇曆。而其附印的各類參考書則是十分雜駁。本來年曆爲主，所附印者合稱之爲《百中經》，是清代以來小民日用參考書，相同於《萬寶全書》。而今已不用《百中經》之名。其他各項小冊形之篇頁，即雜湊其中，有數十種之多。而《營謀小集》即居其中之一。由於我年年把《通勝》贈送給近代史所，所以本所圖書館自此已收藏《營謀小集》。其他中外各大圖書館就決不會收藏。

《營謀小集》論複頁全書一共 4 頁，論單頁共有 8 頁。主要印字太小，目的在儘量縮小篇幅，配合廉價。但《營謀小集》雖是小冊，其字數分量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則大於《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和《朱子治家格言》四種書的總和，所以不能小看這本小冊子。

在一個市井社會做買賣謀生商販而言，已經是難得編著的文字寶典，隨身參考的秘籍了。豈能用文家尺度衡量？商賈負販那裡有功夫閱看皇皇典冊？附帶再交代，《營謀小集》並非大肆論述的理論書，內容全是條目式一項一項列舉，宗旨自是節省文字，方便查考。全書共集條目 32 條，每條既有說明又附一、兩首詩章，俱以七言描述，淺俗有似歌訣，共計 39 首。再加上前有序說，後有結語，自具完整首尾。正可表現一種有組織、有內涵的商販專業書。書後題名涉世老人所作，亦不知爲何許人也。

大凡商書出刊不易，著述尤難，即使見之文字，不過是老賈閱世之談，只能待以經驗紀錄，毫不得妄稱商學。但雖此細微點滴，自亦保存前人營商之基本思想與應世態度，實亦足提上學術嚴肅討論。此亦必當介紹《營謀小集》公之於世，以備學界公開評估研討。

此書開宗明義，在序言中明白申說是供做生意人參考應用。開首立言：

> 但凡後生出外，經營生意，無非求財以爲養家糊口之計。先要至誠忠勇，語言信實；除盡躁暴之氣，以和爲貴。（本書序文）

中國民間大小商販，經商立場，基本做法，必先守定信義二字，是所有在商言商者長久宗奉不移之圭臬。至於營商手段，在交易過程中更須守定和平二字。這篇首章序文，反覆申說謙和意義與維持之必要。遇事明知自己有理，也要表示退讓，明知自己吃虧，也要忍受犧牲。可謂序文重點，俱在使生意人抱定誠信與表現謙和。一般看來，此即是營商成功要訣。

全書所列條目 32 項，內中以詩訣表陳者有詩 39 首。雖然各具重點，而實可大致歸併爲 13 個顯著的勸戒。其總結趨向，在於教導初涉世的生意人，健全其立足於商販生涯中的做人道理。其書開首即明白指出：「終身可行」。現可分舉於次：

其一，首先須學應對態度與稱呼。此即今時習聞之公關，自無須避諱要做好公共關係，質言之，正是人事關係。前代商賈稗販，雖不識字，而能最深諳此道，自是十分重視。今日各大公司設公關部，與此內涵不同，尤無傳承之跡。然在任何大小商販個人，則與人交接應對，絕對不能毫不

講究。前人經驗要自稱呼入手，尤能探驪得珠。茲見其詩訣：

少年先要學稱呼，喜色歡聲不可無；
你肯敬人人愛你，須知此是好規模。

其二，慎交遊，勿受引誘。少年入世，慎防交到損友，入其鬼蜮，受其勾引。以至輕狂浪蕩，失財喪身，終至沈淪終身，百事無成。其勸諭詩云：

野鬼迷人不可當，誰知生鬼更猖狂；
招搖帶引行偏路，失足翻身跌落牆。

其三，戒色欲。做生意原在養育妻小，惟不可浪蕩胡爲，沈溺色欲。經商遊走市廛，難避花街柳巷。尤忌爲東家做事，與婢妾偷情。可見其詩訣所諷喻：

婢女同居共一群，多因調戲犯淫根；
風流有盡終難了，折在兒孫禍在身。

其四，戒賭博。少年出外做買賣，無論乘車、乘船、投宿客棧，到處均能碰到賭局。往往禁不起被拉入局，賭掉盤費貲本，喪財失業，從此潦倒。故須堅定意志，峻拒賭博。可見其詩訣所諷喻：

一提賭字淚交流，禍患牽連遍九州；
壞盡世間賢子弟，爲癡迷死不回頭。

其五，要顧念雙親。出外營商，奔波謀生，雖不免十分辛苦，實仍當時時寫信，竹報平安，以慰父母掛慮之情。故有詩叮嚀：

遊子挑包直達行，爹娘猶復意沈吟；
順回幾句平安信，免使高堂日掛心。

對於辜負父母恩情，賺錢自享者，則亦有詩諷喻：

恩情不念目無天，只以荷包作枕眠；
薄待爹娘①骨肉，福根削去枉徒然。

其六，衣著穿戴要廉儉樸素。此在做生意人衣著外表，不尙奢華豪侈，

而重在端重整潔。以誠篤儀表，示人以樸實可靠。故有詩以戒諭：

勿貪時款學新裝，樸素人稱是大方；
試看至誠珍重筆，出門老實不輝煌。

以上所舉 6 點營商販者之諄諄勸教，實凡爲人在世，平常多須注意講求，不限於營商一途。而此類不厭反復申述於投身商賈稗販，蓋重在由基礎教養入手，看似無切於實用，而其初步基礎不能不加意自求健全。至於以下各項，則自可見商販知識學養之要求。

其七，精習算盤。做商販須精熟算術，此在商賈一途，須人人必精習此道。惟商賈重在應用，不作高深研究，而自明清以來，已早有算盤口訣發明。即是常見於日用類書中之算法，有加減乘除口訣運用。而於小販則有斤兩銀錢換算口訣。但凡商販，無不精通而熟用。

商賈一道又須熟習商業書信。往昔多憑自修，惟運用之妙，尤在累年經驗，因其語辭運用，關係到營商成敗，今世此科已備列於大專商貿專門課程。其於前代小商販亦早視爲營商基本智術。故其有詩諷喻：

算盤信札至通行，未曉還須細問音；
學到曉時成老練，將來不用再求人。

其八，節儉銀錢，積少成多。此書所持條目有二，一爲成家，一爲立業。平日因須省吃儉用，而慎用積蓄，告以用錢賺錢之法，不外存儲於可靠錢莊，並請搭儲蓄合會，小則即用以取妻成家。其詩有云：

古云積少可成多，長大將來娶老婆；
若是零星支去了，娶妻空自把頭摩。

積存銀錢，終望將來自開店鋪，作老闆。其詩有云：

合伙營謀免打工，荷包切勿手頭鬆；
多年積蓄成資本，今日居然做老東。

其九，本小財薄，不輕言借貸。做小生意，博蠅頭小利，積存有限，故不可輕易借貸他人，以免周轉不靈，虧蝕老本。故有詩訣云：

重利甜言爾勿貪，借時容易取回難；

順情誤己君須記，非比財翁有寶山。

其十，行商買賣，不可露帛。前代出外營商，將本求利，而凡資金運轉，貨色搜集，囊橐相隨，行旅十分不便。而水陸道途，難免萑苻不靖。是以一路小心警惕，不可大意，尤忌露帛，招致盜賊覬覦。故有詩警戒：

不宜行李太排場，身上金銀要隱藏；
免被小人生計害，定時失望眼光光。

其十一，爲東家做事，秉負忠心，盡力盡責。凡受僱於東家，須全心全意照顧東家事務，首在於忠誠，次在於勤能。自然會受東家重用，而能生財致富。此點先後有詩訣 3 首，可作勗勉：

萬事能清在一勤，不辭瑣碎任艱辛；
東家暗裏微微笑，知爾將來有用人。

一閘火燭喊驚天，要顧東家貨物先；
打點如何安置法，出齊心力等搬遷。

說出天花仍是假，銀錢一試見眞心；
能將貨物勤提理，必定明年有好音。

既承東家賞識，也要自知分寸，不可仗恃得寵，一味驕滿，明中欺壓同伙，暗中搆陷友朋，是做生意人大忌。如其詩所言：

幸屬東家裡面人，舖中饒讓爾三分；
識情不可爭閒氣，魚水和諧共一春。

其十二，做生意不可朝秦暮楚。凡做一處不滿意，即轉他處，或計較薪金多寡，常常跳槽轉換東主。此亦商販所當戒慎，以免百事無成。此項有三詩勸諭：

想眞好處方間手，勿作兒戲混一回；
此業未定尋別業，費時失業做難來。

工銀嫌少走回家，坐食山崩計便差；

回想出來尋活路，豈知人意亂如麻。

犬兒賣去便無親，猶復依依認主人；
多少得新忘卻舊，人情不及犬情眞。

其十三，做生意要廣結善緣，拉攏顧主，此是要訣。尤須處處吃虧，樹立信譽，使人祛除疑慮，可以相託大事，合伙共創商機。其中既有技術亦有藝術，開發未來，不可限量。其詩有二爲喻：

世情至好識人多，某位先生某大哥；
熟客便宜勾主顧，相逢一定笑呵呵。

小小工夫要整齊，做來層次識高低；
他年大展生平志，方信初時肯喫虧。

後列 7 項，實爲商販入世必備之修養，雖指原則，但亦具體重點分明，爲前代商人累積經驗，比之其他商書，要點俱備，不見減削。蓋其他商書所收類項，可多出天文、時令、節氣、神誕、天下物產名目、銀錢識別、各地稅捐，種種附加要項，而同一類商人本分，則其詳略有別，而宗旨無異。《營謀小集》發行於萬商雲集之香港，乃國際商程十字路，並未爲世淘汰，亦足以代表商販知識之一格，值得向中外學者介紹。

中國固有商業知識，遠在學術傳承之外。尙不及農工兩業之有多樣圖書傳世。自古以來，惟商書最缺。適遇近代商戰之世局，使中國遭逢重大衝擊，蒙受百年朘削，可謂慘敗。但凡今世之商學，名目繁多，理趣精奧，計慮深遠，競爭慘烈。商學發達，則民富國強；商學落後，則國弱民貧。而今國人醒覺，一流人才，群趨於工商實業，則國家富強可期。惟上古之世，中國不乏優越商人，子貢、陶朱爲商家宗奉典範，故固有商學亦當探其經緯，明其概略。則今日學界已作廣泛發掘，近十多年來已形成風氣。本人樂見其重大開拓，故願推介《營謀小集》，以備一磚一石之累積。

民國 89 年 5 月 15 日寫於南港

李國鼎先生照片資料庫網站介紹

蔡淑瑄*

一、前言

李國鼎先生 1910 年出生，1926 年進入國立東南大學（前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數學系就讀，次年轉物理系，1930 年畢業。1934 年考上第二屆中英庚款公費，赴劍橋大學進修；並成爲凱文迪斯研究室（Cavendish Laboratory）、英國皇家學會蒙特研究室（Royal Society Mond Laboratory）研究員，研究核子物理與極低溫超導。1937 年因七七事變發生，毅然投筆從戎回國，就此展開一生爲國爲民的事業。抗戰動員期間，李國鼎先生出任防空學校照測總隊修理所所長，支援防空設備及維修，並培訓機械人才。在照測總隊這三年間並曾至武漢大學任教，1941 年任職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並至甘肅臨洮觀測日全蝕。次年任資委會重慶資渝煉鋼廠工務組主任，籌建煉鋼、軋鋼廠。1945 年轉任該會工業處，負責會屬鋼鐵事業管理委員會，並在戰時生產局協調重要物資的供需。李國鼎先生自 1948 年來臺之後，曾任職臺灣造船公司、經濟安定委員會下之工業委員會、美援會、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經濟部、財政部等單位，並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總統府資政，對於臺灣的經濟與科技發展有卓越的貢獻。

李國鼎先生檔案十分豐富，舉凡會議紀錄、書面報告、剪報、信函、照片等，種類繁多且數量豐富，對於戰後臺灣的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科技等各方面的研究，深具參考價值。除了私人檔案之外，李國鼎先生珍藏 500 多冊照片，生動記錄他一生參與臺灣經濟建設、科技發展的過程，可補文獻史料之不足，誠爲不可多得的寶貴資料，以下就整理過程及資料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助理

庫內容（網址：http://ktli.sinica.edu.tw/）加以介紹。

二、整理過程

李國鼎先生的照片分存於資策會亞洲信託大樓、科技大樓及資政公館三處；此外，李國鼎先生捐贈的個人檔案中亦附有少數照片；白壽雄先生亦提供一部分與李先生同至歐洲訪問的照片。照片涵蓋的主題按李先生的經歷大致分爲：家庭生活、留學時期、抗戰時期、臺船時期、工業發展、財政改革、國際會議、國際合作、科技、授勳、演講與榮譽、國內外政經交遊等十三類；共計相本 500 餘冊，照片兩萬多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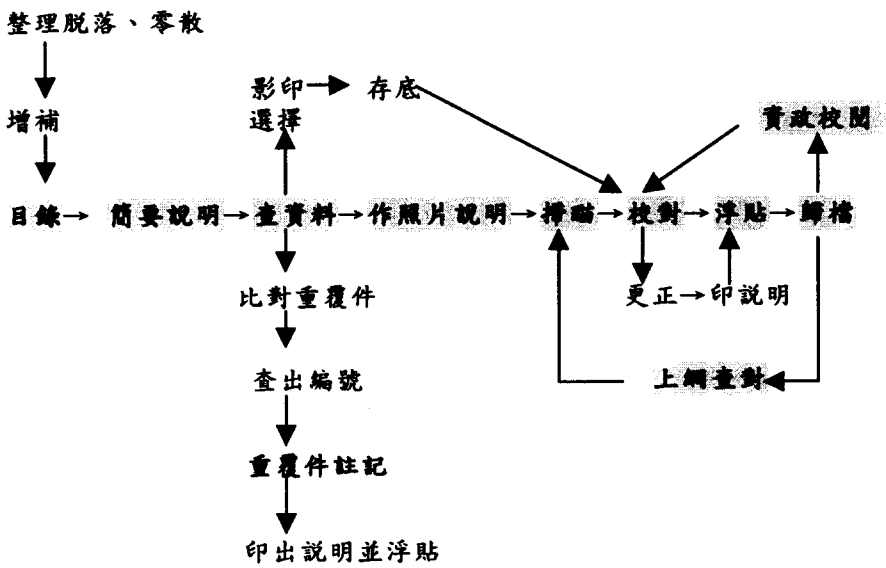
製作小組整理照片前必須先行訪問李國鼎先生，請他就照片人物、內容及其意義等，逐一說明；由於同一主題的照片，可能分散在不同相本中，整理時須先進行篩選，剔除重覆件，再就同一主題選擇較具歷史意義的照片，就照片中之人、事、時、地、類別分類建檔。製作照片說明時或遇資料不足，則需找尋相關參考史料，製成完整的目錄說明。再將照片交由本院計算中心，以全彩 jpeg/300dpi 掃描儲存；然後利用 Digital library 系統製成照片檢索資料庫，將文字資料庫及照片影像檔結合，以冊號、文件號、人、事、時、地、類別作爲查尋關鍵字，以便在顯現照片之同時亦可出現其相關資料，以說明照片內容及相關人物。整理過程詳細說明如下：

1. 目錄：先將照片逐冊編成流水號，零散、脫落的照片依性質分類、整理編成輯。
2. 訪問：由李國鼎先生閱覽每張照片，作簡要說明，訪問者即將人物、事件用立貼註記在照片上。若有相關資料附件，一併影印作爲整理之參考。
3. 查尋資料：整理照片時，除記錄李國鼎先生的說明外，須參考其他資料，如參照李國鼎先生個人檔案資料、相關報導以及當時的報紙等，做成較詳細的照片說明。另一方面亦做查證、比對的工作。
4. 重覆件註記：因照片陸續整理，並非一次完成目錄，故時有重覆件；應視其性質先做時、地、人物等比對，查出重覆件的編號，

作成標記。

5. 照片說明：原則上先做每冊相本的事件背景說明，再作逐張照片說明。
6. 掃瞄：選擇照片後，予以編號標記清楚，交付計算中心專人負責掃瞄，製成數位化影像檔案。
7. 校對：校對照片中事件、時間、人名、職稱、地點、位置排序。有誤者更正；有疑問者查對資料，並請教李先生。
8. 浮貼說明：將照片說明以立貼浮貼在照片下方。
9. 定稿及歸檔：由參與訪問者作初審，再交李先生審閱。有誤者再予修正及重貼，最後定稿歸檔。
10. 上網查對：掃瞄的照片與定稿說明掛上網頁後，仍需校正照片與編號、說明及照片放大等功能的連結是否正確，並隨時更正。

以上說明，可繪成流程圖如下：



三、照片資料庫內容介紹

此次先行開放的照片資料庫，包括李國鼎先生照片第 1 冊至第 81 冊，共計 796 張。由於製作小組採隨訪隨整的方式，照片的序號並未按時間排序，此 796 張照片包括了李國鼎先生從早年到近期的照片。唯其中第 48 冊到第 81 冊較有次序地整理了李國鼎先生從 1961 年至 1972 年的活動照片集錦。內容按主題依次介紹如下：

（一）家庭生活：李國鼎先生於 1910 年 1 月 28 日出生於南京，後入南京高等師範附屬小學、鐘英中學，1930 年畢業於東南大學。1934 年赴英劍橋大學留學。1937 年與宋競雄女士結婚。此資料庫蒐有抗戰期間李國鼎、宋競雄伉儷攝於貴陽花溪住家及其親友等照片，對於抗戰時期大後方的人們生活剪影可以提供參考一二。

（二）臺船時期：抗戰勝利後，李先生出任資源委員會中央造船公司籌備處副主任，1948 年擔任臺灣造船公司協理來臺就職，1951 年升任臺船總經理。此資料庫有 1952 年李國鼎先生與招商局董事長俞飛鵬將軍等參加中華民國全國船聯會日本航業考察團、陪同美國第七艦隊總司令雷德福先生（Admiral Arthur Redford）參觀造船和修船設備、臺灣造船公司新造漁船下水典禮等照片。

（三）經濟活動：1953 年 9 月李國鼎先生任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工業委員會專門委員（兼一般工業組組長），編定經建四年計劃的工業建設部分，推動以民營中小企業爲主的進口替代工業。1958 年 9 月擔任美援會秘書長（後兼任經濟部工礦計劃聯繫組召集人、美援會工業發展投資研究小組召集人）之職，負責經濟規劃與美援分配運用等。1963 年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成立後，先後出任秘書長及副主任委員。1965 年 1 月李國鼎先生擔任經濟部長，積極推動經濟建設，包括推動加工出口區、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改革整頓國營事業。

由於李國鼎先生對於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臺灣的經濟發展參與甚多，留下的相關照片資料十分豐富，內容包括各公私營產業的參觀

考察、參與美國經濟顧問團的來華參訪活動、訪華國際友人如美國詹森總統特使布萊克（Eugene Black）、美援公署署長郝樂遜（Wesley C. Haraldson）、美國詹森總統科學技術特別助理賀尼克博士（Donald F. Hornig）、美國國際開發總署駐華分署署長白慎士先生（Horward L. Parsons）等人簽訂各項國際合作計劃案的歷史鏡頭。

1967 年 7 月李國鼎先生偕同劉大中、蔣碩傑、顧應昌、費景漢四位中央研究院院士，在梨山行館向蔣中正總統提出有關臺灣財經改革意見，對日後臺灣經濟的發展具有關鍵性的影響，梨山會議是此資料庫中提供的另一珍貴歷史鏡頭。

（四）財政：1969 年李國鼎先生在財政部長任內，推動政府財政現代化的改革，包括推動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採用國際通行的布魯塞爾（Brussels）分類法重訂關稅稅則分類、修訂關稅法授權政府機動調整關稅稅率、成立財稅資料處理中心加強稽核工作、成立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制度、修改銀行法成立中小企業銀行，並加強基層金融檢查、籌措國家十大建設財源等。資料庫中的照片包括相關的活動或舉辦之各種財政人員訓練活動。

（五）國際會議：李國鼎先生自工業委員會時期即參加各項國際經濟會議，其中以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亞經會）、世界銀行暨國際貨幣基金年會兩者的次數最多；另外有如中越經濟合作會議等各國雙邊合作會議、重要的國際會議或學術研討會，並有會議期間會晤重要國際人士之照片。

（六）國際合作：除與聯合國簽訂合作方案推展臺灣經建計劃外，李國鼎先生並經常出國訪問，促進國際經建交流，行蹤遍及美國、日本、越南、泰國、菲律賓、沙烏地阿拉伯、約旦、印度、歐洲、南美及南非共和國等，或宣慰當地僑胞，或會見留學生、農耕隊等，對於推動國際外交卓有貢獻。此資料庫即蒐集其訪問各國之照片。

（七）科技：1976 年 11 月，行政院成立應用科技研究發展小組，由李國鼎先生擔任召集人，1979 年 12 月行政院科技顧問組成立，再兼任召集人，邀請國外專家學者擔任行政院科技顧問，並邀集國內學者專家召開全國科技會議，決定重點科技發展方案，推動新竹科學園區之設立，

成立資訊工業策進會，獲有「科技教父」之美譽。此外，並建立群體醫療中心及醫療網。資料庫照片包括出席科技會議、巡視南部醫療中心、參觀新竹工業園區、中美技術合作會議、法國核子原料製造廠等。

（八）授勳：李國鼎先生因推動臺灣經濟建設及科技發展貢獻良多，所獲殊榮無數，包括 1968 年榮獲菲律賓麥格塞塞「政府服務獎」，1972 年獲韓國朴正熙總統頒發「政府一等光化樹交勳章」。1980 年獲頒南非共和國大十字級好望勳章，以及 1994 年獲李登輝總統頒授一等景星勳章等。

（九）演講與榮譽：李國鼎先生在推動臺灣經濟發展的貢獻上享有極高之國際聲譽，常應邀至國內外各大學演講，美國哈佛大學並設立「李國鼎先生經濟社會衛生發展中心及講座」，史丹福大學亦將經濟研究大廈命名爲「國鼎苑」，其所獲之國內外榮譽博士學位多達十餘個。此資料庫記錄了李國鼎先生國內外講演的鏡頭。

（十）國內外交遊：李國鼎先生在推動臺灣工業、經濟、財政、科技發展等工作上時，結識許多國內外政經要人，建立長期之友誼。此資料庫集有如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與友人球敘等照片。

整理小組按內容在登錄每一張照片時，即先作好各項分類，包括：冊號、文件號、年、月、人物、地點、事件、類別，如下表：

冊號	文件號	年	月	人物	地點	事件	類別
78	2	1971	7	李國鼎 劉鳳文	中央銀行國庫局城中區集中支付處及財政部國庫集中支付處新址	財政部長李國鼎（左一）巡視中央銀行國庫局城中區集中支付處及財政部國庫集中支付處新址。左二爲第一支付處處長劉鳳文	財政

使用者可依需求選擇關鍵詞作欄位檢索或全文檢索。由於李國鼎先生經歷豐富，並跨財經、科技兩大領域，結識許多國內外人士，本資料庫的功能除提供李國鼎先生的照片外，使用者亦可從中找尋相關人物資料。舉凡照片中的人物職銜[1]，整理小組均予以補齊，以方便利用。

此一照片資料庫首先開放前 81 冊，以後將隨整理進度隨時增補資料，陸續開放。李國鼎先生照片資料庫是近史所檔案館第一個完成的網路影像資料庫，相信此影像資料庫配合李國鼎先生的個人檔案，對於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研究提供了多面相的研究資料，我們期待各方給予批評指教。

---

1 人物的職稱主要參考外交部檔案資訊處編，《中國駐外各公、大使館歷任館長銜名年表》（1989 年）、國史館編，《中華民國行憲政府職名錄》（臺北：國史館，1988 年），冊 1-4、剪報資料及相關單位職員名錄。間或上網查詢各工商企業團體大事記。主要參考資料：李國鼎先生檔案、李先生 1967-1985 年大事記、李先生 1965-1975 年之行事曆、薛化元主編，《臺灣歷史年表》（臺北：國家政策研究資料中心出版，1990 年），冊 1-4、康綠島，《李國鼎口述歷史》（卓越文化公司出版，1993 年）、《李國鼎先生九秩誕辰華封文集》（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1999 年）、陳爲忠編，《李國鼎先生論著目錄》（聯合工業專科學校，1986 年）等相關文獻、趙既昌著，《財經生涯五十年》、武冠雄著，《臺灣貿易發展經驗》（智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1950 年至 2000 年的中央日報及臺灣新生報爲主的報導、相關人物訪談及口述歷史訪問，如近史所出版之口述歷史：《民營唐榮公司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口述歷史訪問紀錄》等書，其中有李先生在美援會時期的活動及相關人物之記錄，可以參照。

檔案與研究

國史館典藏臺灣省教育廳檔案介紹

歐素瑛*

一

戰後以來臺灣各級各類教育的發展，與政治、經濟、社會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性。就政治而言，賴教育宣傳政令，灌輸國民應有之國家認同與民族意識；就經濟而言，由傳統的農業社會過渡到工商業社會的過程中，配合國家經濟政策，培養所需要的經建人才；就社會而言，因應民主法治社會的建立，養成民眾的公民道德與倫理觀念等。換言之，教育不僅要符合國家發展所需，更要塑造社會所需人才，教育體制與教育內容亦需作適當的調整與改變，以因應需要。教育在現代國家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與重要性可見一斑。1968 年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之後，除了配合國家發展所需外，亦積極推動教育革新工作，在教育質量方面，均有顯著的成長，爲國家培育所需人才。

1947 年 5 月 16 日臺灣省政府成立以來，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教育部及各縣市教育局，即分別負責辦理臺省教育事業的規畫暨執行工作。其中，臺灣省政府教育廳負責辦理臺省教育事項、社會教育事項、教育及學術團體目的事業監督事項、圖書館博物館公共體育場籌劃及管理事項，以及其他教育行政事項等，廳內設有秘書室、第 1、2、3、4、5 科、督學室、軍訓室、人事室、主計室、總務室，以及國語推行委員會、國民體育委員會，

* 國史館助修

[1]負責相關事務的推動，並且隨著不同業務的推動，組織編制略有更動，以提高其職能。

本文擬將國史館典藏之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檔案分門別類進行介紹，提供研究者參考。

二

國史館係中華民國重要的史料典藏機構之一，自 1957 年在臺復館以來，即以纂修國史及典藏國家重要史料文獻爲職掌，所庋藏之史料，不但種類繁多，且數量龐大，包括文件檔案、專藏檔案、人物檔案、微縮檔案、視聽檔案、照片檔案，以及蔣中正總統檔案等，十分豐富。目前該館所典藏之臺灣省政府檔案，計有 77 個單位，上從廳處一級單位，下至學校、鄉鎮公所、地政事務所等基層單位檔案，皆有典藏，檔案總數爲 25,493 卷，計自日治時期起至臺灣光復後各項建設措施，如經建計劃、施政計劃、戰時運輸統一調配、八七水災專案、港口擴建、美援計劃、農復會援助計劃、土地改革、山地行政、外僑管理、援外技術、農田水利、地方自治、日僑接收遣返、二二八事件等攸關臺灣發展之史料。[2]

目前該館所典藏之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檔案，係 1983 年 10 月至 1987 年 11 月間陸續移轉來館者，所涵蓋之時間自 1965 年以迄 1977 年，共 337 卷，9,844 件，爲關於歷年來臺灣省教育廳重要工作計畫、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國民教育、中美基金運用計畫、山地教育、社會教育、視聽教育、工藝教育、出國考察報告、國家建設研習會、技術訓練中心等相關案卷，爲研究臺灣經濟起飛期間教育發展之重要史料，然因數量不多，使用者亦少，並未受到重視。蓋因臺灣光復以來之教育史料，除教育部典藏者外，[3]實以由原省教育廳移往省立臺中圖書館庋藏者爲主，該館業於 1984 年 6 月出版《臺灣教育發展史料彙編》，詳列各類教育之學制、行政、教學及課程、重要

---

1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編印，《臺灣省教育簡介》（臺中：編者，1976 年 1 月），頁 9～10。

2 《現藏國家重要檔案暨圖書期刊簡介》（臺北縣新店市：國史館），頁 15。

3 教育部檔案可參閱教育部總務司編印，《教育部檔案典藏一覽表》（臺北：編者，1993 年 12 月）。

教育措施、教育法令等方面的發展和演變，提供學界相關研究之基本史料；至於國史館所典藏者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以下謹根據國史館典藏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檔案之主要內容，分爲施政計畫及建議、國民教育、中等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社會教育，以及中美基金教育計畫及美援經費、其他等類，加以歸納整理，茲述如後：

（一）施政計畫及建議：自 1953 年實施計畫經濟以來，臺灣逐漸轉型爲工商業社會，產業結構亦由勞力密集向技術密集發展，爲使教育與國家建設相配合，教育廳亦針對各級各類教育提出配套措施，以培養各項建設所需人才，相關檔案有教育廳重要工作計畫、施政計畫、教育建議、教育資料、全國教育會議、地方教育行政會議及省政信箱等，內容十分豐富，可藉此瞭解政府之相關決策過程暨執行情形，足供學者參考。

（二）國民教育：此一時期工作重點在推動九年國教暨克服施行後之相關困難，首先爲師資問題，相關檔案有勇類校長上進案、保送國小校長進修案、校長主任甄選儲訓辦法、國小行政效能案、校務行政推行案、教務主任座談會、修訂教師甄選、增加教師編制、分發畢業的優秀師專生、修訂師專生分發制度、服務山地國中教師優待辦法、解決國小教師同職位不同待遇、提高師資素質、維護師道尊嚴、提高教師研究費、教師調動積分辦法、獎勵優良教育人員、鼓勵教育人員辦學案。其次爲教學問題，相關檔案有消除二部制教學案、重新修訂課程標準、減少授課時數、簡化國小教科項目、重視四育均衡教育、加強倫理道德教育、加強國中音樂美術教學、加強體育教育推行案、擬訂國民小學參考書審查辦法、重編課本教材、改進國中小學教科書、編印國中國文教師手冊及美術教學指引、充實自然科學器材、改進能力分班、改革學生測驗方法、統一學生記分法、國民小學學生出席及異動狀況報告、學生外流案、學童求學案、加強查緝惡補、防止體罰學生事件。再者，教學設備方面，相關檔案有增購土地案、興建禮堂案、國民小學教職員宿舍案、禁止代購學生日常必須品、減免學雜費、減輕教育負擔案、山地偏遠補助旅運費等。

（三）中等教育：1968 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各縣市中學爲因應地方實際需要及國中畢業生升學所需，除建議放寬招生班數、名額外，要求設立高中、高職及夜間補校者亦多，相關檔案有屏東縣東港鄉、臺北縣雙溪鄉、土城鄉、金山鄉、淡水、永和、三重市、桃園縣大溪鎮、苗栗縣通霄鎮、南投縣國姓鄉、臺南市等設立綜合高中，以及彰化縣北斗高中、

高雄左營高中、高雄縣林園鄉、宜蘭縣頭城高中、臺東高中分部設置夜間補校等。其次，爲使延長義務教育之實施更加周延，亦漸次推動相關措施，相關檔案有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補助九年國教經費、實施國中學區制度、城鄉教育均衡發展、修訂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加強史地課程、國中教科書工作檢討會、中等學校增設法律常識課程、教學觀摩會、資料巡迴展、行政業務檢討會、增補國中教師、減輕教師授課負擔、實施計畫教育、減免學雜費、校外生活指導、興建教職員宿舍、興建山地籍學生宿舍、擴建運動場等，有助於觀察九年國教之實施情形。

（四）職業教育：自 1967 學年度起，配合九年國民教育，實施省辦高中、高職，縣市辦國民教育的政策，並逐年結束初級部與五年制班級，至 1970 學年度爲止，全省職業學校均已改爲高級職業學校；同時，爲配合國家經濟建設計畫，採取發展工業、水產職業教育、緊縮農業、商業職業教育、調整家事、醫事職業教育的政策，[4]以造就經濟建設基層技術人才。相關檔案有加強實施職業教育、加強水產教育配合漁業發展、增設養殖學系、設立高級工商科學校、埔里農工改埔里高工、斗六國中改爲工業職校、內埔農校增設工科、輔導醫事教育列入重點發展、加強全面推展家事教育、設立農工專校、加強技藝農科教育、訂定各農專及農學院招生辦法、加強技術專科教育、實習師資嚴重缺乏、分門別類實施現代教育、獎勵大專或農校青年返鄉、從速訂定技能檢訂標準、課程標準、增列本國史課程、加強輔導升學與就業、輔導大專畢業生就業、設立山胞就讀高工及工專保障名額、專門人員檢覈考試辦法等。

（五）高等教育：隨著國民教育水準的逐年提升，各高級職業學校、專科學校漸有改制之議，相關檔案有屏東設體專、宜蘭農校改制農專、臺南高農改制五專、水產職校升格五專、桃園農校改制專科、澎湖水產升格爲專科、海洋學院升格爲海洋大學、擴大高雄學院爲大學、臺中師專改爲師範學院等；同時，增設相關科系之請亦時有所聞，相關檔案有增設土木科系、設置都市計畫學系、設行政專修班、設國中師資專修班、成功大學增設歷史系、醫學院、大專院校普設農工科、增設教育科系及課程等。其次，關於大專聯考方面，相關檔案有廢止升學考試之加分及保送、師專五

[4]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編印，《臺灣省教育簡介》，頁 26～30。

年制保障名額、取消高職畢業生報考限制、大專教育檢討會建議、增加大專聯考錄取名額、大專聯招之入學考試分組方式、大專聯考錄取標準降低、取消大專報考科系限制、大專聯考以智力體能代替、花東兩縣設大專考區、大專聯考及留學、各項升學考試日期配合本省氣候等。復次，關於師生方面，相關檔案有現任校長、教導主任進修、校長會議、頒訂教師進修辦法、大專師資及設備、培養師資發展中學教育、設國中師資專修班、保送資深績優教師深造、教員介聘或排課、保送甄試升學、保送師範大學、增加備取生、增加學生名額、山地青年就讀大學特優案、培養國家建設人才、發展培植工業人才、師專生充任教員解決九年國教師資等。再者，教材教法方面，相關檔案有各大中學加強外文教學、增設道路有關課程、增設國術課程等。

（六）社會教育：爲培養優良社會風氣、提高國民知識水準、配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及實踐「國民生活須知」，各相關單位對於社會教育工作著力亦多，相關檔案有電視臺應播放有益身心的節目、教育部呼籲淨化電視節目、以臺語播放新聞、氣象、建議電視臺播放閩南語反共連續劇、各電臺方言節目比率、建議電視製作有關國民生活須知與禮儀節目、嚴格檢查電視節目、製作法律教育歌詞與劇本、加強推行國語、國語文教學問題建議、全國圖書館業務會議提案、推行正當娛樂案、高中以上加授中華民國憲法、建議提高教師社會地位、取締影視明星長髮異裝、表彰本省文化界先賢等。

（七）中美基金運用計畫及美援經費：自從韓戰爆發以來，美國即持續不斷地提供臺灣經濟、軍事援助，其中，透過補助臺灣相關教育的發展，培養經濟建設所需的人力，亦爲經援的重要一環，相關檔案有配合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階梯教學師資培養計畫、充實本省省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實習設備、中等及職業教育發展計畫、師資培訓計畫、教育發展計畫援款、補助實習工廠設備、補助商工職校師資培養計畫、發展工業教育經費、中美基金計畫表、調查中美基金教學計畫成果、補助臺灣省農工職校更新設備、中美基金月報表、中美基金國中經費會計報告表、發展職業教育計畫基金收支月報表、九年國教援款案、九年國教計畫、中美基金建議事項、中美基金決算報告等，可以觀察美援與中美基金在教育項下的運用情形。

除上所述，國史館典藏之臺灣省教育廳檔案還有山地教育、工藝教育、

科學教育、視聽教育、軍訓教育等類，亦分述如下：

（一）山地教育：由於是類教育不論在師資、教學及設備各方面，向處於相對弱勢的一環，亟待加強，相關檔案有補助小學應派科任教員、補助興建教職員宿舍、調整山地國小學生文具費、教室建築經費、分校購地經費、增加山地國小辦公費、山地獎勵金、加強山地國民教育師資及教學設施、提高山地教育水準等。

（二）工藝教育：爲加強中學工藝教育，啓發職業陶冶觀念，改進教學方法，提高教學效率，增進社會人士對工藝教育之瞭解，除舉辦工藝作品展覽會外，並委託師大工教系代辦工藝研習班，相關檔案有教學研習會實施計畫、教育輔導計畫、研習會實施辦法、舉辦工教研習會、電子教學研習班、輔導國中工教研習、美工科教學科目及時數表、補助中學工藝及家事教育、工藝輔導調查表及日程表、辦理工教研習情形、工藝教師參加、編訂工藝月刊、核定補助工藝及家事教育、工藝教學計畫、遴調教師參加研習、工教輔導人員名冊、研習成果清冊、工藝工具操作法圖片等。

（三）科學教育：爲啓發學生對於自然科學的興趣，培養學生科學治學方法與精神，提高科學水準，由是積極發展科學教育，相關檔案有中小學科學展計畫、中小學科展覽會、生物科學實驗教學研習會、學習成就評量方法研討會、研習會綜合報告、科教成果報告表、綜合檢討改進意見書、科學教育人才培育計畫、科學教育行政人員出國考察、科學教育月刊出版辦法、自然科視聽器材研習、顯微鏡及顯微投影機調查表、科學教學設備實施要點、教學設備五年計畫及年度計畫表、科學儀器觀摩座談會、研訂高中科教設備計畫、聘師大協助科教評鑑、天文臺協助推行科教、科學教育專案補助等。

（四）視聽教育：爲改善學校教學方法，增進教學價值，乃透過電視進行教學，以提供較佳的資料、方法，相關檔案有視聽教育工作檢討會、視聽教學申購調查統計表、申請加入中國視聽教育學會爲團體會員、視聽教材所需幻燈片課程一覽表、電視教學與改善閉路電視座談會等。

（五）軍訓教育：爲灌輸學生軍事知識、鍛鍊強健體魄及養成良好生活習慣，自 1953 學年度開始，各高級中學全面實施軍訓教育，1954 學年度起，更推廣至各大專院校，最初係由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策畫主辦，1960 年 7 月，教育部成立學生軍訓處、臺灣省教育廳成立軍訓室，主辦軍訓行

政業務，[5]相關檔案有學校軍訓工作督導實施計畫草案、嚴禁各級學校學生吸煙、訓導總務主管聯席會報、學校生活管理及訓導制度等陳述意見、軍訓課程由退休教官暫充任、調派師專護理教師職、增列「軍訓教育及活動」等。

（六）專門科目訓練：爲因應九年國教實施之後需要大量師資，乃針對一般大專學校非相關科系畢業者，於擔任教師後，除須接受教育科目訓練外，亦須接受 20 個專門科目學分訓練，以增進其專業科之教學知能，相關檔案有專門科目訓練、在職教師進修實施要點、研習會實施計畫修正草案、在職教師修習名冊、學員結業成績冊、受訓補助費等。

（七）技藝訓練中心：自 1968 學年度起，爲配合九年國教的實施，兼顧學生升學與就業的需求，除了健全教育體制與教育內容外，亦擴大辦理技藝訓練中心，依據社會需要設置科別，使國小畢業無法升學及國中輟學生可以習得一技之長，相關檔案有技藝訓練計畫表及支出預算明細表、駕駛訓練自費班訓練計畫、成功工商附設技藝訓練中心、技藝訓練中心人員名冊、補助經費等。

（八）出國考察報告：主要爲教育人員的出國進修考察報告，相關檔案有奉派出國人員屆期應繳出國報告、出國人員返國後限於一個半月內提出報告、考察報告、出國報告等。

三

國史館典藏之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檔案以 1970 年代前後的資料爲主，此一時期臺灣正處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轉型期，教育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自不待言。該批資料一方面可以觀察延長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的施行情形及所遭逢之困難，另一方面也可探究此一時期教育發展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建設間的合作關係，對於觀察 1970 年代臺灣教育發展，助益頗大，值得有興趣之研究者多利用之。

其次，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檔案中，典藏有關於教育廳之施政計畫、高

---

[5]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編印，《臺灣省教育簡介》（臺中：編者，1968 年 6 月），頁 22。

等教育、中等教育、國民教育暨社會教育史料，對於研究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美援與臺灣教育、經濟發展與人力需求，以及各級各類教育發展等課題，實爲不可或缺之第一手史料。當然，臺灣省政府教育廳檔案因係政府機關檔案，在性質上，自然以政府之法令規章、政策宣導爲主，無法探知民眾、輿論對於相關問題之意見與看法，有待其他資料補充，始能較適切地瞭解此一時期教育發展之實況。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84)

抗戰前的清華大學，1928-1937

蘇雲峰著 326頁 精裝300元 平裝250元

本書爲《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的續篇，介紹抗戰前的九年間，清華大學快速發展成爲國內一流大學的情形。其發展特點爲：一、有良好的學校領導人和獨特的領導風格；二、有比其他國立大學充沛穩定的經費；三、有第一流的教學和研究環境，尤其是圖書館和理工學院的儀器設備；四、有堅強的師資陣容；五、有自由主義傳統和教授治校制度；六、實施嚴格的通才教育，並採精英政策，文法理工四學院學生最多時不過千餘；七、政治干預學術，乃時代通病，清華的學術自由傳統雖抗拒了公開的政治干預，卻寬容地下的政黨活動，以致有學生越軌舉動，所幸梅校長領導有方，校園得免淪爲政治鬥爭場所；八、畢業生人數不多，但於兩岸三地和美國等處的學術、教育文化、科學研究和工業建設等領域上，均有卓越表現和重大貢獻。總之，清華大學在近代中國動盪不安，欲振無力的高等教育困境中，是一個難能可貴的楷模。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行《內閣漢文題本：户科貨幣類》微捲簡介

鄭永昌*

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在浩瀚的史料當中，官方記錄毫無疑問佔有一席之地。而紛繁的官方史料裡，檔案文書其價值與可靠性更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其中，清代內閣大庫檔案的發現與流傳，不僅開拓清史研究的新面向，同時也加深學界對清代歷史的認知程度。多年以來，由於庋藏機構孜孜於檔案的整理與出版，並建立彼此間合作與流通管道，使以往受限於運用這些檔案的年輕學者，得以有方便閱覽的寶貴機會。晚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先後從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購置多種清代檔案微捲[1]，既彌補臺灣典藏之不足，同時也節省學者遠赴大陸蒐羅資料的時間與花費，其貢獻值得肯定，而該所年來從一檔館新購置的一套清代檔案文書：《內閣漢文題本專題檔案：戶科貨幣類》(以下簡稱《戶科貨幣類》)微捲即是一例。

一

清代本章制度，有題本、奏本、奏摺之分。題本是清代京省所屬的高

---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1 例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賴惠敏教授指出，目前該所購自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微捲數量，佔該館已複製檔案且對外發行的一半，目前仍在陸續購置當中。而該所目前已購置的清代檔案，可分別見賴惠敏，〈第一歷史檔案館發行「清代硃批奏摺財政類」微卷簡介〉，《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 22（1996 年 9 月），頁 101；〈清代巴縣縣署檔案：乾隆(1736-1795)司法類〉，《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 28（1999 年 9 月），頁 124。

級臣僚向皇帝報告的日常政務文書。由地方各省呈送的題本，俱經由通政司轉達內閣，稱爲「通本」，而來自京內各部院的題本，則附於六部之後，逕送內閣，稱爲「部本」。先經內閣票籤，再進呈御覽。由於題本多屬日常政務，故籤詞亦依成規，有「該部知道」、「依議」、「該部議奏」、或「該部察核具奏」等字樣，君主依內容選定其中一籤，送批本處以紅筆照旨批寫滿文或漢文於題本封面，因俱用朱書，故又稱「紅本」[2]，再經六科抄錄後發回該衙門執行。雍正 7 年(1729)規定京外本章必於正本外另立副本，隨正本一併投送內閣，奉旨後內閣遵照紅本朱書，以墨筆批錄於副本上，存皇史宬以備日後查核[3]。以上簡單敘述題本的發抄過程，俾便了解內閣漢文題本的性質。

現藏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題本約計 140 萬件，爲該館收藏檔案中數量最多的一種文書。該館依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分類整理，其中屬於戶科題本方面又進一步細分爲：戶籍、田賦、漕糧、稅課、貨幣、庫儲、經費、農業、倉儲、工業、商業、以及災害賑濟等十二類[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購入的，即是其中有關貨幣的檔案部份。

收錄於《戶科貨幣類》的題本，就時間而言，起於乾隆元年(1736)，下迄光緒 24 年(1898)，提供研究者了解此 160 餘年間清代貨幣政策的重要訊息。這套檔案是第一歷史檔案館於 1997 年攝製完成，共 13 捲，2141 件，42,493 頁，微捲編號爲 MC04668-04680，16 釐米。微捲中複製各題本年份與數量如下：

捲　號	時　　間	編　　號	頁　數	件數
第一捲 (MC04668)	乾隆元年正月—九年八月六日	0007-3338	3,331	119
第二捲 (MC04669)	乾隆九年八月六日——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0008-3734	3,726	135

[2] 參見莊吉發，《清代奏摺制度》（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9 年 9 月，初版），頁 87-91。

[3] 參見莊吉發，《故宮檔案述要》（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3 年 12 月，初版），頁 10-17。

[4] 引自秦國經，《中華明清珍檔指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32-34。

第三捲 (MC04670)	乾隆十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	0008-3736	3,728	126
第四捲 (MC04671)	乾隆二十一年三月六日—— 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0008-3742	3,734	169
第五捲 (MC04672)	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0008-3760	3,752	139
第六捲 (MC04673)	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三十八年十月十五日	0008-3741	3,733	180
第七捲 (MC04674)	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十八日—— 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0008-3750	3,742	125
第八捲 (MC04675)	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五日—— 五十五年四月十四日	0008-3150	3,142	213
第九捲 (MC04676)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十一日—— 六十年十二月十九日	0008-2015	2,007	140
第十捲 (MC04677)	嘉慶元年三月十二日—— 二十年十月二十日	0008-3748	3,740	283
第十一捲 (MC04678)	嘉慶二十年十一月六日—— 道光十六年十一月四日	(嘉)0008-1451 (道)1453-3727	3,719	300
第十二捲 (MC04679)	道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光緒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道)0008-1269 (咸)1271-2246 (同)2247-2733 (光)2735-3481	3,473	170
第十三捲 (MC04680)	光緒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0008-0674	666	42
總　計			42,493	2,141

從表中可以清楚看到，《戶科貨幣類》所收錄的題本，無論捲數與檔案件數，皆以乾隆朝最爲豐富，約佔全部三分之二，這對關心乾隆朝貨幣史與財經史的學者而言，提供更多以及更充實的史料。

轉動著一幅接一幅的捲片，首先須注意的，是這套檔案所展現的文書

格式。一如所有題本規定的文書格式[5]，《戶科貨幣類》每一件題本首頁居中的上方有一「題」字，鈐印該衙門關防，右側有「依議」、「該部議奏」、「該部知道」等批紅。次頁首行書明官銜姓名某某「謹題」字樣，尾頁最後以「謹題請旨」結束，附上日期、鈐印關防。大部份題本後並附有「貼黃」，也就是該題本的內容摘要，因此，一份達數十至百餘頁的冗長文書，我們可以經由貼黃了解其中大意與重點。題本內文每頁六行，一行二十格，抬頭二字，平行寫十八字。

二

相對於奏摺內容的廣泛與多樣性，舉凡地方風俗、民生吏治、社會百態、天候變化、物價波動等情事，閱讀時趣味盎然，題本則因性屬日常公務性質的報告文書，內容雖嫌冗長枯燥，然而仍不失其史料本身的重要價值。《戶科貨幣類》題本，主要爲戶部寶泉局與各省轄下鑄錢局每年所作的政務報告，內容反映該錢局的經營狀況、開設爐座數目，鑄錢卯數與鑄錢量、員役的僱聘與配置、各項經費籌措與開銷、鑄錢盈虧、幣材礦脈的探測、採買與運輸等情況，經由這些檔案史料，使我們深入體察清代貨幣發行機構的運作，以及中央與地方、省與省之間的財政關係。

其次，清代的貨幣制度基本上是銀銅複本位制。白銀主要應用於大宗商品交易，銅錢則做爲日常零售市場與工資的支付工具。然而，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相對於政府無法對白銀流通採取任何的手段干預，但對銅錢方面則貫徹其強勢主導角色[6]。姑且不論這種主導力量能否充份發揮，但官方對錢幣鑄造權的掌握，幣材的課徵與分配，利用錢幣發放(例如搭放兵餉或設官錢局)，並增減其含銅量（如黃錢改鑄青錢），以調劑貨幣市場供需比價各層面，無不極力堅持其管控地位，藉此維護政府的威權立場。經由《戶科貨幣類》題本的記錄，使我們了解中央戶部與各省鑄錢機構在面

---

5 清代題本所依據的本章格式，是始於順治八年規定後實施。見莊吉發，《清代奏摺制度》，頁 90。

6 參王業鍵，《中國近代貨幣與銀行的演進(1644-1937)》（臺北：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1981年4月），頁 5-12。

對貨幣市場變化，以及有限的幣材供應下，如何作出適當的調配，從中並反映出政府對商業金融與國家利益之間持有怎樣的態度。

再者，鑄幣權既然象徵官方的威權與法理地位。因此，如何維持造幣局的永續經營便成爲政府的首要方針。然而，受到營運資金與幣材供應的限制，清初至雍正年間各省鑄局開閉無常。綜觀乾隆至光緒歷朝政府，該如何籌措充裕營運資金，並獲得穩定幣材，一直深切地困擾著戶部與各省政府。從《戶科貨幣類》題本中，大體上提供我們以下的印象：乾隆年間由於國內政經情勢相對穩定，市場銅錢升值，鑄局因此有可觀的鑄息收入；而以雲南領銜所生產的銅礦日益暢旺，又有川銅、洋銅、南銅（湖南銅）的補充，加上雲南、貴州、湖南、廣東等省鉛錫的持續出產，解決以往幣材不足的困境，而經由省際間的協餉制度、生息銀兩的營運、鹽銅互易制度等方式的推行，使地方鑄局得以有穩定的資金來源。然而，這種情況至嘉慶以後盛極而衰，嘉道年間錢價下跌，錢局日益虧損，不得不減卯或停鑄；咸同之際，國內動亂相繼發生，滇銅供應缺乏，銅錢含銅量下跌，制錢重量減輕，鉛錢、鐵錢、大錢的流通，惡化原來穩定的貨幣體制；而光緒朝承接前朝紊亂的貨幣局面，欲振乏力。《戶科貨幣類》檔案所透露的訊息，不僅反映出清代十八、九世紀百餘年間的官方鑄錢史料，細讀其內容，從中更印證清廷國勢由盛而衰的軌跡。事實上，貨幣政策本來就是財經政策一個重要環節，而貨幣體制推行順暢與否，又與政府財政基礎的良窳息息相關。嘉道以來，隨著清廷內憂外患的壓力，國庫空虛，根本無法建立穩定的貨幣體制。翻閱期間的貨幣史料，不禁體會到明末士人李清曾經說過：「信乎錢運關國運也」[7]。

三

以上，爲個人初步翻閱《戶科貨幣類》檔案所觸發之些許心得，尚待往後更爲深入細緻的研究。此外，筆者試圖將有關戶部寶泉局和地方鑄局鑄錢規模與變化作簡單介紹，俾便對各省鼓鑄情況有概略認識。另一方面，

[7] [明]李清，《三垣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 5 月），頁 221。

由於題本中涉及乾隆朝資料較多，且其間各鑄局營運變化也較大，因此敘述時將較偏重於乾隆一朝。

如上所述，《戶科貨幣類》題本主要記錄乾隆至光緒年間戶部和各省鑄局經營狀況，其中所見鑄局，除中央戶部寶泉局外，地方省局分別有：直隸寶直局、山西寶晉局、陝西寶陝局、四川寶川局、貴州寶黔局、湖南寶南局、湖北寶武局、江西寶昌局、廣西寶桂局、廣東寶廣局、江蘇寶蘇局、浙江寶浙局、福建寶福局、以及雲南寶雲局，而雲南一省，又先後在不同時期有省城、臨安、大理、廣西、廣南、東川（又分新、舊兩局）、保山、曲靖、下關、永昌、楚雄等鑄局，總計 14 省 26 個鑄局。此外，檔案亦曾出現山東寶濟局與安徽寶安局名稱。就安徽而言，主要爲雍正 10-12 年間的鑄錢報告，而乾隆以後安徽並未再度設局鑄錢。山東寶濟局方面，只見有雍正 7 年至乾隆 3 年(1729-38)間有關鑄錢的記錄，乾隆 3 年該局即已停止營運。

（一）戶部寶泉局：

寶泉局爲中央戶部的鑄錢機構，自清初即維持可觀的鑄錢量。現存《戶科貨幣類》題本有關該局資料，主要爲督理京省錢法戶部右侍郎，與寶泉局監督報告該局歷年出入各色銅鉛錫料，鑄解錢文數目，以及搭放兵餉，與給發工食工料等項之奏銷清冊。乾隆元年至 6 年間(1736-1741)，由於雲南代鑄京錢 34 萬餘串，故寶泉局只需鑄錢 50-60 餘萬串，自乾隆 7 年(1742)始，停止雲南代鑄京錢，往後寶泉局每年維持 80-90 餘萬串產量。咸豐以後，由於戰亂頻仍，滇銅供應受阻，中央遂開鑄大錢，清冊中亦出現該局有關當十、當五十、當百、當五百、當千銅錢，以及一錢與當十鉛、鐵錢收支記錄。

（二）直隸寶直局：

乾隆 10 年(1745)開局鑄錢，銅材來自官辦洋銅，鉛錫則委派員役赴湖廣等地採買。《戶科貨幣類》檔案收錄該局歷年鼓鑄用過銅鉛錫料、支放爐匠工料公費、並鑄出錢文等清冊。由於洋銅供應不時，該局屢有增減爐座或停爐情況，開鑄時大致上設爐 4-6 座，歲鑄錢 4-6 萬餘串，工本則動支地丁與耗羨銀兩，鑄出錢文經扣除工本、工食與工料等支出外，餘錢主要

搭放保定、天津等地一成兵餉。

（三）山西寶晉局：

寶晉局在雍正 7 年(1729)開鑄，但因銅斤不繼，13 年(1735)停爐。乾隆 14 年(1749)經山西巡撫準泰奏請重開鑄局。《戶科貨幣類》題本主要爲該局每年鑄錢用過銅鉛錫數目、鑄出錢文、給發爐匠工料、搭放兵餉、並錢文發市平賣之報告清冊。該局在乾隆 30 年以前，大抵維持在 10-11 爐，歲鑄 4 萬餘串，30 年代中期至嘉慶 17 年(1812)減爲 6 爐，歲鑄 26,000 餘串，嘉慶 17 年後又減爲 3 爐，歲鑄 2 萬串。幣材主要動支地丁銀採買川銅、洋銅、以及湖南鉛錫。由於該局每年須將局錢依時價發市平賣，因而《戶科貨幣類》題本中，留下該省相當豐富的銀錢比價史料，對研究十八、九世紀間該省錢價變動有相當價值。

（四）陝西寶陝局：

陝西省早在雍正 7-12 年(1729-34)、以及乾隆 7-8 年(1742-43)曾兩度開鑄，年鑄錢約萬餘串，供當地兵餉之用。然而受銅材所限無法持續鑄錢，因此主要倚靠雲南與四川錢的供應。乾隆 13 年(1748)，經陝西巡撫陳弘謀奏請重開鑄局，設爐 10 座，一面致力運集各方銅材（如洋滇川三銅），一面積極開發該省礦產（如漢中府華陽鎮的黑鉛）。設局之初，歲鑄錢 4 萬餘串，分正鑄與帶鑄兩項，正鑄錢文供採買幣材工本與發放兵餉之用，帶鑄錢文則供爐匠工食與其他雜費支出。隨著幣材供應漸增，乾隆 17 年(1752)後鑄爐增至 20 座，歲鑄錢 9-10 萬餘串，除滿足該省兵餉所需外，更有餘錢出售市易、撥濟工程，並發運甘肅。然而，乾嘉之際，隨著銅錢供應過多，錢價持續下滑的影響，該省遂收縮規模，道光年間鑄錢量不過 4 萬餘串，而光緒年間更減至萬餘串，只是全盛時期的十分之一。

（五）四川寶川局：

四川於雍正 10 年(1732)開局鑄錢，卻因銅斤不繼終告曇花一現。乾隆元年重開鑄局，設爐 8 座，惟賴滇銅供應，年鑄 3 萬餘串。隨著滇銅生產的暢旺，四川鑄錢規模也相應擴張，乾隆 3 年(1738)增爐 7 座，鑄錢 7 萬餘串。且正當滇銅日益興旺之際，四川當地的迤北廠、沙溝廠、老洞溝廠、以及梅子凹廠等地銅礦產量也大幅增長。目前留下的《戶科貨幣類》題本中，即提供考察川省銅礦營運的線索，並從中得知，相對於十八世紀許多

省份鑄錢無不藉資滇銅的情況下，川省卻日漸擺脫滇銅的倚賴，並有餘銅提供鄰省所需。其全盛時，鑄爐多達 40 座，歲鑄 14 萬餘串。但乾嘉之際，由於私錢充斥，官錢流通受阻，該局不得已奏請停爐。道光以後雖然恢復鼓鑄，但錢價低迷，經營成本增加，寶川局鑄錢雖維持鑄爐 10 座的局面，但歲鑄錢不過萬餘串。

（六）貴州寶黔局：

貴州鑄局初設於大定府畢節縣，雍正 8 年(1730)開爐鼓鑄，乾隆 24 年(1759)經巡撫周人驥奏請移歸省城貴陽府。就規模而言，乾隆 40 年代以前爲寶黔局高峰期，先後設爐 15-20 座，鑄錢量 12-17 萬串，40 年代尙維持每年 9-10 萬串的鑄錢量，但 50 年代以後，一如四川的情況，在私鑄猖獗的衝擊下，該省鑄錢規模隨之收縮。此外，《戶科貨幣類》題本有關貴州貨幣史料，同樣值得重視的，是該省鉛斤供需報告。檔案中記錄著該省督撫每年有關當地鉛礦開採情況、籌措鉛斤經費、及其運送京外各省鉛斤路線與腳費支出等問題，提供我們考察銅以外另一重要幣材的訊息。

（七）雲南寶雲局：

相對於其他各省專設一個鑄局從事鼓鑄，雲南省卻擁有二個以上鑄局終年運作，極盛時期甚至出現九個鑄局同時開爐，共計 138 個爐座，每年鑄錢量達 80 餘萬串[8]。現存《戶科貨幣類》檔案中，透露乾隆至光緒年間該省各鑄局營運變化，以及當地銅礦開採狀況。由於以往有關雲南貨幣史研究成果相當可觀，在此無需對雲南鑄錢規模多加介紹，但經由這些檔案史料，仍可補充以往研究不足之處。舉例言之，滇銅除供應本省與中央鼓鑄所需以外，而其他省份須經由員役攜帶資金或其他物資赴滇抵易銅斤。因此，當外省以白銀換取雲南的銅料，或如廣東採用鹽銅互易手段，或如湖廣以鉛換銅等方式，經由上述各種不同的途徑，究竟如何進一步加強省際間金融與物資交流？爬梳檔案史料，將對以往集中討論雲南與中央之間，藉由銅材運輸所建構的財政關係外，同時也提示出省際之間財政聯繫

---

[8] 參嚴中平，《清代雲南銅政考》，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臺北：文海出版社，1971 年），輯 56，頁 89-94。據稱當時鑄局分別有省城、大理、祿豐、蒙自四局，康熙 24 年又增設臨安，同氏著，頁 14。

網絡的研究面向。

（八）湖南寶南局：

雍正 8-9 年(1730-31)寶南局以收買廢銅鑄錢，不久亦因銅料匱乏宣告停爐。乾隆 9 年(1744)，在湖南布政使張燦奏請之下重開鑄爐。設鑄之初，5 座鑄爐歲出錢 2 萬餘串，幣材仰賴滇、黔等省供應。乾隆 17-27 年間(1752-62)，隨著該省郴、桂兩州銅、鉛、錫礦大肆開發的結果，益加刺激湖南鑄錢工業的擴張，鑄爐先後自乾隆 17 年(1752)10 座添至 22 年(1757)的 20 座，鑄錢量也從原來 4-5 萬餘增至 9-10 萬餘串。其極盛時，幣材不僅能滿足自身需要，更有餘銅協撥湖北、支援貴州解京白鉛，並有餘錢運解甘肅協濟兵餉。然而，乾隆 44 年(1779)後，隨著郴、桂礦產日漸枯竭，湖南鑄錢每下愈況，5 座鑄爐所產錢文，亦僅敷本省搭放兵餉之用。

（九）湖北寶武局：

雍正 8-9 年間(1730-31)，湖北也在全國普遍收買廢銅鼓鑄聲浪中開爐，但只產出 2 萬餘串銅錢即告停爐。直到 13 年後才又重開鑄局，設爐 15 座，歲鑄錢 4 萬餘串。由於湖北素有「九省通衢」之稱，因而匯聚來自各方幣材以供鑄錢，故反映其使用幣材的多樣性；但由於腳價費用昂貴，故須負擔較高運費成本；且往往因幣材轉輸不時，遂增加該省鑄錢的不確定性與多變性。《戶科貨幣類》有關該省鑄錢報告中，即充份反映上述情況。例如該省鑄錢用過的銅材，先後有滇銅、洋銅、漢銅（漢口當地商銅）、川銅，以及南銅；又如乾隆 11 年(1746)該省因銅斤不繼，遂將制錢減重 33%（將原定重一錢二分青錢改鑄重八分小錢），而當 12 年(1747)後銅斤日益充裕之際，寶武局隨即增爐至 20 座；而爲了支付昂貴的運費，該局乃在江、漢兩縣設官錢局市錢易銀，藉此賺取錢息以彌補成本的負擔；又自乾隆 50 年代始，該省受到來自各省私錢流入的衝擊，加上銅源匱乏，鑄局又經常開閉不定，道光以後，甚至處於長期停爐情況。

（十）廣西寶桂局：

乾隆 8 年(1743)以前廣西流通的制錢，幾乎僅仰賴雲南每年運送 6 萬餘串滇錢以資搭放兵餉之用。自 8 年始，廣西始正式自鑄制錢，設爐 10 座，歲鑄 2-3 萬餘串，如此少數量自然不敷社會需求，因此仍需滇錢的協濟。自乾隆 15 年(1750)後，雖然雲南停運制錢，但改以每年供應 45 萬斤銅料，

加上廣西當地銅鉛礦廠的適時開發，遂促使該省鑄錢的大幅成長，除鑄爐數目添至 20 座外，年鑄錢量也增至 9-10 萬餘串。但自乾隆末年至嘉道年間，由於銅錢壅塞，市價日減，寶桂局逐漸裁減鑄爐，鑄錢量只不過萬餘串，至咸同之際太平天國動亂期間，鑄錢事業更益低迷。

（十一）廣東寶廣局：

廣東是錫材的重要供應地。自乾隆 5 年(1740)爲防範民間銷毀制錢，官方遂在制錢中添加錫材，鑄成青錢（有別於以前的黃錢），錫遂成爲制錢中不可或缺的成份之一，從此廣東每年須運送 15 萬斤錫材，以供戶工兩部鼓鑄之用。然而這種情況並未爲廣東鑄錢帶來多大助益。該省自康熙 37 年(1698)停爐後，直至乾隆初年將近半個世紀未見有鑄錢記錄，市場流通的制錢，大部份間接從滇省流入。直到乾隆 10 年(1745)，當廣東按察使張嗣昌奏請設局鑄錢，才逐漸紓緩當地長期制錢不足的壓力。然而，開局之初，6 座鑄爐每年只有萬餘串的鑄錢量，僅敷搭放省城兵餉，制錢流通不足的問題仍未解決。乾隆 19 年(1754)間，經廣東巡撫鶴年與雲南巡撫愛必達商議，開始採取兩省之間銅鹽互易方式。鹽銅交換使廣東每年獲得穩定的銅材來源，因而促使廣東鑄錢量頓增至 3 萬餘串，搭放兵餉範圍也擴大至省區邊遠地帶，餘錢更在南海、番禺等地設官局糶易以平錢價。然而，銅鹽互易的方式實行至嘉慶 25 年(1820)又告停止，一方面因滇省鹽斤積壓日多，而廣東亦由於錢價下跌，制錢壅塞，鑄局被迫停爐，銅斤解送也停止。

（十二）江西寶昌局：

《戶科貨幣類》題本中，曾提及江西在雍正 7-9 年(1729-31)與乾隆 3 年(1738)鑄錢記錄，但亦不過曇花一現。當乾隆 7 年(1742)該省巡撫陳弘謀議請開爐時，即述及該省充斥著剪邊、鵝眼、沙板等私錢的嚴重性[9]。在陳

---

9 清代人民私鑄銅錢名目繁多，剪邊、鵝眼、沙板（又作砂板）等名更是官方檔案記錄中經常提及。所謂剪邊錢，是指人民暗中以鐵鉗或剪刀把官錢剪小，從中獲得的銅料碎屑以供私鑄，而經過裁剪的官錢，雖然仍屬制錢，但因外形細小，又不合法定重量，官方遂稱之謂「剪邊錢」；至於鵝眼錢或沙板錢等名，則是對人民私鑄銅錢之名稱，就其外型更小更輕，彷如鵝眼，故稱之爲「鵝眼錢」；或以其質地粗糙，而稱爲「沙板錢」。此外，諸如風漂、漏風、光板、錘扁、榆夾等，雖不同地方而有不同名目，而以其外型細小，重量輕薄，質地粗糙不堪的私錢，所產生的稱呼則

弘謀力請之下，江西遂在次年重開鑄局，洋滇銅配鑄。就規模而言，除了短時間鑄爐減爲 4-6 座，贛省一直維持著鑄爐 10 座，歲鑄錢 7 萬餘串的規模。在題本記錄中，該省鑄錢除搭放兵餉外，錢息所得更須協撥外地，包括雲南、四川、貴州、江蘇、通州坐糧廳，甚至戶部。道光年間，由於該省鑄局錢息不足，竟出現由鹽商與典商呈繳錢息的記錄。

（十三）江蘇寶蘇局：

雍乾之際，受到銅料供應的限制，江蘇省也一如其他許多省份，鑄局時開時閉。直至乾隆 6 年(1741)後的題本，才開始有持續鼓鑄的記錄。事實上，寶蘇局鼓鑄所面對的問題，亦如前述湖北情況一樣，經常受到外地幣材供應順暢或價格高低與否的影響。現存《戶科貨幣類》題本中，即反映該省鑄局營運規模的多變性。當官辦洋銅適時運抵，或滇銅採買順利、或黔鉛供應無虞，寶蘇局每年即可 20 座鑄爐併發，年鑄錢量高達 16 萬餘串，但當上述情況如有不測，該局鑄爐隨之裁至 8 座，鑄錢量遽減爲 5 萬餘串。其極盛時，更可協撥安徽搭放兵餉錢文，但收縮之際，尚不敷本省搭放之用。嘉道年間，銀貴錢賤問題迫使該省減少制錢供應，道光 7 年(1827)的題本中，記錄該年鑄錢不過 3 萬餘串，道光 19 年(1839)巡撫裕謙更請求停爐卻未獲准，而使其僅維持小局面的運作。終於在咸豐 5 年(1855)當太平軍迫近之際，寶蘇局亦終告關閉。

（十四）浙江寶浙局：

鼓鑄情況與江蘇相近的寶浙局，也經常受到幣材供應順暢與否而影響該局運作。乾隆 6 年(1741)重開鑄局後，設爐 10 座，乾隆年間，鑄錢量最多時可達 13 萬餘串，而當銅斤不敷之際，則縮減至 5-6 萬餘串。該局鑄錢雖稱洋滇銅配鑄，但在乾隆 20 年代以前，主要以商辦洋銅爲主，滇銅數量較少，但 20 年代後，一方面滇銅出產興旺，每百斤價銀不過 11 兩，相對地，商辦洋銅每百斤則需 17.5 兩。在成本考量下，浙江鼓鑄多用滇銅，而洋銅不過佔 2 成。

（十五）福建寶福局：

寶福局始建於乾隆 4 年(1739)，洋滇銅配鑄。整體而言，該省鑄錢規

類同。

模不大，鑄爐僅設 4 座，歲鑄錢 4 萬餘串，扣除官役薪水工食雜項，本省兵餉，並撥運臺澎各營錢文共 3 萬餘串外，每年又發錢鋪數千至一萬串市易平價後，實餘剩無幾。乾隆 40 年代後期，由於福建錢價逐漸下跌，該局減鑄至 3 萬餘串。乾隆 60 年(1795)後，更因錢價過賤，乃將兵餉全部以銀兩發放，僅維持極少的鑄錢量。至道光 4 年(1824)終於奏請停爐。

四

以上，是對《戶科貨幣類》題本有關各省鑄局規模與變化作一粗略介紹。由於該檔案數量尚屬可觀，因此筆者短時間的初步翻閱，其中遺漏之處必定不少。往後能進一步細讀，對於考察清代貨幣史發展而言，定有較深入的認識，並能開拓更好的研究主題。整體而言，由於該檔案集中戶部與各省鼓鑄事務性報告，雖有助於了解清代貨幣財政的面相，但有關貨幣流通與整個社會經濟變化之互動性等問題，則史料所反映的情況卻相當有限。此外，乾隆年間在新疆葉爾羌（乾隆 24 年）、阿克蘇城（乾隆 26 年）、伊犁（乾隆 40 年）等地相繼設立的鑄局，題本中亦未提及。因此，若要對清代貨幣經濟史能有充份而全面的掌握，相關的其他檔案史料，諸如《宮中硃批奏摺・財政類——貨幣金融》、〈內閣漢文題本專題檔案：刑科土地債務類〉、《清代巴縣縣署檔案》中司法類「欺詐」記錄、〈史館檔・食貨志——錢法事蹟〉、《清朝文獻通考：錢幣考》、清代歷朝〈上諭檔〉、〈軍機處檔〉、《宮中檔》、《明清檔案》，以及相關文集方志等，皆需一併參考。本文撰寫的旨趣，是希望能拋磚引玉，俾能更進一步豐富清代貨幣史研究的內涵。

本通訊歡迎世界各地學者，撰文介紹各該地區近代中國史研究情形、出版狀況、會議消息，及傑出學人之貢獻，以廣學術交流。

蔣中正總統檔案中之事略稿本介述

——以民國 19 年爲例

陳進金*

一、前　言

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以下簡稱蔣檔）依其性質可分爲：蔣總統籌筆、革命文獻、特交文卷、特交檔案、特交文電、領袖家書、文物圖書、蔣氏宗譜、照片影輯和其他類等 10 項。其檔案內容含括政治、外交、軍事、財經、文經、社會、交通等各方面，數量非常多，無法一一詳細說明。[1]筆者曾以民國 19 年中原大戰爲例，簡單介紹蔣總統籌筆、革命文獻、特交文卷、特交檔案和特交文電等五種檔案資料及其運用情形。[2]本文擬就文物圖書中的「事略稿本」予以介述，以饗讀者。

二、事略稿本

蔣檔之文物圖書包括印信、印章、印譜、任狀及證書、勳章及紀念章、

---

* 國史館協修

1 陳進金，〈國史館典藏「蔣中正總統檔案」始末〉，《國史館館刊》，復刊 21 期（民國 85 年 12 月），頁 365-373。

2 陳進金，〈《蔣中正總統檔案》的史料價值及其運用——以民國 19 年中原大戰爲例〉，載中華民國史專題第四屆討論會秘書處編，《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四屆討論會）》（臺北：國史館，1998 年 12 月），冊(2)，頁 1279-1308。

稿本及刊本、書畫、書籍、輿圖、及其他文物等 10 種。[3]其中稿本一類計有：事略稿本（民國 16 年至 37 年，287 冊）、事略簡編（民國 16 年至 23 年，4 冊）、困勉記（光緒 10 年至民國 32 年，8 冊）、游記（光緒 19 年至民國 32 年，2 冊）、學記（光緒 20 年至民國 32 年，3 冊）、愛記（民國 15 年至 32 年，3 冊）、省克記（民國 4 年至 31 年，2 冊）、《蔣主席傳記》（1 冊）、蔣主席傳略（1 冊）、蔣主席 60 年來大事表（1 冊）、民國 15 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鉛印線裝本 2 部，40 冊）、民國 15 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草稿本，5 冊）、自反錄(一)、(二)（各 2 部，24 冊）、蔣介石先生 40 年以前年譜（1 冊）、蔣主席文抄（民國 7 年至 31 年，5 冊）、此 31 年日記中摘出（1 冊）、總理手諭影藏（民國 13 年 8 月至 13 年 10 月，9 冊）、總理與總裁重要文電初集（1 冊）、孫總理祭蔣太夫人文（3 冊）、復興贅筆（民國 33 年 4 月，3 冊）、《四史論贊》（1 冊）、《歷代政治語錄》（3 冊）、《珠岩齋文集》（17 冊）、《珠岩齋文抄》（1 冊）、《珠岩齋初編》（1 冊）、《古文辭料》（4 冊）、《詩經講義》（19 冊）等共計 442 冊。

事略稿本，係蔣氏的秘書參閱相關函電令告，及蔣的日記編撰而成，其體例如同毛思誠所編《民國 15 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即仿《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的記述方式。事略稿本起訖年代，自民國 16 年至 38 年，其中 28 年闕漏，27 年、32 年各有兩部（內容並非完全一致），總計 287 冊，如下表：

年(民國)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冊 數	8	11	9	6	12	16	25	15	16	14	3	13
年(民國)	27	29	30	31	32	32	33	34	35	36	37	38
冊 數	12	12	12	12	2	12	12	12	12	12	12	16

國史館典藏的蔣檔中，並沒有蒐錄蔣氏日記；不過文物圖書一類中的困勉記、省克記、愛記、游記和事略稿本等資料內容，均曾摘抄蔣之日記，故其史料價值極高。尤以事略稿本數量最多，資料最豐，更值得民國史學

[3] 陳進金，〈國史館典藏「蔣中正總統檔案」始末〉，頁 371。

者重視。由於事略稿本採編年體記述，也就是將歷史事件置放在時間系統裡面，有助於釐清許多史事發生於那一天。例如民國 19 年 2 月 12 日中原大戰前夕，蔣氏接獲閻錫山「蒸電」(10 日)時，立即電請何成濬詳詢張學良態度，足見其對奉張的重視。[4]又如同年 8 月 15 日，南京中央軍克復濟南後，蔣中正爲避免張學良有所疑忌；8 月 21 日，由歸德飛濟南會晤韓復榘，並召集各軍師長令切勿渡河北上。[5]當時聽訓的一位軍官，在他的《日記》裡也有相同的記載。[6]

此外，透過事略稿本的部分內容，還可以瞭解蔣氏的內心想法。例如民國 18 年發生中俄「中東路事件」，因這一事件及與俄國交涉問題，奉張與南京中央有所齟齬。東北代表莫德惠曾於民國 19 年 1、2 月晉謁蔣中正，要求主持對俄外交；蔣基於政治現實面的考量，曾寫了一封長電給張學良，縷述中央臨時政治會議所決定對俄問題處理辦法及用意，並囑咐張氏推荐赴俄代表及外交部司次長人選。[7]但實際上，蔣卻在日記上批評莫德惠見識不明，東三省內政腐敗，靡費繁，冗員多，不如北京政府時期。[8]

由上述例子，事略稿本提供史事的精確日期，將有助於釐清歷史事件與蔣氏政策的形成過程。再者，事略稿本的部分內容也具體呈現蔣氏的真正想法，更可藉以瞭解其內心世界。此適足以說明蔣檔中的事略稿本定能擴大研究蔣中正與民國史事。

三、以民國 19 年爲例

事略稿本採編年體例記述，每年冊數不一，民國 19 年之事略稿本計有

---

4 孫詒編，《民國 19 年之蔣介石先生》、國史館藏，蔣檔，文物圖書，事略稿本，民國 19 年 2 月 12 日。

5 孫詒編，《民國 19 年之蔣介石先生》，民國 19 年 8 月 21 日。

6 萬耀煌，《萬耀煌將軍日記》（臺北：湖北文獻社，1978 年 7 月），冊(上)，頁 41。

7 孫詒編，《民國 19 年之蔣介石先生》，民國 19 年 2 月 6 日。

8 孫詒編，《民國 19 年之蔣介石先生》，民國 19 年 2 月 1 日。

6 冊，每兩個月合輯 1 冊，每冊均錄有〈要目〉，[9]如下：

1 月：

1.唐生智叛軍全部解決唐潛逃
2.閻錫山到鄭州即回太原
3.韓、石情形不穩
4.石友三從命由蚌埠移駐亳州
5.桂軍又在桂圖反攻
6.共匪朱毛由閩竄贛
7.莫德惠到京報告對俄交涉經過中央表示對俄之決心

2 月：

1.對中東路與俄交涉之方針
2.預備於第 3 次中央全體會議時擬提胡漢民爲中央黨部秘書長以眾不贊成而止
3.桂逆蠢動粵軍消極第六路朱紹良軍由平樂撤退
4.9 日電規閻錫山
5.12 日覆閻電表示革命決心
6.對晉準備動員（13 日）
7.譚胡王各院長通電斥閻（14 日）
8.再覆閻各電（19、22、26 日）
9.馮閻領銜通電反抗中央

3 月：

1.開第 3 次中央全體會議
2.發告誡第三集團軍將士電文
3.覆張學良通電
4.韓復榘石友三離合順遂之經過與孫殿英萬選才任應岐高桂滋等部之動態
5.桂亂未平
6.閻錫山猶豫不決願辭職出洋
7.閻釋放馮玉祥回陝決心謀叛
8.對部隊訓話主張經理必須公開

---

[9] 蔣檔中事略稿本之〈要目〉大多未標註標點符號。

9.萬選才由洛入鄭由鄭攻汴
10.回里掃墓
11.視察象山軍港
12.晉陝將領 15 日通電擁閻錫山爲中華民國陸海空聯軍總司令

4 月：

1.動員討逆指示各軍機要
2.贛南共匪猖獗
3.赴津浦路巡視
4.收回威海衛租界地
5.馮玉祥到鄭州指揮逆軍
6.赴平漢路南段檢閱各軍
7.西北軍進駐洛陽
8.由漢回京

5 月：

1.誓師頒佈討逆軍戰鬥序列
2.閻錫山到新鄉
3.八日由京出發往津浦線巡視 10 日到濟南
4.孫逆殿英守亳縣不退
5.逆軍進犯荷澤戰爭開始
6.進攻亳縣持久未克
7.進駐徐州督師 12 日總攻擊開始
8.逆軍石友三部進退不決之情形
9.萬逆選才守歸德
10.討桂軍克復桂平
11.蔣光鼐蔡廷鍇等師北調參加討伐閻馮
12.張桂逆軍圖湘
13.共匪擾贛
14.18 日克復歸德 21 日向柳河寧凌之線總攻閻軍潰退
15.第三軍團王金鈺等部在平漢路觀望不前以致戰局延長
16.劉茂恩反正
17.23 日進駐歸德
18.飛鄄城督令第三軍團前進

19.28 日再行總攻擊楊堌集爲攻擊目標之中心
20.平漢路佔領許昌
21.隴海路正面總攻擊無效
22.令劉茂恩挺進開封
23.逆軍全線向我反攻

6 月：

1.敵我兩軍態勢與戰術
2.逆軍犯田陳寨
3.張桂逆軍進犯株萍侵佔長沙
4.閻錫山到津浦路指揮
5.滇軍討逆
6.巡視野雞岡
7.晉逆在津浦線佔青城
8.歸德附近構築第三防線
9.整理戰線轉移陣地
10.指示各軍轉移陣地佈署
11.歸德機場被逆軍夜襲之危狀
12.平漢路第三軍團由許昌撤至漯河
13.張桂軍放棄長沙回竄湘南
14.蒞民權縣編組迂迴部隊
15.閻逆攻魯計劃
16.進駐柳河站督師
17.桂主席呂煥炎被戕
18.收復長沙
19.飛駐馬店令調第九軍
20.閻逆回晉
21.下令進攻清香集
22.濟南失陷
23.石逆進佔高堤圈柳河行營垂危
24.共匪乘機進逼南昌
25.民權縣被逆軍襲佔戰局最危
26.迂迴部隊安全撤退

27.決定戰略先擊破津浦路再解決隴海路

7 月：

1.鉅野失陷李師長雲杰陣亡
2.張桂軍潰敗爲全局之一轉機
3.閻軍進窺津浦路之兵力及部署
4.討逆軍改正戰鬥序列
5.盧旅長紹棠守曲阜馬旅長騰蛟守兗州
6.逆軍變更戰略
7.逆軍援亳州
8.晉軍猛攻曲阜兗州未逞
9.決定新戰略
10.曲兗解圍
11.隴海路吃緊
12.津浦路之布置
13.蔣夫人諍諫宋子文
14.派李韞珩赴青島增援膠濟路
15.克復亳州
16.劉汝明部進犯老河口
17.指示進攻濟南計劃
18.韓復榘發和平求去通電
19.公往兗州面授機宜
20.共匪陷長沙
21.津浦路總攻擊開始

8 月：

1.公由兗州經徐州回駐歸德
2.李韞珩師在青登陸
3.北平擴大會議成立
4.剿共開始
5.馮軍圖襲歸德
6.歸德危急
7.逆軍至勒馬集而止未直衝歸德戰事又過一危機
8.收復長沙

9.滇軍屯兵南寧
10.津浦與膠濟二路晉軍之部署
11.克復濟南後之預備計劃
12.克復濟南
13.隴海路新部署
14.再令平漢路軍向鄭洛挺進
15.膠濟路逆軍由青城北退
16.由歸德飛濟南處理軍政
17.上國民政府電陳述對逆軍處置意見
18.克復泰安
19.獲閻致汪電
20.何鍵又退出長沙
21.調劉峙指揮平漢路軍
22.指示答復石友三投誠條件
23.總攻擊前下令激勵全體將士

9月：
1.發第2號至第4號總作戰命令
2.夫人到徐州歸德慰勞
3.長沙剿共情形
4.東北通電擁護中央
5.石友三表示投誠
6.劉茂恩部佔領密縣
7.吉鴻昌輸誠讓道
8.閻錫山通電下野
9.勸告逆軍各將領并通電敘明大包圍戰略完成之態勢
10.汪兆銘潛離北平
11.隴海路戰況
12.譚延闓院長逝世
13.逆軍總崩潰之勢已成
14.電各將領指示以後戰略
15.佔領官亭後之戰局
16.三到漯河并到許田石象鎮督師遊射鹿臺古蹟

17.在前線與吉鴻昌通電話
18.佔領蘭封通許之線

10 月：

1.逆軍總退卻
2.巡閱蘭封逆軍所遺陣地工事
3.克復開封與龍門
4.進駐開封
5.到中牟督師
6.克復鄭州
7.回京
8.雙十節發表告全國民眾書
9.克復洛陽
10.受基督教洗禮
11.馮玉祥通電下野
12.回里掃墓
13.克復潼關
14.委任孫連仲爲總指揮

11 月：

1.居鄉休養
2.桂亂未平
3.贛湘共匪猖獗
4.閻錫山通電下野
5.第 3 屆第 4 次中委執監全會開會發告本黨同志書
6.就行政院長職發告行政各主管長官書
7.討桂之滇軍撤退回滇
8.陳濟棠在桂屯兵不進並反對稅制

12 月：

1.親赴贛鄂部署剿共軍事
2.四川二劉爭持地位
3.發布告全國學生整飭學風書
4.熊楊乘機失事受傷
5.遊廬山發告誡地方行政人員治匪書

6.創辦空軍

7.收復永豐縣東固之匪巢

8.通電裁撤釐金宣告關稅自主

9.發布國民會議選舉辦法

10.頒布大赦令

11.閻錫山離晉出洋晉軍殘部就編

上列〈要目〉雖無法完全呈現事略稿本內容，但仍能說明其內容大要。由於民國 19 年，蔣中正與閻錫山、馮玉祥等爆發大規模的內戰，史稱「中原大戰」；因此，該年之事略稿本內容，大多與此一戰事相關。例如 2 月 12 日蔣電何成濬云：

> 閻確已動員，我方決先取守勢，如果彼先啓釁，則我平漢、隴海兩路先會取汴、鄭與黑石關之線，爲第一期。次則由津浦、平漢兩路會取平、津，爲第二期，擬以克成(徐源泉)主豫，湘汀(王金鈺)主冀或與雪暄(陳調元)對調。第三期則規取晉、察、綏也。[10]

蓋當時南京中央正與閻錫山正進行「電報戰」，[11]蔣氏決定先採取守勢，似乎想透過政治方式和平解決，不使雙方兵戎相見。3 月 5 日又記載對閻、馮策略如下：

> 公曰：時局雖有發展，但策略難定，聯此制彼或聯彼制此，皆非正本之道。或雙方並聯，使其皆能聽命於中央，則得矣。又曰：閻謀專博舊社會之同情，聯舊派以反對中央；而馮則陽迎合新潮流之趨向，聯新派以反對中央。彼輩虛僞奸詐，信用皆已掃地，然中央對此，或用之，或制之。不可不詳審也。[12]

又如 8 月 12 日，南京中央軍克復濟南前夕，蔣曾電第 61 師師長暨濟南臨時警備司令蔣光鼐，指示收復濟南應注意：「(一)對各領事館及教堂須加保

---

[10] 孫詒編，《民國 19 年之蔣介石先生》，民國 19 年 2 月 12 日。

[11] 民國 19 年 2 月 10 日，閻錫山致蔣中正〈蒸電〉，主張禮讓爲國，約蔣氏「共息仔肩」，以弭黨爭。之後到 2 月底，南京中央與閻往復 10 餘封文電，彼此環繞黨國問題相互論辯，是爲「電報戰」。雙方往來電文可參閱國史館藏，蔣檔，革命文獻，原件，統一時期，冊(7)；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臺北：出版者不詳，1952 年，再版），輯(2)，卷(2)，頁 46-65。

[12] 孫詒編，《民國 19 年之蔣介石先生》，民國 19 年 3 月 5 日。

護。(二)官兵暫禁入商埠，凡入商埠之街口，須派最有紀律之官兵警戒；凡我官兵無兄部之許可通行證者，概不得入商埠。(三)對膠濟路方面，應派相當部隊警戒。」[13]

除了上述有關戰略、戰術外，也有許多拉攏東北軍的資料，例如 2 月 19 日即電方本仁請張學良令于學忠部入關襲取平、津。[14]3 月 11 日，蔣又電方本仁轉詢張學良，「對軍事進行，東北可補助至如何程度。」[15]《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一書中，於 6 月 4 日記「公電促張學良出兵討逆，以期縮短戰禍。」[16]在此條之前無相關記載，這樣容易讓讀者誤解蔣氏直到 6 月 4 日才電促奉張出兵；事實上，戰爭尚未正式爆發，蔣氏已曾要求張學良入關奪取平、津。《張學良進關秘錄》一書，更錯認 8 月 14 日蔣致吳鐵城〈寒電〉是蔣第一次力催奉張出兵，[17]其與事實相差甚鉅。《張學良進關秘書錄》一書，乃吳鐵城遺留有關中原大戰的部分函電資料，蒐錄之第一封電文日期爲 8 月 2 日，而吳氏早於 3 月中旬即已奉命赴瀋陽，期間相差近五個月；自 3 月至 8 月，蔣氏電請張學良出兵電文不知凡幾，該書編輯者實不應草率認爲 8 月 14 日之〈寒電〉爲蔣首次催請奉張出兵入關。

其他活動東北軍的資料，如 3 月 13 日云：

> 公論現局謂：關鍵全在東北，如張學良能切實表示擁護中共，則閻決不敢南下，石之態度亦必隨張而轉移，則馮必不敢東進也。[18]

又如 6 月 10 日電東北代表吳鐵城等云：「東北出兵經費二百萬已匯出，囑咐張學良於佔領平、津後，迅即用車輛輸送得力部隊進展石家莊，以逆歸路。」[19]9 月 8 日，電請李煜瀛與張學良磋商駐紮平津部隊餉項、河北國

---

[13] 孫詒編，《民國 19 年之蔣介石先生》，民國 19 年 8 月 12 日。

[14] 孫詒編，《民國 19 年之蔣介石先生》，民國 19 年 2 月 19 日。方本仁，時任東北政務委員兼代北平行營主任；于學忠，時任東北邊防軍第一軍軍長。

[15] 孫詒編，《民國 19 年之蔣介石先生》，民國 19 年 3 月 11 日。

[16]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臺北：未對外刊行，1978 年 10 月），卷(2)，頁 54。

[17] 劉心皇輯註，王鐵漢校訂，《張學良進關秘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0 年 6 月，初版），頁 74。

[18] 孫詒編，《民國 19 年之蔣介石先生》，民國 19 年 3 月 13 日。

[19] 孫詒編，《民國 19 年之蔣介石先生》，民國 19 年 6 月 10 日。

稅、整理奉票，及鐵路外債等問題。[20]由事略稿本暨蔣檔其他資料，可以發現李煜瀛曾於 6 月、8 月兩次代表蔣中正，北上與張學良商談東北出兵的具體條件，據此可知，李氏在東北軍入關助蔣一事中，實扮演極爲關鍵的角色。[21]

再者，事略稿本亦載有相當多有關財政經費的資料。中原大戰前夕，平津地區的英文時報刊載一幅饒富趣味的漫畫：蔣一手握機關槍，一手捧銀元；馮一手執大刀，一手捧窩窩頭；閻一手執手榴彈，一手托算盤。[22]似乎暗喻南京中央有充裕的財政支援，到底蔣是否如漫畫所示般的不虞匱乏呢？事實上，蔣經常爲經費不足問題而勞心，如事略稿本 6 月 20 日記蔣電財政部長宋子文轉上海銀行界請求協助云：

> 上海中國銀行張公權、李馥蓀兄，交通銀行盧筱泉、胡孟嘉兄，四行儲蓄會錢新之兄，中南銀行胡筆江兄轉致葉扶霄、吳蘊齋兄，四明銀行孫衡甫兄，浙江興業銀行徐寄廎兄大鑒：中正與諸兄相違已久，緬維夙昔之相助，銘刻在心。此次忍痛作戰，固出萬不得已，最後勝利，中正敢負其責。惟是餉需支出，仍賴金融各界相與維持。自政府成立，對於債信無稍損失，爲同人所公知；調劑金融以鞏固艱難創造之局，不得不期望於諸兄，用特電懇協助到底。豈惟中正之幸，國家實利賴之，尚祈賜教。特達。[23]

6 月 23 日，電請蔣宋美齡轉宋子文，希望如數照發政府所需款項。[24]6 月 26 日，再親電催宋子文撥款云：「武漢下期伙食祇發一成，而此間正面各師伙食經理處分文未發，均來行營面催。如此情形，危險萬分，務請兄於危難之中，共同維持，萬望照前數發給，以安軍心。而挽危局，無任盼切。」[25]

---

[20] 孫詒編，《民國 19 年之蔣介石先生》，民國 19 年 9 月 8 日。

[21] 陳進金，〈東北軍與中原大戰〉，未刊稿。

[22]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 年，2 刷），頁 601。

[23] 孫詒編，《民國 19 年之蔣介石先生》，民國 19 年 6 月 20 日。

[24] 〈蔣中正電請蔣夫人轉宋子文爲公計希如數照發政府所需之款不得延誤〉，民國 19 年 6 月 23 日，國史館藏，蔣檔，蔣總統籌筆，拓影本，統一時期，冊(16)，總號 3315。檔號：2010.20/4450.01-016。

[25] 孫詒編，《民國 19 年之蔣介石先生》，民國 19 年 6 月 26 日。

由於 6、7 月以來戰事危急，南京中央軍需浩繁，蔣令宋子文籌發軍費屢屢不逮，即使委請蔣宋美齡代催，亦未獲允諾。事略稿本 7 月 19 日摘錄一封蔣宋美齡給宋子文的電文云：「如果不能發，可將我房屋積蓄盡變充軍費，若軍費無著，戰事失敗。吾深知介石必殉難前方，決不敢面見顏人世，負其素志。如此，則我如不盡節同死，尚有氣節乎？故寧先變賣私產，以冀挽救於萬一也。」[26]由上述例子，除了可以看出蔣、宋間的摯情外，亦能說明南京中央的財政經費常有不敷支出的現象，且在籌募的過程中曾遭到阻礙。

四、結　語

蔣檔一向爲民國史學者所急欲利用的原始資料，具有高度的史料價值，殆無庸置疑。而其「文物圖書」一類中的事略稿本，雖非蔣氏親筆函，但由於書稿內容多采自蔣氏函電令告及日記，故極具參考價值。尤其摘抄蔣氏日記部分，往往能呈現一般函電所無法說明的內心想法，可藉以擴大研究蔣氏的廣度與深度。

事略稿本與《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二書，體例相近，惟就史料性質而言，前者爲一手史料，並曾經蔣中正親自審閱，後者則屬於二手史料。再就史料內容而言，前者豐富詳贍，後者較爲簡略且有容易令人誤解的記述。因此，隨著事略稿本的開放，研究現代史的學者需要進一步查閱蔣檔中之事略稿本。

不過，史學工作者都十分明白，無論史料價值多高，歷史研究不能依賴單一檔案，就能完成一篇史學論著。以民國 19 年中原大戰爲例，事略稿本提供一手的原始資料，舉凡作戰佈置、拉攏東北軍，與財政收支等文電均有蒐錄，但仍必須與蔣檔中的其他類檔案資料，以及國史館典藏的閻錫山檔案等交相參照，才能突破以往研究的限制，這也正是檔案價值的極致發揮。

---

[26] 孫詒編，《民國 19 年之蔣介石先生》，民國 19 年 7 月 19 日。

研究與討論

明清地域社會論的反思

—《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新書序言*

岸本美緒**著・何淑宜***譯

本書是以江南地方社會爲焦點，論述中國在 1644 年明清交替前後百餘年間社會變動的論文集。其中雖然包含我個人最近若干新完成的文章，但主要還是發表於 1986 年以來的論文彙集而成。如果我最早的論文集《清代中國の物價と經濟變動》（研文出版，1997）可算作經濟史的部門，則這本書可說是屬於社會史的範疇。雖然這顯示了十幾年間我所關心課題的變遷，但經濟史也好，社會史也罷，我基本的興趣實際上並未有太大改變。在前書中所收錄 1978 年的論文中，我曾述說著這樣的旨趣：我並不是要「將當時社會經濟上的各種變化，諸如土地累積、商品生產、農村手工業的展開等課題，直接與高度抽象化的發展階段論及經濟結構論連繫起來」討論，而是試圖檢討「對當時每個土地所有者、生產者而言，是哪些具體的經濟背景促成當時社會經濟上的各種變化，爲這些變化帶來有利的因素，從而不可避免的造成這些變化？」這是前書整體上我所關心的問題。而在本書中，我所關注的焦點，也不是把晚明社會中別具特色的各種現象，諸如陽

---

* 本文譯自岸本美緒教授《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17 世紀中國の秩序問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9 年 12 月）一書的序言，感謝岸本教授同意我將本文翻譯爲中文，並提供許多寶貴的修訂意見。翻譯期間承蒙于志嘉、林麗月兩位教授及鄭永昌學長，不辭辛勞代爲修改譯稿，謹此致謝。本譯文初稿曾登載於明清學網群之網站。

** 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教授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明學的盛行、鄉紳統治、民變等，放在發展階段論的大框架體系中討論其近代性或侷限性，而是要具體地瞭解當時人們爲何採取如此的行動？怎樣的狀況促使人們朝向這個方向運作？

然而，在前書中，我因爲是以當時日本明清史學界很少研究的物價方面切入，所以投注了大部份的心力於物價資料的蒐集，並經由對這些資料的整理來究明歷史真相。相對於此，明末清初江南地方社會的激烈變動，是戰後日本明清史研究中一直以來重要的焦點之一，陽明學、鄉紳勢力、民變等課題，均已累積了相當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書寫作的重心，與其說是個別事實的發現（當然，我希望本書多多少少能提出些有價值的發現），不如說是就明末清初江南地方社會向來已廣爲人注意的現象加以重新解釋，以解開研究史上的膠著狀態，並試圖整合性說明各種現象之全貌。特別是第一、二、三章爲研究史的再檢討，爭議性較大，又因爲與 80 年代以來在日本明清史研究中一直廣受矚目的所謂「地域社會論」有關，自發表之初即受到種種方法上的批評與討論。

以這些批評爲泉源，作者從中得到的新知，將在其後各章節中適當的展現出來，但我仍然想藉本書序文，嘗試重新回顧我個人的基本方向在研究史上具有怎樣的特色？以及這些方向究竟從何而來？碰巧，1999 年初，在東京學藝大學，我有一個向學生們講述有關「地域社會論」的機會，當時我試著以儘可能樸素直率的方法，把個人的情況也不加隱瞞的說出，以表達我相關的想法。現在進一步把當時內容作若干補充修正於下，且容我以此作爲本書序言。

日本的明清史研究中，以「地域社會論」一詞，用來表示一個方法上的觀點而被開始使用，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至於其開始的契機，誠如經常被提到的，是在 1981 年名古屋大學東洋史研究室主辦，以「地域社會的觀點——地域社會與領導階層」爲題的研討會上。我當時也參加了那一次的研討會，感覺到一種觸及核心的議題被提了出來。然而對我而言，會中與其說問題已被徹底地解決，倒不如說留下一個未來必須思考的模糊的課題。其後幾次在我所發表的論文當中，爲了回答上述課題，而使用這個研討會中深具意義的「地域社會論」一語，以描述我個人的想法。結果，卻出乎意料地被視爲「地域社會論」的「代表性論者」。然而，假如深一層

反省的話，我這樣的作法，既侷限了 1981 年研討會所具有的豐富延伸性的內涵，甚或將之扭曲，這使我稍感惶恐不安。

關於被視爲「地域社會論」的諸多研究及其內容方面，因爲已經有相當多的學者發表過文章（其中也包括對使用此一詞彙表示懷疑意見的論者），所以不打算多此一舉表達我個人的見解。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拜讀相關文獻（可能的話不僅是介紹性、評論性的文章，也包括實證性的論著），自行歸納出自己的看法。在這裡，我想以自省的心情，思索自己何以，以及如何對「地域社會論」的方法抱持著關心？試想，研究者被某種方法吸引的過程，與其說這個方法從一開始就具有「正當」確實的證據或理論，不如說是對這個人而言，首先有一種不自覺的契合感受。而我個人的情況，並不僅僅是在「地域社會論」方面，其他方面確也如此。閱讀他人的論文覺得有趣，在爬梳史料、寫作論文之際，從中自然而然地產生喜好與傾向，然而這些究竟是什麼？當初往往自己也無法瞭解，直到遭受他人的指責與批評後，才開始注意自己的偏頗，經過仔細審慎的反省與研究，才有意識地使自己的「方法」具體化。

現在的我究竟該稱爲那一範疇的學者？或許會被歸類爲抽象性「方法論」的類型，但學生時代的我，是一個對梅涅克（F. Meinecke）所著《歷史主義之成立》一書卷頭格言所說「個體非筆墨所能窮盡」深感共鳴的「個體實證派」，對抽象化的「方法論」，毋寧有抗拒或疏離之感。成爲研究者以後，才發現「方法論」並不是什麼在自身之外限制自己的框架，而是將個人思考歷程以及思考方法的基礎公諸於世的東西。即使是現在，我也不願高舉「方法論」，藉以折服對手，進而掌握學界主導權。我的興趣主要在「爲何我會這樣想？」或「基於什麼樣的不同前提，而出現與他人不同的主張？」偶而，我也會因爲和其他研究者抱有同樣的旨趣，就把它當作「最近學界動向」，隨意地將論點一般化；有時也會因爲受到其他學者強烈的批評，因而認真地強調自己方法上的合理性。我在深切反省之餘，也要說明下面所要敘述的內容，並不「因爲這是新的（正確的）方法，所以大家都應該採納」。我對「地域社會論」所關切的，與其說是基於對「地域社會論」普遍性真理的確信，不如說是真誠地呈現一直以來我個人的習慣或愛好，至於妥當與否，則有賴讀者的判斷。

「地域社會論」的不定型性

「地域社會」一詞，是具有多種含意的籠統措辭，即使在「地域社會論」出現之前，明清史學界中著眼於「地域」的多樣性研究，已經一直活躍地進行。一種方法是基於無法將廣大中國一概而論的看法，將每個地域如江南、華北、福建等面積大小雖各不相同，但在產業、文化等方面具有一定特色的地域個別加以討論。第二種方法則以爲，與其說各個地域間有不同的特色，不如將眼光放在地域作爲一個體系的統合性、自立性上，分地域加以研究。如施堅雅（G. W. Skinner）由以河川爲中心的交通運輸體系觀點出發，把中國區分爲八至九個大區域的著名的「巨區」理論（macro-region），即是其中一例。不但可以將中國區分爲數個大區域，相反的，例如「朝貢貿易體系」的理論，所構思的即是一個超越中國範圍的廣泛區域系統。上述第一、二兩種的「地域」，正與人文地理學所說的「均質區域」及「機能區域」概念相應合。至於第三類型，與地理、空間的大小無關，重點是從社會層面出發，研究當地社會。在日本戰後的中國史學界中，許多學者向來較少研究宮廷、中央政府層次的政治史，而是投注更多心力處理社會基層的生產關係、階級對立的社會經濟史，即使在英語地區研究裡，相對於靜態的與概念性的國家秩序樣貌，透過充滿紛爭的地方社會（local society）的實際情況，試圖發現動態之「歷史」的主張，從 1970 年代以來即已日益盛行。

有鑑於上述的情況，對「地域社會」的注意，顯然不能說是「新的」視角。我個人也不想特別以「新穎」作爲標榜。儘管如此，在 80 年代以來明清「地域社會」若干研究中，確實也可看出一些迥異於前的共通特色，我的重點正在於此，而這也正是我屢屢提到「地域社會論」的動機所在。

那麼，這個共通的特色究竟是什麼呢？山田賢對於統稱爲「地域社會論」的研究趨勢思潮曾有所論述，他雖自謙爲「任意的」歸納，但請容我引用於下：

①「地域社會」、「地方社會」、「在地社會」等，通過個體與個體的接觸，締結社會關係，進而不斷地互動，並構成社會關係網絡，藉由

權力、支配、秩序等，讓社會確實凝聚整合成一個整合組織。這種整合向心力（或者作爲一種對抗動機，對反整合的牽制）作用的「場」之理想狀態，是「地域社會論」的注目焦點。

②將修辭法（統辭法），乃至「文法」中共有的「場」，從預先特定的空間範圍中釋放出來，每個人依據彼此締結的關係紐帶，以共同關懷爲基礎而建立的認知體系，才是構成其本質的基礎，內部遍佈著柔軟可變的架構，而具有重新詮釋理解的空間。

從上述簡要的引文中所浮現的「社會」印象，顯然並沒有一個清楚的輪廓，也許甚至會讓人有非常模糊的感覺。然而，不正是如此不定型的情況，才將我吸引入「地域社會論」嗎？我從小就有感於社會的撲朔迷離、不可思議以及變動不居，所以只要看到類似有如清晰框架結構物體的「社會」形象，不僅無法安心，反而更加困惑。這個說法有些難以明瞭，所以我將稍稍加以說明。

假如想一想目前的「我」，究竟該怎樣去體會自己所處的社會呢？毫無疑問，我實在無法宏觀體察這整個社會。具體上我所能瞭解的，一言以蔽之，只是家庭、工作環境或交友圈等極爲微觀的人際關係。即使是我現在服務的大學，看到機構圖應該有一個清楚的概念了，實際上仍非親眼目睹。但是，卻很自然而然地感受到這所大學的「存在」，進一步被這種信賴感所支配，每天上班、授課、領薪水，不會有任何特別不適應的感覺而繼續生活下去。連自己所工作的大學都不甚明確，對於比學校更大的「社會」，那更僅止於模糊的想像了。但是很幸運地，我的生活常識和行爲方式尚不至於與其他人相悖離，即使偶而會有挫折，但至目前爲止，還沒出現不可挽回的事態（說不定不久以後會出現）。我們對社會所謂的「瞭解」究竟是什麼？難道不就是與他人共有生活常識，並把相應於這樣的行爲方式視爲自身的體驗嗎？試想，無數和我一樣只擁有相近有限知識的人們，一方面各自生活，一方面又組成具有某種程度秩序的社會，進而能夠在安定環境中不加質疑地生活。雖然令人驚嘆，但構成「社會」的內容不正就是社會中每個人的常識和實踐？

對於社會，我們首先能確實體認的事實是，在社會中生活的每個人，其知識相當有限而不完整。我們日常所目睹的、身體所接觸的，不過是我

們所相信存在的「社會」中極細微的部份。儘管如此，我們仍可依據某些事實的想像，對社會做出種種選擇。諸如參加大學考試、繳納稅金、買賣股票等。在此，我們看到的是一種常識性的行爲方式，因爲幾乎所有的人都學而時習之，大規模的社會才得以保持某種程度的秩序而延續下來。

方法上的個人主義

依我個人之見，「地域社會論」的曖昧性與不定型性，不就是因爲研究者站在處於社會中一隅的人物的角度而引發的嗎？「地域社會論」當中一個屢次被批評的特色是，不是以封建制、奴隸制等大框架結構爲前提，而是把重點放在每一個人在諸如宗族形成過程中究竟扮演怎樣的角色等極微小的事例出發。看起來好像是在處理和大局無關的細微瑣事，然而，它所關心的卻不一定僅僅止於個別的微觀情事。從許多被認爲屬於「地域社會論」的研究中可以感受到的旨趣，其實是要從這些事例中抽離出當時人的行爲型態、抉擇的依據，以及社會面向等，以整合性的概念模式來把握，甚至從普遍性的脈絡裡捕捉。關鍵不在問題的大小，而在問題的方向性。不是像神一般高高在上，以超然性觀察立場來俯瞰整個社會，而是由社會中各個角落來選擇個別的人群行動，這些行動才是瞭解社會的真正本質。從這樣的觀點出發，思考人們爲何這樣地活動時，問題的方向性勢必是從人們的行爲與動機出發，成爲一種微觀的、由下而上的研究取徑。「地域社會論」的研究經常被批評缺乏國家論的陳述，然而，「地域社會論」亦無意將國家視爲屹立於社會之外的龐大實體，而是要思考生活於地域社會的人究竟如何看待地方官吏，以及爲何認爲自己應該依從地方官等觀點，來解釋「國家權力」。

我在碩士論文中開始思考物價問題時，已從個別人物的動向來思考社會變動的方向。我姑且將這樣的傾向稱爲「方法上的個人主義」（雖然在論文中我未使用這個名詞）。這種對問題的關心方式，一方面出於對發展階段論的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對抗意識，同時也在我有關物價議題的論文之中充份表現。當時我以「方法上的個人主義」來思考的問題的方向性，是

結合了人類活動中相當合理性的解釋的。有感於「封建制」、「共同體」等詞語完全無視「當時的人爲何採取這樣的行動？」等課題，純粹只以外在觀點把當時種種現象安置於過去階段之中，我因此反其道而行，試圖表明當時農民或地主的經濟活動，是相應於當時經濟狀態下所做出的精打細算之結果。那時，我閱讀了經濟學者原洋之介採用計量經濟學方法來探討華北農村共同習慣的論文，受到相當大的衝擊，深深地認同他所指出的觀點：「單單從制度型態的表面變化來觀察所建構出的發展階段論，就理解人類活動而言是不充分的」，「對人類活動的動機做出現實而恰當的假說，藉以說明某種具體的歷史制度的建立與展開的方法，才是現代經濟史學最必要的。」稍晚，我讀到俄羅斯（蘇聯）經濟學者 A. V. Chayanov 的《小農經濟原理》一書，那已是七九年到八〇年擔任助教的時候。

「A. V. Chayanov 經常『經由從事經濟活動的人之觀點』……來理解主體性（主觀性、subjective）的經濟計算之意義，從而解明對其不可欠缺的範疇」，這樣的看法我個人認爲是完全正確的。這種想法至今並未改變，但此後當我的興趣從經濟史擴展到社會史方面時，如何說明那些很難以「合理性」稱之的人群的活動，遂成爲我一直關心的興趣所在。藉由思考有關晚明陽明學或民變的機會，我現在感覺到，每個人所謂合理的利害計算，以及超越個人私利的集體意識、倫理之間，不僅無法單純分開來討論，甚至是深深地糾纏在一起。例如我在討論陽明學時說到，當人們不覺得自我需侷限於個人肉體，而能夠在更形擴大的血緣組織、乃至於全人類層次中感知自我(這種感覺大概誰也不能說「錯」吧)，如此一來，區分「利己」與「利他」的意涵將完全消失。極言之，考慮到只有無私奉獻所支撐的堅固且絕對之結合，才能夠使其成員獲得最佳保護效果的話，那麼，人們落實此種感覺，以體驗「放棄個人私利後反而使自身得到保護的策略」，那就並非不可理解了。明末清初時期之所以深深地吸引我的注意，不外因爲這是個社會變動不安的時期，從中清楚地呈現出造成個體與群體間緊張關係的糾纏狀態。不過，我所關心的問題並不完全是新的方向，可以說包括了我向來關注的焦點，以及我個人以往旨趣的再度浮現。

不安的歷史學

當我們思考「社會角落的行爲者」構成社會秩序的過程時，將會展現出「以不安作爲媒介的聚集」，以及「經由常識的交流」兩種脈絡。這兩者並不必然相互排斥，兩者是否能涵蓋一切也不清楚。不過，「不安」與「常識」對我而言是具有重大意義的關鍵詞，首先就這兩者來加以思考。

自己生活的社會並不是一個堅固的實體，而是人們想像的產物，稍一搖撼就會轟隆轟隆地瓦解。這種不安的感覺，從我孩提時代就深烙在心中。譬如「戰爭」，我所關心的，與其說直接關切戰爭的傷害或罪惡，不如說是傾向於「爲什麼那個時代大部份的人視其爲理所當然而不加懷疑，而現代許多人卻又視爲理所當然地加以責難呢？」「現代人的想法是否正確？」我對「群眾心理」（當時覺得是非常高級的專門用語）一詞抱有相當興趣，時時想著怎樣才能不被這種心理所沖失？

剛進入大學時，恰好同時閱讀到社會心理學家佛洛姆（E. Fromm）的《逃避自由》，以及增淵龍夫的《中國古代的社會與國家》，受到莫大的啓發。佛洛姆的書討論從都市流離出來的低下中產階級層，被宛如浮萍的不安定感所支配，反而「逃離自由」轉而集結於納粹陣營當中。增淵的著作則以戰國時代爲背景，處理「任俠結合」現象之形成。二書所處理的時期與地域雖然完全不同，但都是描述當時固有秩序崩潰，人與人從相爭的不安定中，真切地嚮往群體性，但卻也反過來成爲束縛人們的動力因素。我在感動之餘也強烈感受到二者超越時空的共通性。在本書各章處理以社會流動化爲背景的明末清初社會集團形成的熱潮，與陽明學之共同性論述中，讀者應可感覺我受到這些書直接影響的痕跡。

對「社會不安時期」的明末清初之關心，是本書通篇的特色之一。因此，在書名中大膽地使用「明清交替」一詞，希望將當時隨著國家權力真空因而產生的對秩序崩解的不安定感突顯出來。在第一章中所使用的「流動化」，大概會讓人想起在英語地區的明清史研究中一直被使用的 social mobility 一語。但是相對於英語地區的社會流動論是以近代能力主義的社會模式爲基準，來計算社會階層的流動頻率，本書的「流動化」論則與明末

清初社會一貫的對秩序解體的不安，以及社會失序有關。受不安左右的人們，從中所產生的形形色色之社會現象，諸如以擁有勢力的人爲中心的隸屬性社會關係的構成、或擬血緣的結合，以及社會集團間相互激烈抗爭等等，均展現出與社會流動高度穩定的社會體系間兩極對立的樣貌。本書中所謂的「流動性」，並不是指廣大社會發展藍圖中的「近代性」問題，而是指在秩序變動時期當中，反覆呈現社會不安定感的背景。因此，這個「流動性」概念，被批評爲「任何時代都存在的，跟歷史發展無關的現象」，確是可以理解。但是，我所希望的，是在那個社會不安的時代裡，試圖從人們直接面臨的秩序問題中，找出聯結我們當今時代與當時人們的確實關懷所在。

「地域社會論」的研究取徑之所以吸引我注意，一方面由於它基本上是以「秩序稀少性」的感受做爲前提，另一方面試圖追問「秩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地域社會論」或稍早由谷川道雄教授所提出的「谷川共同體論」，經常遭致的誤解是指斥這些理論把權力或支配等問題拋開，從而塑造理想的、樂天的社會秩序理論。取代直接討論階級鬥爭、反權力鬥爭，代之以探究「領導權」等社會整合關鍵因素的「地域社會論」傾向，恐怕是會使人有這樣的印象吧！然而，依我個人來看，正是因爲作爲其前提的社會觀是像「萬人對萬人的抗爭」般嚴酷的衝突模式，才促使我們必須詰問「怎樣能讓秩序恢復呢？」

當然，階級鬥爭史觀也是一種有利的衝突模式，但對我而言此模式所以不能令人滿意之處，是深信秩序存在本身，及其必然相繼展開的階級鬥爭史觀的預設立場。做爲階級鬥爭史觀的基礎，像建築物般具體化的社會結構的印象，與其說回答了我上述的問題，不如說問題一開始時就已不被理會。我感到階級鬥爭論具有某種樂觀性，就是不考慮霍布斯（T. Hobbes）視爲人類業病的「秩序問題」。當然，我也不否認就是這樣的樂觀性，促使人類在社會改革的實踐上，朝向理想而努力。同時我也深切感到，我們不應該只針對這種有實在論傾向的社會觀橫加批評，專門暴露其虛構性，不論在現實生活方面也罷，或在社會改革實踐方面也罷，這樣實在性的社會感覺，正是支撐每個人行爲的動力，我們必須抱著尊重態度而加以正視。

日常生活意義的結構

從初中到高中，我記得我對「常識」一語非常講究。我喜好英國評論家、小說家 G. K. Chesterton 也是在這個時候，此人不但因發表以布朗神父爲主角的偵探小說而聞名，而且一如西部邁所強調，他不僅僅是個幽默作家，更是個舉足輕重的保守主義評論家。當然，當時我的理解力相當有限，但充斥在諸如《星期四之男》等小說裡的警句，顯示出 G. K. Chesterton 對「秩序稀少性」的敏銳感覺，以及對「常識」或「健全秩序」充滿睿智而語帶雙關的維護，因而也引起我的興趣。我是不是個保守主義者，我自己也不是非常清楚，但是至少有如下所述的模糊感覺——對這個社會總能恰如其份的運行感到驚訝。在理所當然的日常共同觀念中，感覺到有些值得重視的東西。同時也不喜歡那些無視於讓社會繼續推動的困難因素的盛氣凌人的批評言論。

1981 年的研討會中，森正夫基調報告的一大特色，就是強調「意識」的重要性。在日本明清社會經濟史學界，意識的問題一向在歷史唯物論的框架內以意識型態論的形式處理，但就意識型態論而言，其中似有「意識型態不外於虛僞意識」的含意，也就是說，觀念是一層面紗，真實隱藏其下，唯有揭開觀念的面紗，具體而客觀的社會結構才會呈現出來。相對於此，這裡對「意識」的關注卻不是如此，而應該說是基於以當時人所共有的社會認識，來建造社會的一種思考方式（一方面束縛我們，另一方面又支撐著我們的社會秩序，正是這樣的共同主觀的產物）。在這個研討會中，探討民眾對地方社會領導權力的認同等課題，簡單地說，有兩個對立的立場：一是當作被地方領導階層強制的虛僞意識的產物；另一則視之爲彼此共同性的實際牽絆。關於這一點，我並沒有特別深入的想法，但當時仍作了如下的發言，「是否由衷地真正認同？或是因爲被欺騙而跟從？二者都不是容易解決的問題，也無需追根究底。倒不如觀察當時人在地方社會的各種各樣的活動，以常識判斷這些是正常的，那些是怪異的，在這樣的過程中，不正是能發現一些固有社會上饒富趣味的問題嗎？」當我注意到社會學領域中已累積有大量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時，已在研討會舉行過數

年以後。

屬於現象社會學用語的「日常生活意義的結構」，比起我曾經模糊愛用的「常識」一詞，一方面更能明確的表述出常識的意義，另一方面也證明把「常識」作爲「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來處理的正當性。對於廣闊而多樣雜陳的世界的種種現象，從人們賦予其意義開始，人們即把社會做爲具有意義的實體而建構起來，甚至能互相交流。從中組成的「日常生活意義的結構」，由於是每個人賦予意義過程的產物，就此點而言，雖然是「主觀性的」，但並不因人而異，只要是有社會常識的成員，不論其立場、信念是否相同，即共同享有的「彼此主觀性（intersubjectivity）」的結構。雖然也可能用規範、秩序等詞彙來代替這種結構，但這種結構與其說是強使個人行爲趨於齊一化的框架，不如說是一種座標軸——我們將社會上相互差異且對立的人們行爲放在這個座標軸上，才能瞭解這些行爲的「意義」，就是說，以這些行爲理解爲「社會」這個全體圖像的有意義的一部份。如沒有這種座標軸的話，人們行爲的無限多樣性，不過是無法構成全體圖像的混沌而已。也因此，即使是社會上激烈的對立抗爭，也因爲被理解爲具有意義的行動，而被含攝於一定的認知世界之中。

本書的第四章、第五章處理的是震撼明末清初江南社會的若干事件，但與其探究這些事件的「事實」本身，不如分析這些事件究竟在地域社會以怎樣的消息來傳播？並且被當時人賦予怎樣的意義？注意「當時人們究竟如何觀察他們的社會？」以主觀性看法爲出發點的研究取徑，是「地域社會論」中共通的主觀性傾向，但屢屢被批評爲「無腳幽靈」般的觀念論。在此，需要解釋的有兩個方面。第一，部分主觀論者之所以採取主觀的論點，乃是因爲他們否定歷史學上客觀論證方法的可能性，認爲歷史學終究是不能對話的結果，與地域社會論的「主觀性研究取徑」完全沒有關係。「（與自然科學不同）社會科學必須處理社會現實中的人類活動及其合乎當時常識的解釋。……這樣的分析必然要提及從行爲人本身的觀點出發，來解釋行爲和其背景的主觀性論點。」（A. Schütz）對這樣的原則，我深感肯定。爲什麼呢？那是因爲和蘋果從樹上掉下來的自然現象不同，人類的行爲是經由人的主觀而活動。晚明江南社會爲什麼會爆發民變？若不透過當時人如何看待社會的動向，以及他們認爲什麼才是正當等問題，將無

法說明。有關人類行爲的範疇中，只有透過這樣「主觀性解釋」，才能獲得所謂假設與驗證（反證）的科學程序。

包括我的論文在內，被視爲「地域社會論」的若干研究中，是否在這樣的程序上十分嚴謹，當然還有討論的餘地。「地域社會論」的目標，並不像大家批評的那樣，想逃脫社會科學的檢證，而是要擺脫教條式的社會實體化或是無法證明的必然論，審視由人的活動交織而成的社會之複雜動態，以試圖建立富有柔軟性的理論模式。在這個意義上，我（在「後現代主義」極度盛行的今天）也許可以說是相當舊式的「社會科學」信仰者。

第二，前述關注人們意識的研究潮流，與以自然科學方法研究歷史上各種物質層面的趨勢，彼此絕非對立。1979 年在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舉行的「長江三角洲研討會」，是結合農業學家和中國史研究者彼此對話的劃時代會議，成爲此後中國史研究上，推動農業技術、生態、環境等自然科學性研究的關鍵。這次研討會做爲 1980 年代以來孕育明清史研究新潮流的契機，經常與 1981 年名古屋大學的「地域社會論」研討會相提並論，但評論者往往將二者視爲相對立的觀點，甚至有人批評「地域社會論」重視意識問題而忽略了歷史物質層面的失當。但就我個人的看法，社會科學重視主觀的觀點，正是要修正魯莽地採用自然科學方法研究社會現象所產生的偏差，不但未曾輕視農業技術、生態、環境等問題的重要性，也不是要對這些問題質疑其採用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倒不如說，1980 年代以來的兩個新潮流，正是在批判過去模倣自然科學而進行的社會經濟史學研究的同時，所產生的雙胞胎嗎？

那麼，當依據每個人的主觀認知而試圖描述其形成的社會秩序之際，隱隱約約縈繞在我心中的，就是方法上的難題。這樣的說明方式果真能充分地說明人們主觀的根據（爲什麼人們會這樣地思考）嗎？例如，思考鄉紳爲什麼會被認爲是擁有勢力者時，大概所能舉出的根據是擁有廣大田地或具有仕宦經驗吧！但接下來需要說明的是，爲什麼鄉紳能快速地累積土地？爲什麼官僚經驗能成爲威信的來源？如果不把鄉紳、官僚勢力或國家權力等加以預設立場，這樣的解釋可行嗎？假如採用這種方法來解釋的話，不是走進死路，就是陷入循環論證，永遠不能脫困。

在我書寫構成本書第二章的原始論文時，我曾寫如下，「人們在選擇

鄉紳做爲保護者時，其標準並不在鄉紳與土地所有或國家權力間的關連性，而是鄉紳在地方社會中實際的保護能力。而許多人集結於鄉紳之下，也成爲其保護能力的根源。這很明顯是一種循環論證。」當時我感覺到如上說明不成爲說明，但因陷入困境，不得已斷念進一步的探求，同時也有一點賭氣的心情，覺得惟有以這種循環論證才能說明鄉紳勢力的根源。其後，我發現在社會學的領域中，有關「自我組織性」、「再歸性」、「自我定位」等問題的討論，與我不成熟的疑問互有關聯，對此，我雖然感到來得太遲，但所幸還是發現了。也就是說，「成員基於對體系的自我認識而自行組織」所建構的社會，必然包含「自己以自己做爲根據」的循環性邏輯。這樣的「發現」雖然並不能解決數十年以來，我對社會懷抱的不可思議的感受，但至少顯示這不是我個人的異常感受，所謂社會，也許本來正是依據循環論證的機制而確立的。

以上就有關「地域社會論」方法的若干層面，參雜我個人的情況，提出個人的意見。一直以來，我關心的是社會的脆弱、危險、暴動之際的激烈，以及不可思議的微妙之處。換言之，使我驚訝的是這麼多不完美的人聚集起來，爲什麼社會還能適當地運作呢？因此，我在觀察明清時代的社會時，也不從高遠的角度著眼，而是站在跟我同樣對社會全體抱著模糊感覺的人們一樣的立場，嘗試考察人們怎樣摸索著建構出他們的社會。然後，試著站在同樣的立足點上和他們對話。雖然，被歸屬於「地域社會論」之流的研究者，並不一定都抱持同樣的感覺來做研究，但皆對「社會」的實在性或發展必然性感到懷疑與不安，或許是一種時代思潮吧！

以上所述，假如由現今最新的社會科學理論來看，似乎的確是幼稚而簡單的想法。但我認爲這樣就好。做爲一個歷史研究者，首先能完全放開自我的感受，直接面對研究對象，這是最先決的條件，而由此所獲得的知識，如果能給我某種感動的話，那再好不過。對於這個方法，我只能老實地表明內心的想法，至於其妥當與否，就交給各位讀者判斷了。

新書評介

The Opium Empire: Japanese Imperialism and Drug Trafficking in Asia, 1895-1945. By John M. Jennings,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1997. 161 頁。

謝美娥・陳惠珠*

一、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IMTFE）1946 年 5 月至 1947 年 11 月日本 A 級戰犯的審判中，將日本的煙毒販運活動與對中國的侵略行爲關聯起來，拍板定罪。[1]對此，本書作者提到，IMTFE 的詮釋根據的是 1930 年代的在華紀錄，只能部份呈現日本與煙毒貿易的關聯，對於日本面對鴉片麻藥的動機和目的的瞭解，仍留有空白。因此他以日本外務省檔案和相關的官方出版品爲基礎，提供 IMTFE 所缺乏的歷史脈絡，作爲本書的研究目的。同時，他也強調，在探討日本與鴉片麻藥的關聯時，不可把日本牽涉煙毒程度的逐漸增加，簡化地視爲毒化亞洲人民使其順從的武器，而要把此事理解爲日本帝國主義有其先後曲折發展的歷程。在本書中，他就是以這樣的觀照爲前提，企圖把日本牽涉煙毒程度逐漸增加的「故事」，闡述得更清楚些，並刻意避開類似 IMTFE 式的道德批判或政治審判立場，把鴉片麻藥視爲日

* 本文承蒙林滿紅老師悉心指導，鍾淑敏老師提示相關背景知識和改正本稿行文敘述的錯誤，以及匿名審查人寶貴的修改意見，非常感謝。謝美娥、陳惠珠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及碩士班研究生。

1 李恩涵，〈九一八事變前後日本對東北（僞滿洲國）的毒化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5（1996 年 6 月），頁 272-273。

本帝國主義的一個隱喻（metaphor），以展開其文本。

二、內容摘要

本書除緒論與結語之外，共分六章，章節安排大致按時間順序，從日本幕末時期對鴉片貿易的反應談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失去其在東亞的優勢爲止，把日本牽涉鴉片毒品的時空範圍串連起來：

第一章 日本對鴉片控制的源起

第二章 日本殖民地的鴉片與麻醉藥控制

第三章 日本在中國的毒品販運

第四章 日本與國際毒品控制（1909-1931）

第五章 滿洲國的鴉片專賣（1932-1938）

第六章 鴉片與東亞新秩序

根據作者按時間鋪陳的這六個章節內容，我們可以歸納爲以下四個敘述脈絡來看：（一）在第一、二、五章中，作者對日本在其本國、殖民地、滿洲國、中國及東南亞佔領區實施的鴉片控制制度，鉅細靡遺地描述，說明日本從初期因地制宜的個別化掌控，到後來大東亞供需圈的形構，乃是一個相當複雜曲折的變化歷程；（二）第三章主要是談日本麻藥製造業的興起、官商關係及其煙毒販運網絡；（三）在第四章中，作者圍繞著日本與國際禁煙組織的對話，帶入鴉片控制意識漸行升高的國際關係；（四）鴉片控制力的弱化與東亞新秩序的崩潰，爲第六章的主要內容。其中，作者費了相當多的篇幅善盡第一個敘述脈絡，以便詳實呈現日本在各勢力區鴉片政策的差異性。

（一）日本在殖民地、佔領區、滿洲國的鴉片政策

作者提到，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和日本都歷經歷史性劇變，在面臨煙毒傳布的考驗上形成明顯的對照。亦即，同樣在西方勢力侵入的情勢下，中國因鴉煙泛濫導致鴉片戰爭，繼而走向衰弱；日本雖經鎖國結束和明治維新，卻能一貫地對內嚴格禁止鴉煙，終在東亞興起。對於日本本國如何控制鴉片，作者追溯至德川幕末被促開港爲嚆矢。在日本第一次頒布嚴禁

鴉片販賣和管制藥用鴉片的法律（1870 年）之前，鴉片的藥用特性已普爲民間所知，大阪及其附近地區是日本傳統麻藥製造業的中心和栽植罌粟最盛之處。鴉片生產商業化，沒有納入政府規範。但是中國鴉片戰爭失敗給予德川幕府極大的警訊，日本懼怕英國帝國主義將伴隨鴉片貿易而滲透日本，加上黑船事件的刺激，在美國駐日領事 Townsend Harris 宣稱與美國締約貿易可進一步對鴉片進口嚴格設限，且美國不會對日發展鴉片貿易的有利條件勸誘下，日本遂於 1858 年與美國簽訂商約。之後，以日美條約爲藍本，日本與荷、俄、英、法的通商條約也都明文列入嚴禁鴉片條款，對於鴉片可能隨開港而侵入的憂患意識，化爲積極的預防性通商措施。

至明治政府，嚴禁鴉片的統治方針仍然延續下來。其具體行動是透過三次立法來完成，政府施策由 1870 年的重法懲處管制，逐漸發展爲 1879 和 1897 年規定產銷悉由政府壟斷的鴉片專賣制度。1870 年制定的販賣鴉片律和生鴉片處理規則，主要是對營利行爲、吸食鴉片課以重典，以及實施藥用鴉片的控管。[2] 1879 年爲因應前述法令的缺失（國內所產嗎啡成分不定，市場力量將使需求轉向進口供給），頒布藥用鴉片買賣及製造規則，建立政府專賣，終止鴉片自由買賣。[3] 1897 年爲擴張基本供應，又立鴉片法，取代 1879 年法令，加強專賣操控，也開始接受低嗎啡成分的鴉片收購和降低徵收價，刺激國內鴉片生產。自 1858 年通商條約包含禁鴉片條款以來，日本正視了如何處理鴉片貿易的問題，也似乎有了若干成果，但作者卻又藉 Hartley 鴉片走私案（1877-78），隱喻日本施行鴉片禁令的努力並未完全成功。

1895 年日本取得臺灣，雖是其國力在東亞上升的一個象徵性指標，但

---

[2] 販賣鴉片律規定：販賣鴉片營利，處斬刑。慫恿他人吸食，處絞刑。鴉片吸食者、提供場地，或販賣鴉片營利者，處徒(監)刑。政府官員違反規定，或串通他人者，亦同。生鴉片處理規則是命令地方政府檢查、記錄藥劑師擁有鴉片的質與量，且規定進口藥用鴉片只限於經地方政府許可的某些人士。

[3] 鴉片生產方面，鴉農所穫全由政府收購，政府依其嗎啡含量支付價款，但嗎啡含量低於 6%者則需廢田，不予補償。藥用鴉片的買賣方面，醫生及製藥者皆需向地方當局申請購買，每次申請量限制爲 150 克以下，用藥皆需向主管當局詳實呈報，違者易科罰金 150-500 圓不等。

也不得不積極面對臺灣的鴉片吸食泛濫及鴉片貿易興盛的情形。領臺之初，日本本國對臺灣的鴉片政策曾有嚴禁與弛禁之爭，但鑑於臺人武力反抗尚烈，深知實行嚴禁不易，及至後藤新平的影響，決定採取漸禁路線，其具體方式爲 1897 年頒布臺灣鴉片令，採行有照吸食登記制。[4] 另外，特許日公司三井及英國公司 Samuel 進口生鴉片，總督府自設製藥所生產煙膏供應島內需求。1901 年專賣局成立後，鴉片的控制責由警察與專賣局二個系統擔任：前者負責煙癮者登記、批發與零售商的執照發行和存量監督；後者負責生鴉片進口、生產及運輸。鴉片專賣除了有政治的效益——以販賣特許權獎勵與政府合作者——之外，對總督府尋求臺灣財政獨立的最初幾年，意義尤其重要，此時鴉片收益佔全年收入比例平均在 20%以上。專賣局控制後，臺灣鴉片的質、量均呈穩定成長，1918 年鴉片收入達於顛峰。

1910 年日本殖民朝鮮，對於鴉片也與臺灣採同一模式，自 1919 年起納入政府專賣。朝鮮的鴉片產量自 1930 年起大爲增加，除了供應專賣局之外，更重要的是打開對關東州和中國東北的出口市場。朝鮮與關東州的交易協定是：關東以其沒收充公的嗎啡給朝鮮，朝鮮則混以波斯、土耳其高級鴉片製成煙膏輸入關東。出口至中國東北的鴉片，則是因爲滿洲國成立後鴉片生產不能自足所致。另外朝鮮也與臺灣訂有鴉片製造協定：朝鮮供給臺灣生鴉片，臺灣以未提煉的嗎啡（粗製嗎啡）供應朝鮮，使朝鮮能大量生產並提升高質嗎啡、海洛因等毒品。1935-45 年間朝鮮生產的鴉片和麻藥毒品，90%是爲了出口，出口地則是關東州、滿洲國。

至於關東州，日本的鴉片控制原先是實行所謂的「特許制」（Farm System），即商人繳納一定稅金以獲得政府給予鴉片的進口、製造和販售權利。不過特許制並不能杜絕吸食鴉片，反而助長鴉片生產販售，加上受到 1924-1925 年日內瓦鴉片會議影響，當局乃以臺灣模式的專賣制度取代關東的特許制度。

在東北地區，滿洲國建立（1932）以前，已普遍種植鴉片，重要性僅次於高粱、大豆。1920 年代張作霖壟斷鴉片經營籌辦軍費，鴉片貿易蒸蒸

[4] 此令規定領有執照者才能購買及吸食鴉片，而申請執照前，必須經政府核准的醫生檢查確認爲煙癮者。

日上。截至瀋陽事變之時，鴉片麻藥早已普及東三省，許多人賴此業爲生。1933 年滿洲國的鴉片法生效，混合臺灣和朝鮮的鴉片法令，實行鴉片專賣。不過，由於對本地植鴉農地不能有效掌握，生鴉片供給仰賴朝鮮、波斯進口，大量的走私鴉片亦流通於市。此外，專賣制也有其缺失，例如鴉片販賣執照的申請未經警察體系完整調查即行賣照，未納入鴉片法管制的嗎啡、海洛因等麻藥更如常公開販賣。至 1937 年，鴉片專賣稍有進展，收入隨著官方能掌握的吸食鴉片人數增多而跟著增加。但是進入太平洋戰爭時期，由於必需動員各種資源，罌粟田有必要轉爲糧田，而且官方也察覺到，儘管短期間鴉片專賣利潤豐厚，對國家而言長期的成本所耗則更多。亦即每年雖有 3000 萬元鴉片利潤，可是吸食鴉片、藥物泛濫需耗去 1 億 8000 萬元，再加上勞動生產力的損失和警力負擔額外需再耗去 1 億 5000 萬成本。在這個背景下，麻藥法和十年的禁止鴉片計畫因而產生。然而，即使是十年，亦難以解決長久以來的沈苛重症。

在華北，日本軍部 1915 年即以特許制售賣專賣權給中國商人，並從鴉片銷售中分得 70%利潤。之後，北京「臨時政府」也由日本軍部指導之下，掌握了部分鴉片貿易的收益。然因中日戰局阻斷運銷通路，使鴉價升漲，走私猖獗。同時混亂的局勢也助長了麻藥的流通，日人和韓人毒品商販跟著日軍之後進入華北，與日軍發展成共生關係。在華中，原仰賴雲貴土藥的供給因戰爭而阻絕，大多數的鴉片煙商逃亡。日本軍部接控華中市場，在其主導下輸入伊朗鴉片分配給本地市場，部分收益作爲建立南京維新政府的經費。之後，也在 1938 年實行鴉片專賣，並由大陸浪人里見甫組織宏濟善堂（Hung-chi Benevolent Association）在日軍指示下負責銷售鴉片。

1938 年日本強硬派獲勢，成立興亞院，統一監督日政府在華的政治、經濟、文化行政，並擬定中國佔領區的鴉片政策。[5] 內蒙在興亞院的策劃下，成爲日本在華佔領區鴉片自足供給目標的最大生產地。然而，作者認爲，儘管有此統籌體系，日方所能掌控的只是鴉片麻藥貿易的一小部分。例如：1941 年華北的鴉片生產估計有 54 萬公斤，但進入政府手中的量只有

[5] 興亞院認爲傀儡政權需在日本指導下，儘速成立鴉片運作體系、登記吸鴉者，謀求本地鴉片生產達到供給自足程度。

4%，其餘悉數爲京津私梟買去或流入華中高價售出。而且華北土藥業公會商人多忽略官方提供的鴉片，傾向中介私運鴉片，未按照日方的規劃行事。再如華中的宏濟善堂，其在上海的活動因有法租界商人的競爭以及反對南京維新政府的勢力，也未能掌控全部的華中鴉片貿易市場。至於蒙疆政權的鴉片生產是否如興亞院的預期，達到中國佔領區內自足供給的目標，也需再觀察。

至於東南亞佔領區，日本曾計劃實施集權化的鴉片專賣，由內蒙、滿洲國供給生鴉片，在巴達維亞和新加坡生產供應該區鴉片，以取代戰前依賴印度和伊朗進口鴉片的貿易關係。但因戰爭期間船運缺乏以及準備不足，計劃構想如紙上談兵。

（二）日本麻藥製造業的興起、官商關係及其煙毒販運網絡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原本由土耳其進口的麻藥缺貨，加上通貨膨脹及歐美勢力暫從亞洲抽離，使日本放棄嚴格的監控政策，且積極組織製造、銷售網絡。此鴉片網絡是由商人、政府官員，甚至是兩者正式或非正式合作構成。當時配合政策受到當局重視的商人，有鴉片之王二反長音藏與麻藥之王星一。後者不但因麻藥販售致富，更進一步勸陳政府將網路延伸到中國。另外，在政府方面，如後藤新平在 1916 年內務大臣任內，推行鴉片增產政策，修正 1897 年頒佈不准個人、公司以任何名義購買鴉片的規定，改爲可購買一定數量的鴉片。於是，日本麻藥製造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茁壯，填補歐洲各國原先佔有的國際市場。日本的麻藥生產量，至 1918 年不但已敷日本本國所需，且有大量剩餘，在市場驅力下以中國市場爲其出路。

至於鴉片貿易的官商關係，例如在臺灣發生的星一醜聞案透露，星一曾有賄賂專賣局長賀來佐賀太郎以擴張麻藥事業的嫌疑，並且星製藥進口粗製嗎啡到臺灣之後的運銷紀錄消失，卻可在南至福建乃至中國北境都看到其所製嗎啡流通。1921 年的古賀非法販賣鴉片的事件中，大連市政府日本官員中野有光、拓殖局長古賀廉造、宏濟善堂戒煙部小畠貞次郎，被控侵佔政府專賣的鴉片販賣到市場。1926 年，在朝鮮的日本大正製藥，從朝鮮走私嗎啡到大連案也被揭發。這些浮出法律檯面上的案子，幾乎顯示鴉

片麻藥的貿易存在官商掛勾、走私到中國的事實。尤其，星一在麻藥販運方面的發跡和沒落，與日本本國派閥興替有關。星一因政友會而起，由於憲政會抬頭打擊政友會而落。此外，日本麻藥製造、銷售網的形成，除了積極發展國內鴉片工業向中國銷售外，主要透過殖民地、佔領區、滿洲國彼此相互支援形成。如將關東州、臺灣的嗎啡運至朝鮮，製成鴉片再輸往關東、滿洲國、山東等地，並透過中東鐵路、膠濟鐵路走私獲利。

（三）日本與國際禁煙組織的對話

就 1909-1931 年間日本與國際藥物控制運動的互動方面，作者敘述日本如何在歷次國際鴉片會議中折衝樽俎，以保其裡子（放縱煙毒走私、鼓勵煙毒貿易）與面子（支持國際抑制煙毒的理念）。自 1909 年世界主要強國在上海召開首次鴉片會議開始，包括國際聯盟的「鴉片諮詢委員會」（the Opium Advisory Committee, OAC, 1921 年成立）每年的年會在內，一連串的國際鴉片會議陸續舉行，鴉片和麻藥控制成爲國際討論的議題。日本也是諸次會議的與會國，面對日本人在中國從事非法麻藥貿易的角色日益增顯，在會議中日本一方面表態有意願對鴉片販運採取對策，另方面又要有效回應國際社會的批評。但是 1920 年代日本抵制鴉片販運的承諾終歸烏有，使國際對之失去信心。

國際藥物控制運動肇始於 1906 年美國傳教士以道德訴求發起控制世界鴉片及麻藥流通，之後有美國召開的 1909 年上海萬國禁煙大會。各國咸認應展開有關鴉片控制的外交接觸，並協助中國解決鴉片煙害問題。最初日本是以英日友好同盟爲前提，不與英發生利益衝突，同時藉機宣揚日本在臺灣實行鴉片漸禁政策的進步成效。而對於美方代表指證日本日益增加再出口嗎啡至中國的情形，日本只允諾調查了事。1911-12 年海牙鴉片會議中，英美之間的立場差異和爭執日益顯著。[6] 日本表面上仍本於英日同盟立場來反應，但實際上未依順英方的構想，也因鴉片麻藥方面的差異，使英日兩國關係漸行漸遠。另外，在中國的《北華日報》揭露英國大量出口

[6] 會中，美方亟思嚴格控制鴉麻藥物，英方則批評其領導權，因而美方懷疑英方之所以不願改革，是與其印度鴉片貿易利益有關。

到日本的麻藥當中有極大部分非法貿易進入中國，英方在反毒者的壓力下採取行動：若日本不能證明其從英印進口的鴉片麻藥只在日本消費的話，英將保留出口權。爲挽回聲譽，東京的努力是在 1920 年令關東州、青島執行廢除鴉片專賣，但只有青島在 1922 年廢除專賣，日本的拖延態度頗受國際反鴉片協會（the International Anti-Opium Association）的強力批評。鴉片諮詢委員會的焦點也轉向日本在華的鴉片麻藥販運，指稱臺灣進口原料鴉片增加，而官方卻宣稱已登記的抽鴉片煙人數下降，認爲在臺灣製造的嗎啡實已散布至全中國。

1924-25 年日內瓦鴉片會議召開，與會國簽約成立國際鴉片麻藥監督機構「常務中心部」（the Permanent Central Board），並設計一套要求各國政府提供麻藥進出口證明的制度。會中對於禁鴉片的最終期限，英美立場殊異，二國的爭議再度呈現，而英日關係也因英方執行日本需證明進口原料鴉片乃爲本地消費之事而有齟齬。爲增進外國對日本的信心，1926 年日本成立鴉片委員會企圖改革。卻因政府沒有授予決策權，權限仍在殖民地政府和各部會，無法控管鴉片販運，也無法提供改善訊息面對國際批評。

1931 年麻藥會議再開，會中簽署了限制麻藥生產及管制分配的協定。由於日本未列入麻藥出口國，以其利益受威脅而以違反自由貿易原則提出抗議，倡議修改限額規定，這項構想受與會國接受而納入議事之中。

（四）鴉片控制力的弱化與日本東亞新秩序的崩潰

作者在這個敘述脈絡中，從官方的掩護、麻藥製造業在法令邊緣的游走、國家不敵市場力量等各方面切入，在在顯示作者對日本與鴉煙麻藥的密切關係，投以同情的瞭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際鴉片價格躍升，日本政府鼓勵其麻藥製造業發展。1918 年日本麻藥製造業生產的麻藥已超過其國內需求量，有相當的剩餘。麻藥製造業者利用官方加強麻藥控制的曖昧情勢，透過日本佔領區，以中國爲其剩餘麻藥的輸出市場。1920 年代日本政府無視於像星一、大正等大製藥廠從事的隱晦活動，雖知日本公民亦牽涉販運麻藥至中國，官方仍未抑制國內麻藥生產。至 1930 年代，日本已是世界麻藥生產最多的國家之一，其 1935 年的製藥量，嗎啡佔世界供給量的 10%，海洛因則佔世界全部產量的 37%。但至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對鴉片相關藥品的總需求迅增爲三倍，軍需量佔國內消費量的 60%。

及至歐戰期間，日本的生鴉片來源受阻，需求感更爲加深。然而中國佔領區、滿洲國、朝鮮等地皆無法供應，內蒙鴉片則因輸入成本過高，亦難供給國內需求。最後轉向指望本國的大阪府增加生產，但也只能供給 50%的需要量。因此作者評斷：若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將陷入相當嚴重的鴉片短缺的苦境之中。

作者強調，鴉片所在之處象徵日本締造的東亞新秩序的擴展，鴉片與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如影隨形。但日本也因對「看不見的力量」難以掌握，進而失去延續此一新體系的機會。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迅速佔領東南亞諸多島嶼，卻失於瞭解這個「東亞新秩序」。從國家與市場的角力來看，作者認爲日本實際上無法掌控中國及東南亞的鴉片麻藥。日本佔領區及殖民地官僚，皆不能有效避免當地生產的鴉片脫離官方掌控轉爲地下經濟。從這些地區的官方專賣成效來看，不僅東京無法掌握在華關東軍的行事，而在華的軍部及其扶持的中國政權又難以控制鴉片貿易（走私）。所謂政府專賣，僅僅說明日本只掌控到全部流通鴉片的一小部分而已。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都還艱於確保國內製藥原料的供應。

三、幾點評論

本書寫作上最大的特色是以時間敘述爲綱，以日本在各勢力區多樣化的鴉片政策爲主的整體性故事爲緯。如同作者聲稱的，其研究目的是要提供一個完整的歷史脈絡。就這點而言，本書的目的似乎已經達到。其次，作者認爲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並不是一開始就架構成形，而是歷經許多曲曲折折的變化才建構起來。這是作者何以不憚其煩地描述殖民地、日本佔領區、滿洲國等地的鴉片政策的多樣面相、如何設立鴉片控制的主要緣故。作者相信日本與販運鴉片麻藥的牽扯也是如此，在建構其鴉片政策的歷程當中，也充滿了複雜性和矛盾性。再者，作者以朝鮮、滿洲國、華北等地的鴉片專賣制度所出現的各種弊端，以及走私貿易的興盛，說明國家力量透過專賣所能控制的鴉片，只佔市場流通量的極小份額。這種看法也與向來把專賣看成是日本政府掌控了絕大部份鴉片產銷的觀點，有所不同。此

外，作者特別提出另一詮釋視野來看待日本與鴉片的關係——把鴉片麻藥視爲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個隱喻，而不是單純地當作日本毒化東亞人民的武器。這點應是作者與江口圭一、倉橋正直、朴橿、李恩涵等人的主流看法最大的分別，也是本書在思考策略上最有創意之處。[7]

不過，本書也充滿了值得讀者回應之處。首先，在問題意識方面，雖然作者明言，本書是因爲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結論未充分呈現歷史的整體，希冀補充更爲完整的歷史事實。但是書中鋪陳了故事情節之後，作者究竟要以這些鉅細靡遺的陳述解決什麼樣的問題？作者似乎覺得文本的呈現已經足夠，進一步的問題分析卻留給讀者。例如，從作者的陳述中，我們看到日本殖民臺灣之初商議鴉片政策時，確實含有解決鴉片吸食泛濫的意圖（19-26 頁）；我們也看到，作者不斷敘述 1930 年代至二次大戰結束前，日本官僚在華的鴉片政策有所窒礙和轉折的一面，諸如：東京與日本在華各勢力區領導者之間的行政命令存在落差、專賣運作不盡理想、不能掌控大部份的鴉片市場、以及大戰爆發後亟思轉罌粟爲糧食生產的決策等等（66-67、86-88、95、98-99 頁）。作者似乎要暗示讀者：日本的殖民、對華軍事佔領和面對國際關係時，有其不能掌握的變數發酵，因此日本的鴉片政策並不是那麼一貫，掌控力也不那麼徹底。雖然日本在殖民地、佔領區、滿洲國實行的鴉片政策，隨著時間的遞移，也都有所變化（增強專賣或轉爲實質禁煙）。然而，如果鴉片政策的變化隱喻著日本帝國主義的變化的話，這些變化能真正代表日本帝國主義在先後時序發展中性質上的

---

[7] 主流看法與 IMTFE 說法一致或相近，認爲日本帝國製造煙毒麻藥違法走私輸入中國或亞洲其他地區，做爲其侵略工具，而這項行爲又是由日本帝國內外的官、商、民共同分工完成，是爲「國家犯罪」。李恩涵，〈九一八事變前後日本對東北（僞滿洲國）的毒化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5（1996 年 6 月），頁 269-312；同李著，〈日本在華北的販毒活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7（1997 年 6 月），頁 45-91；同李著，〈日本在華中的販毒活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9（1998 年 6 月），頁 183-222。朴橿著，游娟鍠譯，《中日戰爭與鴉片（1937-1945——以內蒙古地區爲中心）》（臺北縣：國史館，1998 年）。倉橋正直，《日本の阿片戰略——隱された國家犯罪》（東京：共榮書房，1996 年），頁 33-34、262。江口圭一的意見，參考李恩涵和倉橋正直的著作。

差異嗎？由於作者並不明言日本帝國主義在先後時序究竟如何發展，因此在隱喻其指涉的兩個概念（鴉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仍留有極大的想像空間。

相關的問題是，作者聲言在瞭解日本面對鴉片麻藥的動機和目的上仍留有空白，但是即使按照作者的詮釋，把鴉片麻藥當作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個隱喻，對於日本與鴉片麻藥牽扯日深的議題，作者仍然未加分析日本是在何種的動機和目的下使然，亦即鴉片麻藥如何隱喻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儘管不提日本以煙毒毒化東亞人民云云，作者所謂的隱喻，其真實含意與倉橋正直所說的「國家犯罪」一說似乎又有相當的差異，但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原本就含有國家主導的意味在內，我們並未看到作者在這方面加以細究，殊爲可惜。在日本興起成爲亞洲新強國（尤指日本經歷甲午和日俄戰爭後的國力）之前，鴉片在日本以外的東亞地區早已泛濫成習，鴉片貿易所及之處卻又與中國的衰落相關聯。與其說鴉片的流通只隱喻日本帝國主義，毋寧說它是牽涉東亞諸地區關係結構的變動來得恰當。

關於以鴉片爲隱喻（metaphor）來發展歷史議題的學者，這裏想提一提 Carl A. Trocki，與作者的觀點相互參照。Trocki 在 1990 年曾出版一本專書，論證十九世紀英帝國的鴉片貿易與新加坡華人秘密組織的結盟關係。[8] 1999 年又出版 *Opium, 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A Study of the Asian Opium Trade, 1750-1950*，更完整地討論鴉片麻藥貿易對歐洲人——尤指英帝國在亞洲的發展——的興衰，論述鴉片麻藥的商業化、專賣、形成財富集中資本累積，進而成爲全球資本主義及現代民族國家的基礎。Trocki 在該書序論中提到，他引入由 Joseph Conrad 首先提出來的「鴉片帝國」這個隱喻（metaphor），從鴉片和其他傳統麻醉藥物的早期歷史談起，發展了「商業化麻藥貿易」這個理論規範（the Paradigm of Commercialized Drugs Trades），並把這個理論規範概念與歐洲殖民主義在亞洲、美洲、中國的發展繫在一起。亦即，Trocki 要處理的是鴉片麻藥貿易、歐洲殖民主義、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以及現代國家的建立等項之間的關

[8] Carl A. Trocki, Opium and Empire: Chinese Society in Colonial Singapore, 1800-1910,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聯。[9]

此外，關於空間的整體性問題，作者所敘述的空間範圍包括了臺灣、朝鮮、東北、內蒙、華北、華中和東南亞，卻獨缺華南的部份。據鍾淑敏所云，一般涉及日本與鴉片關係的研究著作，基本上也都是以關東軍或在中國的日本陸軍機關主導鴉片貿易的地方爲空間範圍，鮮少涉及日本在華南的鴉片政策。事實上，在華南，鴉片流通末端——鴉片吸食所的從業者中有不少的臺灣籍民。臺灣總督府對這些臺灣籍民的管理，例如在籍民人數最多的廈門，可說是放任及視爲「棄民」的立場，甚至日本駐華南領事也認爲如此政策對日本海外發展有利。也就是說，總督府和日本領事方面並未實質地取締鴉片犯罪，反而消極地坐視籍民與鴉片業產生密切關係，形同將臺灣籍民視爲惡勢力擴張的爪牙。[10]對於華南的忽略，本書也不例外。華南的份量雖不及日本勢力所及的其他地區，但在作者自詡的完整的歷史脈絡中，也不應忽略。

根據朴橿的研究，在中日戰爭之前，日本在華實施鴉片政策主要是以鴉片收益確保殖民地財政和籌集戰爭經費爲考量，然在中日戰爭期間的鴉片政策則有不同的變化。蒙疆政權仍然爲了財源不足而持續鴉片增產政策，南京汪政權和滿洲國的鴉片政策則都轉向實質的禁煙性質。朴橿認爲，這與日本爲了誘導汪政權在太平洋戰爭中給予協力，以及對滿洲國人力資源需求的考量有關。[11]本書作者對滿洲國後來實施的禁煙計畫雖有所描述，但對華中鴉片專賣在中日戰爭期間的性質轉變則無提及，朴橿的研究可以補充。

另外，作者在鋪陳日本與國際禁煙組織的互動對話中，一方面點出了

---

9 Carl A. Trocki, *Opium, 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A Study of the Asian Opium Trade, 1750-1950*（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Introduction".

10 鍾淑敏，〈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與鴉片問題〉，發表於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舉辦的「臺灣文獻史料整理研究學術研討會」，2000 年 6 月 7-9 日，頁 2、20-23。

11 朴橿，〈中日戰爭時期日本占領區的鴉片政策〉，收於張玉法編，《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縣：國史館，1998 年），冊下，頁 953-974；又，朴著，《中日戰爭與鴉片（1937-1945——以內蒙古地區爲中心）》，頁 80。

日本極力平衡掩飾日本臣民惡勢力的事實和保有國家的國際聲譽這二個矛盾，另方面也把日本與歐美各國的國際關係的變化帶入。但是本書比較缺乏的是，日中在國際鴉片會議中的角力關係。關於這個部份，作者是否太過於注意要避開日本對中國毒化說的困局，因而忽略之？據張力的研究顯示，雖然國際聯盟的國際鴉片會議是日中二國交鋒的戰場之一，但是 1937 年之前，中國對日本仍有所顧忌。1937 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中國在歷次國際鴉片會議中，確實有意宣揚日本的侵略與其佔領區內的煙毒活動環環相扣的言論。[12]

最後，作者在第六章將日本東亞新秩序的崩潰，歸結到鴉片政策的成效和掌控方面，他認爲關鍵在於日本無法完全控制鴉片的流通。也就是說，作者認爲日本鴉片控制的有效性程度和東亞新秩序是否能持續有關係。與作者近似的說法，可上溯至任職臺灣總督府專賣局和臺灣製鹽專務董事的出澤鬼久太。他在日軍佔領東南亞時向軍方提出鴉片政策論，倡言「大東亞共榮圈確立的關鍵在於阿片政策如何，大東亞民族覺醒的良藥亦實在於阿片政策之適否」。[13]作者也以華北爲例，說明專賣機制所能掌控的鴉片流通量遠少於投入走私的估計量。不過，我們認爲，關東軍及日本在華的軍方機構，無論是實行特許制或政府直接專賣，其以經濟利益爲優先考量的動機（例如爲維持蒙疆政權而增強鴉片種植、華中實行鴉片特許制以其利益扶持南京維新政府），以及坐視日人、朝鮮人、中國人公開販賣或走私鴉片麻藥的立場也幾無二致。明的一面是鴉片漸禁，實質上謀求鴉片產銷的自足，暗的一面卻是嗎啡、海洛因諸毒品隨著鴉片流通。就這方面來看，儘管專賣掌控的鴉片量，如作者所言只是小比例，但是經濟利益的攫取和變相的助長鴉片麻藥流通，對日本的利益而言畢竟還是相當成功的，也可以說日本在華執行的鴉片政策有其成效。而日本所建立的東亞新秩序之所以不能延續，恐怕另有其他變數，並不是日本的鴉片政策不能貫徹或只控制了小量的鴉片這樣的簡單論述可以說明的。

---

[12] 張力，〈國際聯盟禁煙顧問委員會有關日本在華產銷毒品的爭議〉，收於張玉法編，《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冊下，頁 929-951。

[13] 轉引自鍾淑敏，〈臺灣總督府的對岸政策與鴉片問題〉，頁 7。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高華著。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年，705 頁。

對歷史的重新解讀

鄭會欣*

對歷史事件的描述和解釋，離不開對原始資料的掌握，同時更需要歷史家在充分佔有史料的基礎上由表及裏、去僞存真，對史料進行細心的梳理，認真的研判，從而得出正確的結論。長期以來，爲甚麼中國大陸的學者關於中國近現代史，特別是中共黨史的研究無法取得突破，除了資料短缺這個客觀因素之外，在所謂輿論一律、歷史研究應該成爲黨的宣傳工具這類口號之下，廣大學者日益缺乏個人的獨立意識，喪失理性的思考能力，恐怕才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八十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經濟上的改革開放，中國近現代史方面的研究也不同程度地有所寬鬆，表現之一就是大量的歷史檔案（主要是民國各個時期政權的檔案，也包括中國共產黨內的一些檔案）陸續公布於世，雖然這些資料的公布是有選擇的，還遠遠談不上徹底（特別是有關中共黨史方面的檔案），但應承認這已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在二十年前那是連想都不敢想的。與此同時，學術研究不論是其深度還是廣度也都有了長足的進步。以黨史研究爲例，過去人們不敢問津的一些禁區甚至亦有所觸動，如富田事變、肅托肅反、西路軍問題等等，不少學者在充分佔有資料的基礎上，對於以往似乎已作定論的問題大膽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試圖對歷史重新進行解讀。剛剛出版的高華教授的新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就是其中一部力作。

八十年代以前，關於延安整風運動的學術文章並不是很多，有的只是一些回憶和紀念文章，真正談得上是研究的著作或論文更是鳳毛麟角。凡是涉及到延安整風，所有的文章，包括黨史教材幾乎都是一個聲調，這種

*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

狀況就是到了八十年代初也沒有多大改變，譬如當時一部發行量甚大的教科書就是這樣評價延安整風運動的：「整風運動是一次普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運動。實踐證明，它是解決黨內矛盾的正確的成功的方法，是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建設理論的創造性的發展」，「這是繼『五四』思想解放運動之後的又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它繼承了『五四』的科學民主精神，同時又糾正了五四時期的形式主義的缺點」。[1] 近十年來，海內外學者的一些新的研究對於延安整風運動的內幕都不同程度地有所披露，如戴晴的《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89年）、楊中美的《遵義會議與延安整風》（香港：奔馬出版社，1989年），陳永發的《延安的陰影》（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楊奎松的〈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的臺前幕後〉（《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等，但真正全面、系統研究延安整風的學術著作當屬高華的這部新著。

本書凡六十萬字，七百餘頁，是迄今爲止研究延安整風運動最全面、最系統的一部學術著作。作者認爲，延安整風運動是毛澤東運用其政治優勢，徹底改組中共上層機構、重建以毛澤東爲絕對主宰的上層權力再分配的過程，也是毛澤東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徹底轉換中共的「俄化」氣質，將中共改造成爲毛澤東的中共的過程。毛澤東在整風中創造出的思想改造和審幹、肅反兩種手段，沉重地打擊了黨內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和對蘇俄盲目崇拜的氣氛，不僅完成了黨的全盤毛澤東化的基礎工程，而且還建立起一整套烙有毛澤東鮮明個人印記的中共新傳統，這一系列概念與範式相沿成習，它不僅成爲每一個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遵守的行爲規範，同時也改變了1949年以後生活在大陸所有中國人的命運。

本書除前言、後記以及參考文獻、索引之外，正文共分爲上、下兩篇。上篇「延安整風運動的起源」共五章，主要介紹毛澤東與原中共中央領導人歷史上的分歧和矛盾，以及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干預。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逐步掌控了黨權與軍權，抗日戰爭爆發後毛澤東開始對國際派的代

[1]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中國現代史教研室編，《中國現代史》（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年），冊下，頁153。本書1983年剛剛出版時，印數即達八萬餘冊，到1985年第二次印刷時，印數已接近十三萬冊。此書目前仍是中國大陸各大學歷史的教科書。

表人物王明進行迂迴反擊，對於整風運動加緊進行輿論上和組織上的準備。毛澤東從蘇聯的《聯共（布）黨史》中領悟到要想確立自己在黨內至高無上的地位，必須要奪取意識型態的「解釋權」，爲此他採取了兩個主要措施：一是「挖牆角、摻沙子」，大力提拔陳伯達、胡喬木等，組織屬於自己的理論班子；二是「甩石頭」，以所謂黨內兩條路線爲經緯，精心編輯黨內歷史文獻彙編《六大以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還用了相當大的篇幅對毛澤東在江西根據地肅反、肅 AB 團的責任加以詳盡的剖析，實際上這也是說明毛澤東後來在延安整風中之所以大力肅清國際派，以及打擊黨內自由主義的審幹和搶救運動是有其深遠的歷史淵源與現實意義的。

下篇「毛澤東與延安整風運動」共分爲十章，這是本書的重點。作者不惜筆墨，參考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和當事人的回憶，將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作了深入透徹的剖析。

國共分裂後，毛澤東雖然首先在江西創建了農村根據地，開始走上了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並不高，甚至還經常受到當時的中共中央以及來自共產國際的排擠和壓制。這種狀況雖然遵義會議後發生了變化，但是並沒有完全樹立起毛在黨內的獨尊地位。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經過與張國燾的鬥爭、西安事變、抗戰爆發後國共兩黨的再次合作，到了四十年代初，延安已經成爲一個高度組織化和意識型態化的社會。此時延安城三萬七、八千人口中就有三萬多人是中共中央和邊區各機關、學校的幹部，其中大部分又是抗戰爆發後來自國統區的青年知識分子。隨著政治、軍事局勢的相對安定，毛澤東認爲發動一場統一黨內思想、樹立自己絕對權威的運動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而開展延安整風運動正是毛澤東發動黨內鬥爭策略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操練。

毛澤東是一個傑出的戰略家，他清楚地知道，爲了打擊主要敵人，必須團結和依靠一部份人，利用他們作爲貫徹執行自己意志的工具，同時也要在打擊的對象中分化和瓦解另一部份人。

毛澤東的首要任務就是尋找同盟軍。在中央，他的最堅定的政治盟友是劉少奇及其班底彭真等人，他最得力的助手則是剛從蘇聯歸國、王明原來的副手康生，中央辦公廳和中央組織部的主要領導人任弼時、陳雲、李

富春實際上扮演的是毛澤東「內管家」的角色，在地方上，毛提拔重用的是高崗（八路軍留守兵團政委、西北局中央書記），軍隊中他最寵信的將領則首推林彪。在毛澤東的眼中，以周恩來、彭德懷、陳毅爲代表的所謂「經驗主義份子」都曾在歷史上反對過他，必須在運動中加以觸及，目的是打下他們的傲氣，樹立自己的威信，但最終對他們還是要團結和利用的（特別是在統戰和指揮軍隊方面）。毛澤東的打擊對象十分明確，那就是以王明、博古、張聞天、王稼祥爲首的「國際派」，但即使是在打擊對象中也是有所區分的，譬如張聞天、王稼祥曾在遵義會議上站在毛的一邊，因此在處理時情況就不完全一樣。這也說明歷史上的因素以及個人的好惡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始終佔據著極高的比重。

延安整風運動的步驟是：先整國際派，利用「自由主義」打擊教條主義；然後再利用部分投降的國際派以及軍隊中的高級幹部整肅在黨內具有「五四」傳統、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知識分子（以王實味、丁玲爲代表），最終樹立起毛澤東在黨內、軍中無比崇高的地位。

延安整風是有組織（在中央總學委的統一領導下進行，中央社會部、組織部和中央黨校則是重要的領導機構）、有步驟（整風——審幹——肅反——搶救）、有計劃（從上到下、從陝北的中央機關到各地方根據地）進行的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它對於日後中國共產黨的成長乃至於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都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作者在書中列舉了大量個案，對肅反及審幹搶救中的過程及其種種表現作出了極爲細緻的描述，這從書中第十一章「從整風到審幹」的小標題和內容即可見其端倪：

一、教化先行：首先認真聽取傳達報告，反覆閱讀上級爲整風運動精心編輯的文件，吃透中央精神，在思想和輿論上先做好準備；

二、排隊摸底：所有參加整風的幹部不論是高級幹部還是中下層幹部，都必須寫出具有自我批判性質的反省筆記，供領導人參考，以此了解幹部的「活思想」；

三、審查在後：對自由主義，要求所有幹部填寫「小廣播調查表」，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動員並強制廣大黨員交代自己的言行，這在中共政治生活中還是第一次；

四、向黨交心：指令每個黨員和幹部必須以書面的形式，詳細交代個

人的歷史，包括填寫幹部簡歷表和撰寫詳細的個人自傳；

五、「脫褲子、割尾巴」：整風審幹運動期間，在來自強大的自我壓力和集體壓力的雙重重壓下，所有幹部的靈魂都受到強烈的震撼和撞擊，猶如經歷了一次漫長的心理煉獄；

六、「新人誕生」：經過這麼多程序，最終黨組織給每個人作出政治鑑定，於是黨員和幹部向黨獻上一顆赤誠的心，最後徹底埋葬「舊我」，自我意識逐漸消失，「新人」隨之而誕生。

隨著整風的結束、「新人」的誕生，毛澤東終於在黨內、軍中確立了他至高無上的領袖地位，「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爲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一首陝北民歌應運而生，響徹雲霄。

作者認爲，交替使用教化與強力方法鍛造「新人」是毛澤東的一大發明，與斯大林的清黨和肅反運動相比，坦白審幹運動在觸及和改造人的靈魂方面，不論是在深度還是廣度方面都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程度。再深一層研究，這場基於明確政治目的而發起的運動，可謂土洋結合，除了套用列寧、斯大林的若干概念和方法之外，在其運作方式和操作實踐的背後，還帶有極爲濃厚的傳統中國內聖之學的痕跡，幹部坦白交代和自我剖析與宋明理學的「格物致知」、尋求「天人合一」的路向幾乎異曲同工，除了詞彙和解釋系統不盡相同外，最大的區別乃是前者在手法上更具強制性。凡是對於中國當代史略有了解的讀者看過此書之後大概都會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建國後所發生的眾多政治運動，如肅反、反右、社會主義教育（四清），一直到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其手法與延安整風完全是一個模式，所不同的只是規模日益擴大、手段日臻完善罷了；而延安整風運動所開創的填履歷、寫自傳、作鑑定、建立檔案等一系列制度更是延續至今，成爲黨和國家管理幹部、審查幹部的重要方式。

以往大陸的宣傳與黨史教材對於延安整風只是讚揚它是如何肅清了教條主義的影響，達到了黨內的團結，而將整風與審幹、搶救運動截然分開，即使不得不提到搶救中的錯誤，也只是將其全部歸咎於康生一個人身上，對於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應負的責任不是隻字不提，就是避而不談。作者在佔有大量資料的基礎上，對延安整風運動的經過、中央社會部與總學委在整風運動中的作用和核心地位等問題進行了深入客觀的分析，從而

得出結論：毛澤東是延安整風運動（包括審幹與搶救）所有一切的決策者、指揮者，康生無疑是搶救運動的主要執行者，但他所作的一切都得到毛澤東的支持，至少也是得到他的默許的；同時作者也詳細分析了毛澤東的經歷及其個人性格中的複雜與矛盾。以往人們不大清楚中共其他領導人在整風中的作用，本書則首次詳述了劉少奇、彭真、李富春等人的責任：劉少奇是毛澤東最忠實的盟友，是審幹、反奸運動的決策者；彭真是毛最重要的助手之一，直接負責集中大批高級幹部的中央黨校的整風、審幹和反奸；李富春在整風運動中也是毛澤東核心圈子的成員，專門負責中直機關的整風；而從陝北中央到地方唯一沒有執行搶救運動的只有山東根據地的領導人羅榮桓。

正是由於延安整風運動中所使用的一些方法並不光彩，所以它始終是毛澤東的一大心病（富田事件也是其中之一），這也就是爲甚麼長期以來毛澤東對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諱莫如深的一個主要原因。許多當年在延安被整過的幹部對此心懷不滿，但長期以來一直不敢出聲，偶有發洩，必遭毛澤東的強烈反擊。譬如 1959 年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對毛澤東所說的那句著名罵詞：「華北會議忍了幾年，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的娘不行？」陳毅在 1967 年的「二月逆流」中說：「文化大革命是歷史上最大的逼供信」，「延安整風搞出了一個劉少奇，怎麼樣了？斯大林搞出了一個赫魯曉夫，又怎麼樣了？」[2]毛澤東聞之頓時發起「無產階級雷霆之怒」，彭德懷、陳毅的下場也就可想而知了。

本書從動筆到定稿前後歷經九年，若加上收集資料，時間就更長了。仔細閱讀全書，我以爲至少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資料豐富，學風嚴謹

作者爲了研究這一課題，花了大量精力，四處搜集資料，這從書後所附的三十多頁參考文獻書錄中即可看出。舉凡大陸公開或內部出版的各種文獻、檔案、年譜、文集、傳記、回憶錄等等，作者都加以認真研讀。實際上作者所引用的資料大都是公開出版，按理說並不難找，但難得的是作

---

[2] 關於「二月逆流」中陳毅的談話有很多種說法，這裏摘錄的是王力的回憶，我認爲是比較可靠的。見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31。

者博聞強記，目光敏銳，善於分析史料，從這些大量往往被其他人所忽略或不注意的資料中爬梳鑑別，點滴歸攏，最後得出自己的結論。所有的解釋都是建立在嚴實的史料基礎上，據事言理，而不是憑空想像，採用不同的資料加以佐證，若只有一條資料，則提出問題，留作參考。因而這是一本嚴謹的學術著作，可以這麼說，未來公布的檔案資料只會進一步證實或補充本書的論斷，而不會推翻其主要觀點。

二、尊重歷史，重現歷史

近年來隨著大量檔案文獻的公布，大批回憶錄也不斷出版，爲歷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補充。但是回憶錄也有其侷限和缺陷，除了因作者的記憶原因，一些具體的時間、地點可能有誤外，爲尊者諱，只講自己過五關，不講自己走麥城則是最常見的問題，因此歷史學家必須參照其他史料才可與回憶錄相互印證，從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本書作者高華博士是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多年來一直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具有相當深厚的研究功底，特別是他的觀察力很強，善於從一些回憶錄語焉未詳、點到即止的話語中追根尋源，探索歷史的真蘊。他曾經以文革前長期擔任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的回憶錄爲素材，引用大量相關的文獻資料，進行深入的分析和認真的考證，對於反右、反右傾和四清運動以及中央政爭與地方間的關係作出了令人深思的闡述，在學術界引起廣泛的注意。[3]

三、文字平實，可讀性強

本書篇幅巨大，考證精細，它不是時下坊間流行的那種記實文學，而是一本嚴肅的學術著作；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全書文字平實，融會貫通，章節之間安排得十分緊密，雖然全書沒有一句對話，但新意卻散布在每一個章節之中，作者善於捕捉每個細節，字裏行間都反映出當年的氣氛，讀者閱讀此書會產生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這在當前出版的各類歷史著作中也是不多見的。

正如作者在「後記」中所說，本書在寫作過程中還存在著很多遺憾，

---

[3] 高華，〈北京政爭與地方——釋讀《江渭清回憶錄》〉，《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8 年 4 月），總期 46。

諸如無法看到中央社會部、組織部等核心機構有關延安整風運動的檔案，未能採訪延安整風運動的親歷者，聽取他們的回憶等等。在我看來，第一個遺憾或許是無法解決的，至少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官方這方面的檔案不可能公開，也不會允許學者去中央檔案局自由查閱；但第二個遺憾則應該說是可以做到而且也是必須做到的。延安整風運動距今已將近六十年，當年親身經歷過這場運動的人已大多謝世，留在世上的人越來越少，如果我們再不去搶救史料，對於歷史來說，那才將會成爲真正的遺憾。

《文明初曙：近代天津鹽商與社會》。關文斌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年，297 頁。

宋惠中*

鹽商是傳統中國商人中最富有的一種，尤其在清代，由於實行商專賣制度，鹽商在「鹽市場的不完全競爭」(imperfect competition of the salt market)下，壟斷鹽利，獲利豐厚[1]，因而成爲最富有的商人。清代鹽業在乾隆年間，臻於極盛，當時中國最大的商幫無論新安商人、山陝商人均以鹽業爲其最主要經營項目。因此，鹽商之興衰及其社會網絡和鹽商與社會文化風氣變遷的關係，一直是史家關注的問題，且已有許多研究成果出現。[2] 但這些

---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1 Ts'ui-jung Liu(劉翠溶), "Feature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of the Ming-Ch'ing Salt Market,"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II)* (Taipei: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1989),pp.559-627.

2 關於鹽業及鹽商的研究可參見佐伯富，《清代鹽政の研究》(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會，1956 年)、佐伯富，〈清代における鹽業資本ついて〉，《東洋史研究》，11：1.2 (1951，1952)、Ping-ti Ho(何炳棣) "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1-2 (June, 1954), Ts'ui-jung Liu, "Feature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of the Ming-Ch'ing Salt Market,"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著作多以整個清代鹽業或兩淮爲討論的重點，討論長蘆即天津鹽商的著作至今尚不多見。[3]

一

本書原以英文草成，後經南開大學張榮明等譯成中文。本書的主要部份即力求再現天津鹽商的歷史與故事並討論國家政權、官僚體系與地方社會的交互作用。本書除導言及結論外，共分八章，第二章「天津城」旨在考察天津城市化的背景，探討天津城在十六世紀前如何由一個軍事據點發展成沿海要塞，從十六世紀開始，天津發展成爲華北的一個主要都會。在此一過程中，漕運及運河的發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因爲要維持運道的暢通，故不得不犧牲天津周圍的治水和墾田事業。使得天津成爲一個水災不斷的城市，也無法發展農業。這種結果頗符合劉伯溫的預言「天津無有兵刀之苦，只透水火之災」。直到清代末葉，當大運河不再用於漕糧運輸

(II),pp.559-627. 陳鋒，《清代鹽政與鹽稅》(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 年)。汪士信，〈乾隆時期徽商在兩淮鹽業經營中應得實得利潤與流向試析〉，《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 年，期 3，頁 95-111。徐泓，《清代兩淮鹽場的研究》(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72 年)。王振忠，《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北京：三聯書店，1996 年)。王振忠，〈明清兩淮鹽商與揚州青樓文化〉，《復旦學報》，1991 年，期 3。朱宗宙，〈清代前期揚州鹽商與地方文化事業〉，《揚州師院學報》，1985 年，期 4。郭正忠主編，《中國鹽業史(古代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與 Jeou-Yi Aileen Yang(楊久誼), *The Muddle of Salt: The State and Merchan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1644-1911*. PhD.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1996. 王思治、金成基，〈清代前期兩淮鹽商的盛衰〉，《中國史研究》，1981 年，期 2。王方中，〈清代前期的鹽法、鹽商和鹽業生產〉，《清史論叢》4（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頁 1-48。何漢威，〈清末最後十五年間政府的籌款方策：鹽斤加價〉，《中國史學》6，1996 年，頁 49-68。林永匡等，〈清代鹽商與皇室〉，《史學月刊》，1988 年，期 3。

3 與長蘆鹽商及鹽業發展有關的論著包括：徐景星，〈長蘆鹽務與天津鹽商〉，《天津社會科學》，1983 年，期 1。葉秀雲，〈清代長蘆鹽運使司及其所屬機構〉，《天津史研究》，1985 年，期 1。孟慶斌，〈長蘆鹽業史述略〉，《河北學刊》，1992 年，期 4。

時，天津的農業才有所發展。

第三章「鹽務」旨在探討長蘆鹽政的運作，考察有清一代朝廷對長蘆的政策及其演變，據以瞭解長蘆鹽商、清朝政府、當地的經濟社會是如何結合在一起的。作者認爲清廷與長蘆鹽商的關係歷經了三個階段：清初至康熙初年的掠奪期；盛清(康熙中至乾隆末)的寬裕期；晚清(嘉慶至宣統)的掙扎期。清帝國初建時，雖以減輕明末的苛捐以號召鹽商爲其效命，但隨即因財政需求恢復停徵的明末鹽稅，由 1644 年至 1658 年即增加了 45%。三藩之亂平定後，之前因戰禍而增加的引課得到了減免，鹽價亦因銀錢比價變動而有所調整，鹽區劃分也得到較合理的安排，鹽商也獲得融銷的便利，奏銷時間更爲寬裕，並獲得包括內務府等國家機構的發商生息，長蘆鹽商因此進入一個鼎盛期。但這種繁榮是以鹽商對政府及官僚的捐輸、報效及行賄爲代價的。嘉慶以後的鹽商歷經銀錢比價的變動、及官方不停的加價使鹽商的成本不停的增加，但鹽商利用走私、賄賂及摻雜使假等方式以自存，作者認爲直至晚清長蘆鹽商仍是有利可圖的。

在第四章「家族」中利用了許多契約、傳記、家信、族譜和官書來討論鹽商家族的運作、興衰及其如何受社會和法律的影響。作者認爲鹽商的私家經濟與他們的許多民事訴訟同樣也帶著國家、社會、經濟間種種矛盾的烙印。家族既是生產、消費的單位，又是投資的單位，此外還是鹽商們社會化自我再生產的機器。商人家族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應歸功於能集中安排和使用集體的資金，家長在其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家長的領導下，家族資金的集中與共享，教育和勞動的分工，成員間的合夥投資均有益於整個家族經濟的發展。並利用聯姻等方式拓展關係網絡，爲鹽商與其它地區的精英的溝通創造機會，並爲其在全國崛起奠定了基礎。隨者家族財富的累積，私人的利益及分家的因子也在滋長。因爲鹽商的私人財產涉及鹽稅及鹽業專賣權，因此在鹽商的分家過程中，國家扮演著一個爲難的角色，分家和財產的糾紛常常要由鹽運使來裁決。爲了有益於社會的和睦、秩序與穩定，不得不在家長的權威和個人財產權之間保持平衡。並借助地方習慣法和中介人的調解以解決衝突。

第五章「鹽商的社會文化網絡」則透過對遂閑堂張氏、沽水草堂安氏和水西莊查氏這三家十八世紀長蘆巨富興衰的描述，對天津的「鹽商文化」

進行剖析。作者認爲鹽商的經濟基礎來自於國家認可的壟斷經營，他們的生意仰仗國家貸款、提繳停減種種課稅，這意味著鹽商的財富與國家政策緊密相關。因此鹽商必須獲得政府的最新訊息、掌握政策的變化，甚至揣摩皇帝的聖意。爲了達到此一目的，鹽商們結交官府、鑽營權貴，籠絡匯聚京城的勢要，也以詩文之會，有意識的模仿士大夫階層的文化，並培養家族成員考科舉以進入士大夫階層的社會網絡。鹽商的書齋、花園成爲社會網絡的兩個世界，其在空間上雖在城牆或城市政治中心之外，但在鹽商的詩社和宴會上創造了一個空間，使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諸多成份融爲一體。

鹽商在天津或僑寓、寄籍或入籍天津，透過通婚、世交、鄉誼形成日益深廣的地方關係網絡，而發展出鹽商與地方的共同利益與歸屬感。第六章「社會」旨在分析鹽商自十七世紀以來是如何參與種種的地方公益事務的。鹽商運用其財力、物力及人力，在地方官及鹽運使的鼓勵下，創設水會、粥廠，修橋、築路以服務桑梓。鹽商的這些社會服務傳統當然可視爲鹽商的公關行爲，但事實上也擴展了這些紳商的影響力，甚至超過了傳統的士紳。庚子以後，鹽商也發展了天津的教育事業、興辦學堂，引進女子教育及職業教育。但作者也指出，在這些公共事業的發展中，鹽商的角色雖然愈來愈重要，但鹽商並未對當地政府或國家造成威脅。相反的，鹽商在鞏固其自身地位的同時，也維持社會的穩定。因此鹽商與政府間是一種共生共利的關係，彼此並非零和遊戲，而是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同時都得到拓展。

在晚清的新政與民族主義的浪潮下，紳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第七章「變革的時代」及第八章「多變的政治」即在分析此一發展過程。在商戰思潮的影響下，天津的商人開始投資現代化工業，部份較積極的鹽商也參與其中。另一方面在晚清的預備立憲自治團體中，鹽商與其他的商人也獲得了許多席位，其影響力甚至超過以地主爲主的傳統士紳。天津商會更在王賢賓等長蘆綱總的領導下成爲一個跨行會、行業，代表整個天津商界利益的組織。協助天津的政府與商民處理銅元危機、1908 年的銀色風潮與洋貨進口危機及橡膠風潮等重大財經事件。作者認爲天津商會的領袖，不僅僅聽命於官方，也要考慮地方的需要。因此他們的活動很快就超出官方所

認可的範圍，不僅對市政提出意見，更就帑利、稅收及支出等方面和地方官有不同的意見，呈現出相對的自主性。

在第九章「危機」中作者詳述了 1911 年的天津鹽務風潮，導致長蘆綱總、天津商會總理王賢賓等累商被抄家的經過。作者認爲在此一事件中，累商所欠的洋債約 700 萬兩，與由商會協助處理的洋貨風潮 1,400 萬兩的債務相較，並非毫無解決的餘地。但由於官方的介入，使私人與洋商間的債務複雜化，官方最後宣布累商破產而沒收其引地也顯示出鹽業專賣體制及其法律基礎的模糊性及侷限性。但在此一過程中仍可看到清政府不論衰弱到何種程度，仍能合理合法的將政府的意志強加於人民之上。

二

鹽商是傳統中國最重要的商人，一直是史家關注的焦點。在鹽商的研究史上，本書可以補多方面的不足。關於鹽商的研究，學界的重點向來置於兩淮鹽商，討論其他區域鹽商的著作並不多見，本書以天津的長蘆鹽商爲中心，正可以與以往許多討論兩淮鹽商的論著進行比較與對話。關於鹽商資本積累及其興衰的討論，由何炳棣開其端，[4]王方中、薛宗正、蕭國亮、汪士信等人皆有所討論，[5]對於鹽商未能積累資本及其資本流向有奢靡說、捐輸宗族說、爲善說、窖藏說及政府壓榨說等。首先在鹽商的奢侈性消費方面，以往的研究多將其視爲鹽商窮奢極欲、誇示富豪，耗費社會資源，也使得鹽商的資本無法積累。但本書的研究卻指出，鹽商的追求奇技淫巧的心態，是因其不被社會接受而導致內心焦慮的結果。而鹽商賴以致富的

---

4 Ping-ti Ho, "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7:1-2 (June, 1954).

5 王思治、金成基，〈清代前期兩淮鹽商的盛衰〉，《中國史研究》，1981 年，期 2。王方中，〈清代前期的鹽法、鹽商和鹽業生產〉，《清史論叢》4（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頁 1-48。薛宗正，〈清代前期的鹽商〉，《清史論叢》4（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頁 49-64。蕭國亮，〈清代兩淮鹽商的奢侈性消費及其經濟影響〉，《歷史研究》，1982 年，期 4。汪士信，〈乾隆時期徽商在兩淮鹽業經營中應得實得利潤與流向試析〉，《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 年，期 3。

經濟基礎的不穩定，更加重了其追求社會認可的壓力。鹽商即利用其財富建構其社會政治文化網絡，鹽商藉由組織詩社、游園會、收藏古玩、結交文學之士及朝中官僚，這不僅有利於其社會地位的提昇，事實上在維繫鹽商的壟斷性商業活動上也具有重要的功能。[6]

其次在捐輸宗族說方面，以往的研究多認爲鹽商一旦發家後在家鄉修祠堂、置祭田，並贊助家族成員從事科舉或文化學術活動，而中國家族中的分家制度以是使鹽商無法從事資本積累的重要原因。本書作者則認爲，鹽商的成功在於能集中安排和使用家族集體的資金，而家長對於教育及社會網絡的安排更能使家族經濟的地位更穩固。參加科舉考試事實上是維繫家族權利的重要方法，進入官場的家族成員並不完全脫離鹽業經營(如嚴修、李士銘等)。關於分家，本書作者則指出，因鹽業的專賣權，使得政府常需介入鹽商的分家案件中。分家雖代表家族經濟的終結，但在有共同經濟利益的情況下，某些家族成員仍會用合股或其他方式合作，因此分家並不一定代表經營資本的分散。關於天津鹽商家族我更感興趣的一個問題是，當徽商在兩淮由重祖籍地緣漸漸土著化而以僑寓地爲中心重修族譜、重建宗祠時，[7]在號稱「津門無土著」的天津，長蘆鹽商家族們是如何看待他們與地方上的關係，是寄籍、僑寓或土著？

第三，在爲善說方面，鹽商參與許多地方公益及慈善事業，已是眾所週知的事，許多地方公共事務的經費已成爲鹽商日常支出的一部分。[8]問題在於這些支出的性質及對鹽商的意義。作者認爲若考慮這些社會活動所付出的資金，鹽商累積財富的速度可能會減緩，但對於無形資產而言，其代價則是微小的。

第四，對政府的捐輸與官員的行賄，一直被認爲是鹽商最重的負擔，有的學者甚至認爲這些苛勒佔鹽商應得利潤的 60%以上。[9]本書則認爲這些

---

6 園林的社交活動及其功能可參見王鴻泰，《流動與互動——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測公眾場域的展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 年)，頁 44-82。

7 王振忠，《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北京：三聯書店，1996 年)，頁 58-73。

8 見《清鹽法志》，卷 34，〈長蘆 25・雜記門・善舉〉；卷 35，〈長蘆 26・雜記門・學校〉。

9 汪士信，〈乾隆時期徽商在兩淮鹽業經營中應得實得利潤與流向試析〉，《中國經濟史研究》，

徵斂對鹽商而言可能不是負擔，而將其視爲鹽商成本的一部份。付出愈多，獲利也就愈多。這樣的說法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因爲鹽商的捐輸大多不是一次支付的，常是分年代徵的。而且在捐輸之後也常有加斤加價的「恩典」，因此捐輸事實上也就是鹽商與官方某種程度的交易，真正支付這些捐輸款項的反而是吃官鹽的一般民眾。

三

本書各章節雖各有主題，但基本上仍依照時間的序列由明代天津衛的興起至 1911 年長蘆鹽商的洋債危機。但或許是資料所限，第五章以前是以康雍乾爲主要的背景，第七章以後則主要討論 20 世紀初的變革。嘉道至咸同年間即以十九世紀爲背景的討論則較欠缺。而這段時間是中國另一大的鹽區——兩淮鹽區的制度面臨鉅大變革的時代，道光年間的廢引改票導致大鹽商破產者頗多，同治年後雖將票法參以綱法，使專商再興，但已大不如前。在銀錢比價變動，淮商無以爲繼的年代中，天津的長蘆鹽商如何度過危機，是頗值得討論的問題。

本書還觸及一個令我感到頗爲有趣的課題，就是長蘆鹽商對現代企業的投資。在晚清的商人研究中，似乎有將傳統商人與現代企業商人分開討論的傾向，在討論新式企業時，幾乎都是以買辦商人爲對象，而認爲鹽、典、錢業是傳統商人的重心。但作者指出長蘆鹽商大量投資於天津的現代企業，包括燭皂公司、捲煙公司、保險公司、火柴公司，甚至鐵路公司。作者指出，鹽商所投資的現代企業與官辦和官督商辦企業不同，投資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裏。而在興辦新式企業時，鹽商與政府和買辦商人及洋人間的互動，及這些新式企業所需的龐大資金是否是造成鹽商們擴張信用向外國銀行的大量借款，最後導致長蘆鹽商的破產，則是我更有興趣探討的。

作者指出，本書「從史實出發，盡量避免套用某些理想化的模型來解釋或預測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此處他力圖避免直接使用「市民社會」

1989 年，期 3，頁 108。

等有爭議的名詞，但本書仍相當明顯的是以國家——社會的論述爲主軸。在最後三章中明顯強調天津商會的影響，這個部份若能與既有的商會研究做一比較，當更能突顯此種商人團體與國家互動模式的多樣性。[10]但我認爲作者在這部份的討論中似乎將商會的活動皆視爲長蘆鹽商的活動，事實上，鹽商對商會的影響程度是可以再考慮的。天津商會的總理王賢賓雖是鹽商出身，但在天津商會所組成的各種行業中，並未見鹽業加入。[11]王賢賓出任商會總理的身份雖是「中和店鹺務財東」，但除了他之外，天津商會的會董及行董中就無其他鹽業代表了。[12]事實上，就全國十餘個商務總會而言，也僅有江寧、重慶、貴州、江西、陝西商務總會有鹽業代表。[13]因此鹽商在商會中的影響力是值得重新檢討的。

最後，本書因爲是翻譯之故，有許多名詞有相當明顯的錯誤，並有許多手民之誤。如頁 35，註 16 松蒲章當爲松浦章、吳金強當爲吳振強之誤；同頁註 17，Jonathan Spence 中文譯名爲史景遷；註 18 樊伯川當爲樊百川。頁 59 之附錄二 A、附錄二 B、附錄二 C 當爲附錄一 A、附錄一 B、附錄一 C 之誤。頁 62 註 10 當爲《清鹽法志》卷 3，頁 1b-2a，而非頁 21。頁 203 註 1 的 Min Tu-ku 當爲韓國學者閔斗基，註 4，應爲《中美工約風潮》。頁 127 註 44，張玉發當爲張玉法之誤。僅列於此供作者及讀者參考。

---

[10] 既有的商會研究包括蘇州商會的馬敏、朱英，《傳統與近代的二重奏——晚清蘇州商會個案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93 年)、邱澎生，《商人團體與社會變遷：清代蘇州的會館公所與商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5 年)。討論上海商會的徐鼎新、錢小明，《上海總商會史(1902-1929)》(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 年)、張桓忠，《上海總商會研究》(臺北：知書房出版社，1996 年)。

[11] 見〈全津各行業加入商會清單〉，天津市檔案館、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聯合會編，《天津商會檔案匯編(1903-1911)》(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63-78。

[12] 見〈光緒三十四年分商會會董行董經營事業簡明表〉，《天津商會檔案匯編(1903-1911)》，頁 88-92。

[13] 馬敏、朱英，《傳統與近代的二重奏—晚清蘇州商會個案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93 年)，表 2。

大事紀要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

(2000.4-2000.9)

蕭郁雯・張珍琳*輯

2000.04.06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與思想組學術研討會，由副研究員湯熙勇先生主講：〈集中管理與審判問題：戰後初期在中國大陸之臺民〉。

04.06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題座談，由上海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葛劍雄教授主講：〈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疆域〉。

04.1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邀請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熊月之先生主講：〈張園與晚清上海社會〉。

04.1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研究室第七次討論會，由淡江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邱仲麟先生主講：〈耆年冠帶——關於明代「壽官」現象的考察〉。

04.18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研討會，由研究助理劉士永先生主講：〈日治時期臺灣死因結構初探〉。

04.19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會茶敘活動，由美國密西根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傅爾布萊特訪問學員 Jr. Kenneth M. Swope 主講：〈野域：萬曆朝之國際爭端與國內叛亂〉(Wild Frontiers: International Incidents and Domestic Rebellions During the Wanli Reign)。

04.22　由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等單位主辦之「亞際文化研究系列學術討論會 VI」，由韓國漢城聖公會大學 NGO 研究所主任、人民參與民主連帶副秘書長 Cho Hee-yeon（曹

* 蕭郁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張珍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

喜松）主講：〈Social Movements aft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Regime: Korea and Taiwan〉。

04.2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學術演講，邀請政治大學法律系教授陳惠馨女士主講：〈「兩性關係與法律」的教學與研究〉。

04.26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第七次討論會，由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助理教授張嘉鳳主講：〈疾病、戰爭與政治—以天花對清初滿人的影響爲例〉。

04.2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林明德先生主講：〈「大東亞共榮圈」與中國：戰爭與和平的抉擇〉。

04.2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外華人研究群」學術演講座談會，邀請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教授熊建成先生主講：〈古巴的華人〉。

04.29 跨校際之「近代中外關係研讀會」，邀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林滿紅女士主講：〈中國海洋關係的轉折點：試以十八世紀雲緬、日本、美洲等地白銀的衝擊力作觀察〉；文化大學史學系助理教授朱心然先生主講：〈傳道與外交之間？伯駕(Peter Parker)使命感的分析〉。

05.04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學術研討會，由副研究員朱德蘭女士主講：〈戒嚴時期（1949-1987）臺灣的「匪諜」案〉。

05.0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邀請慶應大學教授山田辰雄先生主講：〈戰後日本近代中國史研究的發展與變遷〉。

05.05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會舉辦聯合座談，邀請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兼副所長張顯清先生，歷史所研究員劉重日先生、王戎笙先生、王春瑜先生、商傳先生和近史所張德信先生主講：〈大陸明史研究趨向〉。

05.05 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主辦「回顧老臺灣・展望新故鄉—臺灣社會文化變遷學術討論會」，在該校舉行兩天（詳細情形請參見本期洪建榮的會議報導）。

05.06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近代史研究所海外華人研究群、臺灣宗教學會、中央廣播電臺、中華科技整合研究會主辦「宗教與全球華人系列座談：東南亞之部」，邀請清海無上師主講：〈清海無上師觀音法門與東南亞華人〉。

05.1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思想史組「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1600 迄今」系列演講，邀請師大美術系王正華教授主講：〈藝術史的圖像研究：歷史、方法與實例討論〉。

05.1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演講，邀請北京大學歷史系副主任董正華教授主講：〈大陸學界現代化研究相關議題的探討〉。

05.1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賴惠敏及林滿紅女士分別報告「清前期懲貪案件——以八旗官員爲例（1700-1799）」和「有等級區分的均富思想——論中國文化的一個關鍵概念及其在臺灣歷史中的實現(兼談西方知識論中 eclectic affinity 的概念)」。

05.20 「近代中外關係研讀會」邀請北京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員楊奎松先生主講：〈四十年代中共對美政策調整的意識形態考量〉；中興大學歷史系研究生張齊顯先生主講：〈北京政府外交部之人事與組織變遷分析〉。

05.20 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近代史研究所海外華人研究群、臺灣宗教學會、中央廣播電臺、中華科技整合研究會主辦「宗教與全球華人系列座談：東南亞之部」，邀請義守大學共同科專任教授依昱法師主講：〈臺灣的人間佛教與馬來西亞地區的華人信仰〉。

05.2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許雪姬女士主講：〈日治時期臺灣面臨的海盜問題：澎湖振成利號遭搶事件爲例〉。

05.26 由東吳大學歷史系主辦「史學與文獻學學術研討會」，於該校舉行一天。

05.27 由臺北政治大學、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廣州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聯合主辦之兩岸三地「研究生視野下的近代中國」學術座談會，假廣州中山大學舉行，約有七十位來自三地的師生參與討論。

06.03 由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臺灣宗教學會、中央廣播電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外華人研究群、中華科際整合研究會主辦「宗教與全球華人系列座談：東南亞之部」，邀請高雄市文化院院主蔡文先生主講：〈高雄市文化院與東南亞華人的德教〉。

06.05 由中國近代史學會主辦之「韓戰五十年」學術座談會，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行，擔任引言報告者有：李明，〈從南韓的角度看韓戰之意義與影響〉、劉維開，〈蔣中正總統對韓戰及相關問題的看法與政策〉、張淑雅，〈韓戰研究概況〉、林正義，〈美國政府對韓戰的策略〉、楊奎松，〈蘇聯與中共對韓戰之因應〉。

06.07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主辦，中華民國史蹟研究中心及日本交流協會臺北事務所協辦「臺灣文獻史料整理研究成果展暨研討會系列活動」，由中日學者專家宣讀論文十四篇，並邀請日本駿河臺大學廣瀨順皓教授專

題演講：〈目錄之電子化、國際標準——以日本之現況爲例〉。

06.0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助研究員巫仁恕先生主講：〈節慶、信仰與民變：明清城隍信仰與城市群眾的集體抗議行爲〉。

06.0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午餐會，邀請宜蘭技術學院副教授、前總統府交際科專員文祖湘先生主講：〈我眼中的蔣、李兩位總統〉。

06.1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院所學術討論會，由助研究員余敏玲小姐主講：〈蔣介石與聯俄容共政策之再思〉。

06.15 「近代中國歷史學與歷史思想研討會」(Workshop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Thinking)在德國海德堡大學舉行三天，此項會議重點在於近代中國史學和歷史思想之發展，及其與不同記憶型態的關係。尤其著重中國、日本、西方史學和史觀的交互影響、新史學的出現及傳統觀念在其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06.16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醫療生命史研究室」主辦「疾病的歷史」研討會，假該所舉行三天（詳細情形請參見本期張哲嘉的會議報導）。

06.17 「中外關係研讀會」邀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助理教授林秀玲主講：〈中國文物外流形式的探討，1850-1940：軍事掠奪、考古探險及盜運〉；花蓮師範學院社教系副教授吳翎君主講：〈民初中美合作開採油礦之交涉，1914-1917〉。

06.23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學術演講，由助研究員陳志柔教授主講：〈中國大陸改革的制度變遷：地方社會制度與鄉鎮企業產權變遷〉。

06.27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會第五次聚會，邀請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歷史系教授曼素恩女士（Susan Mann）主講：〈前國家時期中國史的性別化〉（Engendering the History of Pre-National China）。

06.29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學術研討會，由助研究員劉序楓先生主講：〈清代環中國海的海難事件研究——以中、日間對難民的救助及遣返制度爲中心〉。

06.29 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6 月 29 日起舉行三天。有關近代史研究的論文如下：Diana Lary, "The Scar of War: The Impact of Anti-Japanese War On Chinese Society"；林美莉，〈抗戰後期國民政府的物資搶運〉；張瑞德，〈戰爭與工人文化——抗戰時期大後方工人的認同問題〉；黃源盛，〈民國初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習慣——以大理院裁判史料爲中心的考察〉；Brian E. Mcknight, "Studies of Pre-modern Chinese Legal

History in the 1990's"；鄭培凱，"Water Lilies and Courtesans' Chastity: Male Interests in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the Late Ming"；林維紅，〈婦道的養成——以晚清湘鄉曾氏爲例的探討〉；Susan Mann, "Women's History, Men's Studies: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on Gen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陳存恭，〈中共在山西的戰爭動員（1936-1945）；周惠民，〈歷史教育與國家意識〉；汪榮祖，〈章氏六經皆史說再議〉；黃克武，〈幾道先生情最真？：嚴復的異性情緣與思想境界〉；石川禎浩，〈「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告示牌問題考〉； Thomas A. Metzger, "China's Current Ideological Marketplace and the Problem of "Morally Critical Consciousness"。

07.0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學術討論會，邀請 Prof. Thomas Buoye (University of Tulsa)主講 "Ideology and Economic Change: Commercialization of Land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意識型態與經濟演變：十八世紀的土地商業化）。

07.0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助研究員葉其忠先生主講：〈名實（詞）之辨：給張東蓀貼所謂的「唯心主義者」標籤和他自評析論〉。

07.06 由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與香港中文大學聯合主辦之「第三屆中國商業史國際研討會」，於香港舉行三天（詳細情形請參見本期趙祐志的會議報導）。

07.07 由中國近代史學會主辦之「國共問題與兩岸關係——歷史的角度」學術座談會，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行，擔任引言報告者有：蔣永敬，〈從第一、二次國共分合看兩岸關係〉、陳存恭，〈抗戰時期國共關係的省思〉、楊奎松，〈歷史上國共兩黨的民族主義及其影響〉、王成勉，〈美國在戰後調停國共問題所扮演的角色〉、吳安家，〈拋棄國共鬥爭情結以開展兩岸關係〉。

07.11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研討會，邀請臺東師院講師李玉芬女士主講：〈綠島人文生態的變遷〉。

07.1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檔案管理與運用研討會」，邀請政府主管機關、檔案典藏機構、圖書資訊學界及檔案使用者等相關人員與會討論。會議分檔案法與檔案管理、檔案保存、檔案教育、檔案數位化四個主題（詳細情形請參見本期莊樹華的會議報導）。

07.13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學術研討會，由兼任研究員王世慶先生主講：〈「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之土地投資與經營——以總

督府出資之社有土地爲中心〉。

07.1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午餐會，邀請美國 DePauw University 副教授江勇振先生主講：〈近代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1919-1949〉。

07.18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研討會，邀請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助教授 Daniel Botsman 主講：〈Prisons, Punishment and the Politics of Civilization in Japan and its Empire〉。

07.2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陳慈玉女士和朱浤源先生分別報告「戰時統制下的臺灣礦業」和"Perspectives of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sia: Zeng He and Malacca as a Case Study"。

07.2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李恩涵、林明德兩位教授榮退演講會。

07.28 由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等單位主辦之「族群互動與泰雅族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於花蓮舉行三天。

08.0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般近代史組「一九五〇年代的臺灣海峽兩岸」系列演講，邀請卿斯美博士(Dr. Simei Qing)（密西根州立大學麥迪遜學院副教授，Madison College,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主講："Conflicting CCP Visions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1950s"。

08.02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邀請國際古蹟保存總會（ICOMOS）執行會員西村幸夫（Yukio Nishmura）教授蒞局演講，講題：〈新世紀城鄉風貌之形成與營造——市民參與及歷史活化機制之運作〉。

08.0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戰爭與社會研究群學術演講，邀請米德博士（Dr. Rana Mitter, 英國 Warwick 大學歷史系講師）主講：〈民族主義、抵抗與合作——九一八事變後的東北〉。

08.03 由西北大學等單位聯合主辦之「西安事變實證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假西安市西北大學舉行三天。

08.05 由臺中縣政府文化局主辦，財團法人阿罩霧文化基金會承辦，二級古蹟霧峰林家宅園研討會系列之一：〈霧峰林家宅園災後重建的檢討〉，假臺灣省議會紀念園區舉行，分三個主題：阿罩霧整體重建的意義、霧峰林家宅園保存的意義、震災後古蹟清理工作的進行與保存。

08.08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研討會，由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許佩賢女士主講：〈明治時期的公學校運動會〉。

08.1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

系教授胡春惠先生主講：〈清末民初延邊的朝鮮移民〉。

08.1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組專題演講，由魯汶大學社會及文化人類學博士張雯勤主講：〈以泰北的前國民黨雲南人爲例，看漢人陸地跨境移民的特殊意義〉、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生主講：〈族群想像與異己建構：明清時期滇黔異族書寫的人類學分析〉。

08.1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組專題演講，由英國曼徹斯特大學人類學博士候選人鄭依憶主講：〈「族群」、歷史、文化：以賽夏矮靈祭爲例〉。

08.17 由瑞典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歐洲日本研究所與瑞典國際事務學院合辦之「日中關係研討會」(Academic Workshop on The Japanese-Chinese Relationship)，於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三天。

08.18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中心、財團法人黃烈火社會福利基金會主辦之「客家文化講座：族群、社區與文化」（至 9 月 8 日），乃基於農曆七月份正是客家社群義民信仰的重要節日，透過講座的舉辦，由圍繞義民信仰相關議題的揭視，省思當代臺灣族群的歷史與現實課題。講題分別是：〈鄉土學習與社區營造〉、〈由客家語彙看客家個性〉、〈中壢老地名漫談〉、〈義民爺信仰與臺灣族群關係〉、〈道教信仰與客家社會〉、〈義民信仰與中壢開發〉。

08.20 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主辦「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國際研討會」，在武漢市舉行四天，討論中國社會結構與社會意識的歷史變遷。

08.21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會主辦之「明清物質文化、日常生活與中國」讀書會演講，邀請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承載先生主講：〈明清之際的文人職業畫家〉。

08.2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午餐會，邀請美國 Rowan University 歷史系王晴佳教授主講：〈中國史學史研究的過去與未來〉。

08.23 由蒙藏委員會召開之「十年來蒙古的政經發展及未來展望」學術會議，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兩天，計邀請來自美國、英國、德國、外蒙古等地九位學者與會研討，連同國內學者共發表十六篇論文。

08.2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由助研究員張寧女士主講：〈在華英人之間的文化衝突：上海「運動家」對抗「鳥類殘害者」，1899-1920〉。

08.25 中央研究院東北亞區域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外交

史組舉辦學術演講，由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選人須藤瑞代主講：〈近代中國婦女思想的變遷——以 1903 年博覽會事件爲例的探討〉。

08.28 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籌備處舉辦座談會，邀請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鄭吉雄先生主講：〈乾嘉治經方法中的思想史線索〉。

08.29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研討會，由副研究員蔡慧玉女士主講：“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s in Wartime Taiwan, Indonesia, and Japan (1940-45)”。

08.31 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學術討論會，由研究員林慶彰先生主講：〈顧頡剛與錢玄同〉。

09.05 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辦，中正大學歷史系協辦之「南臺灣鄉土文化學術研討會」，假該校舉行兩天，針對南部六縣市的原住民、移民拓墾、產業開發、家族發展、社會結構、政治演變、宗教信仰等課題，邀請學者共發表論文十八篇。

09.06 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主辦之「被殖民都市與建築」國際學術研討會，假該所舉行兩天，討論主題包括民族建築與文化互動、多樣的殖民都市與建築、日本殖民都市與建築、殖民與都市史、建築史之研究，邀請學者共發表論文二十餘篇。

09.0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邀請司徒琳博士(Dr. Lynn A. Struve, Prof. of History &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 Cultures, Indiana University) 主講：〈清代形成的時間定位問題：西方的一些想法〉。

09.09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與思想組學術研討會，由副研究員湯熙勇先生主講：〈清代中國救助朝鮮難船的方法——以臺閩地區爲中心〉。

09.09 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暨新史學雜誌主辦之「歷史教科書與歷史教學」座談會，假該所舉行一天。

09.1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般近代史組「一九五〇年代的臺灣海峽兩岸」系列演講，邀請愛知大學副教授三好章先生主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識字運動——以 1950 年代爲中心〉。

09.1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午餐會，邀請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王碩先生主講：〈從婦女生活的變化看清前期滿漢文化的融合〉。

09.1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學術演講，邀請日本成蹊大學教授湯山トミ子女士主講：〈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母子關係與母愛觀念的形成：以魯迅爲例〉。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1~30 期總目

＊篇名之後括弧內爲作者，阿拉伯數字代表期數＊

◎學術會議

抗戰建國暨臺灣光復：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三屆討論會（卓遵宏） 21
「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王奇生） 21
「1937 年至 1945 年中日戰爭之再檢討：新資料與新解釋」國際研討會（張力） 21
歐洲思想與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精英文化研討會（黃克武） 21
滬杭史學之旅（陳三井） 21
明末以來中西文化交匯研討會（張力） 22
臺灣商業傳統國際學術研討會（張隆志） 23
船政夢華：紀念福州船政局創辦一百三十週年的研討會（馬幼垣） 23
群英會翠亨——「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追記（陳三井） 23
大陸「第二屆全國青年史學工作者學術會議」記略（謝國興） 23
「紀念西安事變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紀要（徐乃力） 23
「馬歇爾使華」學術討論會簡介（徐乃力） 23
會議消息（曾金蘭輯） 23
「發明過去・想像未來：晚清的『國族』建構，1895-1912」系列活動報導（黃克武） 24
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紀略（胡健國） 24
儒學與世界文明國際會議（徐新建） 24
嚴復研究的新趨向：記近年來三次有關嚴復的研討會（黃克武） 25
第四屆「近百年中日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黃自進） 25
中國現代教育家雷沛鴻教育思想討論會綜述（曹天忠） 25
第二屆東北亞體育運動史學會會議紀要（范春源） 25
會議消息（藍旭男輯） 25
「禮教與情慾：近代早期中國文化的後/現代性」系列活動報導（呂妙芬） 26
「檔案與近代歷史」研討會（任育德） 26
「紀念史學」的登峰造極——「第二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側記（陳三井） 26
A Report on the Workshop of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Shireen Stephen · Rohininandara Dasa Rajagopal) 26
第二屆中國商業史會議簡述（李培德） 27
Maritime China: Culture, Commerce, and Society（Wing-kai To 杜榮佳） 27
「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的重建（1600 迄今）」系列活動報導（張哲嘉、黃克武） 28
五四運動與二十世紀的中國：北京大學紀念五四運動 80 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歐陽哲生、金安平） 28
「五四」如何面臨未來?—兩岸五四運動 80 周年紀念學術研討會參觀記—（白永瑞） 28
The Role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Reflections

and Reconsiderations（民國時期在二十世紀中國所扮演的角色：反思與再考量）國際會議報導（羅久蓉） 28
「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報導（張寧） 29
「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會議紀要（張世瑛） 29
「第六屆中日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李恩涵） 29
「中國商人、商會及商業網絡」——第三屆中國商業史國際研討會會議報導（趙祐志） 30
「回顧老臺灣、展望新故鄉——臺灣社會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紀要（洪健榮） 30
「疾病的歷史」研討會會議報導暨近代史相關論文簡介（張哲嘉） 30
「檔案管理與運用研討會」會議報導（莊樹華） 30

◎學術演講

研究生活的回顧——從梁啓超到現代化（張朋園） 23
對中美關係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William C. Kirby，陳時偉節譯） 23
四十年來研究生涯的回顧（呂實強） 24
梁啓超研究與「日本」（狹間直樹撰，張玉林譯） 24
Racial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Frank Dikötter） 24
師友風誼，道術因緣——退休講演（王爾敏） 25
從歷史觀點看亞洲經濟共同體的型塑（西川博史講・鍾淑敏譯） 26
中國新移民的研究（莊國土） 26
退休茶話（張存武） 27
退休感言:研究院成全了我（蘇雲峰） 28
退休茶話：把酒話桑麻（陶英惠） 29
退休感言：暮靄回首來時路 煙波迷茫念師友（李恩涵） 30

◎會議消息

美國東南區亞洲研究協會第卅五屆年會 21

◎學人簡介

從「海權」與「思想」考察近代中國史的學者——王家儉先生（葉高樹） 21
隨意寫新詩 白首下書帷——周策縱先生治學的三大領域（周昌龍） 21
橫山英先生與中國近代史研究（曾田三郎） 21
王業鍵先生（范毅軍） 22
以「南港學派」的馬前卒爲榮：李國祁先生與中國近代史研究（林麗月） 22
「但開風氣不爲師」的李時岳先生（實成關、李書源） 22
漫漫長路 苦苦求索——羅榮渠先生的學術生涯（林被甸） 22
從梁啓超、立憲運動到現代化——張朋園先生的學術歷程與成就（劉紀曜） 23
「喜託嚶鳴」——屆齡榮退之呂實強先生（張秋雯） 24
平野健一郎先生的學風與學問（古田和子、張啓雄） 24
博古通今，闡幽發微——王爾敏先生的學術志業（劉德美） 25
明晰論斷、發微知漸：孫廣德先生（朱浤源） 25
狹間直樹先生（石川禎浩撰・黃自進譯） 25
巴斯蒂(Prof. 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許文堂） 25
劉鳳翰——中國近代軍事史拓荒者（劉維開） 26
吳承明教授的經濟史研究（葉坦） 26
黃宗智（唐澤靖彥撰、黃秀敏譯） 27
山田辰雄教授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民國史觀」與「歷史的連續性」

（國分良成、高橋伸夫撰・鍾淑敏譯） 27
閔斗基先生的中國史研究與其成就（裴京漢） 27
從圖書館走向歷史研究：蘇雲峰先生的學術生涯與成就（沈懷玉） 28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The Scholarship of Albert Feuerwerker（Thomas Buoye） 28
李恩涵（李仕德・周琇環） 29
魏宏運（江沛） 29
王樹槐（侯坤宏・李宇平・林蘭芳） 30
Roland Felber-On the Occasion of his 65th Birthday (Ursula Ballin) 30

◎研究心得

撰寫《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的若干心得（蘇雲峰） 21
時文稿：科舉時代的考生必讀（劉祥光） 22
中國現代化的俄國觀點：讀朱浤源教授《從變亂到軍省》（魏安福） 22

◎研究與教學

教學與研究生涯四十年（孫廣德） 25

◎研究概況

匈牙利及捷克的中國研究（李國祁） 21
對兩岸研究抗戰期間國共關係史現狀的省思（青石） 21
關於中東鐵路研究評述（譚桂戀） 21
Cities and Urban Society in China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A Review Essay in Western Literature (Christian Henriot) 21
簡介臺灣最近出版的四本近代中國婦女史資料目錄（廖秀眞） 2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中之專案研究計畫(民國 84 年 7 月 1 日—87 年 7 月 31 日)（江淑玲輯） 22
中國大陸太平天國史研究述評（夏春濤） 23
《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出版緣起（李金強） 23
「近代中外關係研討會」介紹（廖敏淑、陳昱伶） 23
上網際網路 INTERNET 查詢近史所資訊（胡國台） 23
中國大陸《近代史研究》簡介（曾業英） 24
牛津大學的中國研究（曾銳生） 25
滿文繙譯的漢籍及其相關研究（葉高樹） 26
中國大陸近代商人之研究（馮筱才） 26
十年來中國大陸有關近代中外經濟關係之研究（陳爭平） 26
十年來臺灣有關抗戰時期經濟史社會史之研究（林美莉） 26
哈佛大學亞洲中心 26
戊戌維新百年研究述評（馬洪林） 27
民國洋票回憶錄之史料價值（徐有威・貝思飛 Phil Billingsley） 27
中國現代政治觀念形成的計量研究（金觀濤、劉青峰、章清） 28
琉中關係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赤嶺守） 29
「南開大學周恩來研究中心」簡介（王永祥） 29
「蔣介石先生與日本」研究計畫（黃自進） 2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中之專案研究計畫（江淑玲） 29
中國都市史研究的課題及其尋求的理論架構（貴志俊彥著・鍾淑敏譯） 30
中國大陸最近之會館史研究（馮筱才） 30

◎研究筆記

冷戰和中國邊疆——中、英、美三國秘檔研究（劉曉原） 27

◎檔案與研究

基督教在華傳教檔案介紹——以美國聖公會「中國差傳檔案」爲例（林美玫） 27

外交部亞太司檔案的內容與利用：從一九五〇年代臺灣對東南亞華僑（華人）政策談起（趙綺娜） 27

淺談中共歷史檔案的利用與研究（楊奎松） 27

簡介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藏有關戰後臺灣經濟之數位化檔案（劉素芬、莊樹華、蔡淑瑄） 27

介紹網路上的兩種清代檔案目錄（賴惠敏） 27

國史館典藏臺灣省教育廳檔案介紹（歐素瑛） 3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行《內閣漢文題本：戶科貨幣類》微捲簡介（鄭永昌） 30

蔣中正總統檔案中之事略稿本介述——以民國19年爲例（陳進金） 30

◎檔案研究

上海市檔案館館藏歷史檔案簡介（史梅定） 28

上海市檔案館館藏日僞政權檔案概況及初步評價、開發（陳正卿） 28

海峽兩岸檔案利用比較（張力） 28

清代巴縣縣署檔案：乾隆朝(1736-1795)，司法類（賴惠敏） 28

王世杰個人檔案整理概述（巫金燕） 28

◎史料介紹

關於中日戰爭日方史料的收藏與介紹（加藤陽子撰，川島眞、傅奕銘譯） 21

越飛與孫中山——蘇俄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的一頁（林軍） 21

大英圖書館有關中國近現代史資料的收藏——倫敦地區史料介紹之一（呂芳上） 22

第一歷史檔案館發行〈清代硃批奏摺財政類〉微捲簡介（賴惠敏） 2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外交檔案有關臺灣史料介紹——從總理衙門檔案看清季臺灣對外關係（莊樹華） 22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經濟檔案保存與整編概況(十三)（蔡淑瑄） 22

《胡適家書》的特點及其史學價值（陸發春） 22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近代中國研究與典藏——倫敦地區史料介紹之二（呂芳上） 2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經濟檔案保存與整編概況(十四)——臺糖檔案介紹（姜正華） 2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澳門專檔》史料介紹（莊樹華） 23

從汪精衛一封未傳送出去的函稿談起（邵銘煌） 23

《酬世錦囊》之內涵及其適用之人際網絡（王爾敏） 24

《胡適與楊聯陞論學書札》編印緣起（陶英惠） 2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外交檔中之華僑資料（姜正華） 2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中英庚款會檔案簡介（周琇環） 25

西班牙外交部總檔案館及其所藏有關中國史料簡介（李毓中） 25

林可勝院士個人檔案整理概述（隋皓昀） 26

關於臺灣拓殖株式會社之檔案（河原林直人撰・鍾淑敏譯） 26

介紹日本愛知大學所藏中國近代史關係資料——霞山文庫與山田良政・純三郎檔案——（馬場毅・黃英哲） 26

新發現的一篇陳熾重要遺稿（孔祥吉、潘光哲） 28

黨史會藏《中行廬經世資料》介紹

（劉維開） 28
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六種羅字特藏資料介紹（區志堅、曾漢棠） 28
訪陶英惠先生談中央研究院院史室資料的徵集（蔡淑瑄） 29
《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及其史料價值（吳蕙芳） 30
《營謀小集》與商販經理知識（王爾敏） 30
李國鼎先生照片資料庫網站介紹（蔡淑瑄） 30

◎問題與討論

評《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楊奎松） 27
敬答楊奎松先生（陳永發） 27

◎學思之旅

平津「取經」行紀聞（陳三井） 29

◎新書評介

黃自進著：《吉野作造對近代中國的認識與評價(1906-1932)》（川島眞） 21
耿雲志、崔志海著：《梁啓超》（黃克武） 21
陶文釗等著：《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對外關係》（吳翎君） 21
吳翎君著：《美國與中國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爲中心的探討》（李仕德） 22
羅福惠著：《湖北近三百年學術文化》（朱英） 22
楊奎松著：《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畢萬聞） 22
莊吉發：《薩滿信仰的歷史考察》（賴惠敏） 23
陳鴻圖：《水利開發與清代嘉南平原的發展》（劉景芬） 23
李勇、張仲田編著：《蔣介石年譜》（劉維開） 23
張壽安：《以禮代理：凌廷堪與清中葉儒學思想之轉變》（小島毅撰，黃自進譯） 24
賴惠敏：《天潢貴胄——清皇族的階層結構與經濟生活》（巫仁恕） 24
張朋園：《郭廷以 費正清 韋慕庭：臺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汪榮祖） 24
Donald A. Ritchie 著，王芝芝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謝國興） 24
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by Joan Judge （張朋園） 25
張啓雄：《外蒙主權歸屬交涉，1911-1916》（呂秋文） 25
蘇雲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李國祁） 25
蘇雲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11-1929》（呂文浩） 26
李盈慧：《華僑政策與海外民族主義(1912-1949)》（林蘭芳） 26
陳淑銖:《浙江省土地問題與二五減租》（侯坤宏） 26
Fountain of Fortune---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 By Richard Von Glahn（邱麗娟、吳明勇、廖鴻綺） 26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By Carol Benedict（趙元玲） 26
Law and Loca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orthern Taiwa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y Mark A. Allee（池勝昌） 26
Japan's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 1859-99. By Shinya Sugiyama（王憲群） 26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齊錫生） 27
余光弘，《清代的班兵與移民：澎湖的個案研究》（許雪姬） 27
蘇雲峰，《三（兩）江師範學堂：南京大學的前身，1903-1911》

（區志堅） 27
林桶法，《從接收到淪陷：戰後平津地區接收工作之檢討》（陳永發） 27
蔡玲、馬若孟，《中國第一個民主體系》（陳儀深） 27
外交史研究的新成就——讀王爾敏著《晚清商約外交》（張憲文） 28
《二戰期間在日中國勞工問題研究》（陳鵬仁） 29
《滿族的婦女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賴惠敏） 29
《陳炯明與聯省自治運動》（張世瑛） 29
《晚清七十年》（洪健榮・范純武・吳美鳳） 29
《晚清經濟政策與改革措施》（趙建國） 29
The Opium Empire: Japanese Imperialism and Drug Trafficking in Asia, 1895-1945. By John M. Jennings（謝美娥・陳惠珠） 30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鄭會欣） 30
關文斌，《文明初曙：近代天津鹽商與社會》（宋惠中） 30

◎研究與討論

明清地域社會論的反思——《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新書序言（岸本美緒著・何淑宜譯） 30

◎研究機構

昆士蘭大學亞洲商業史研究中心（黎志剛撰，葉其忠譯） 24

◎學位論文

臺灣各大學歷史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博碩士論文目錄（1995.3~1996.1）（公小穎輯） 21
臺灣各大學歷史研究所有關近代中國史研究之博碩士論文目錄（1995.11~1996.7）（公小穎輯） 22
臺灣各大學研究所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博碩士論文目錄（丘慧君輯） 23
香港各大學研究所歷屆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之博碩士論文目錄（鄒重華等輯） 23
臺灣各大學歷史研究所有關近代中國史研究之博碩士論文目錄（1996.8~1997.8）（公小穎輯） 24
臺灣各大學歷史研究所有關近代中國史研究之博碩士論文目錄（1997.9~1998.8）（公小穎輯） 26

◎大事紀要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1994.12~1996.3）（公小穎輯） 21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1995.9~1996.9）（公小穎輯） 22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1996.5~1997.2）（公小穎輯） 23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1996.5-1997.9）（公小穎輯） 24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1997.2-1998.3）（公小穎輯） 25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1998.4-1998.8）（公小穎輯） 26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1997.9-1999.2）（公小穎輯） 27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1999.3-1999.9）（劉晨華輯） 28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1999.10-2000.3）（蕭郁雯輯） 29
近代中國史研究大事紀要（2000.4-2000.9）（蕭郁雯等輯） 30

◎來函照登

勘誤表（唐澤靖彥） 28

◎通訊總目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11-20 期總目 21
《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1-30 期總目 30

德國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學者費路(Roland Felber)教授(右一) (攝於1994年臺北)

李國鼎先生（右二）與中央研究院院士顧應昌、劉大中、費景漢和蔣碩傑四位先生（由左至右）向蔣中正總統提出臺灣財經改革意見（攝於1967年梨山行館）

本期要目

「中國商人、商會及商業網絡」——第三屆中國商業史國際研討會會議報導
「回顧老臺灣、展望新故鄉——臺灣社會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紀要
「疾病的歷史」研討會會議報導暨近代史相關論文簡介
「檔案管理與運用研討會」會議報導
退休感言：暮靄回首來時路 煙波迷茫念師友
學人簡介——王樹槐、Roland Felber
中國都市史研究的課題及其尋求的理論架構
中國大陸最近之會館史研究
《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及其史料價值
《營謀小集》與商販經理知識
李國鼎先生照片資料庫網站介紹
國史館典藏臺灣省教育廳檔案介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發行《內閣漢文題本：戶科貨幣類》微捲簡介
蔣中正總統檔案中之事略稿本介述——以民國19年為例
明清地域社會論的反思——《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新書序言
新書評介三本